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鲁国尧自选集

LUGUOYAOZIXUANJI

● 河南教育出版社



封面题字 吕叔湘

鲁国尧 (1937.11—), 江苏泰县人。1964年北京大学汉语史专业研究生毕业。现任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南京大学教授, 复旦大学兼职教授。曾任日本东京大学外国人研究员, 美

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访问学者。

1986年、1989年获第一届、第三届王力语言学奖金。

著论文三十篇, 译书半部。



责任编辑 查道元
封面设计 黎隆安

ISBN 7-5347-1371-4



9 787534 713712 >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鲁国尧自选集

河南教育出版社

(豫)新登字 03 号

顾问 吕叔湘 曹先擢 李行健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鲁国尧自选集

责任编辑 查道元

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编 450002)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125 印张 230 千字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25 册

ISBN7 5347-1371-4/I·65

定 价 9.10 元

序

本书是作者多年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结晶，也是作者多年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成果。本书力求做到观点正确、内容翔实、层次清晰、语言流畅，力求做到理论性与实践性、学术性与通俗性的统一。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及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和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参考。

和指导下,我们同河南教育出版社一起拟订出了出版的计划和有关细节。在广泛听取有关同志的意见后,列出了一个可供入选的中年语言学家名单。经过反复权衡比较,确定了名单。他们是:徐通锵、邢福义、陆俭明、刘叔新、李新魁、裘锡圭、吕必松、鲁国尧、蒋绍愚、李临定。我们深感遗憾的是,未能编选我国老一代语言学家和青年语言学家的自选集,即使是中年语言学家,也不可能全部选入,特别是有的同志,刚超过规定的年龄上限,虽然他们学术成果累累,也未能入选。还有的同志,由于其他原因,要求暂不入选。我们工作中难免有不全面或疏漏的地方,敬希语言学界的师友们谅解和批评,以便改进我们的工作。

我们衷心感谢年高德劭的吕叔湘先生为每本自选集题写了书名。这里饱含着他对语言学界的殷切期望和亲切的关怀。我们也要代表语言学界的朋友,向河南教育出版社表示诚挚的感谢。特别是他们的社领导专程到北京来商讨计划,并亲自审读书稿。负责这套书的责编查道元同志,多次往来于郑州北京之间,做了大量细致的组织和审稿工作。我们也要感谢入选的这些同志的配合和支持。没有上述的各种支持,这套书是无法同广大读者见面的。

曹先擢 李行健

1993年1月26日于北京

* 前五册误将“怀”字印成了“系”字,特此更正。

目 录

《孟子》“以羊易之”、“易之以羊”两种结构类型的

对比研究	(1)
“隶书”辨	(19)
“方言”和《方言》	(53)
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	(66)
《卢宗迈切韵法》述评	(81)
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	(131)
元遗山诗词曲韵考	(177)
白朴的词韵和曲韵及其同异	(197)
白朴曲韵与《中原音韵》	(212)
从曲律、曲韵查核诸家对白朴曲点校的失误	(233)
《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	(250)
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	(292)
——读《利玛窦中国札记》	
“布文”辨识本末及其他	(305)
跋	(312)
作者简介	(314)

《孟子》“以羊易之”、“易之以羊” 两种结构类型的对比研究

一

在《孟子》的“梁惠王”篇“齐桓晋文之事”章有这样三段话：

(1)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

(2)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3)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

可见在《孟子》的语言里，“以羊易之”和“易之以羊”意思相同，这两种结构都能成立。

“以羊易之”的结构是“‘以’+介词宾语+动词+宾语”，我们称之为甲型。

“易之以羊”的结构是“动词+宾语+‘以’+介词宾语”，我们称之为乙型。

甲型和乙型的区别在于，“‘以’+介词宾语”一前置，作状语；一后置，作补语。他们所修饰或补充说明的成分叫述语。甲型是状述结构，乙型是述补结构。

对于古代汉语里“‘以’+介词宾语”的位置，不少古汉语语法

书只是一般地说,可以前置,也可以后置。

也有些古汉语语法书指出了甲型和乙型的一些差异,如中国语法学的开山著作《马氏文通》讲:“‘以’字司词概先动字,其有后乎动字者,则司词长,不则语意未绝也。”^①又说:“转词介以‘以’字置于止词之后者,盖止词概为代字,而转词又皆长于止词,句意未绝耳。”^②但是杨树达的《马氏文通刊误》批评马说:“马氏谓‘以’字及其司词短者例居动字之前,长者则居动字之后,此但据类例之多少为言,绝无何等理论为根据也。……以‘句意未绝’为例外之理由,不成为理由也。盖凡无理论为根据,而但据见例之多少以立规则,其规则往往不能成立,有如此者。”^③还有些著作也指出了甲型和乙型的某些特点,本文后面将予以讨论。

究竟这两种结构类型有没有区别?有什么区别?笔者拟就《孟子》这个内容一致的先秦语言材料,对甲、乙二型从结构和功能上进行对比分析。关于《孟子》,司马迁说,孟轲晚年“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朱熹说,全书“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观七篇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缉可就”(《朱子大全》)。《孟子》的语言口语性很强,明白流畅,句式纷繁而富于变化。《孟子》的语言基本上反映了战国中期的汉语的面貌,可以依据这部书的语言材料来研究上古汉语语法的某些问题。

在《孟子》里,甲、乙二型有其相同之处,但也有较大的差异,试述如下:

(一)甲、乙二型的“以”都能表示“用”、“拿”。如:

(1)汤使人以币聘之。(《万章上》)

(2)贤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尽心下》)

(3)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梁惠王上》）

甲、乙二型的“以”都能表示“按照”。如：

(1) 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梁惠王上》）

(2) 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尽心上》）

甲型的“以”还能表“因为”。如：

(1)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④（《尽心上》）

(2)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尽心下》）

这是乙型的“以”所不具备的。^⑤

(二) 甲型如作句子的谓语，其主语都是施事。如：

(1)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万章上》）

(2) 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告子下》）

乙型则不然，其主语有的是施事：

(1) 王语暴以好乐。（《梁惠王上》）

有的是受事。如：

(2)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离娄下》）

(3)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梁惠王上》）

为什么这种句子的谓语取乙型而不取甲型呢？这与述语中动词的宾语“之”有关，“之”要与所指代的对象靠近，那就不让表工具、手段的介宾结构夹在中间，而把它放在后面。这两个“之”都是指代句中主语的。又如“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万章上》），因为“之”要靠近所指代的对象“汤”，放置介宾结构于后。

(三) 在甲式里，“‘以’+介词宾语”在前，随后的可以不止是一个“动词+宾语”的结构，而比较复杂。如：

(1) 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梁惠王上》）

(2) 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尽心下》)

(3) 子产听郑国之政, 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 (《离娄下》)

(4) 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 (《万章上》)

在介宾结构之后的, 第一例是由两个述宾结构组成的并列结构, 第二例是兼语结构, 末两例是述补结构, 都比较复杂。如果把“以+介词宾语”也置后做补语的话, 那“太挤”了。尽管“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很长, 符合马建忠的“后置”的原则, 但也后置不得。

在乙型, “以……”作补语, 其前的被补充说明的成分只能是单纯的述宾结构。如:

(1) 杀人以梃与刃, 有以异乎? (《梁惠王上》)

(2) 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 养弟子以万钟。 (《公孙丑下》)

(四) 甲型可以和特别的指示代词“者”^⑥组成体词性结构。如:

(1) 以力假仁者霸, 霸必有大国; 以德行仁者王, 王不待大。 (《公孙丑上》)

(2) 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 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 (《梁惠王下》)

未见乙型加“者”的用例。

因为“谓词性结构+者”变成体词性结构时, 其中的谓词要尽量靠近“者”, 这样介宾结构置于前为宜, 所以只有甲型可以加“者”。

(五) 如果“以”的介词宾语是特指代词“所”, 只能取甲型, 如果是疑问代词“何”, 也多取甲型。如:

(1) 拱把之桐梓, 人苟欲生之, 皆知所以养之者。 (《告子上》)

(2)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滕文公上》)

(3)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梁惠王上》)

(4)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梁惠王下》)

代词“所”、“何”作宾语时必须放在介词“以”的前面,所以整个介宾结构前置。

在《孟子》里,只有一例“何以”置于述语之后:

敢问招虞人何以?(《万章下》)

这也许是整个“招虞人何以”作“敢问”的宾语的缘故吧。

(六)甲型的“以”可以不带介词宾语。

(1)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尽心下》)

(2)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梁惠王上》)

(3)梓匠轮輿,其志将以求食也。(《滕文公下》)

关于这种句型里“以”不带介词宾语的问题,流行的见解是,“以”后省略,而且是省略了一个“之”。^⑦可是在《孟子》里未出现过“以之”,马建忠早就注意过这个现象,他说:“‘以之’二字,经籍罕用。”^⑧王力先生说:“至于介词后的宾语被省略的就比较多了。最常见的宾语的省略是在介词‘以’字和‘为’字的后面。其所省略的应该认为是代词‘之’字或‘此’字。但是,这里所谓‘省略’就仅仅是为分析的便利而说的;实际上有许多地方根本不能补出这个代词宾语来。”^⑨否定了省略“以之”说是对的。拿上举三例而论,第一例可说“以”后省“关”;第二、三两例省略什么词语呢?只能说,“以”的意念上的支配对象不是确定的,第二例指某道理,第三例指梓匠轮輿的劳动。本文的提法是,“以”后可以不带介词宾语,犹如及物动

词可以不带宾语，不得谓之“省略”。

(七)“以……为……”是甲型结构的一种。如：

(1)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棬。(《告子上》)

(2)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告子上》)

(3)我欲行礼，子敖以我为简，不亦异乎？(《离娄下》)

(4)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以为不恭也。(《万章下》)

第一、二两句中“为”的动作意义较强，三、四两句表示意念中认为什么是什么。虽不尽相同，但结构是一样的。“以”也可不带介词宾语。

未见“为……以……”句。

(八)如果两个谓词性结构在一起，则甲式必居于前，而乙式必居于后。如：

(1)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尽心下》)

(2)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
(《告子下》)

(3)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
(《万章上》)

两个谓词性结构在一起，其核心——谓词要尽量靠拢，语言自然地调节“以……”的位置。

(九)甲型前可以有副词“不”、“无”，构成否定式。如：

(1)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告子下》)

(2)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万章下》)

(3)请无以辞却之，以心却之。(《万章下》)

也可前有助动词。如：

(1)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梁惠王下》)

(2) 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下》)

未见乙型前加否定副词构成否定式或前加助动词之例。在乙型里,述语和补语是紧密结合的。

但是下面的例子值得讨论,似乎二者之间可以有副词:

(1)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公孙丑下》)

(2) 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尽心下》)

可是,这些“不”后的“以”是否是介词,值得怀疑。请看下面诸例:

(1) 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离娄上》)

(2) 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万章下》)

(3) 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告子上》)

例(1)(2)中,“不以……”与其前的谓词性结构之间有连词“而”。例(3)中,“以”前有“必”,甚至还有“亦”。这三例的“以”如果还看成介词,那是扞格难通的。这应该是动词。从历史上看,很多介词是渊源于动词的,在战国时期的《孟子》里出现动词“以”是不足为怪的。下面诸例也是动词“以”做谓语的:

(1)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离娄上》)

(2) 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馈也以礼。(《万章下》)

其主语是“主语+‘之’+谓语”的结构,而且有语气“也”停顿,这两例中的“以”该都是动词了吧。关于第一例,马建忠说:“‘以’,动字,‘仁’,止词,合之为语词。”^⑩黎锦熙先生也同意马说。^⑪而杨树达的看法不同,他说:“‘以’字是介字,‘仁’字乃‘以’字之司词。……

不得谓‘以’为动字，‘仁’为止词也。盖此语在常法当云‘三代以仁得天下’。然孟子之语气欲侧重‘以仁’，故与常法之组织先后不同，而词性则无异也。如马氏说，则意义用法全同之词，其词性亦变迁无定，学者岂尚有规矩可循耶！”⑫显然马是而杨非，下面两例委实找不到“常法之组织”，还能认为其中的“以”是介词吗？

(1)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
(《公孙丑上》)

(2) 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上》)

总之，要区别动词“以”和介词“以”。从“以”由动词衍为介词的历史发展看，在《孟子》里“以”有动词用法似不足为异。

“以……”作状语的甲型结构功能比较齐全，可以有否定式，能愿式，是个有前途的结构，而乙型结构则反是。

(十)在乙型里，动词的宾语都很简单，其中代词“之”较常见。而补语中，“以”的介词宾语的词的数量，除一例外，或比动词的宾语多，或与之相等。换句话说，论长度，补语或长于述语，或相等。如：

(1)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滕文公上》)

(2) 附之以韩魏之家，如其自视欻然，则过人远矣。(《尽心上》)

(3) 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万章上》)

(4) 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离娄下》)

(5)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梁惠王上》)

三十几例中只有：

(6)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尽心上》)

其中的介词宾语短于动词的宾语。

至于甲型，介词宾语的长度或和动词宾语相等。如：

(1)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

(《梁惠王下》)

(2)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滕文公上》)

介词宾语的长度或小于动词的宾语。如：

(1)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梁惠王上》)

(2)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告子上》)

(3)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告子下》)

介词宾语或长于动词的宾语：

(1)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万章上》)

(2)伊尹以割烹要汤。(《万章上》)

这些如果换用乙型表示也未尝不可，如“以行与事示之”换成“示之以行与事”，试与“杀人以梃与刃”(《梁惠王上》)比较可知。

但介词宾语长于动词宾语的，很多例不能换成乙型，亦即他们只能取甲型。如：

(1)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尽心上》)

(2)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离娄上》)

(3)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万章上》)

(4)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万章下》)

例(1)有“者”，例(2)前有“不”，例(3)后有补语“于虞”，例(4)是“以……为……”式，这都是甲型结构的特点，尽管介词宾语长，也得前置，前已论述。

马建忠说：“转词介以‘以’字置于止词之后者，盖止词概为代字，而转词又皆长于止词。”^⑬以《孟子》语言来检验，这个看法大体还可以，只是不够严密：第一，乙型“动词+宾语+‘以’+介词宾语”中，动词的宾语（即马氏的“止词”）不一定是代词，也可以是名词或简单的词组；第二，“转词”亦不“皆长于止词”。杨树达批评马氏时说：“马氏谓‘以’字及其司词短者例居动字之前，长者则居动字之后。”^⑭事实上，动词前的“以”的介词宾语有短的，有长的。

二

上面对甲型“‘以’+介词宾语+动词+宾语”、乙型“动词+宾语+‘以’+介词宾语”作了对比、描写、分析。如果述语部分仅仅是动词，不带宾语或不能带宾语，也可以用“‘以’+介词宾语”作状语或补语，那么，

丙型：“‘以’+介词宾语+动词”

丁型：“动词+‘以’+介词宾语”

下面将对丙型和丁型作一些对比分析。

其相同处在于无论丙型或丁型，充任述语动词的可以是不及物动词，所以不能带宾语，这是跟甲、乙型的大异之处。如：

(1)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万章上》）

(2)孔子进以礼，退以义。（《万章上》）

在《孟子》里，“来”、“进”、“退”都是不及物动词。唯“来”与“进”各有一例带宾语：“劳之来之”（《滕文公上》）、“国君进贤”（《梁惠王下》），但都是不及物动词的使动用法。^⑮杨伯峻先生认为：“动词为

不及物者，虽单音词，‘以……’仍在前。”^{①⑥}按之《孟子》，这话是可商榷的。

丙、丁二型里，述语有些是由不带宾语的及物动词担任。如：

- (1) 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万章上》)[比较“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万章上》)]
- (2) 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告子下》)[比较“食而弗爱，豕交之也”(《尽心上》)]
- (3) 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公孙丑下》)[比较“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公孙丑上》)]
- (4) 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滕文公上》)[比较“教人以善谓之忠”(《滕文公上》)]
- (5) 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公孙丑下》)[比较“辞尊居卑，辞富居贫”(《万章下》)]

诸例中“养”、“交”、“畔”、“教”、“辞”都是及物动词(从比较可知)，但不带宾语。吕叔湘先生说：“动词后既省‘之’字，‘以’字就非居动词后不可。……不能说‘以钱与’，只能说‘与以钱’。”^{①⑦}观《孟子》诸例，“以币交”、“以殷畔”是能成立的。

丙型和丁型的不同之处在于：

(一)丙型作谓语时，主语都是施事。^{①⑧}如：

- (1) 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公孙丑上》)
- (2) 沈同以其私问……(《公孙丑下》)

在丙型里，介宾结构所修饰的述语，可以是单个动词，还可以是由动词组成的较复杂的结构。如：

- (1) 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公孙丑下》)
- (2) ……而以他辞无受，^{①⑨}不可乎？(《万章下》)

(3)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
 (《公孙丑上》)

(4)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
殉乎人者也。(《尽心上》)

前两例述语是状述结构，后两例是述补结构。

丙型前可有否定副词和助动词。如：

(1)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告子下》)

(2)孔子则欲以微罪行。(《告子下》)

在丙型里，特指代词“所”、疑问代词“何”皆置于“以”前。如：

(1)敢问其所以异。(《公孙丑上》)

(2)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梁惠王上》)

丙型的“以”可不带介词宾语。如：

(3)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滕文公下》)

(4)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
 几于人矣；而君之仓廩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梁
 惠王下》)

前例“以”意念上的支配对象指上文的牛羊，后例“以”的意念上的支配对象指前面述说的一段话。

以上所述特点皆丁型所不具备。

(二)丁型作谓语时，其主语可以是受事，“以”后的介词宾语比较长。如：

(1)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万章上》)

(2)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万章上》)

在第二例中，“以”的介词宾语颇长，而在丙型里，“以”后的介词宾语也可以较长，前引诸例可证。

从功能上说，丙型似甲型，丁型似乙型。在《孟子》里，丙、丁二

型的核心述语动词是不及物动词,或虽是及物动词却不带宾语。甲型乙型的动词都带宾语,因而表达的内容广,出现频率高得多。

三

几点看法:

(一)甲型和乙型、丙型和丁型在结构上的差异是,“‘以’+介词宾语”前置为状语还是后置为补语问题。在功能上也有相当差异,他们有时能互相转换,但不是彼此都能互易的,也就是说,“以……”的位置不都是随意的,并不如一般所云:可以前置,也可以后置。在《孟子》里,“以羊易之”和“易之以羊”之所以能在同一章内出现,是由于他们的“动词+宾语”部分与“以’+介词宾语”部分都很单纯的缘故。而且应注意到,“易之以羊”的出现环境:它是两个相连的谓词性结构的后一结构。原文是:“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

(二)有些著作提出一种“侧重论”,在古汉语研究和教学中颇有影响。刘景农先生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大抵用做状语时,述说的重点是在动词上;若做补语,就侧重在介词的宾语。”^{②③}所举例子中有两则出自《孟子》:

(1)汤使人以币聘之。(《万章上》)

(2)招虞人以旌,不至。(《滕文公下》)

刘氏认为,前者述说的重点是在动词“聘”上,后者侧重在介词“以”的宾语“旌”,“就做动词‘招’的补语了”。

笔者的看法与之不同:如果仅仅一个动词(或带宾语),述说的重点自然是在动词上。但是当“以……”被加在前面的时候,“以……”这个状语不是无足轻重的,较之原来的单个动词(或带宾语),工具状语就是侧重点。试揣摩《滕文公上》篇“有为神农之言者

许行”章的一段著名的对话。孟子问陈相的几个是非问句，按先后次序排列：

- (1)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
- (2)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
- (3)许子冠乎？
- (4)自织之与？
- (5)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
- (6)自为之与？

前三句孟子问话的重点是在动词“种”、“食”、“织”、“衣”和“冠”上，“必”起强调作用。第四、六句的重点在“自”、第五句的重点呢？决非“爨”和“耕”（若是，“耕”和“种”义近犯复），孟子是在问：许子是不是用釜甑来烧火煮饭，用铁器来耕田？重点在状语。待陈相回答“然”后，紧接着追问一句“自为之与？”这“之”就是指的“釜甑”与“铁”，诱出陈相的答案“以粟易之”，孟子马上就抓住不放，大发议论：“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械器”、“陶冶”都是承“釜甑”与“铁”而言的。第五句的重点不是明明在“釜甑”与“铁”吗？

再看《万章下》篇“敢问不见诸侯”章的几个正常的甲型句和乙型句：

- (1)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
- (2)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岂敢往哉？况乎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乎？

论语气的激烈，还是第二例中的几个“以……”状语显得突出。再看该章末了儿的对话：

万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然则孔子非与？”^{Fl}：“孔子当仕有官职，而以其官召之也。”

难道不是强调的“以其官”吗？

我们的看法是：动词（或带宾语）如果加上了“以……”，这“以……”无论做状语还是做补语，都是侧重点。现代汉语的工具状语皆前置，司空见惯，而古汉语却有工具补语，后置，这易于使现代人产生工具补语后置即为侧重点的错觉。

（三）本文开始时曾引述了杨树达批评马建忠的一段话，在那里，杨氏有须以理论为根据以立规则的意思。笔者拟提出一种“调节论”。

在语言里，一个句子内的各个组成部分根据相互制约的关系而自动调节，以求构成一个协调、和谐的统一体。在《孟子》的语言里，有“以……”，可担任状语，也可担任补语，从而造成不同的结构类型。选择什么结构类型，要受相互关系的制约。如“子产……以其乘輿济人于溱洧”句，必须取甲型，因为“济人”后有补语“于溱洧”，如果把“以其乘輿”也放在后面，往哪儿摆？岂非太“挤”了。而“济人”前有状语，后有补语，就显得轻重得宜。“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句，“说”和“就”两个动词尽量靠拢，“之”要与被指代者“汤”接近，就必须以“以伐夏救民”殿后了。在两个连贯的谓词性结构中，甲、丙型必居前，乙、丁型必置后，这也是语言为了更好地表达思想，根据各个结构的形式特点，对他们自动调节、选择，以求协调、和谐的体现。

上面所讲的是在一个小环境内各个组成成分的自动调节，因受相互关系的制约而产生的调节可以在比上述稍大的环境内进行。请看下面诸例：

（1）人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

庆；庆_△以_△地_△。（《告子下》）

（2）嫂溺，则援之以手乎？（《离娄上》）

_{△△}

- (3) 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梁惠王下》)

这三例都是取的“以……”后置式,是有原因的。例(1),前有“则有庆”,紧接着来一个“庆”,“以……”就被调节到后面去了。例(2),“之”指代“嫂”,靠近为宜。例(3),“事”的宾语“之”指代前面的“狄人”,也应接近。

再观察下面三例:

- (1) 王好战,请以战喻。(《梁惠王上》)
 (2) 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公孙丑下》)
 (3)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尽心上》)

三例“以”的宾语都是重复前面句子中的动词的宾语,②若后置就距离远了,前置则有气势顺注之感。

吕叔湘先生在《文言虚字》里说,有些句子是宜于“以”字在后的,如“先以书遗之,告以将归”句,改成“以将归告之”就觉得不顺。②我们认为,其所以不顺,是因为两个谓词性结构,前者取甲型,后者又取甲型的缘故。前为甲型,后为乙型,“以……”一居前,一殿后,则两翼舒展,重心平稳。

我们讲,在语言里,由于受着句内、句外成分的制约与影响,对近似结构有所选择,从而加以调节,以求协和,不是指某个具体人在说话的时候边思考,边调节,边说话,而是指语言自行调节,使有关成分各得其所,各称其职,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规则。

(四)很多介词是由动词变来的,这在语言史上不乏其例。《孟子》所反映的是战国时期的汉语,其中有动词“以”,也有介词“以”。动词“以”出现次数不算少,具有一般及物动词的功能,如可带宾

语,可受副词“不”的修饰。由动词变来的介词“以”,可置于动词前,也可置于其后。在《孟子》里,介词“以”在前的结构很活跃,出现频率高,具有很多特有的功能;而介词“以”在后的结构出现频率低,与其他词的结合受着很多限制,例如就未发现乙型、丁型的否定式。这说明在那时,比起“以……”补语来,“以……”状语是个占优势的有前途的格式。后来“以……”状语逐渐取得胜利,淘汰了“以……”补语,也战胜了名词作工具状语的表达方式,^③成为独一的形式。现代汉语的工具状语“用……”、“拿……”,置于动词前,至少在词序上就是承自“以……”状语的。

1964年春初稿于北京

1980年夏定稿于南京

【附注】

- ①马建忠原著,章锡琛校注《马氏文通校注》第335页,中华书局,1954年版。
- ②同上,第189页。
- ③杨树达《马氏文通刊误》(1955年校订本)第89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 ④马建忠认为此句的“以”是“用”义,见《马氏文通校注》第189页。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译为“因为”,此从杨说。
- ⑤王力先生已指出,见《汉语史稿》(中册)第370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 ⑥“所”和“者”,《马氏文通》称之为接读代字,黎锦熙《比较文法》称为联接代词,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称为特别的指示代词。
- ⑦见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第51页、407页,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杨伯峻《文言语法》第122页,北京出版社,1956年版。刘景农《汉语文言语法》第130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 ⑧见《马氏文通校注》第337页。该页引“以之”五例,皆出自韩愈文。
- ⑨王力《汉语史稿》(中册)第460页。

- ⑩《马氏文通校注》第 17 页。
- ⑪黎锦熙《比较文法》(1957 年校订本)第 138 页,科学出版社,1958 年版。
- ⑫《马氏文通刊误》第 5 页。
- ⑬《马氏文通校注》第 189 页。
- ⑭《马氏文通刊误》第 89 页。
- ⑮朱熹《孟子集注》释“劳之来之”为“劳者劳之,来者来之”。
- ⑯《文言语法》第 121 页。
- ⑰吕叔湘《文言虚字》第 42 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 年新 1 版。
- ⑱“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离娄上》),主语是受事,这是由于谓语里的“可”起作用的缘故。在“可”字句中,动词有被动意义,见王力《汉语史稿》(中册)第 419 页。
- ⑲《孟子注疏》孙奭疏为“饰以他辞而不受”,可证“无”为副词。
- ⑳刘景农《汉语文言语法》第 200 页。
- ㉑三例中“以”的宾语都没有承前用代词“之”,马建忠说,经籍罕用“以之”,笔者曾查阅了若干先秦古籍,信然。
- ㉒《文言虚字》第 42 页。
- ㉓如“子欲手援天下乎”(《离娄上》)。

此文原发表于程湘清主编《先秦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孟子〉句法结构初探》,“文革”后取其中一节改增而成此文。

“隶书”辨

作为汉字重要书体之一的“隶书”，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至今仍在若干场合中使用。它这个名称始于何时？又有什么特有的涵义？历来不少文字学著作和论文都论及这两个问题。例如，对于前者，启功先生颇有影响的专著《古代字体论稿》明确提出：“字体的各种专门名称，实自秦代才有的。”“把各种字体命以专名，始自秦代。”^①这本书以较多篇幅论述了多种书体名称的涵义与关系，其立论皆与此观点有关。认为“隶书”之名始于秦代几乎是人同此言，该是不成问题的定论了，然而恰恰大有问题在。至于“隶书”得名的涵义，可以说，学术界迄今尚无正确的解释。何以致此？这是由于历来关于“隶书”的文献资料和说法，为数甚多，而“虚实之事，并传世间，真伪不别也，世人惑焉，是以难论”^②。我们必须花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笔者拟就这两个主要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最后简略地讨论一下隶书的创造者问题。

一、“隶书”究竟何时得名？

1. “隶书”的名称变迁

长期以来学者们都相信班固、许慎的话，以为“隶书”这种书体在秦始皇时才出现。可是20世纪70年代大量的考古发现，尤其是云梦睡虎地出土的大批秦简，有力地证明了，“隶书”这种书体在秦始皇以前就已出现了。秦始皇在结束剪灭六国诸侯的战争后，惩于

前此文字的分歧繁复,于前 221 年即统一的当年,下令“书同文字”,前 213 年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毁儒家经典,并重申“同文书”的禁令,^③就是以秦国文字来统一关东六国文字。命令李斯等人整理出“秦篆”作为标准字体,实只用于刻石、诏书等庄重场合。而当时政务军务的繁剧、经济文化的发展、民间交往的频仍却使早已形成的“隶书”更广泛传播。就现有文献资料言,这种书体在秦始皇前或始皇时可能尚无名称。一个新事物刚产生,人们还来不及赋予专名,这在古代并非罕见之事。

至汉代,大一统帝国的长期稳固,政治、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使这种书体更为通行。汉时的人们就给予它“今文”的名称,以别于前此的书体。两汉时代的书籍大多是用“今文”书写的,例如马王堆三号墓中的帛书,很多是用“今文”写的,临沂银雀山一号墓出土的 4942 枚竹简,其文字则全部为“今文”。^④西汉的儒家经典多数也是用通行的“今文”写的,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今文经”。还有另一类儒家经典,即用以前的古文字书写的“古文经”。《汉书·艺文志》:“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又《景十三王传》:“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后汉书·儒林传》:“东莱费直传易,授邾邪王横,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汉书·郊祀志下》:“臣愚不足以迹古文。”可见“古文”就是统指“今文”以前的古字。“古文”、“今文”这两个相对的词都是先秦所无,汉代才有的。由于“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⑤到了汉代,这些陆续发现的用“古文”写的经书,看不懂了,须要转写成“今文”。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里就曾记载过:“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荀悦《申鉴·时事》云:“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谓真本经。”“今文”和“古文”的不同就形成了两类经书的差别,例如马融

《书序》：“今文《泰誓》，皆无此语。”⑥《礼记·聘礼》“纁三采”郑玄注：“古文‘纁’或作‘藻’，今文作‘璫’”。又《士冠礼》“礼于阼”郑玄注：“今文‘礼’作‘醴’。”发人深省的是，历史上只有“今文经”这个术语，从无“隶文经”或“隶经”的说法。若是像历来专家们所说的那样，在秦代即有“隶书”专名出现，那么两汉用“隶书”写的儒家经典为什么不叫“隶文经”或“隶经”呢？而且，如在秦时即已存在“隶书”其名，那么汉人就应该经常使用这个词儿了。事实恰恰相反，笔者曾下了一番死功夫，查阅了现存的大部分两汉典籍，也翻阅了部分考古资料，竟没有寻找到一只真正的西汉时期的以“隶”作为书体名称的用例。

前人也曾认识到所谓“隶书”即“今文”，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四》：“汉之所谓……今文者，隶书也。……隶书，秦汉间通行。”清人包世臣《艺舟双楫·历下笔谈》也说：秦时的隶书，“汉谓之今文”。但是他们是“二元论”者，总认为两名并存。尚未有人提出这样一条明确的断语：在西汉和东汉初，就只有“今文”一词，而无“隶书”其名。

“自秦灭六国，席百战之威，行严峻之法，以同一文字。凡六国文字之存于古籍者，已焚烧划灭，而民间日用文字，又非秦文不得行用。……故自秦灭六国以至楚汉之际，十余年间，六国文字遂遏而不行。”⑦这就是秦始皇统一文字、焚毁儒书双管齐下的效果。在西汉，立于学官的十四博士皆今文经学，而“古文”只见于偶或发现的古文经及出土的古器物上。宣帝时在扶风郡美阳县得了一只鼎，大臣们“多以为宜荐见宗庙”，唯独张敞能识读铭文，辨认出这只是周代的一般彝器而已，⑧可见几乎在整个西汉时期，古文已是与大众无涉，非专家不能认识的古董了。而至王莽执政、称帝时，情况却迥然不同。王莽“寻旧本道，遵术重古”，⑨他曾“征天下通小学者以

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⑩“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⑪霎时间大大热闹起来。刘歆在汉哀帝时与诸博士争立“古文经”于学官而未成,此时却成了王莽的股肱,“古文经”因而得以广泛流播,正式立于学官。^⑫另一学者扬雄擅长“奇字”,刘歆之子刘棻就曾专门向他学习。^⑬好古之风甚嚣尘上。据《说文解字·叙》载,王莽及其心腹甄丰等定当时文字为“六书”:首列“古文”,“孔子壁中书也”;次为“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三为篆书;第四才排上今文,但被改名为“左书”。左,佐也。左书,辅助性字体的意思。^⑭如此,僵死的“古文”、“奇字”竟昂然列于所谓“六书”之首,而长期通行的,官方和民间使用的主要书体“今文”却遭到这样的贬抑。

不久,赤眉、铜马等农民起义军于公元23年摧毁了王莽的“新”王朝,随之刘秀取得政权,统一中国。东汉王朝建立伊始,文字使用情况颇乱。史载,公元42年马援上书,禀陈了当时的文字混乱情况,到了他向光武帝提出“荐晓古文者”以正印文的地步。^⑮许慎记述了公元1世纪后期的知识分子对“古文”“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⑯可见“古文”、“奇字”在一世纪初年所以命运亨通,不过是王莽、刘歆等上层统治者“动欲慕古,不合时宜”^⑰的结果。违背历史潮流而泛起的沉滓很快被冲没下去,而活生生的“今文”始终是通用的主要书体。王莽等给的卑称“左书”也只留下一点痕迹:成为“今文”的别名,后代文字学家有时把它与后起的另一卑称“隶书”连用,如晋卫恒的《隶势》:“鸟迹之变,乃惟佐隶。”

“隶书”这一卑称是怎样来的呢?它首先为班固所提出。班固是东汉初年的史官,他了解到“今文”是秦始皇时代的重要书体,这是他的“功”。(其实这种书体在秦始皇前就有了,1975年云梦秦简的发现证明了此点。)但是班固把这种书体的产生与两汉人(包括

他自己在内)所痛恨的秦始皇的严刑酷法联系起来,杜撰了一个这种书体的起源说,给了它一个更卑的卑称:隶书。《汉书·艺文志》“小学家”序讲:“是时(按,指秦始皇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

《汉书》成于汉章帝建初(公元76—84年)年中,“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⑬就现有文献资料言,在班固提出了“隶书”这一名称后,首先使用的是王充。其《论衡》称章帝或为“今上”,^⑭或为“孝章”,^⑮几次提到建初后的年号“元和”、“章和”,^⑯尤其是在《宣汉篇》中提及《汉书》,可见《论衡》的成书是在班固《汉书》之后。王充师事班彪,年长于班固,但很服膺这位师弟,著作中多次称道,因此他也使用“隶书”这一名称是不足怪的。《论衡·正说篇》讲到《论语》时云:“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⑰

虽然如此,但当时多数知识分子并不肯接受“隶书”这一名称。请看许慎的话,他在《说文解字·叙》(写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即公元100年)中承认:“诸生竞说字解经,喧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从“诸”、“竞”两字可见此辈人数之众!这群人坚认“今文”是仓颉造的,自古传下的正文,怎肯承认它是秦时起于官狱多事“施之于徒隶”的书呢?名称自然也在改易不得之列。他们依然按照今文“说字解经”。当时“学术界”争论如此激烈。许慎斥之为俗儒鄙夫,他继承并发挥了班固的观点:“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⑱

由于许慎的《说文解字》曾“进呈御览”,又是文字学的权威著作,影响巨大,再加上秦始皇的严刑酷法一直是人们抨击的目标,“隶书”之名遂为以后的学者所沿用,而“今文”一词逐渐被泯没。崔

瑗的《草书势》：“惟作佐隶，旧字是删。”（按，着重号是本文作者所加，下同。）^{②4}赵壹的《非草书》：“故为隶草，趣急速耳。”郑玄《尚书大传序》：“伏生为秦博士，至孝文时，年且百岁，张生、欧阳生从其学而受之，声音犹有讹误，先后犹有舛舛，重以篆隶之殊，不能无失。”《汉制度》^{②5}：“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也。”^{②6}蔡邕的《圣皇篇》：“程邈删古立隶文。”魏晋时成公绥《隶书体》：“虫篆既繁，草藁近伪，适之中庸，莫尚于隶。”^{②7}潘岳的《杨荆州诔》、《杨仲武诔》、卫恒的《四体书势》、索靖《草书状》、江式《文字源流表》等都把“隶”当作书体名称使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法云寺》载：“摩罗聪慧利根，学穷释氏，至中国即晓魏言及隶书。”“隶书”已经成了当时汉字的名称了。

2. 辨“隶书”之名创自刘歆说

“隶书”之名始见于《汉书·艺文志》，而前人多未加省察地把《汉书·艺文志》看作是抄自刘歆《七略》的，因此就有人认为“隶书”一词为刘歆所创。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中讲：“《艺文志》即《七略》原文，人皆知之。”又采其门人陈千秋说，认为隶书“盖皆刘歆伪撰古文，欲黜今学，故以徒隶之书比之，以重辱之”。钱玄同称此说“真是颠扑不破之名论”。^{②8}诚然，在《艺文志》总序中有就刘歆《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之语，但他们把《汉书·艺文志》的话归在刘歆的账上则大可商榷。汉志于“《周官经》六篇”下注“王莽时刘歆置博士”；又著录了与刘歆同时的扬雄著作多种，刘歆后的杜林著作两种；在“赋”类序中引用扬雄的话称“扬子”。再看看我们着重研究的“小学家”类，序中提出了“隶书”的名称，下了定义，其下文内还有这么一段话：“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

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这里首先讲到平帝时征天下通小学者赴京师一事，《汉书·平帝纪》有同样记载。按，刘歆受命继父校书，著《七略》，皆为平帝前哀帝时事，后来刘歆因移书让太常博士，忤执政大臣，外出补吏去了，仍是哀帝时发生的事。《七略》怎能写到平帝时事，并论及扬雄著作呢？至于“臣复续扬雄”的“臣”指谁？清刘光蕡《前汉书艺文志注》说：“此‘臣’字当是歆以父向《别录》为《辑略》中语，班未及改者。”这就是认定这些文字全是刘歆所作的主观成见的必然结果，刘向怎会去续扬雄的书？还是韦昭讲得对，“班固自谓也”。^②班固著有《在昔篇》、《太甲篇》，《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班固都提及自己的著作了，怎能把汉志算是刘歆的呢？

再者，如像康、陈、钱那样认定“隶书”一名是刘歆创造的，那么刘歆既已在哀帝时把“今文”改作“隶书”，为何事隔不久，至王莽定“六书”时再将“隶书”更为“左书”呢？《说文解字·叙》记载了“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定“六书”一事，许慎距王莽不远，所述当为可信。刘歆是王莽复古改制的得力助手和顾问，《汉书·王莽传》称“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定六书之名及次序一事，大司空甄丰是主管部门的最高长官，不一定是主要的具体制定者，^③这件事怎会没有刘歆的份儿？凭学问和地位，他会属于“甄丰等”的“等”字之列的。他早在《移太常博士书》中就大为抨击秦始皇，试问，在辅助王莽制礼作乐声势烜赫时，他却抹掉自己前时创造的具有反对秦始皇严刑酷法含义的“隶书”这个名称，换上个一般的卑称“左书”，这种退步是可能的吗？

《七略》已佚，但后人在类书和注释中引用过，清代不少人做过

辑佚工作。试以严可均《全汉文》所辑之数十条与《汉书·艺文志》对校,甚至对具体书的叙述语言也不太同。再看汉志,每一类书名列举后,总有个小计,如“书”类,小计为“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班固自注:“入刘向《稽疑》一篇。”颜师古发其凡例:“此凡言‘入’者,谓《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与此同。”可以认为:汉志所列书目系据《七略》而略有增删,每类的序则是班固自己撰写的。《汉书》的其他部分也有类似情况,如《律历志》:“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誉,征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使羲和刘歆等典领条奏,言之最详。故删其伪辞,取正义,著于篇。”取刘歆之义罢了。

3. 辨班固“萧何六体”说、许慎“秦书八体”说

要确认“隶书”之名起于班固,还必须辨清“萧何六体”与“秦书八体”说,尤其是后者被奉为金科玉律,致历代文人及近现代文字学论著普遍认为秦人已规定字体专名,本文开始所引述的启功先生的话,即是代表。与此略有不同的是唐兰先生的见解:“秦书八体的说法,应该是秦汉之际才有的。”^②秦代或秦汉之际果真有“八体”吗?

“萧何六体”说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的:“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这段话极为可疑。前已论证,在秦始皇同文书和焚书坑儒、严禁私挟《诗》《书》的双重打击下,“古文由此绝矣”。众所周知,汉承秦制,“相国萧何摭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③东汉人陈宠谈到“萧何草律”时,也说“圣汉初兴,改从简易”。^④去秦法之苛繁,务从简易,这是两汉人对汉

初律的共同认识。刘邦、萧何怎会在刚取得政权时就慌不迭地以法律形式复活不“宜于时”的，已为秦法所划灭的“古文”、“奇字”呢？特别应该指出，不是高祖时，而是惠帝四年，始除秦代的挟书之律，而萧何卒于惠帝二年，萧何草律时，那些“古文”、“奇字”赖以传播的儒家经典还为伏生、张苍等少数人私藏，尚未公开重现，“古文”、“奇字”怎会如此昂然居首呢？刘邦、萧何既未除挟书之律，那么秦始皇同文书的禁令当时也未必取消。

又，汉王朝初建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④汉初帝后将相，多出身微贱，文化不高，怎会规定“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呢？又怎会定个讽书九千个不同的字这样的高标准来卡应试的学童呢？

班固之说自是难通，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继而提出“秦书八体”说：“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草书。《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经过这一修正，确比班固的说法精巧了许多，如“书或不正，辄举劾之”的主语已不是一般“吏民”了。时间也被推前至秦时，但因秦“划灭古文”是无法抹煞的史实，故“古文”、“奇字”只得割爱。然而正如唐兰先生指出的：“李斯们既然要统一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又取史籀大篆省改而作小篆，又称秦篆，那末，假如是官定的字体，就不应该有大篆。”^⑤又，许慎讲，经过整理后的结果，“自尔秦书有八体”，像“刻符”、“署书”、“殳书”等是否实有，究竟何指，后人挖空心思也讲不清。如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引萧子良说：“署书，汉高六年萧何所定，以题苍龙白虎二阙。”那怎么是秦书之一体呢？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论及这些

字体时说得对：“其体茫昧。”秦始皇同文书后是不是有这许多“花体字”，至今考古学无法证实。

班固说汉兴以六体试学童，许慎说是八体，二说甚相抵牾。弥缝者大有人在。如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当是汉初试以八体，其后重定《尉律》，乃以六体，许言其始，班要其终，各存其是，不必牵合。”如此臆断！更多的人如李赓芸主张用许说纠正班说。^⑤王鸣盛的话尤为典型：“二说大相矛盾，以予考之，许说是，汉志非也。”主要理由是“凡论文字，必以许慎为正，班虽在许之前，……不如许氏确也。”^⑥更有人如宋王应麟要将汉志的“六体”改为“八体”。^⑦启功先生认为：“可知学童受太史考试始得为史，这是自萧何以来的汉律。而所试内容，却前后不同。西汉承秦之后，试以‘八体’；东汉承莽之后，试以‘六体’。《汉志》沿用刘歆的蓝本，叙述没有《说文叙》详细，好似萧何之律即试‘六体’。”^⑧许慎的说法就一定对吗？许慎自己感叹：“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这部《尉律》既当时尚存，不应只为他一人所知。“隶书”乃秦八体之一，而汉兴又长期用以试学童，是著之于煌煌《尉律》的，何以“诸生……喧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如此茫昧无知！尤其是早于许慎的班固，职为史官，更不应见不到这部《尉律》，他怎会把“八体”错成“六体”呢？王充也是早于许慎的，其《论衡·别通篇》云：“孝明之时，读苏武传，见武官名曰移中监，以问百官，百官莫知。夫仓颉之章，小学之书，文字备具，至于无能对圣国之问者。”最后的话与许慎颇相似，但未提到《尉律》。段玉裁云，许说“固别有所本”。^⑨《汉志》“小学家”类不是著录有《八体六技》一书吗？讲得最干脆的是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文序纠谬》：“此云‘八体’者，盖《八体六技》刘歆所伪撰，许慎用其说也。”试问，如果《八体六技》书中的“八体”确指“秦书八体”，^⑩那末《汉书·艺文志》的著者班固

(康有为说著者是刘歆),在著录该书后为何在序中摒弃“八体”说,反去大谈“萧何六体”呢?胡朴安讲得对:“若据《汉书·艺文志》叙论,则《八体六技》一书,非汉兴所试之八体,合以亡新所定之六书。”^⑫

班说既非,许说亦误,我们还要深究。现把“萧何六体”、“秦书八体”同“王莽六书”放在一块考察,看他们关系如何,依下列次序列表:

王莽六书	1. 古文	2. 奇字	3. 篆书	4. 左书	5. 缪篆	6. 鸟虫书	
萧何六体	1. 古文	2. 奇字	3. 篆书	4. 隶书	5. 缪篆	6. 虫书	
秦书八体			2. 小篆	8. 隶书	5. 摹印 ^⑬	4. 虫书	1. 大篆 3. 刻符 6. 署书 7. 殳书

于此不难识破真相:西汉中后期儒家“古文经”陆续重现,王莽、刘歆等好古,遂使“古文”、“奇字”泛滥起来,作为“制作”的项目之一,他们把当时的各种书体概括为“六书”,但在次序和名称上注进了厚古薄今的观点。可以说,首先给书体排队并赋名的是王莽等人,而不是秦人,王莽等贬通行的“今文”为“左书”,启一恶端。“萧何六体”的内容与顺序全同于“王莽六书”,但是班固却把这“王莽六书”逆推二百年,挂在开国名臣萧何的名下,托古以饰其说,还踵继王莽、刘歆,进而给“今文”一个更卑的卑称:隶书。然而“萧何六体”沿袭之迹难掩,“隶书”的名称及起源说又无多少人接受,许慎遂起而造出个“秦书八体”说以纠班固之失,屏“古文”、“奇字”而列大篆于首,又多搞了些“花体字”的名目来凑数。秦汉最通行的书体在班固的笔下得一“隶书”名称已属不幸,而至许慎,地位更为卑下,竟居末座,连任何一种“花体字”都不如了。如此,时人和前人(包括班固)的“莫达”之说终于被他“达”了。

应劭《汉官仪》载东汉光武帝的《四科取士诏》，内有“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④光武帝以儒生而跻帝位，年青时，“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明帝“十岁能通《春秋》。……师事博士桓荣，学通《尚书》”，章帝自幼“好儒术”。^⑤诸功臣及官吏皆通经艺。这与西汉高惠时君臣迥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就严格了，士人若“书疏不端正”，有司就要举劾。东汉初这一套制度是班固、许慎所熟悉的，“祖宗”立的法度，其后诸帝也许仍然遵行，那就可能更为班、许所亲知了。《汉书·艺文志》、《说文解字·叙》的“书或不正，辄举劾之”，或许是班固、许慎取之于近而托之于古吧。

4. 辨某些材料之伪

我们在查阅现存的西汉时代的典籍时，发现把“隶”作为书体专名使用的有三例。一是孔安国的《尚书序》：“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按，着重号是本文作者所加，下同）二是孔安国的《古文孝经训传序》云：“鲁恭王使人坏夫子讲堂，于壁中石函得古文《孝经》二十章，载在竹牒，其长尺有二寸，字科斗形。鲁三老孔子惠抱诣京师，献之天子，天子使金马门待诏学士与博士群儒以隶字写之。”另一是孔臧的《与侍中从弟安国书》讲：“知以今籀古，以隶篆推科斗，以定五十余篇，并为之传云。”若上述著作可靠，则“隶”作为书体名称在汉武帝时已见载籍。

可是这些都是赝品！《史记》及《汉书·艺文志》均不言孔安国为《尚书》作传事，至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及《隋书·经籍志》才提及孔安国的《尚书传》。伪孔传乃魏晋间人所著，早成定讞。^⑥现

存古文《孝经》孔安国传是清代乾隆时从日本传来的，清人考证是伪作。^{④7}孔臧文则见于《孔丛子·连丛子》，而《孔丛子》、《连丛子》也是地道的伪书，曹魏时人作。^{④8}

三文中都提到“科斗文”一词，似乎汉武帝时已有此名，实则“科斗书之名起于后汉，而大行于魏晋以后，”^{④9}作伪者企图托之于孔子后代以自重，却掂拾了当时流行的用语，恰恰露出了麒麟皮下的马脚。“科斗书”如此，“隶书”之名何尝有异？

伪书倒也不可因其伪而置之不顾，辨其伪，知其作伪年代，亦自有它的用场。本文前已论证，魏晋是“隶书”之名开始普遍使用的时期，这三篇伪孔文的用例不是可以作为有力的佳证吗？

孔颖达《尚书正义》引卫宏《古文奇字·序》，述秦始皇坑儒事，首有“秦改古文以为篆隶，国人多诽谤”语，但是孔氏同时代人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十七、《汉书·儒林传》颜师古注，还有《后汉书·陈蕃传》李贤注、《史记·儒林列传》张守节正义均引述同一坑儒事，开头悉无“改古文以为篆隶”一语，书名还有的引作《诏定古文尚书》，有的作《诏定古文官书》。唯宋代类书《太平御览》卷八十六作：“秦改古文以为大篆及隶字，国人多诽谤怨恨。”而且段玉裁认为《古文奇字》、《诏定古文尚书》等皆为《古文官书》之讹，并疑为南北朝时人依托为之。^{⑤0}孙诒让和朱希祖提出《诏定古文官书》的作者不是东汉的卫宏，而是晋初的卫恒。^{⑤1}

清代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曾引《尚书考灵曜》：“秦改古文以为小篆及隶字，国人多诽谤怨恨。”查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及赵在翰《七纬》，皆无此语，当是桂馥误题书名。“隶书”一词并未在汉代纬书中出现。

二、“隶书”的真正涵义是什么？

“隶书”这一名称，使用了近 2000 年，涵义是什么，历来是有争

论的。字文钧的观点具有代表性：“‘隶’，过去有一种说法是指奴隶，这是错误的。‘隶’是指官吏中的下层，即书吏和狱吏之类。他们为了书写的方便，就采用了民间通行的草篆，于是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字体。因为这种字体在被称为徒隶的下层官吏中普遍使用，所以称为隶书。”^⑫

对“隶书”涵义的不同解释，总是根源于《汉书·艺文志》的“是时（本文作者按，指秦始皇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短短数语，班固指出了“隶书”兴起的时代、原因、作用，道出了“隶书”得名的涵义。显然，在这段话中，“隶书”之“隶”，即徒隶也。要理解班固命名的真正涵义，就必须了解“隶”和“徒隶”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解决问题的一把钥匙。“隶书”说发端于班固，张扬于许慎，他们都是汉人，因此比较笨拙但也比较可靠的方法就是仔细研究两汉人著作中这些词的使用情况，从而确定其真正涵义，舍此似别无他径。

1. “隶”不指称奴隶

我们同意字文钧的看法，把“隶”解释为奴隶，确是错误的。齐佩瑒说：隶书“这种苟趋省易的平民文字与六国古文的诡变简率，是不无关系的，或者因六国是亡国奴隶，故秦人斥其文字为奴隶文字”。^⑬他认为隶书脱胎于六国文字，因六国是亡国奴，故得此名，这是错误的。

我们曾查阅了大量的两汉人著作，发现在汉代，作为奴隶名称的是下列诸词：奴、婢、僮、仆、苍头、庐儿、臧、甬、侮、获等，兹摘取数例于下：

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刘邦《罢兵赐复诏》^⑭）

乃髡钳季布，衣赭衣，置广柳车中，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

鲁朱家所卖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买而置之田。诫其子曰：“田事听此奴。”（《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多从人，行至长安，虏卖以为僮仆。（《史记·南越列传》）
 尝有客，遣苍头市酒，迁久，大醉而还。客不堪之，骂曰畜产。宽须臾遣人视奴，疑必自杀。（《东观汉记·刘宽传》）

奴从宾客浆酒霍肉，苍头庐儿皆用致富。（鲍宣《谏哀帝疏》）

臧、甬、侮、获，奴婢贱称也。（扬雄《方言》卷三）

在先秦，“隶”确作奴隶解，如《左传·昭公三年》：“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又《哀公二年》：“克敌者，……人臣隶圉免。”又《定公九年》：“臣尝为隶于施氏矣。”而在两汉，有少数“隶”作奴隶解，但多是仿古的用例。如：

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刘向《极谏用外戚封事》）

叔群既在皂隶矣，六卿兴而为桀。荀寅肆而颺恣兮，吉射叛而擅兵。（刘歆《遂初赋》）

论士苟定于志行，勿以遭命，则虽有天下不足以为重，无所用不可以为轻，处隶圉不足以为耻，抚四海不足以为荣。（王符《潜夫论·论荣》）

况此隶竖，生女为妾，生男为虏。（张安超《讥青衣赋》）

先秦的“隶”是奴隶义，但词义在变化、引申，至两汉，其主要意义之一是“卑贱者”、“卑贱的”，有时用作骂人语。试看下面诸例：

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汉书·叙传》）

江充，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耳。（壶关三老茂《上武帝

书》)

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
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闾茸之中,……

(司马迁《报任安书》)

饿殍流隶,饥寒道路。(班彪《王命论》)

地可以垦辟,悉为农郊,以贍萌隶。(司马相如《上林赋》)

上以应天变,下以安民隶。(马融《延光四年日蚀上书》)

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⑤曾饿得寄食漂母,可从来没有做过奴隶。江充,前已明言是“布衣之人”,这“隶”用作定语,颜师古注为“贱也”。司马迁受宫刑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⑥岂是奴隶?“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说的是他与宦官无异,宦官是宫中备扫除的贱役。“萌隶”同“甿隶”,贾谊《过秦论》称农民起义领袖陈涉为“甿隶之人”,陈涉原是“与人傭耕”^⑦的雇农,不是奴隶。

富有启发意义的是,汉元帝时人史游的《急就篇》里有“奴婢私隶枕床杠”一语,乍看来,这“隶”不指奴隶又指什么?但注《汉书》的颜师古却解为动词:“隶,附着之义也。私隶者,言属著私家,非给公役者。”颜师古是了解汉代多数“隶”不作奴隶解的。而宋代号称博洽多闻的王应麟补注《急就篇》,却解为“隶,仆隶”,以正颜注。当为颜是而王非。

在汉代,“隶”并不跟“奴”连用为双音名词。汉语在古代,单音节词占优势,当双音节词逐渐增多时,因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便往往将前代语言中某单音节词拈来,与其时同义的某单音节词结合成一个新的并列结构的双音节词,先秦的“隶”(奴隶义)与魏晋的“奴”(奴隶义)组成一个双音名词便是一例。《汉书·司马迁传》颜注引晋尚书郎晋灼曰:“臧获,败敌所被虏获为奴隶者。”《后汉书·西羌传》:“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此例转

变痕迹宛然。后来逐渐用开:《晋书·刘元海载记》:“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汝将何以视天地,尚不愧奴隶耶?”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中原困屠解,奴隶饜肥豚。”人们往往因汉以前“隶”有奴隶义,汉以后出现的双音名词“奴隶”日益大量使用,于今尤烈,就误以为汉代的“隶”也是奴隶义。对具体语言未作具体分析,易于使人将“隶书”之“隶”释作奴隶。

2. “隶”和“徒隶”并不指称下层官吏

“隶”和“徒隶”指称下层官吏,如书吏、狱吏之类,持这种见解的除上述宇文钧外,又如唐兰先生认为:“把他们叫做隶书,徒隶的书”,“恐怕只是郡县小吏所写,是隶书一类。”^⑤马叙伦先生认为:“此类书出自诸隶之手,犹今日官府文书皆由书记作之也,故号隶书。”^⑥讲得更明确的如胡朴安:“隶书的兴起,是秦代专供给狱史隶人用的。”^⑦丁易:“把它叫做‘隶书’,说是官府衙门里差人皂隶用的字。”^⑧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亦云:“当时办公文的小官叫做‘徒隶’。”^⑨可见这是文字学界中的极为普遍的观点。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答曰:不然。

在官制上,汉亦承秦制。“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⑩“吏”是官员的通称。高级官员可以叫“吏”,如《汉书·谷永传》:“上从之,以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而平阿侯谭位特进,领城门兵。永闻之,与谭书曰:‘……拜吏之日,京师士大夫怅然失望。’”这“吏”指最高执政官。又如刘歆因移书让太常博士,触忤执政大臣,“惧诛,求出补吏”,此“吏”乃河内郡太守,^⑪不可谓低。笔者查阅了《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辑本),低级官员尽管在统治者的营垒中地位卑下,但他们绝不叫“隶”或“徒隶”,而也可以叫“吏”,还有的叫“史”或“书佐”,具体名目繁多。在三书中职司刑狱和文书的就有“狱掾”、“狱

吏”、“狱小吏”、“狱法吏”、“狱法小吏”、“狱史”和“书吏”、“书佐”等名称。如：

平阳侯曹参者，沛人也。秦时为沛狱掾。（《史记·曹相国世家》）

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秦时狱法吏冠柱后惠文。（《汉书·张敞传》）

吉本起狱法小吏。（《汉书·丙吉传》）

求为狱小吏，因学律令，转为狱史，县中疑事皆问焉。（《汉书·路温舒传》）

既至官，当遣从史西，召善书吏十人于前，治私书谢京师故人，遵冯几，口占书吏，且省官事。（《汉书·陈遵传》）

育径出曹，书佐随牵育。（《汉书·萧育传》）

其他如“监门吏”（《史记·酈生陆贾列传》）、“里吏”（《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市吏”（《东观汉记·樊晔传》）、“驭吏”（《汉书·丙吉传》）、“御史”（《汉书·张敞传》）、“骑吏”（《汉书·韩延寿传》）、“卒吏”（《汉书·何武传》）、“卒史”（《史记·萧相国世家》）、“市掾”（《东观汉记·第五伦传》）等等。笼统而言，则叫“下吏”（《汉书·韩延寿传》）、“小吏”（《东观汉记·第五伦传》）、“掾吏”（《东观汉记·吴良传》）、“掾史”（《汉书·杨敞传》）、“佐史”（《汉书·朱博传》）等。这些名称有的在秦时已出现，如云梦秦简有“佐史”（《金布律》）、“佐吏”（《置吏律》）。

这些人在地主官僚行列中属于下层，汉制，“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⑤这些“佐史”都是为统治阶级卖力的，“治书定簿，佐史之力也”，^⑥其地位仍在人民群众之上。贾谊《治安策》曾经描绘了这个

金字塔式的统治机构：“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这些“小吏”非但不叫做“隶”或“徒隶”，而且是站在“隶”或“徒隶”的对立面。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很多文字学论著将两者名称混同，以致误解了“隶书”的真正涵义。

3. “隶”、“徒隶”、“徒”都指称罪犯

“隶”字，前已论及，在两汉，除了一些仿古的用例外，主要意义之一是“卑贱者”、“卑贱的”。“隶”还有另一主要意义，是罪犯、刑徒。从语源上看，这一义也是由奴隶义发展而来的。在古代社会，经常把罪犯充作奴隶，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斐豹，隶也，著于丹书。”杜预注：“犯罪没为官奴，以丹书其罪。”后来阶级斗争和生产的发展，犯罪和服刑便有大小轻重之分。在两汉，刑徒与官私奴婢虽同是失去自由的人，同样受“髡钳”或“黥”的刑，但刑徒的服刑及强制性服役是有一定期限的。

秦时有一种刑徒，是以“隶”作为名称的。1964年西安出土的秦昭王三十三年的高奴铜石权，铸有“工隶臣平”等字，^⑦秦昭王廿七年和四十年的上郡戈也都是隶臣铸造的。^⑧这些“工隶臣”是被迫在官营手工作坊中劳动的男性刑徒。1975年出土的云梦秦简多数是秦律条文，秦律中经常出现“隶臣妾”，如“隶臣妾其从事公，隶臣月禾二石，隶妾一石半”（《仓律》）。这种刑徒因年龄差别而有“大隶臣妾”、“小隶臣妾”、“免隶臣妾”（《仓律》）等不同名称。因被迫从事的工作差别而有“工隶臣”（《军爵律》）、“府隶”（《金布律》）、“牢隶臣”（《贼死》）等不同名称。在《汉书·刑法志》里也有“隶臣妾”，颜师古注：“男子为隶臣，女子为隶妾。”《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就记载了威圉侯季信成、襄城侯韩释之等因犯罪成了隶臣。“隶”单独用的例子如许慎《说文解字·叙》：“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⑨《汉书·刑法志》：

“卒隶之徒，还为敌仇。”这两例中的“隶”都是指刑徒，如英布等；“卒”指戍卒，如陈涉等。^⑩又《说文》十二上：“阨，常以昏闭门隶也。”以刑人看门，古有其例。

这个“隶”和“徒隶”意义是完全相同的。《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生为愍隶，死为转尸”，颜师古释为“愍隶者，言为徒隶，可哀愍也”。班固讲的“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他自己就是把“隶”解作“徒隶”的，历来很多人直至宇文钧都这样理解，这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徒隶”是什么意思，往往被解释错了。请看下面诸例：

（三年）六月，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汉书·惠帝纪》）

令徒隶衣七绌布。（《史记·孝景本纪》）

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
 圜，徒隶所居也。一曰女牢，一曰亭部。^⑪（《说文解字》十三下）

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
 这“徒隶”是指办公文的书吏、狱吏之类的小官吏吗？否。再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这个“徒隶”又与“徒”所指完全相同，试比较下面五对例子：

甲、（七年）春，免徒隶作阳陵者。（《史记·孝景本纪》）

（中四年）秋，赦徒作阳陵者。（同上）

乙、其后安国坐法抵罪，……居无何，梁内史缺，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起徒中为二千石。（《史记·韩长孺列传》）

孝景时，梁人韩安国坐事被刑，起徒中为内史。……安国徒隶，……还治其国。（蔡邕《谏用三互法疏》）

丙、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亡耻之心乎？……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贾谊《治安策》）

丁、建和元年夏四月丙午，诏曰：“比起陵茔，弥历时岁，力役既广，徒隶尤勤。顷雨泽不沾，密云复散，悦或在兹。其令徒作陵者减刑各六月。”（《后汉书·桓帝纪》）

戊、于是罚琰为徒隶，使人视之，辞色不挠。（《三国志·魏书·崔琰传》）

太祖以为琰腹诽心谤，乃收付狱，髡刑输徒。前所白琰者又复白之曰：“琰为徒，虬须直视，心似不平。”（《三国志·魏书·崔琰传》裴注引《魏略》）

“徒”指的什么？《论衡·四讳篇》：“被刑谓之徒。”徒就是有罪受刑服劳役的犯人。史载甚夥，仅举数例于下：

颍川铁官徒申屠圣等百八十人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九郡。（《汉书·成帝纪》）

邴吉为廷尉监，治巫蛊于郡邸，怜曾孙之亡辜，使女徒复作淮阳赵征卿、渭城胡组更乳养。（《汉书·昭帝纪》）
坐须贾于堂下，置莖豆其前，令两黥徒夹而马食之。（《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青尝从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钳徒相青。（《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宠妻梦裸袒冠帻踰城，髡徒推之。（《东观汉记·彭宠传》）

后三例分别以刑名“黥”、“钳”、“髡”作定语。

总之，“隶”、“徒隶”、“徒”绝非指称书吏、狱吏之类的低级官员，都是指罪犯、刑徒。《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司隶校尉，……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节，从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蛊，督大奸猾。”

颜师古注很有价值：“以掌徒隶而巡察，故云司隶。”原文、颜注充分证明了“隶”、“徒”、“徒隶”三者意义相同。郭沫若、尚钺徒为奴隶的说法是不对的。^⑫从语源上看，“徒隶”正是由同义词素“徒”和“隶”构成的，比较后起，《春秋》三传、《论语》、《孟子》、《庄子》、《荀子》皆不见，《管子·轻重乙》及云梦秦简始各一见。^⑬

秦汉的徒隶除了要服劳役或在官营手工作坊中做“工”（如云梦秦简的“工隶臣”，汉成帝时起义的“铁官徒”），还可能被迫做各种“低贱”的差使，如看门（《说文》的“阍”），官府中的“听差”（秦简中的“府隶”），拘捕犯人、勘测现场和监管犯人（秦简中的“牢隶臣”及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徒隶”），这些是“徒隶”的词义转化为差役的基础。但变为差役义，大概是较后的事，具体如何，尚待研究。这里举唐代的两例，柳宗元《梓人传》：“彼为天下者，本于人。其执役者为徒隶，为乡师里胥，其上为下士，又其上为中士，为上士，又其上为大夫，为卿，为公。”这个庞大的统治机构的最低层就是官府衙门里的差役——徒隶。陆龟蒙《野庙碑》的“车马徒隶，丛杂怪状”可资佐证。

我们切不可拿后代的词义去理解前代语言里的词，否则就会产生错误。汉代的“隶”和“徒隶”非书吏、狱吏，而是刑徒，这是正确理解“隶书”得名时涵义的一把钥匙。

4. 释“陪隶”

在东汉及其后的典籍中有“陪隶”一词，例如：

昔为陪隶，与臣从事。（班固《为第五伦荐谢夷吾疏》）

臣以负薪之资，拔于陪隶之中，奉职宪台，擢授戎校。（袁绍《上献帝书》）

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气决然。自君章之后，转相放式，好干上怵伎，以采名誉，末流起于爱憎而政在陪

隶也。(应劭《风俗通·过誉篇》)

乘虽见察授,函封未发,未离陪隶。(《风俗通·十反篇》)

毛遂,赵之陪隶,犹假锥囊之喻,以寤主立功。(曹植《求自试表》)

这些“陪隶”显然是指称政府官员,里面又有个词素“隶”,它是不是指差役,办公文的小官?而且,第一例出自班固作品,与我们研究的“隶书”说有关系吗?这些“陪隶”用例可不可以推翻我们上述的观点及论证?这是必须辨明的。让我们看看谢夷吾的“陪隶”身份是怎么样的,第五伦称谢夷吾“昔为陪隶,与臣从事”,那指的是第五伦任郡太守时,擢谢夷吾为督邮,督邮代表一郡的行政长官太守督察县乡,宣达“政令”,兼司讼狱捕亡等事,职权极重,岂是差役所可比拟!再看袁绍,自称“陪隶”,绍何许人?史载,他是“司徒汤之孙”,“少为郎”,“后辟大将军何进掾,为侍御史,虎贲中郎将”,迁“佐军校尉”。出身于豪门显族,官运亨通,何尝是低级下吏?汉制,公卿郡守等中央及地方高级官吏皆可自置属官,“大将军何进掾”、督邮就是这类地位颇不低的属官,东汉的“陪隶”一词即指此。

“陪隶”一词怎样产生的?它是“陪臣”的类化词。“臣”及“仆”、“隶”,原义皆为奴隶。“臣”最早由奴隶义演化出来,指做官的人,而且与“陪”^④结合成“陪臣”一词。《礼记·曲礼下》:“列国之大夫人天子之国曰某士,自称曰陪臣某。”《左传·僖公十二年》载管仲见周天子,自称“陪臣”。这指的诸侯的大夫。《论语·季氏》“陪臣执国命”指的是大夫的家臣。至汉,仍沿用此词,如《东观汉记·梁鸿传》:“初与京邑萧友善,约不为陪臣,及为郡吏,鸿以书责之而去。”则是指的当时的郡国守相的高级属官。当时的语言中既然有“陪臣”一词,于是由类化作用,人们又把与“臣”同义的“隶”拈出,^⑤与“陪”组成“陪隶”,它是“陪臣”的同义词。东汉陈元《驳江冯督察三

公议疏》中“至乃陪仆告其君长”的“陪仆”也是这种类化词。

东汉的“陪隶”一词不是指的差役、文书之类的下级官吏，这个“陪隶”与“隶书”的“隶”无关。

5. 班固“隶书”说的涵义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首先提出“隶书”一名：“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按照班固的说法，“隶书”就是“施之于徒隶”的“书”。很多人据之简化或推导，近人如康有为，今人如唐兰、启功都认为，隶书就是徒隶的书；^{⑦⑧}也有人如宇文钧、胡朴安、马叙伦说为，隶书是徒隶使用的书体；^{⑦⑨}也有人如江声、刘师培则说，隶书是为了“以便徒隶”。^{⑧⑩}这些说法已为人们所习见、所常道，其实，都是经不住推敲的。

原因之一，他们都把“隶”和“徒隶”解释错了。前已论证，“隶”、“徒隶”是指称罪犯、刑徒。这些徒隶绝大多数是劳动者，试问，他们在犯“罪”判刑前或者被强制服劳役的时候，能不能掌握文字？在古代封建社会里，文化垄断在剥削阶级手中，这群“犯人”怎能享有或者使用一种特有的书体？哪怕是简率的、粗俗的、不标准的书体？这种书体怎么“便利”他们？

也许有人说，徒隶中并非没有掌握文字的，例如秦代铸造兵器和衡器的工匠，汉代自应也有。诚然，在秦的上郡戈和高奴铜石权上，是刻铸有铸工刑徒的名字，但那是因为“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⑦⑨}是为了检查质量向徒隶算账加罪用的。而且铸器上的文字，也不一定是徒隶的手笔；即令是，这种徒隶也为数极少。^{⑧⑩}如果说，隶书就是极少数掌握文字的徒隶的书，或是为了方便他们，那么，“起于官狱多事”、“官狱职务繁”之语怎么着落？

这种认为隶书就是徒隶之书的想法，其根源除了对“徒隶”一

词有误解外,还因为把班固的“施之于徒隶”的“施”字理解为施行、推广的缘故。在徒隶中施行、推广,不就是“徒隶的字”或“徒隶使用的字”吗?可是,统治者驱使徒隶服苦役,唯恐不能及早地榨干他们,例如“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⑧又如汉成帝永始二年诏书,承认为了筑昌陵,“卒徒蒙辜,死者连属”。^⑨1972年春在汉景帝墓阳陵附近,发现钳徒墓,尸骨成叠,刑具遍坑,都是在非人待遇下惨死的。^⑩(史载的“免徒隶作阳陵者”^⑪不过是欺骗手法而已)。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有何善心,又有何暇去向徒隶们施行、推广一种书体?如果说因为“官狱多事”,那么在徒隶中施行、推广一种书体干什么?又“趋”什么“省易”?这些也令人难以索解。

又一个关键问题横在面前:“施之于徒隶”的“施”是什么意思?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施”的词义,其常用义除“施行”外,还有“加”、“施加”义。《淮南子·原道训》:“德施百姓而不费”,高诱注为“德泽加于百姓”可证。陈琳《为袁绍檄豫州》:“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污国虐民,毒施人鬼。”这“施”决不能释为“施行”,也是“加”义。我们认为“施之于徒隶”的“施”应释为“加”、“施加”。现把语法上与之同类型的结构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例如:

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书·艺文志》)

夫君于之于言也,所致贵也。虽有夏后之璜、商汤之鬲,弗与易也。今以施诸俗士,以为志诬而弗贵听也,不亦辱已而伤道乎?(徐干《中论·贵言》)(按,“诸”是“之于”的合音。)

楚已诛秦,必加兵于赵。(《史记·陈涉世家》)

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史记·

廉颇蔺相如列传》)

泉鳩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为北地太守,后族。((《汉书·武五子传》)

秦,形胜之国,……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史记·高祖本纪》)

诸例中,介词“于”后的宾语都是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承担对象。“加兵刃于太子”的“加”是“施加”义,介词“于”后的宾语“太子”并非得到“兵刃”,据为己有,而是后来升官为北地太守的人“加兵刃”这个动作的承受对象。同理,“施之于徒隶”句中,徒隶并非得到这种书体,作为己用,据为己有。班固的意思是,秦始皇把这种草率的、简便的书体施加于徒隶们的头上,是为了对付、处理徒隶们的犯罪案件的。绝不是向徒隶们施行、推广一种书体,让他们掌握,在他们中间普及。

班固的这种观点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思想根源的。了解班固及其前人关于秦始皇的某些言论,将有助于对班固隶书说涵义的正确理解。秦亡后,两汉人经常把秦始皇的暴虐恣睢,严刑峻法引为鉴戒,《史记》、《汉书》就记载了贾谊、贾山、伍被、刘安、路温舒、吾丘寿王、谷永、刘歆等人关于这方面的言论,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抨击秦始皇的苛刑酷法。例如《汉书》全文载录了吾丘寿王《议禁民不得挟弓弩对》一文,中有“秦兼天下,……灭诗书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其后民以耨耜箠相挞击,犯法滋众,盗贼不胜,至于赭衣塞路,群盗满山”。又如扬雄《廷尉箴》:“秦繁其辜,五刑纷纷,靡遏靡止,寇贼满山,刑者半市,……,秦以酷败。”暴政的恶果,用“赭衣塞路”、“刑者半市”二语,描绘得淋漓尽致。班固在批判秦代苛政这一点上,完全继承了上述前人的观点。如《汉书·食货志》云:“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

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的一段话，应该把它与《艺文志》关于“隶书”的数语结合起来研究。《刑法志》云：“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圜圜成市。”看，路上尽是罪犯，到处都是监狱，这还不是“官狱多事”吗？秦始皇帝自己到了“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的地步，那狱吏们的繁忙、紧张之状更可想而知，为了处理如此惊人多的刑事犯罪案件和公务文书，就要求快速，“苟趋省易”，因而产生了施加于徒隶，对付、处理徒隶们犯罪案件的简便的新书体。罪犯们叫“徒隶”，也叫“隶”，因此这种书体就叫做“隶书”。这就是班固“隶书”说的真谛所在！

班固笔下的“隶书”本是汉代通行的“今文”，西汉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学，其儒经即用“今文”写的。王莽执政称帝托古改制时，古文经学大行，“古文”广为流播，“王莽六书”的规定者是贬抑“今文”的始作俑者。“新”朝灭亡，今文经学又复抬头，《说文解字·叙》中所述的诸生以“今文”为仓颉时的“正文”，并“大共非訾”古文，这些当是承自师学，早已有之的。当时属于古文经学营垒的班固则崇古文而抑今文，他的《汉书》多古字古义，时“多未能通”，从马融伏于阁下从班昭受读一事可见一斑。^⑤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定今文这种书体为秦始皇时的产物，并把这与他所痛恨、批判的秦始皇的酷法严刑牵扯在一起，说这是为了对付、处理徒隶们的大量犯罪案件而创造出来的简率的书体，名之曰“隶书”。其后的许慎继承并发挥了班固的观点：“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这位权威文字学家的言论

逐渐为人们所信奉,请看东汉赵壹的《非草书》:“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分飞,故为隶草,趣急速耳。”又如唐张怀瓘《书断》:“秦造隶书,以赴急速,为官司刑狱用之。”班、许的“隶书”说千余年来遂定于一尊,“隶书”之名大行于世,直至今日。

然而人们往往误定“隶书”得名的时代,至于“隶书”得名的真正涵义,亦无正确的诠解。“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古”,致使“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④今天我们应该做一番认真的清理工作,去虚说,求实事,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辨程邈、王次仲创造隶书的传说

在汉字的各种书体中,关于“隶书”的说法和传说大概是最多的了。世传程邈创造隶书说和王次仲创造隶书说,尤以前者最为流行,解放后不少书、文接受此说。

最早提出“隶书”名称的是班固《汉书·艺文志》,只说秦始皇时“始造隶书”,没有讲到创造者。许慎《说文解字·叙》在述及王莽六书时,有一段话:“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但是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认为是“秦始皇帝”以下十三字是错简,应系于下文“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之下,那么“隶书”即为程邈所作。其实真正最早提出程邈作隶书的是东汉末的蔡邕,其《圣皇篇》云,“程邈删古立隶文”。但晋初卫恒的《四体书势》主张程邈作篆书,只在最后挂个尾巴:“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颜师古在《汉书·艺文志》注中讲:“篆书,谓小篆,盖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隶书,亦程邈所献,主于徒隶。”足见二人还是从许慎说为主。卫恒乃晋初人,卫恒之说也可证明段、桂的错

简说是站不住脚的。程邈何许人也？据卫恒说，“为衙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到了北魏江式，明确地把程邈创造隶书说与班固的徒隶说结合起来：“隶书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于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隶，即谓之隶书。”到了唐代。张怀瓘《书断》云：“程邈字元岑。”几百年不见载籍的程邈的字忽至此时找到！创造隶书的过程则被讲得更具体：“始为衙县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

王次仲创造隶书的传说更与秦始皇的苛刑酷政相关。本来蔡邕《劝学篇》只说：“上谷次仲，初变古形。”卫恒《四体书势》：“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王次仲何时人？忽有人说是东汉章帝时人，忽有人说是灵帝时人。^⑦至北魏酈道元《水经·漂水》注与梁任昉《述异记》，都记载了一则传说，王次仲也成了隶书的创造者。酈道元云：“郡人王次仲，少有异志，年及弱冠，变仓颉旧文为今隶书。秦始皇时，官务烦多，以次仲所易文简，便于事要，奇而召之，三征而辄不至。次仲履真怀道，穷数术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槛车送之。次仲首发于道，化为大鸟，出在车外，翻飞而去，落二翮于斯山，故其峰峦有大翮小翮之名矣。”王次仲化鸟仙去，戏弄了也战胜了秦始皇。

程、王创造隶书说，起源既晚，史不足征。尤其是1975年云梦睡虎地大批秦简的发现，证明了秦始皇前隶书这种书体早已出现，是广大文字使用者的成果。这两则传说，究其源，都是从班、许的隶书说化生出来，层累增益而成，总是不离“监狱”、“囚车”，总是与秦始皇的无道有关。

1978,8,修改定稿

1978年3月北京地区语言学规划会议在虎坊桥远东饭店召开，笔者有

幸旁听,在会议休息时间数次向唐兰先生请教“隶书”问题,有些观点虽与唐先生相异,然唐先生非但不以为忤,反而热情勉励我著文发表,故于是年暑假增补定稿。唐先生时七十八岁高龄,步履强健,不意于次年遽尔逝世。谨此志悼。

【附注】

- ①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1964年,页7,页8。
- ②王充《论衡·谈天篇》。
- ③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李斯列传》。
- ④见《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75年第1期。《临沂银雀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2期。
- ⑤《史记·太史公自序》。
- ⑥《尚书·泰誓序》孔颖达正义引。
- ⑦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
- ⑧见《汉书·郊祀志下》。
- ⑨《汉书·王莽传》。
- ⑩《汉书·艺文志》。
- ⑪《说文解字·叙》。
- ⑫《汉书·儒林传赞》:“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汉书·艺文志》在“《周官经》六篇”下注:“王莽时刘歆置博士。”
- ⑬见《汉书·扬雄传》。
- ⑭晋卫恒《四体书势》、北魏江式《文字源流表》、《说文解字》大徐本皆作“佐书”。
- ⑮见《后汉书·马援传》注引《东观记》。
- ⑯《说文解字·叙》。
- ⑰《汉书·食货志》。
- ⑱《后汉书·班固传》。
- ⑲如《恢国篇》、《须颂篇》、《佚文篇》、《宣汉篇》。
- ⑳如《讲瑞篇》。
- ㉑如《讲瑞篇》、《自纪篇》。

- ②关于“隶书”一词的早期使用情况,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罗列了一些资料,但不完备。《论衡》的这个用例迄今未为人提及。
- ③此从大徐本、小徐本。“隶卒”、“兴役戍”,段注本改为“吏卒”、“兴戍役”。段改非是,后详。
- ④见《晋书·卫恒传》。
- ⑤《后汉书·礼仪志上》刘昭注:“谢沈书曰:‘太傅胡广博综旧仪,立汉制度,蔡邕依以为志。’”
- ⑥《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
- ⑦《初学记》二十一。
- ⑧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古史辨》第五册。
- ⑨《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
- ⑩《后汉书·马援传》注引《东观记》载,马援上书请正印文,“事下大司空,正郡国印章,奏可”。可见大司空是主管此类事的最高长官。
- ⑪唐兰《中国文字学》,开明书店,1949年,页158。
- ⑫《汉书·刑法志》。
- ⑬《后汉书·陈宠传》。
- ⑭《史记·儒林列传》。
- ⑮唐兰《中国文字学》页157。
- ⑯见钱大昕《三史拾遗》所录。
- 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廿二“试学童六体首古文误”条。
- ⑱见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
- ⑲启功《古代字体论稿》页28。
- ⑳《说文解字·叙》“又以八体试之”段注。
- ㉑唐兰《中国文字学》页15:“秦汉之际有一本书叫《八体六技》,八体固然是秦书八体,……”
- ㉒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页24。
- ㉓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摹印即缪篆。
- ㉔《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
- ㉕《后汉书·光武帝纪》,又《明帝纪》,又《章帝纪》。
- ㉖丁晏《尚书余论》指为王肃伪造。
- ㉗见丁晏《孝经征文》、郑珍《巢经巢文集》卷一《辨日本国古文孝经孔氏传之伪》。

- ④⑧见罗根泽《诸子考索·孔丛子探源》。
- ④⑨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科斗文字说》。
- ⑤⑩见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七《卫宏官书考》。
- ⑤⑪见孙诒让《籀斋述林》卷四《卫宏诏定古文官书考》、朱希祖《汲冢书考》。
- ⑤⑫宇文钧《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功绩》，《人民日报》1974年7月25日。
- ⑤⑬齐佩瑒著，赵荫棠校《中国文字学概要》，1942年8月，国立华北编译馆，页234。
- ⑤⑭这些两汉诏疏文赋或见之于本集，或载之于史书。严可均辑《全汉文》、《全后汉文》可查。又，字下着重号是笔者所加，后同。
- ⑤⑮《史记·淮阴侯列传》。
- ⑤⑯《汉书·司马迁传》。
- ⑤⑰《史记·陈涉世家》。
- ⑤⑱唐兰《中国文字学》页165、页157。
- ⑤⑲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卷二十九。
- ⑤⑳胡朴安《文字学ABC》，ABC丛书社，1931年4版，页41。
- ⑤㉑丁易《中国文字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外出版社，1950年，页72。
- ⑤㉒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各种书体源流浅说》，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页41。
- ⑤㉓《汉书·百官公卿表》。
- ⑤㉔《汉书·楚元王传》。
- ⑤㉕《汉书·百官公卿表》。
- ⑤㉖《论衡·效力篇》。
- ⑤㉗见《西安市西郊高窑村出土秦高奴铜石权》，《文物》1964年9期。
- ⑤㉘见张政烺《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8年3期。
- ⑤㉙此从大徐本、小徐本、段注本改“隶卒”为“吏卒”，“兴役戍”为“兴戍役”（今人引用，多依段改，如启功先生《古代字体论稿》）。钮树玉《段氏说文订》：“此不知因何本改。”按，段改非是。许慎原意，当为“隶”，与“役”（如骊山之役）相应，“卒”与“戍”（如渔阳之戍）相应。秦汉时隶与卒经常被驱遣修建大型工程或执行其他任务。汉代文献中还常见“卒”与“徒”（义同“隶”）连用，如“诸请诏省卒徒自给者皆止”（《汉书·宣帝

纪》)、“卒徒蒙辜”(《汉书·成帝纪》)、“卒徒衣食县官”(《盐铁论·复古》)、“卒徒工匠以县官日作公事”(《盐铁论·水旱》)。

⑦⑩《史记·李斯列传》：“楚戍卒陈胜、吴广等乃作乱。”《史记·叔孙通列传》：“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汉书·五行志》：“亡自戍卒陈胜发。”《汉书·晁错传》：“陈胜行戍。”可证。

⑦⑪《后汉书·崔篆传》李贤注：“《前书音义》曰：‘乡亭之狱曰犴。’”按，犴、圜，古音同属寒部，同系喉音。《说文》段注：“徒隶，贱者称。”不确切。

⑦⑫郭沫若、尚钺释“徒”为奴隶，非是。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2版)页66：“所谓‘徒’也同样是奴隶，一部分是有罪的人，一部分是从民间征发来的。”尚钺《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页37：“在铁官之下，设吏(监工)、卒(工头)、徒(工奴)攻山取铜铁，象这样的工奴在十万以上。”

⑦⑬《管子·轻重乙》：“请以令断山林鼓山铁，今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云梦秦简《为吏之道》：“徒隶攻丈，作务员程。”

⑦⑭《后汉书·袁绍传》李贤注：“陪，重也。”

⑦⑮晋代袁宏《三国名臣序赞》：“至如身为汉隶，而迹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谓。”文若乃曹操的首席谋士荀彧之字，这“隶”既不是奴隶义，也不是卑贱者或刑徒义，也不是衙役义，而是“臣”(做官的人)义。“臣”最早由奴隶义演化出来，变成“做官的人”。袁宏文中“隶”的这种罕见用法也是语言类化作用的结果。

⑦⑯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盖皆刘歆伪撰古文，欲藏今学，故以徒隶之书比之。”唐兰《中国文字学》页165：“统治阶级……把它们叫做‘隶书’，徒隶的书。”启功《古代字体论稿》页26：“什么叫隶书？我们已知就是徒隶的字。”

⑦⑰宇文语、胡语见前引。《马叙伦学术论文集》页134：“秦朝规定徒隶写字用这一体，所以便于办事。”又启功《古代字体论稿》页6：“秦代……隶是徒隶用的、不标准的‘俗体’。”

⑦⑱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一：“江艮庭先生生平不作楷书，虽草草涉笔，非篆即隶也。一日书片纸，付奴子至药肆购药物，字皆小篆，市人不识。更以隶书，往，亦不识。先生愠曰：‘隶书本以便徒隶，若辈并徒隶不如耶？’”刘师培《刘申叔遗书》第十一册《小学发微补》：“盖秦程邈改篆为隶，以便徒隶。”

①⑨《礼记·月令》。

①⑩在剥削阶级的内部斗争中,有少数人犯“法”成了徒隶,如韩安国等,他们是有文化的。但此种人在徒隶中为数极少。

①⑪《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⑫《汉书·成帝纪》。

①⑬见秦中行《汉阳陵附近钳徒墓的发现》,《文物》1972年7期。

①⑭《史记·孝景本纪》。

①⑮见《后汉书·曹世叔妻传》。

①⑯王充《论衡·正说篇》。

①⑰张怀瓘《书断》引王愔说及萧子良说。

此文发表于《语言学论丛》第七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和《语文集刊》第一辑(南大学学报和中文系语言教研室编,1982年)。不久,阿辻哲次先生发表《读鲁国尧氏〈“隶书”辨〉》(日本京都《均社论丛》第11辑,1982年5月),赞同我的若干论点,也指出我失引荀悦《汉纪》卷二五关于“六体”的一段文字,认为它可能抄引自刘歆《七略》,则“隶书”之名不起于刘歆而源自班固说不能成立。我写了《答谢阿辻先生——重论“隶书”的名称》(同上第13辑,1983年5月),感谢阿辻先生指出我的疏漏,但认为《汉纪》及其关于“六体”的一段皆撮编自《汉书》。又,黄耀堃《“京”“华”旧梦》云:萧子良《古今篆隶文体》藏于日本,每一种字体都有举例。(台北《国文天地》1991.10)

“方言”和《方言》

【提要】

一提及“方言”这个词儿，学人们就会自然地想起扬雄的《方言》一书，也就认为扬雄首先使用此词。其实不然，就文献记载而言，“方言”一词及《方言》书名都是首先见于东汉末年应劭的著作。就我浅见，直至19世纪末，汉语里的“方言”意指各地的语言，它既包括现在意义的汉语各方言，也包括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甚至被用来指称国外的语言。后来词义缩小了，仅指各地的汉语土话；在本世纪，随着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兴起，专家们袭用传统词，赋予“方言”以科学的定义，例如“一种语言中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如汉语的粤方言、吴方言等”。近年又出现“地域方言”、“社会方言”两个术语。

—

北京语言学院张清常教授的新著《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后，时贤已有专评，我谨做一点补充。

张著第39页云：“元朝的街巷名称，虽然文献材料极少，尚略有可考，但是胡同名称，实在少见。例如元末熊梦祥《析津志》已亡

佚,据清乾隆年间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38引云:‘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街通。街通二字本方言。’……方言二字熊梦祥本人如何解释不得而知。我们认为,按照中国古代的概念,方言包括氏外族语言。扬雄《方言》里面,东齐青徐方言包括夷语,南楚方言包括蛮语,西秦方言包括氏羌语,秦晋北方言包括狄语,燕代朝鲜归为一起更不必说。这种看法是跟后代和现在大不相同的。”

上引“氏外族语言”的“氏”可能是排印错误。张先生的这一见解很有价值,台湾的《中文大辞典》、上海的《汉语大词典》“方言”条都未能如此解释。笔者六年前著有《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著作与元代语言》(待刊)也曾注意到这一问题,先将我所搜集到的数则“方言”用例抄录于下,也许能起到与张先生桴鼓相应的作用。元人熊梦祥《析津志》中的“方言”一词显然指蒙古语,古代著作不乏类似用例。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自法师至印度,印度始通中国,至是及西使再返,又敕二十余人随往印度,前来国命,通议中书。敕以异域方言,务取符会,若非伊人,将论声教。故诸信命,并资于奘,乃为转唐言,……”此中的“异域方言”与“唐言”相对,当指印度语言。

宋人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一:“阇婆国方言谓真珠为没爹虾囉,谓牙为家凌,谓玳瑁为家囉,谓香为昆爇卢麻,谓犀为低密云。”庞元英是宋神宗时的官员,阇婆国故地在今印尼的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

宋代出使高丽的使臣孙穆著《鸡林类事》,记载了当时的朝鲜语语词数百条,首三条为“方言天曰汉榛,日曰姁,月曰契(自注:黑

隘切)”，此中的“方言”显然是指当时的朝鲜语。

南宋淳熙年间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卷四专立“方言”条，云：“方言者，古人有之，乃若广西之菱语，如称官为沟主，母为米囊，外祖母为低，仆使曰斋梓，吃饭为报崖，若此之类，当待译而后通。至城郭居民，语乃平易，自福建湖湘皆不及也。其间所言，意义颇善，有非中州所可及也。早曰朝时，晚曰晡时，……若此之类，亦云雅矣。”周去非的“方言”既指当时的少数民族的菱语，也指广西的汉语。

笔者曾对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的关于语言文字的条目作过穷尽式的研究，“方言”一词计出现四次，陶氏系元末明初人，但《南村辍耕录》结集成书不晚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冬，说详拙文《〈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载《中国语言学报》第3期）。陶宗仪和熊梦祥都生活在元末，陶氏本黄岩人，但中年以后隐于松江；而熊氏，据元人顾瑛的《草堂雅集》，本江西人，晚年“以诗酒放浪淮浙间，卜居娄江上扁得月楼，……旷达之士，号松云道人。”娄江指今江苏太仓一带，与松江相距甚近。

《辍耕录》卷八“温暾”条：“南人方言曰温暾者，乃微暖也。”

同书卷二“喝盏”条：“天子凡宴飨，一人执酒觞，立于右阶，一人执柏板，立于左阶，执板者抑扬其声，赞曰‘斡脱’，执觞者如其声和之，曰‘打弼’。……盖沿袭亡金旧礼，至今不废……‘斡脱’、‘打弼’，彼中方言，未暇考求其义。”笔者按，此条述元帝宴飨之礼，明言沿袭亡金旧礼，则“彼中方言”当指金代的女真语。

同书卷七“回回石头”条：“回回石头，种类不一，其价亦不一。大德间，本土巨商中卖红刺一块于官，重一两三钱，估直中统钞一十四万锭，用嵌帽顶上。……呼曰刺，亦方言也。”按，元代的回回，指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分布于我国西部及其以西地区。

同书卷十“马判”条：“冯公士启梦弼尝言，为八番云南宜慰司令史日，尝因公差抵一站，日已暮矣。站吏告曰：‘今夜马判上岸，麻线须暂停驿程以避之。’……比曙，抵前站，站吏惊曰：‘是何麻线，大胆若是耶！’……麻线，方言曰官人，”笔者按，陶宗仪此条系据其先辈郑元祐《遂昌杂录》改写，查郑著无“麻线”、“方言”二词。

清代田雯《黔书》卷下“蚂蟥”条，多同于陶氏《辍耕录》，作“驿吏告曰：‘今夕马蚌上岸，麻色须暂停以避之。’……比曙，抵前驿，吏惊曰：‘是何麻色，乃若是！’……麻色，方言官人也”。

田雯《黔书》卷上特立“方言”条，文凡四段，前三段皆以“父母”起首，第一段为“拔，父也，一曰罢。蒙，母也，一曰明。……”第二段为“父为包，母为蔑。……”第三段“父谓之索，母谓之咪。……”

田雯，清康熙时人，《黔书》是其任贵州巡抚时所著，叙贵州少数民族事甚详。《黔书》“方言”条所述必系当时贵州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常用词。

上举九例，加上张书所举元人熊梦祥一例，恰共十例。如果我们有时间多查阅古代记载国内少数民族的典籍和中外交通史的著作，想必能找到更多的用例。黎锦熙先生曾云：“例不十，法不立。”此说之立当无可疑了。

二

那么，在中国古代，“方言”一词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呢？张清常先生认为“方言”包括外族语言，他重申林语堂说。林氏《前汉方音区域考》根据扬雄《方言》一书将前汉方言区分为十四系，兹将张先生所引的五系录如下：

(8)燕代北鄙朝鲜洌水为一系，

(9)东齐海岱之间淮泗(亦名青徐)为一系(杂入夷语)，

- (11)南楚自为一系(杂入蛮语),
- (13)西秦为一系(杂入羌语),
- (14)秦晋北鄙为一系(杂入狄语)。

现在我再作申说:扬雄《答刘歆书》中自称其著作曰《殊言》,自述搜集方言词的方法:“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刘歆《遗扬雄书》也说到“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以为十五卷”,郭璞《方言注序》说:“盖闻《方言》之作,出乎辘轳之使,所以巡游万国,采览异言。”葛洪《西京杂记》卷三亦云:“扬子云好事,……从诸计吏,访殊方绝域四方之语。”上述的“殊言”、“异语”、“异国殊语”、“异言”、“殊方绝域四方之语”指的什么呢?那我们还是看看应劭的《风俗通义序》:“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辘轳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密室。”这是“方言”一词首见于典籍。颜师古《汉书注》于“司马迁传”引应劭曰:“扬雄《方言》云:‘海岱之间,骂奴曰臧,骂婢曰获。燕之北郊,民而骂婢谓之臧,女而妇奴谓之获。’”这是《方言》书名始见于文献。扬雄的这本著作中搜罗的词语主要是各地的汉语词,也有不少非汉语词,例如卷八:“虎,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或谓之於彪(郭璞注:今江南山夷呼虎为彪)。”据现代中外学者考证,“李父”、“李耳”、“於彪”都是非汉语词(详见张永言《词源探索三例》,《中国语言学报》第三期)。《左传·庄公四年》孔颖达疏:“扬雄以《尔雅》释古今之语,作书拟之,采异方之语,谓之《方言》。”总之,《方言》所搜罗的“方言”,都是异方之语,自然不论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都在采集之列。

我再妄言如下:在中国古代,“语言”、“语”、“言语”、“方言”等似乎是近义词,不像在现代汉语里有严格的区别。晋道安《鞞婆沙序》:“昔来出经者,多嫌梵言方质,改适今俗,此所不取。何者,传梵为秦,以不闲方言,求之辞趣耳,何嫌文质?”(按,着重号为本文笔

者所加,下同。)晋法显《佛国志》:“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唯国国言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八慧观《法华宗要序》:“(鸠摩罗什)自手执胡经,口译秦语,曲作方言,而趣不乖本。”(参梁慧皎《高僧传》卷三“译经·论”：“鸠摩罗什……历游中土,备悉方言。”同上卷十五“佛念法师”：“家世西河,洞晓方语。”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一“狼揭罗国……文字大同印度,语言少异。”唐道宣《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支)谦已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已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唐冥详《大唐故三藏法师行状》：“先代翻译,多是婆罗门法师,为初至东国,方言未融,……至如罗什称善秦言,译经十有余年,……”唐刘知几《史通·言语》：“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元汪大渊《岛夷志略》“交趾”条：“其诵诗读书谈性理为文章皆与中国同,唯言语差异耳。”萧大亨《夷俗记》“习尚”条：“其言语多喉舌声,而不清轻。”而元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则“语言”“话语”和“言语”并用：“国中语言自成音声虽近,而占城暹人皆不通话语。……城市村落言语各自不同,亦与中国无异也。”宋人周去非则数词并用,其《岭外代答》卷三“五民”条“二曰北人,语言平易。”卷四“方言”条：“方言者,古人有之,乃若广西之菱语……至若城郭居民语乃平易。”

当我写好此文初稿后,查阅赵元任先生的《语言问题》时,发现前辈先得我心,高山仰止,深悔自己以前读书不细心。不过赵先生书中只举一例,拙文可作赵著的注脚。另外赵先生的论点未尝不可以做点修正。《语言问题》第七讲“方言和标准语”里有一段话:

方言这个名词,在中国是很久就有的名词,从前是当各处地方不同的语言讲。东汉有相传是扬雄写的《方言》一部书,讲什么地方管什么叫什么,它是注重一处一处语言词汇的不同,

同样的东西叫法不同,那都是中国的语言。不过方言这个名词在广义上讲起来么,也当根本不同的语言讲,比方清末在北京有广方言馆,事实上就是教英国语言、德国语言、俄国语言、法国语言、日本语言,各处很不同的语言,根本不一定有关系的、历史上不一定同源的一些语言。那是最广义的方言的名词的使用法。

三

赵先生的广义说似乎可以商榷,那是由于站在“今义”的立场而“以今视昔”的缘故。在19世纪以前(含19世纪)的中国人的心目中,“方言”即语言,无所谓外族语言和汉语方言之分,这是和今人迥然不同的。今人看下列例子时怪顺眼的:晋葛洪《抱朴子·钧世》:“古书之多隐,未必昔人故欲难晓,或世异语变,或方言不同。”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唐皇甫冉《同诸公有怀绝句》:“移家南渡久,童稚解方言。”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三:“尝观文字注:‘秦人谓豹曰程。’予至延州,人至今谓虎豹为程,盖言虫也。方言如此,抑亦旧俗也。”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2:“宰相沈该,顷在蜀郡,买贱卖贵,舟车络绎,不舍昼夜。蜀人不以官名之,但曰沈本,盖方言以商贾为本也。”宋费衎《梁谿漫志》卷七“方言人诗”条:“方言可以入诗,吴中以八月露下而雨谓之淋露,九月霜降而云谓之护霜。……诗人皆用之,大抵多吴语也。”今人看这些例子毫无滞疑,是因为在现代汉语里,“方言”词义缩小了。“方言”既是各方的语言,一个地方的语言当然也是“方言”了。典籍中还见有将“土语”、“俗语”和“方言”相提并论的,这也使现代人容易接受。梁慧皎《高僧传》卷二“昙无讖传”:“讖以未参土言,又无传译,恐言舛于理,不许即翻。”刘知几

《史通·言语》：“唯王宋著书，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史通·杂说中》：“晋楚方言，齐鲁俗语，六经诸子，载之多矣。”宋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二十八：“乡邦俗语即方言也，今人简帖或用之。”民国初年的《辞源》将“方言”释为“土俗语也。囿于一方，不能通行各地，故曰方言”。民国十九年的《王云五大辞典》解释为“各地方的土话”。我揣测，“方言”词义在现代汉语里缩小的原因可能是：汉语自古以来方言分歧十分复杂，几乎人人都能感知，而接触少数民族语言和外国民族语的人总是少数，能形诸笔墨的则更少。而至20世纪，现代语言学的建立给予“方言”以科学的明确的界定，不再含混。例如民国八年的范祥善《国音浅说》：“国音者，国人公有之音也。一国之人，必有语言文字以传达意思。语言文字，必有声音，其限于一区域者，为土音，为方音，不适于全国之用，未可谓之国音。”这段方音与国音即标准音对立的论述，是具有现代语言学观点的人才能作出的。沈步洲在其《言语学概论》（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给“方言”下的定义也显出时代的精神：“故方言者乃同一种语言中由历史所经之情境而发生，非两种源流不相同之语言由历史之机会而接触者也。因地而殊，莫为之界；因时而异，难辨其期；废之不可，减之甚难者也。”

在20世纪的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建立当然与西方语言学的影响密切相关，即以“方言”一词而言，英语的 dialect、法语的 dialecte，源于拉丁语 dialectus，导源于古希腊语的 dialectos“言语、语言、方言”的意思。这个名词源于动词 dialegesthai，“谈话”的意思。西方在19世纪初期，方言研究成为一门学科，其后方言地理学盛行，大型方言地图集问世。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布龙菲尔德《语言论》都花了很多篇幅介绍方言地理学。索绪尔说：“这一事实在德国和意大利是很普遍的，那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方言和正式

的语言并存。在任何时候,任何已达到一定文化程度的民族都曾发生过同样的事情。希腊人曾有过它们的 Koinè ‘共同语’,那是从阿狄克方言和伊奥尼亚方言发展出来的,跟它并存的就有好些地方方言。”(《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第 273、274 页),上举范祥善的话可与之比照。沈步洲在其《言语学概论》的序言中自称“性喜习文于英、德、法各语”,他的书就是引进西方语言学的产物,他给“方言”下的定义当然是渊源有自的。

且看近年汉语词典的“方言”定义。《现代汉语词典》(1978 年版):“一种语言中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如汉语的粤方言、吴方言等。”《辞海》(1989 年版):“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与此同时,不少西方的词典和百科全书给 dialect 下的定义也仍然如此。如 Mario Pei and Frank Gaynor 所编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1954): “a specific form of a given language, spoken in a certain locality or geographic area, showing sufficient differences from the standard or literary form of that language, as to pronunciatio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and idiomatic usage of words, to be considered a distinct entity, yet not sufficiently distinct from other dialects of the language to be regarded as a different language.” *Longman Modern English Dictionary* (1976): “a regional form of a language, esp.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standard or literary language.” *Oxford American Dictionary* (1980): “the words and pronunciation that are used in a particular area and differ from what is regarded as standard in the language as a whol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1983) 首段: “The way a language is spoken in a particular region (for example, the ‘Southern dialect’ of the United states).”

近来西方语言学家给 dialect 下的定义有所变化。如 David Crystal 的 *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1985): “A regionally or socially distinctive variety of a language, identified by a particular set of word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于是中国的语言学家又相应地造出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两个术语,但是多数语言学者和一般人还是把“方言”局限为“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

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的“方言地理学”一章里说:“有一句至理名言,……每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我愿借用此语,说明汉语里的“方言”一词,自东汉以来一千余年,意义并不单纯。只是我们掌握的用例还太少,不足以确定它在各个时期的意义,也难以推阐它的演变史。这样一个重要的词,尚且未能研究清楚,某些学术著作对其古义也未作阐述,可见汉语史研究的薄弱。我们不禁要向汉语词汇史家呼吁,在大力研究俗语词的同时,可否也注意非俗语词的考察。

四

关于《方言》一书是否扬雄所作,历来作肯定回答的多,如戴震《方言疏证》、卢文弨《校正方言》、钱绎《方言笺疏》、罗常培先生《扬雄〈方言〉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等;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十五“别国方言”条则持否定态度:“必汉魏之际,好事者为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云:“反复推求,其真伪皆无显据。”周祖谟先生的《方言校笺序》:“方言是不是扬雄所作,很不容易断定。”赵元任先生《语言问题》说,“东汉有相传是扬雄写的《方言》一部书”,这都是持审慎的态度。按,《方言》书名也是始于应劭,颜师古《汉书注》的“司马迁传”引录了应劭的话,应劭引扬雄《方言》证

“臧获”二字。此后《尔雅·释虫》“莫緝蛸螂蚘”郭璞注：“孙叔然以《方言》说此义，亦不了。”孙叔然乃孙炎字，魏人，著《尔雅音义》。《左传·庄公四年》“授师子焉”晋杜预注：“扬雄《方言》‘子者，戟也。’”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上“先贤士女总赞”、卷十二“梁益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各出现《方言》书名两次。可见自应劭以后，扬雄《方言》书名逐渐出现在魏晋典籍上。不过有些现象值得注意，如《华阳国志》袭用、点窜《汉书》成句，《汉书·扬雄传》：“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华阳国志》改末句为“典莫正于尔雅，故作方言”。而应劭的《风俗通义序》叙述扬雄调查方言事乃是依据扬雄《答刘歆书》，我想，如能从词汇、语法、风格等方面鉴定刘歆、扬雄遗答二书，也许是解决扬雄是否著《方言》这一悬案的办法之一，前人、今人似尚未从此着手，汉语史学人从词汇史角度辨证《列子》真伪，成绩斐然，可否也如法炮制？

汉代《方言》后的继作者是十六国时期的西凉北凉人刘昞，《魏书》卷五二“刘昞传”：“字延明，敦煌人也。”“著《方言》三卷。”《北史》卷三四“刘延明传”同。刘昞，当时人誉之为“河右硕儒”，《史通·杂述》对他评价很高：“其如常璩之详审，刘昞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此书也受到以后学人的重视，宋王应麟《玉海》卷四四“艺文·小学上”载“汉别国方言”、“北史刘延明著方言三卷”。明方以智《通雅》卷首一“方言说”亦谓“北史刘延明亦著方言”。惜乎此书散佚。其后还有一位著《方言》的，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王浩撰方言十四卷，阙。”关于这本书目，宋高宗绍兴初（1131）秘书省颁有《四库阙书目》和《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二种，后者乃近人叶德辉得自丁氏迟云楼的抄本，于

宋讳缺避,无所改移,知其书传授有自,亦属旧本,因为考证而刊行,收入《观古堂书目丛刻》中。则是王浩《方言》乃南宋以前著作,惜亦不传。此二书当与清代的采摭经传故记的《续方言》(杭世骏著)、《续方言补正》(程际盛著)等不同。刘炳《方言》,尤其是王浩《方言》,当今学入知之者甚少,故特为表而出之。

“方言志”一词,如今的语言工作者耳熟能详。就我浅闻,第一个提出此词的是唐刘知几,其《史通·书志》:“茫茫九州,言语各异,大汉辘轳之使,译导而通,足以验风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广被。且事当炎运,尤相关涉,尔雅释物,非无往例,既艺文有志,何不为方言志乎?……至若许负相经、扬雄方言,并当时所重,见传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书,何独舍诸?深所未晓。”刘知几认为班固著《汉书》时既据刘歆《七略》而作“艺文志”,也应据扬雄《方言》而作“方言志”。宋林骕《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三“方言”云:“刘子玄欲作方言志而未果。”本此,然误解《史通》。

戴震《方言疏证序》云:“至应劭集解《汉书》,始见征引,称扬雄《方言》。”这是据《隋书·经籍志》“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应劭撰”立言的,戴书卷三引录了应劭语。我也将《汉书》颜注所引录的应劭注数百条全部翻检一过,确仅“司马迁传”一条。但戴震未能注意颜师古的《汉书叙录》中的一段话:“《汉书》旧无注解,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时代,亦在晋初,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之所见,续厕其末,举驳前说,喜引《竹书》,自谓甄明,非无差爽,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今之《集解音义》则是其书。而后人见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谓之应劭等《集解》。”

赵元任先生在《语言问题》里说:“清末在北京有广方言馆。”这是误记。同治元年(1862年)恭亲王奕訢,设京师同文馆,翌年署理

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奏请在上海和广州“添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随后拟定“上海初期议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试办章程十二条”。同治六年(1867)“江海关道应详通商大臣曾江苏巡抚部院郭”的文书中出现“上海广方言馆”字样,此后文书均如是称,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为兵工专门学堂和中学堂。现存《广方言馆全案》,约编定于光绪二十年(1894)或稍后,未署编者姓名,系江苏巡抚、江海关道、江南制造局总办、会办等关于广方言馆的往来咨札及有关章程,号称全案,实很不全,因系原始案牍,故价值高。上海广方言馆学习的外国语文主要是英文,其次为法文、俄文、布文、德文。(光绪五年的“江海关道刘禀复南洋通商大臣沈”的文书中有“至俄文、布文,似应一并令其肄习”,“沪上广方言馆,向有学习英文、法文、布文生徒”,“至俄文、布文本应兼习”诸语,其中“布文”不知何指。)

1991 年

本文原题为《“方言”的涵义》,发表于《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 年第 1 期。今有增补。

客、赣、通泰方言源于 南朝通语说

【提要】

本文论述自永嘉起的北人大规模南徙导致了黄河流域的汉语北方方言伸展至江淮地区即原吴语区及楚语区的北部,历 200 余年,至南北朝后期形成了以洛阳话为标准的北朝通语和以建康话为标准的南朝通语,客家方言导源于南朝通语。本文继而考证现代江淮方言的东支——通泰方言是南朝通语在原地的嫡系后裔,又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论证通泰、赣等方言与客家方言同源。本文还建议从现代客、赣、通泰方言对南朝通语语音的某些特质作尝试性的探讨。

一

关于客家及其语言的研究,据文献记载,实自清代嘉庆(1796—1820 年)初年徐旭曾、黄钊起,1933 年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的出版,将这一研究推上了高峰。^①

罗常培在其 1942 年所作《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中写道:“我尝说,如果有人把客家问题彻底的研究清楚,那么,关于一部分中国民族迁徙的途径和语言演变的历程,就可以认识

了多一半。从事这件工作,一方面固然可以拿语言的系统去推迹民族迁徙的途径,一方面也可以拿民族迁移的历史去联络语言的关系。”^②若是用现在的术语说,罗常培在这儿既强调了研究客家及其语言的重要性,也提出了研究的方法论。近50年来,中外的后续者们多是按照这一“语文发展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③的方法进行研究的。

客家迁移运动的五期说已为学界所公认,其源始于公元4世纪的“永嘉之乱”时北方汉人的大迁徙。公元220—280年的魏蜀吴三国分裂时期结束后,中国统一于西晋王朝。公元291年,爆发了司马氏皇族内部的“八王之乱”,长达16年,生灵涂炭,引起了农民的起义,也使居住于中国北方的匈奴、羯、鲜卑、氐、羌各族纷纷起事。公元304年,匈奴族刘渊在今山西离石举兵,从此开始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公元311年(晋怀帝永嘉五年)4月,羯人石勒追击晋军于东郡,“王公已下死者十余万人”,^④六月,刘曜攻入晋都洛阳,“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⑤俘晋怀帝。公元316年刘曜攻陷长安,俘晋愍帝,西晋灭亡。中国北方长期陷于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状态,像走马灯似的出现了17个政权。中原大乱,黄河流域的汉人如潮水般南逃,《晋书·王导传》:“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公元317年,晋宗室琅玕王司马睿在南逃的北方士族的拥戴下于建康(今南京)即位,是为晋元帝,统治长江中下游地区,史称东晋,此为南朝之始。经刘宋、南齐、梁、陈,历273年,直至隋王朝统一中国。

4世纪初,中原汉人都把建康的司马睿当作正统,因此南逃的主要路线是渡过淮河,有些人定居下来,有些人以及后来者则进而渡过长江,首都建康及其周围地区自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云:“至南来北人之上层社会阶级本为住居洛

阳及其近旁之士大夫集团,在当时政治上尤其在文化上有最高之地位,晋之司马氏皇室既舍旧日之首都洛阳,迁于江左之新都建业,则此与政治中心最有关系之集团自然随司马氏皇室,移居新政治中心之首都及其近旁之地。王导之流即此集团之人物,当时所谓‘过江名士’者也”。⑥

何止建康及其周围?当时长江中下游两岸遍布北人。罗香林云:“客家先民东晋以前的居地,实北起并州上党,西届司州弘农,东达扬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换言之,即汉水以东,颍水以西,淮水以北,北达黄河以至上党,皆为客家先民的居地。……客家先民虽未必尽出于这些地方,然此实为他们基本住地。……客家先民第一次迁移运动的途径,远者自今日山西长治起程,渡黄河,依颍水,顺流南下,经汝颖平原,达长江南北岸;或者由今日河南灵宝等地,依洛水,逾少室山,至临汝,亦经汝颖平原达长江南北岸。要之,客家先民第一期的迁移,大抵皆循颍、汝、淮诸水流域,向南行动,这是可从该地自然地理推证出来的。”⑦为了安置自北方南迁的士民,东晋及其后的刘宋大量设侨州郡,罗香林根据侨州郡的历史记载及客家家谱,指出客家先民流徙的足迹,“东起今日安徽当涂,西达今日江西九江,南达吉安以至赣县”。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的民族迁徙》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淮域诸支流皆东南向,故河南人大都东南迁安徽”,“安徽省境内侨民之来自北方诸省者以河南占极大多数”,河南山西移民也有不少进入今江苏地区,或迁至武汉、黄梅甚至襄阳地区。⑧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也论及北方士族集团的南迁路线及新居留地问题,兹不赘述。

可以说,西起江陵东至镇江的长江中下游的两岸布满了大量的南迁北人,当然也包括“客家先民”在内。实际上就是北方的汉人逃到吴地、楚地,他们把北方的先进文化、生产技术带到了南方,对

于长江中下游的开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南北朝时特别是梁时,南方的经济、文化远胜北方。对我们研究语言史的学人来说,更有意义的是,这批南迁的汉人把汉语北方方言由黄河流域带到了长江中下游,使公元4至6世纪的汉语方言地图大为改观。《晋书·元帝纪赞》:“经略区区,仅全吴楚。”从方言学来说,淮河以南、长江下游本为吴语区,长江中游本为楚语区。南朝时期“扬州”的建康原是三国时期的吴都,另一重镇号称“西府”的荆州的江陵则是先秦时期的楚都。楚文化和楚语的影响绵亘之久世所周知,此不赘言。现在着重讨论吴语区的范围。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指出,永嘉之乱前今南京地区本操吴语。此已成定谳。但吴语范围究竟如何?有的专家如张琨先生只泛言吴语范围比现在大,而未确指。^⑨根据鲁国尧的研究,吴语区原北抵淮河。^⑩《左传》襄公三年(前570年):“晋侯使荀会逆吴子于淮上”,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认为“淮上”乃吴地,“当在临淮、泗州之境”。《左传》襄公五年(前568年):“孟献子、孙文子会吴于善道。”高士奇引阮胜之《南兖州记》:“盱眙本吴善道也。”《春秋》哀公十二年(前483年):“公会卫侯、宋皇瑗于郟。”杜预注:“郟,发阳也。广陵海陵县东南有发繇口。”海陵即今江北淮南的泰州市、泰县。《左传》哀公十二年:“卫侯会吴于郟,公及卫侯、宋皇瑗盟,而卒辞吴盟。吴人藩卫侯之舍。……乃舍卫侯,卫侯归,效夷言。”卫出公竟在拘留地——今泰州以东一带——学会了“夷言”即吴语。鲁哀公二十二年(前473年)越灭吴,将吴原有的淮河以南领土并吞,将吴所扩张的淮北地放弃。《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勾践所以只取吴地,正如《吕氏春秋·贵直论·知化》所云:“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年),《史记·越

王勾践世家》载楚威王灭越，“尽取吴故地，至浙江”。《战国策·楚策》载苏秦说楚威王语：楚地“东有夏州海阳”，元吴师道重校鲍彪校注本对“海阳”的注释是，“卢藏用云，在广陵东，今扬州海陵县”（按，即今之泰州、泰县）。越虽并于楚，但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仍是与楚不同的地区。《荀子·荣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楚”、“越（含故吴）”、“夏”鼎立，可见三者的文化及语言各具特色。秦以后，江淮之间仍与江南为一体。汉高祖封刘贾为荆王，“王淮东”。贾死，复立刘濞为吴王，尽得吴越故地，都广陵（今扬州）。景帝时平七国之乱后，“徙汝南王非王吴故地，为江都王”。从国名、都城皆可见淮之南为吴地。扬雄《方言》中“吴扬越”连言，这地区的方言早已该是汉语方言的一支了。《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载，曹操征令江北居民内移，“民转相惊”，广陵户“皆东渡江”，因为他们是吴人。《宋书·州郡志》“扬州刺史淮南太守”条：“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居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吴平，民各还本，故复立焉。”可见西晋时江淮之间是吴语区。

历史性的转变就发生在永嘉之乱后的北方汉人的大迁徙，汉语的主要三支——通语、吴语、楚语——长期三足鼎立的稳定局面被打乱了。北方汉语地域广袤，使用人口最多，文化发达，具有标准语的地位，我们借用扬雄的术语，谓之“通语”，吴语、楚语乃是南方的两支汉语方言。由于战乱，成千上万的北人涌进了吴语区和楚语区的北部，“喧宾夺主”，历南朝近300年，西起江陵东至镇江的长江两岸成了通语的“占领区”。

汉语北方方言在跨进江淮新区以前，其内部就没有地域性的差异吗？《宋书·州郡志》：“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西起雍凉，东至海，这么一大

片地区肯定有方言的差异,但大同超过小异。自东周以来,洛阳长期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洛阳话具有权威地位,而使其他方言臣服。若说永嘉之乱前的一段时期,各方言的相互稳定状态已由于内乱而受到一定冲击,那么永嘉之乱则是高强度的冲击力,成百万的北方流民在混乱的逃亡过程中,必然相互“交流”方言;渡过淮河或长江以后,固然有的是同乡聚居,因而南朝政府设置侨州郡,但是这些侨州、侨郡、侨县都是混杂交错的,尤其是今镇江、常州一带的南徐州和以扬州为中心的南兖州。《南齐书·州郡志》:“南兖州”载永明元年(483年)柳世隆语:“凡诸流寓,本无定憩,十家五落,各自星处,一县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淝,东届海隅。”显然这是普遍情况。流民们在犬牙交错式的新居留地,既要接触土著居民的方言,也要与先后到达的其他北方人交际,这都促进了新区的北方方言的融合,如同一只筛子的平面上各色豆子原本各居一区,一经外力的激烈颠簸,各色豆子就要混处杂陈了。

近 300 载的分裂,人为的隔绝使得原本一源的黄河流域的北方方言与淮南、长江中下游的北方方言二者间的分歧逐渐加大。颜之推(531—597年)《颜氏家训·音辞篇》:“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自颜含随晋元帝渡江,至颜之推,已历九世,若至颜思鲁、颜慙楚,则为十世。这么长时期,南方一支必然受原地方言的影响;而北方,少数民族的各种语言尤其是匈奴、鲜卑的阿尔泰语作为统治者的语言对北朝汉语的作用自不在小。到了南北朝后期,即梁与北齐、北周鼎峙时,中国已形成了两个通语,黄河流域以洛阳话为标准,而江淮地区则以金陵话为标准。《颜氏家训·音辞篇》指出“帝王都邑”的语言具有权威性:“独金陵与洛下耳”。在建康,百姓说吴语,而士族与官员则说南方通语。即以颜氏家族而言,自九世祖南渡后一直居于金陵,颜之推父亲颜协晚年居于江

陵,他本人生于江陵,长期随湘东王萧绎(即后来的梁元帝)居江陵,只在551年为侯景军俘至金陵,约一年左右,此后再也未至金陵,但他十分坚持、强调金陵话的正宗地位。又如沈约(441—513年),吴兴武康人,是吴地士族,但他与北方士族的后裔陈郡谢朓、琅玕王融、汝南周顒共同提倡四声论,这“四声”肯定不是就吴语而言的。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的杰出学者,556年他奔北齐都城邺,577年周武帝平齐,他入北周都城长安,此后仕隋,这一特殊经历成就了他的名著《颜氏家训》,这是一部比较文化学的著作,比较了北朝和南朝的思想、礼俗、文学、书法等等,持论公允,实事求是。我们重视的是他对南朝通语和北朝通语的论述:“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羨,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至邺以来,唯见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词,少为切正,李季节著音韵决疑,时有错失;阳休之造切韵,殊为疏野。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颜之推在邺二十余年,只见崔氏叔侄、李氏兄弟语音标准,他指责北方学者李季节、阳休之的音韵学著作的失误。他认为冠冕君子,南方为优,就是说南朝通语优于北朝通语。另一位南北朝末期的学者陆德明(550—630年)在其《经典释文》中说:“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沉浊。”也指出两个通语的差异。

罗香林所说的“客家先民”,自中原地区迁至长江流域,生息繁

衍,子孙后代操的就是南朝通语。唐末黄巢大起义,迫使客家人作第二次迁移运动,罗香林云:“当时全国云扰,民无宁居,惟江西东南部(即上饶以南,赣水以东),福建西南部(即旧日汀州所属各县)及广东东部东北部,侥幸未受灾害,比较堪称乐土。其在东晋第二支派逃难汉族即客家先民之栖息于河南西南部、江西中部北部,及安徽南部西南部的,至是遂有一大部分很幸运地得迁于上述的乐土居住,盖他们前此已分处大江南北,易入鄱阳湖平原、溯赣江而至赣南,更折东,经石城而至闽西南如宁化等地。”^①他们进入大山区,易于保留语言的原有的古老的物质;但是“即使是自花授粉的植物,近亲繁殖的动物和克隆化的微生物,在长期生活和繁殖过程中,也会累积自然的突变”。^②语言也是这样,即使在颇为封闭的地理环境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本身也会缓慢地变化。与留在长江流域的姐妹方言(也在时间的长河中经历着遗传与变异的衍化过程)分道扬镳以后,客家人的语言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色彩的客家话。

二

除了客家话导源于南朝通语外,现代江淮方言也是南朝通语的嫡系后裔。前面我们已论证东晋以前,吴语本北抵淮河,4世纪初北方流民浪潮越淮而南。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的民族迁徙》根据南朝侨州郡的记载,按照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研究这次大移民的路线,论及今江苏省的移民时说:“侨民麋集之地,则江南以今之江宁、镇江、武进一带为最,江北以今之江都、淮阴诸县地为最。”安徽地区,“侨在江南者都聚于下游芜湖附近一隅,江北则散处江淮间,自滁和以至于颍亳所在皆侨置郡县。”湖北则汉水流域之襄阳,长江则自江陵直至黄梅皆满布北来流民。我们再次指出,江陵是仅次于建康的另一重镇,直至梁元帝覆灭,它是北方士庶的又一聚居

地。这样一个范围特别是东部大致与今日江淮方言区相当,江淮方言实莫基于此,但在西部大为缩小。兹述现代江淮方言的大致范围:湖北省的东北部自应山、安陆、应城起向东直至黄梅十余县市;江西省的九江、瑞昌;安徽、江苏两省的江淮之间大致皆是,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江淮方言的东支通泰方言区,西近运河、南临长江,东濒黄海,包括今泰州市、泰县、兴化、东台、大丰、海安、泰兴、如皋、如东、南通市、南通县共十一个点;皖南的青阳、南陵、芜湖、马鞍山、当涂,苏南的南京、江宁、句容、溧水、镇江也是。苏皖二省的方言地理与当时何其相似乃尔! 历 1600 余年只有小的变化,可见 4 世纪的大移民对于中国历史和语言的影响何等巨大。当然江淮方言在西线是大大地退缩了,如今湖北大部分地区说的是西南官话。

客家方言与赣方言关系密切而且同源,自罗常培之论出,天下翕然从之。我们这里要指出的是,这两个方言与江淮方言也有同源关系。现将客家方言的梅县话、华阳凉水井话,赣方言的临川话、南昌话,江淮方言东支通泰方言的南通话、泰州话在语音上的重大相同之处叙述于下:

第一,它们都有两个入声调,而且阳入调值高于阴入调值(南昌除外):

方 言 调 值	客方言		赣方言		通泰方言	
	梅县	华阳	临川	南昌	南通	泰州
阴入	21	32	43	5	4	4
阳入	4	5	5	21	5	5

第二,古代汉语的全浊声母,在这三个方言里今音逢塞音、塞擦音,不论平仄都是送气清音,现举古全浊声母字“田”、“跪”、

“旧”、“白”四字为例,看它们在现代各方言中声母演变的情况:

	梅县	华阳	临川	南昌	南通	泰州	北京	西安	广州	厦门	长沙	苏州
田	t'	t'	t'	t'	t'	t'	t'	t'	t'	t	t	d
跪	k'	k'	k'	k'	k'	k'	k	k	k	k	k	g dz
旧	k'	k'	t _c '	t _c '	t _c '	t _c '	t _c	t _c	k	k	t _c	dz
白	p'	p'	p'	p'	p'	p'	p	p	p	p	p	b

古全浊声母字在左边 6 个方言里完全一致,无论平声“田”字,仄声“跪”、“旧”、“白”字都是送气声母开头(不妨简称作“全送气”),北京、西安、广州则是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厦门、长沙平仄声都不送气,苏州话则仍保留浊声母。

从这个表也可见客、赣、通泰三个方言的一致是反映了同源关系。

在这里,我们承认,客、赣两大方言里有些点古全浊声母字,今音逢塞音、塞擦音并不送气,或某些字并不送气,有些点阳入调值并不高于阴入调值。我们暂且借用生物学的“遗传”与“变异”的术语解释这一现象,一般地说,在生物的种的繁衍中亲代的性状要遗传给下一代,但各个个体也可能产生性状差异,就是变异。现代通泰方言 11 个点毫无例外地阳入调值高于阴入调值,古全浊声母字逢塞音、塞擦音无论平仄皆送气。但是深入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今泰州话上述“跪”、“旧”、“白”等仄声字,白读时声母送气,而文读则不送气,后者跟北京话、南京话、扬州话一致,我们完全可以证明白读送气是亲代性状的“遗传”,而文读则是“变异”,是受普通话和江淮方言中支——宁扬方言——的影响所致。泰州话阳入字(如“毒”)白读时比阴入字(如“笃”)调值高,但是文读时,跟阴入一样,这也是受宁扬方言的影响造成的(扬州话入声只有一个)。其所以

如此,因泰州话处于通泰方言的最西缘,跟扬州话紧邻,泰州、扬州历史上长期在一个行政区内,扬州在文化、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也促进了泰州话的变异。如今在上述两点泰州话的文读较之白读数量上占了优势,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几百年以后,泰州话就会变得只剩一个入声调、古全浊声母仄声字变成不送气清音,就是说在通泰方言里将由于变异而出现一个“例外”的“新种”。似乎我们也可以这样看待上述的今天的个别的或少量的例外。

为什么现代通泰方音显出与客、赣方言的一致性呢?鲁国尧在《泰州方音史及通泰方言史研究》一文中,根据史籍考证出:西晋时沿江北岸只有广陵(今扬州)、江都、舆(今仪征)、高邮、海阳(今泰州、泰县)五县,海阳是最东的一县。东晋安帝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将广陵郡分为三郡:山阳郡在淮南,广陵、海陵二郡在长江北岸。宋时的海陵郡领六县,南齐时领8县,皆在今泰州以东的东台、如皋、泰兴、南通一带。据《宋书·州郡志》,广陵郡领四县,人口7744户,45613口,新置的海陵郡领6县,3626户,21660口,海陵郡虽不及广陵郡人口的一半,但须知西晋时只是海阳县的部分辖地,地广人稀,而永嘉后至东晋末100年间人口陡增,以致为之立郡置县,可见大批北方人迁徙至此。

客、赣方言在南方山区连成一片,而通泰方言孤悬于长江以北、运河之东、黄海之滨,相距遥远,而如此一致,不能不引起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再看看赣方言北边的徽方言,古全浊声母,大多数地方今音逢塞音、塞擦音,不论平仄都念送气清音。看来这四个“全送气”的方言形成了对古老的吴方言与闽方言的包围圈。史载皖南的黄山山区本是山越人的聚居地,六朝时期不少汉人进入,现代徽方言与这段历史应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地质学家的板块构造学说可以从非洲与南美洲海岸曲线的吻合得到印证一样,这个包

围圈看来不是偶然的,这四个方言“板块”正是4世纪北方方言南下进逼吴、闽方言的结果,当然不是同一时期形成的,例如客家人经过不止一次的迁徙才进入粤东北。

我们不讳言,这个包围圈在扬州、南京、芜湖一线有个缺口,这正是江淮方言的中支——宁扬方言区,宁扬方言入声只有一个,当然谈不上阳入调值比阴入高的问题,古全浊声母变今音的规律同于北京话,迥异于通泰方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又要考察历史:公元589年隋文帝派次子杨广率大军平定陈国,结束了273年的南北分裂的局面。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征发淮南十几万民工开凿了自今淮阴至扬州的运河,1000多年来这条运河成了北中国与南中国之间的主要通道,历代定都于北方的王朝都靠运河汲取长江三角洲的财富。和平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交往,使处于南北之交的宁扬方言区成了交通要道;战乱时则是兵家必争之地,城市往往遭到严重的甚至毁灭性的破坏,人口变动很大。在明代,南京话是当时的标准语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⑬明清时代江淮方言区产生了不少杰出的文学作品,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等,对近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所以千余年来宁扬方言发展较快,采取了与北方的其他官话方言协同的发展步调。江淮方言的西支——黄(冈)孝(感)方言地处信阳之南、武汉之北,当华中要冲之地,夹于现代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之间,所以古全浊声母仄声字今音逢塞音、塞擦音也变成清音不送气。

比起宁扬方言来,通泰方言保存了古老的方言特点,这是由于僻处濒海的东隅,一直是比较落后的地区,每逢战事,运河沿线的城市如淮安、扬州、镇江、南京多是鏖战之地,通泰一带则是传檄而定,相对稳定。众所周知,凡是闭塞、动乱少的地区语言变化较慢,所以黄海之滨的通泰方言可以直接跟南海之滨的客家方言认起

“亲”来,它们“1700年前是一家”。

客家方言虽环布于东南沿海,甚至远及台湾、海南二岛,但导源于南朝通语;通泰方言则是南朝通语在原地东隅的直系后裔,我们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论证了它们的同源关系。它们在分离以后,长时期的自身发展变化再加上各自所处的环境,受邻近方言以至通语的影响,发展到现代,变成既共同具有亲代的某些重要性状,又各自具有差异的个体性状的不同的方言。

如果我们关于客家、赣、通泰等方言同源于南朝通语的论点能成立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它们共有的性状对其祖语的某些特质,作尝试性的探讨呢?现代方言入声分阴调、阳调是与其祖语的声母的清浊有关:清声母入声字今音为阴调,浊声母入声字今音为阳调,通泰、赣、客方言阳入调值高,当与其祖方言的浊声母的特质有关;至于古全浊声母字,现代客、赣、通泰、徽方言无论平仄逢塞音、塞擦音全变成送气清音字,这“全送气”也应与其祖方言的浊声母的特质有关;二果同因。古代汉语有浊声母,现代汉语除吴、湘方言外,大多变成了清声母。在现代多数北方官话中,古代浊声母变清音时,逢平声是送气音,而遇仄声(即非平声,仄者不平也)则不送气。是否可以说,南朝汉语的浊塞音、浊塞擦音是送气的,也许这送气很强。后来这些浊声母发生变异、变成清音,亲代的送气性状则遗传下来,即使在仄声里亦然,而且波及后裔方言阳入调值的音高,使其超乎阴入。但是怎样遗传变异呢?

语言、方言的发展、衍化与生物物种的繁衍、变异当然不是一样的,但也有其类似之处,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显然受了达尔文(1809—1882年)生物进化论的巨大影响,但是达尔文的学说是“融合遗传论”。^⑭关于语音的历时的变化,现在人们基本上还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即只是陈述变化前和变化后

的事实,比如任何一种汉语史论著都说,古汉语的浊声母在宋元清化,平声送气,仄声则不送气。如果读者进一步问:为何平声就送气?为何仄声就不送气?就我浅闻,没有任何人能回答。现在有些学者引进了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来讲历时音变的原因,但那还是外因。能不能透析语音本身的“遗传”及“变异”的机制来讲内因?科学的遗传学在当代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语言学家可否借鉴其成果,分析语音本身的特性和结构方式,从而找出“遗传物质”、“遗传信息”、阐述“遗传的变异”等等,使历史语音学前进一步?

【附注】

- ①张卫东、王洪友《客家研究·前言》,《客家研究(第一集)》,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
- ②罗常培《语言与文化》(语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页。
- ③吴玉章《〈语言与文化〉题词》,上书书首。
- ④⑤《晋书·怀帝纪》。
- ⑥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60页。
- ⑦罗香林《客家源流考》,《客家研究(第一集)》第39页。
- ⑧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的民族迁徙》,《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
- ⑨张琨《论吴语方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6本,1985年,台北。
- ⑩鲁国尧《泰州方音史及通泰方言史研究》,日本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アジア・アフリカ語の計数研究》第30号,1988年。
- ⑪罗香林《客家源流考》,《客家研究(第一集)》第19页。
- ⑫沈大稜《遗传学基础》(化学工业出版社,1988年)第160页。
- ⑬鲁国尧《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 ⑭沈大稜《遗传学基础》第2、3页。

本文原题为《客家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发表于《中国客家民系研究》

(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我在读研究生期间,写了《泰州方音史及通泰方言史研究》(附《〈字音集义通考〉解析》),1961.5 初稿,1964.5 第6稿,字逾10万。承桥本万太郎、中嶋干起、岩田礼诸先生鼓励,于1987.8略加修订,发表于日本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的《アジア・アフリカ語の計数研究》第30号,1988.3。1991年曾景忠学长向我约稿,于是将上述长文的部分内容压缩成此文。1990年我为撰写《切韵序史实考》,阅读了大量史籍,提出“南朝通语”“北朝通语”说,这与文末的研究语音机制本身的“遗传”、“变异”的提议,同请方家指正。

《卢宗迈切韵法》述评

【提要】

百余年前,黎庶昌、杨守敬使《韵镜》回归故土,中国语言学界奉为“等韵学”的经典。无独有偶,《卢宗迈切韵法》这一字内孤本也藏于东瀛,由于日本学者的大力帮助,笔者有幸获睹。我们认为,只有把宋代音韵学史和宋代语音史作为广阔的背景,才能对《卢宗迈切韵法》进行深入的研究,了解其珍贵的学术价值。本文“述”在介绍,而“评”在论证阐发其学术价值,由此提出了若干看法。

一

在宋代(960—1279)语言学史中,音韵学占有主导地位。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潘舍人昌年集篆韵序》:“韵书既作,学者趋便就简,……徐鼎臣兄弟著书以行于世,可谓许氏功臣,乃亦分类韵谱以从世好,岂势之所趋不得不然邪?潘侯之书集韵也,依楚金部叙而加详焉。”可见韵学是当时的“大势”和“世好”。

隋陆法言《切韵》出而前此诸家韵书尽废。唐代是切韵系韵书的繁荣时期,述作蜂起。至宋代初期,虽然也有私家著作行世,如曾致尧(947—1012)《四声韵》五卷,^①但是韵书多是皇帝下诏令儒臣文士编纂而后颁行的,如《广韵》《集韵》和作为科举功令的《韵略》。这也决定了《集韵》和景祐《礼部韵略》之后,终宋之世,韵书也就没

有什么发展了,②某些文人只能在修订《礼部韵略》上竭其才智,到了金、元方有新面目的韵书问世。

而颇能表现宋代音韵学特色的,一是“古音学”的发端,吴棫的《毛诗叶韵补音》和《韵补》是“古音学”的开山著作,笔者另有专文论述。另一是“等韵学”的发达,可用沈括的“音韵庞驳,师法多门”③来形容,没有官定的印记,倒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大多数被湮没,只在宋代目录学著作等书中留下了一些书名,这是由于受到标榜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儒者的歧视的缘故。如周麟之《海陵集》卷三《论乞进读本注音切》:“乞于进读本内间注音切,臣非不知帝王之学志于治道,初不问此区区之言,可谓矜小节而暗大体矣。”欧阳修《居士集》卷四二《韵总序》:“儒之学者信哉远且大而用功多,则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为学,儒者之所用也。其为精也,有声形曲直毫厘之别,音响清浊相生之类,五方言语风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则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学者莫肯舍其所事而尽心乎此。”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答杨元范》:“字画音韵是经中浅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洪迈《容斋五笔》卷七:“小学琐琐。”凡此皆可见宋代士大夫的一般心态,还是李焘《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序》说得一针见血:“今学者以利禄之路初不假此,遂一切弃捐不省。”④

现在能见到的宋代“等韵图”屈指可数:《七音略》,它是郑樵巨著《通志》的二十略之一;《切韵指掌图》的盛名则是由于传为司马光所著的缘故;《四声等子》的流传跟佛门有关;《韵镜》在前清光绪年间方才回归;如此而已。至于邵雍《皇极经世》中的“声音唱和图”和祝泌《皇极经世解起数诀》中的准韵图那是为其象数易学服务的。历来只能靠这些资料来了解宋代“等韵学”史,因而有些见解未能中的,甚至不乏错误。

如今我们又发现了宋代的一本等韵著作——《卢宗迈切韵法》。笔者于1990年秋应日本学术振兴会之邀,与东京大学平山久雄教授合作研究宋元语音史,赖平山久雄、远藤光晓二位先生的帮助得以获睹这一字内孤本,经研究后特作述评于下。

二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汉籍目录》(昭和六十二年即1987年发行)载有“卢宗迈切韵法 一卷 宋卢宗迈撰 室町写 一册 二十五糰 线”。

此抄本原为粘叶装,^⑤共五张纸,每张纸的左上方分别有“一二三四五”的字样,也有胶的痕迹,可知为粘接处。每张纸折成两叶,即共十叶。后来改为线装,即现在所见装订形式。原抄本纸高25厘米,半叶宽15.6厘米(改作线装时,右端加了一点纸,所以宽度扩为16.7厘米)。四周单栏,高21.3厘米,宽12.8厘米。书皮题“卢宗迈切韵法”,下题“东寺(小字)观智院(大字)”。书皮下半叶即为正文,此半叶上端钤朱文方印“帝国图书馆藏”,右下角有朱文圆印“明治三三・三・三一购求”。

日本国会图书馆可溯源至明治八年(1875)的东京书籍馆,明治十三年(1880)改称东京图书馆,明治三十年(1897)改称帝国图书馆,昭和二十三年(1948)设置国立国会图书馆。正文每半叶一般10行,也有11行或8行的,行18至22字不等。第8叶下半叶、第9叶上半叶为“跋”,第9叶下半叶只有“一交了”1行3字。第10叶上半叶为36字母指掌图和调四声例字图,第10叶下半叶空白。

还有第11叶,纸张显然与前10叶不同。第11叶上半叶是二纸片粘成,右宽8.7厘米,左宽8厘米。此半叶首行题“延享三年岁舍丙寅孟春廿二日加缮装了”,次行下方署“僧正贤贺(大字)春秋

盧宗邁切韻法

六十三岁(双行小字)”。此 27 字与书皮之“东寺观智院”同为贤贺手笔。延享乃江户时代(1603—1867)樱町天皇年号,延享三年为 1746 年。承平田昌司先生见示《密教大辞典》(密教大辞典编纂会,1931 年出版,1979 年京都法藏馆增订版)“贤贺”条,兹撮其要:贤贺(1684—1769),东寺观智院第十三世,俗姓藤原氏,贞享元年生,十岁在观智院剃度。观智院金刚藏的古书几乎都经他亲手装缮过。宽保元年(1741)任观智院僧正,明和六年圆寂。又,大正藏第五十册第 2052 号冥详《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一卷,系据平安时代写观智院藏

本,末有跋记“……遂缮装毕”,次行写“延亨(笔者按,‘享’之误字)四(原注:丁卯)岁六月廿五日僧上(笔者按,‘正’之误字)贤贺(原注:行年六十四岁)”,可资参证。《卢宗迈切韵法》长期深藏于京都东寺观智院,大概在明治年间流出,1900 年为当时的帝国图书馆购得,帝国图书馆于二次大战后改称国会图书馆,收藏至今。第 11 叶下半叶空白。

书皮上的书名“卢宗迈切韵法”六字与书内字同出抄写者之手,书法较劣。日本图书馆学家定为室町时期(1393—1573)写本,那么这书名当不晚于该时期。我想书名本来当不致如此,因为迄今所知的宋代“等韵”著作并不冠以编著者的姓名,绍兴年间的《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著录“僧守温述三十字母图一卷”,“僧守温”三字并不在书名中。此书卢宗迈跋,自称“集切韵法”,他辑集的资料中有“三十六字母切韵法”等,又屡言及“切韵法”,也许卢氏汇辑以后,自己命名为《切韵法》,也许其后的人如此命名。现存宋人书目中不见此书名,但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文渊阁书目》

卷十二辰字号第一厨“韵书”中著录有“切韵法，一部一册，阙”，“五音切韵法，一部一册，阙”。遗憾的是，《文渊阁书目》既未注明时代，也未载编著者，因此我们无法确指《卢宗迈切韵法》与《文渊阁书目》所载二书是何关系。卢宗迈既是辑集者，又撰序跋，所以后人把他的姓名放进了书名里，这也许是传入日本以后的事，因与日本室町时期大致相当的中国明代（1368--1644），“等韵”著作也不冠编著者的姓名，不像清代有李汝珍的《李氏音鉴》、徐师臣的《徐氏等韵捷法》，即令如此，也只冠以姓氏。

日本书目定卢氏为宋人，系据书序：“宗迈自僮时悟此，今四十年矣，鲜闻晓者，故书而传之同志，岂曰小补哉？淳熙己亥孟春涿郡卢宗迈撰序。”（见右书影）跋尾有“淳熙丙午岁四月壬午卢宗迈因叙所见，附于所集切韵法后。”淳熙己亥是南宋孝宗淳熙六年即1179年，“今四十年”，按惯例，可能是举其成数，姑认作整数，则上推至高宗绍兴十年即1140年。他自称“僮时悟此”，《说文》：“僮，未冠也。”《礼记·曲礼上》：“男子二十冠而字。”因此可推知卢宗迈当生于徽宗宣和（1119—1125）后期。书中所能提供的关于辑集者的信息仅此而已。

卢宗迈何许人？宋史无传，哈佛燕京学社的《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朱士嘉《宋元方志传记索引》、昌

也今以難識者字或直音或反切或調聲並集于前使人人可識可識則易於口誦口誦通熟則歸母甚其既能歸母則可反切既能反切則字無不識是使難學之事而終歸於易學也宗邁自僮悟此今四十年矣鮮聞曉者故書而傳之同志豈曰小補哉淳熙己亥孟春涿郡盧宗邁撰序

彼得等《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皆未列其人。我们终于在地方志和类书中找到他的传记，卢宗迈与其从父汝舟密切相关。清同治七年（1868）《南安府志》卷十三《选举·诸科表·武干科》：“卢汝舟，大庾人。”卷十四《选举·封荫表》：“卢宗迈，以从父汝舟荫，官至武翼大夫。”明天顺五年（1461）李贤《大明一统志》卷五八《江西布政司·南安府·人物》有二人的简传，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白潢增修《西江志》卷九三、雍正十年（1732）谢旻《江西通志》卷九三的汝舟、宗迈传全袭明一统志。明万历凌迪知《万姓统谱》卷十一有汝舟、宗迈传，廖用贤《尚友录》卷二也有宗迈传。同治七年《南安府志》卷十六《宦迹》、卷十七《武略》，同治十三年（1784）重刊同治十年《大庾县志》卷十二《人物·乡贤》则颇详细，二书仅文句略有差异，兹录同治《大庾县志》于下：

卢汝舟，字仲济，博综群籍，留心世务。政和间以陆藻荐，隶御史府，廉约守正，不事刻深。绍兴中地震，上疏推本刘向、京房之意，无虑数千言。先是宣和时卢中等出使高丽国，与其国王论中国及其国与女直战陈之事甚悉，汝舟得其详于中等，又得钟邦直所记使女真行程。建炎三年编为十卷，上闻。复奏赵鼎论战守之具，意在恢复。秦桧恶之，以武翼大夫领宫祠。

“女直”“女真”并见，原书如此。同书卢宗迈传：

卢宗迈，字绍先，汝舟从子也。性聪明，务博览，尤精武艺。年十三，隶御史府。枢密使汪彻临边视事，檄之随行，宗迈知险阨，画城守屯戍之地，陈攻战之法，彻深嘉之，拜武阶，既而列馆职，文雅练达。两朝日历成，一岁五迁，官至武翼大夫。宗迈自以性好文史，遭时建武，晚益藏书，多至数万卷，盖终耻言致身武阶云。

案，“汪彻”应作“汪澈”，字明远，生于徽宗大观三年（1109），卒于孝

宗乾道七年(1171)。据《宋史》汪澈传与高宗纪、孝宗纪、宰辅表及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〇、一九一、二〇〇,汪澈任湖北宣抚使和参知政事时,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三十二年(1162)两次临边荆襄。王明清《挥麈录·第三录》卷三亦记载汪明远为荆襄宣抚使抗击金将刘萼获胜事。《宋史·孝宗纪》载,乾道二年(1166)进呈《钦宗日历》,淳熙三年(1176)上《太上皇日历》。《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五所载孝宗隆兴元年(1163)八月三日御史台的一文书中提及卢宗迈,职衔为“成忠郎六察点检文字”。地方志中卢传所涉,多可按稽史籍。

卢宗迈虽出身武职世家,但性聪明,故僮时便悟韵学;从父博综群籍,本人性好文史,藏书多至数万卷,这在当时颇为不易。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一:“仕宦稍显者,家必有数千卷,然多失于雠校也。”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卷十四《万卷堂记》述庐陵欧阳洵藏书万卷,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九《洪氏天目山房记》载洪舜俞藏书13000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自序藏书24500卷。因此卢宗迈之集切韵法是与其家庭的文化背景和本人的学术修养密不可分的。

既是大庾人,何以自署“涿郡卢宗迈”?卢联桂等编《江西卢氏通谱》(民国十年石印本,封面题“江西全省卢氏通谱”)推始祖为东汉末范阳涿人卢植。南北朝时范阳卢氏为北方著名的世家大族,历北齐入隋的著名诗人卢思道和陆爽、陆法言父子等九人参与了开皇六年(686)的长安论韵,因而也是《切韵》纲纪的制定人之一。^⑥唐时卢氏一支迁入江西,此后子孙繁衍于各县。“集切韵法”的卢宗迈也名列于这家谱中,他自称涿人,述郡望也。在隋、宋两代各有一位卢氏对“切韵”之学做出了贡献,可说是汉语音韵学史上的佳话。

《卢宗迈切韵法》之为宋代书籍,尚有一证。此存于日本的抄本

内有涉及宋帝名讳之字：宣祖弘殷（太祖太宗父）之“殷”两见，首见缺笔，再见不避；仁宗之嫌名“微”、钦宗之名“桓”、理宗嫌名“匀”均不缺笔。我们考察了下列四本韵书：日本静嘉堂文库藏高宗绍兴间浙刊本《广韵》、日本内阁文库和上海图书馆藏孝宗乾道己丑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刊《钜宋广韵》、北京图书馆藏孝宗时潭州刻本《集韵》（中华书局影印收入《古逸丛书三编》）、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藏淳熙丁未田氏刊本《集韵》，四书并于“殷”字缺笔。宋版书的避讳问题并不像一般版本学、避讳学著作所说的那么简单。上述四种韵书对徽宗之“佖”、钦宗之“桓”皆不避。对高宗之“构”，绍兴《广韵》乾道《钜宋广韵》缺笔（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之《钜宋广韵》缺去声一册，故去声字据日本藏全本），两《集韵》则否。孝宗之“慎”，乾道《钜宋广韵》居然不缺笔，但两《集韵》避讳。因此，抄本《卢宗迈切韵法》“殷”字再见不缺笔，也许是所据底本“避讳不尽”，也许是“避讳经后人回改未尽”（用陈垣《史讳举例》语），此“后人”可能是日本版本学家所说的室町时代的抄手。这在其他古籍中也有类似现象，如铁琴铜剑楼藏宋理宗时刊本《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附《韵略条式》第23至27页详列宋代诸帝讳字，缺笔者15字，但英宗之“曙”、宁宗之“扩”竟忘了缺笔（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抄本缺笔，但仁宗之“禎”忘了缺笔），《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影宋写本《切韵指掌图》跋”：“宋讳惟‘匡贞朗’等尚减笔，余不尽然，盖转写失之。”抄本《卢宗迈切韵法》“殷”字首见时缺笔，当是抄手照录的结果，可见所据底本为宋本。考《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附《韵略条式》第六一、六二叶载绍熙五年（1194）十一月二十三日，孝宗神主祔庙，宣祖“皇帝忌及讳依礼不讳不忌”，《宋史》卷三十七宁宗纪绍熙五年、同书卷一〇七“礼志十”庆元二年（1196）礼部太常寺奏议亦载此事。据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现存日本的抄本《卢宗迈切

韵法》所据底本的抄刻的时间下限是绍熙五年(1194)十一月二十三日,上限当然是卢宗迈著“跋”的时间淳熙丙午(1186)四月壬午。这底本未尝不可能是卢氏晚年的稿本或抄本。

《韵镜》自返归故土后,中国学者对它的重视,超过《七音略》,主要原因在于前有刊行者张麟之作的《韵鉴序例》,张序于嘉泰三年(1203),称年20得《韵镜》,研究《洪韵》50载,设二者相接,则张年稍幼于卢宗迈。100年前中国音韵学界始知有张麟之(但其人之生平仕履至今尚未能考得),无独有偶,如今又得卢宗迈,可谓南宋初年“等韵学”的双璧,他们不仅年相值,而且所传述的“切韵法”、“切韵图”各为一系,相映生辉,为我们提供了宋代音韵学史和宋代语音史的宝贵资料。

众所周知,汉语“等韵学”与梵语的悉昙学有密切关系,佛教由中国东传日本,二者也随之流入扶桑。北宋年间的书禁政策和日本藤原氏的闭关政策影响了两国的文化交流,但熙宁五年(1072)日僧成寻来宋,后令其弟子携归佛经400余册,内即有《天竺字源》七册。1167年(孝宗乾道三年)在日本代表武士利益的平清盛执政,大力发展日宋间的贸易,中国书籍大量传入日本。南宋间入宋日僧,史乘可考者80余人,南宋末宋僧道隆等赴日倡导禅宗。据前贤考证,《韵镜》传入日本当在13世纪中叶左右,即宋理宗年间前后。卢书可能也在南宋或稍后传入日本。但《韵镜》大显,而卢书一直深藏于佛寺,可谓有幸有不幸。

三

《卢宗迈切韵法》(此后一般简称“卢书”)是宋代“等韵学”的一个派系的资料的汇集,原无目录,兹按原书次序述如下(序号系笔者所加):

- (一)音释切韵法难识字·淳熙己亥卢宗迈序
- (二)三十六字母切韵诀
- (三)三十六字母分清浊
- (四)三十六字母五音旁通图
- (五)三十六字母切韵法
- (六)切三十六字母法
- (七)全浊字母下上声去声同呼字图
- (八)知照合一、非敷合一、彻穿合一图(案,此图名称系笔者所拟)
- (九)“切韵之学”概述(此名称亦系笔者所拟)
- (十)淳熙丙午卢宗迈跋
- (十一)三十六字母指掌图及调四声例字图(此亦笔者所拟)

序跋自是卢氏手笔。(二)至(九)当为所“集”之“切韵法”,其中有些也可能是卢氏所作或加工过,某些按语和小注更有可能,但很难定。如(九)“切韵之学”概述,大部分与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切韵之学”条的前百余字相同,但其后的“全清、次清、全浊、不清不浊”的名称跟沈氏并不同,似为自增。首先要揭明的是,(一)至(十)体系、术语是内部一致的,如36字母的排列始见终日,四处悉同;清浊之名、浊上变去,前后无异。(十一)居于跋后,但中间隔了半叶,即第九叶下半叶,只有一行三字“一交了”,余为空白,据此,似可认为,这(十一)恐系后人或抄手所附益;且“指掌图”中36字母排列顺序虽同于(三)、(四)、(六),但有一点歧异,图之“晓匣影喻”,卢书作“影晓匣喻”,此亦可作为佐证。

卢书开卷就是“音释切韵法难识字”,是因为后面的“三十六字母切韵法”中列有72个助纽字,其中有14个“难识字”,加以音释。紧接着的是序,逐录于下:

切韵之难易尽见,昔人之诗有云:“字母唯三六,相生百万名。当家疑是客,别国却为亲。”又有云:“的当尘毛现,参差海岳倾。世间难会法,影响误聪明。”又有云:“未明须得旨,及晓不关心。验人端的处,下口便知音。”人谓其难学者,乃切韵法百八字中有难识者字,而又有音声偏暗远,罕人传授,是以难学也。今以难识者字或直音,或反切,或调声,并集于前,使人人可识。可识则易于口诵,口诵通熟则归母甚易,既能归母则可反切,既能反切则字无不识,是使难学之事而终归于易学也。宗迈自僮时悟此,今四十年矣,鲜闻晓者,故书而传之同忘,岂曰小补哉?淳熙己亥孟春涿郡卢宗迈撰序。

玩文意,音释难识14字恐亦系卢氏所为。序首引“昔人之诗”三首,当即其时泛称之切韵诗,张麟之《韵鉴序例》“横呼韵”:“故古人切韵诗曰:‘一字纽纵横,分敷十六声。’”卢序所引第一首见于敦煌写本守温韵学残卷(P2012卷):“诗云:‘在家疑是客,别国却为亲。’”刘复据纸色及字迹,断此卷为唐季写本。潘重规《瀛涯敦煌韵辑别录》说:“此尤足明诗语乃守温以前所传之歌诀。”“验人端的处,下口便知音”亦见于宋本《切韵指掌图》“辨双声叠韵例”之“歌”。卢跋为:

世传切韵四十四图,用三十六母与集韵中字,随母所属,次第均布于图间。而有声有形与有声无形,万一千五百二十声,该括世之所有字,并在其中。揣其声数,乃易之大衍,六十甲子,五行之数,若布万一千五百二十筭,以六除之,则筭无余数。其有用二字云切,或云反者,其理则一,亦五行相生,自然之理,非人意可强为之。若按图调切,则有平上去入四法;横念则有随清浊归韵法;随平仄四声念,则有四等重轻法;又有两字反切归其字者,为之切韵法;相为表里,则是切韵有四法也。

详此四法，乃是前古通晓易数之智士作而成之。每字左右上下各有一字，声声皆别，如中央之视四方，各有定位；若周天之列宿，各有分野。四十四图字字皆然，其非通幽悟微之人，焉能造是？而后学者未有能为言其所自之详者也。淳熙丙午岁四月壬午卢宗迈因叙所见，附于所集切韵法后，而作颂曰：

满空世界字音容，图局包含尽在中。

若人明了个个意，豁然如海与天通。

原抄“若人明了个个意，豁然如海与天通”为一行，其下有双行小字“三百三十六字”，大部伸人地脚，恐系抄手所记抄写的字数。“若人明了”一行后低三字另写一行“集韵字八万八百五十六”。按，《集韵》卷首“韵例”末叙字数为“字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注“新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字”，所谓“新增”是与《广韵》的 26194 字比较而言，此 80856 乃是误将二数相加的结果，当亦非卢跋原有的内容。

综观序跋，卢氏特别强调“切韵法”，指出使用办法，熟练掌握后可达到字无不识的地步。请参看卢书(二)“三十六字母切韵诀”：

欲尽识世间字者，当熟诵切韵法(原注：一百八字)，必呼吸端的，无一字差讹，则反切若有神助，如磁石吸针，似子之见母。且以东德二字归母，东字则云，东丁慎端；德字则云，德丁慎端，是东德二字皆归端字母也。且如德红切，则云，德丁慎东，红字与东字同韵，故切归东字也。字字用此为例，则无所不通，无所不识。

这些跟张麟之《韵镜识语》的话何其相似乃尔：“读书难字过，不知音切之病也。诚能依切以求音，即音而知字，故无载酒问人之劳。”“遂知每翻一字，用切母及助纽归纳，凡三折，总归一律。”借用助纽字熟习反切，是宋人的通用方法。

“切韵法”，卢跋界定为“两字反切归其字”，卢书(六)“切三十六字母法”云：“切脚，如德为父，红为母，德红反切即生东字，此乃切韵(原注：‘上一字为切，下一字为韵。’)相生，天然混成。”衢本《郡斋读书志》于“切韵指玄论三卷，四声等第图一卷”下解题云：“右皇朝王宗道撰，论切韵之学，切韵者上字为切，下字为韵。”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亦云：“所谓切韵者，上字为切，下字为韵。”《四声等子》的“辨音和切字例”和宋本《切韵指掌图》“检例下”都说：“凡切字，以上者为切，下者为韵。”可见这是宋人的普遍观点。“切韵”二字连言，宋代韵学文献在在皆是，《卢宗迈切韵法》出现 14 次，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有“切韵之学”“切韵之法”“切韵家”，袁本《郡斋读书志》于“四声等第图”下云：“切韵之诀也。”张麟之《韵鉴序例》中有“切韵诗”，述及神珙著切韵图，杨傖得《切韵心鉴》。洪迈《容斋五笔》卷八：“为四声切韵之学者，必强立说。”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四：“古人文字但取其声音之协，初无切韵之说。”“详究古人切韵之始，至简易而切当。”宋人书目及《玉海》、《宋史·艺文志》著录有柳曜《五音切韵枢》、王宗道《切韵指玄论》、僧鑑言《切韵指玄疏》、谢晖《切韵义》、邱世隆《切韵搜隐》、佚名《切韵内外转铃》。值得提出的是一本宋初的韵图，刘熙古(唐昭宗天复三年即 903 年—宋太祖开宝九年即 976 年)的《切韵拾玉》，《宋史》卷二六三本传、卷二〇二艺文志皆著录；王应麟《玉海》卷五五“小学下”两次著录，一次次于托名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后，可见其为切韵图。此外有杨中修《切韵类例》，还有《切韵指掌图》。藤原佐世《日本现在书目》著录来自中国晚唐及其以前的多种书，中即有《切韵图》一卷，卢跋内有“切韵四十四图”，甚至有西夏文韵图《五音切韵》。由此可以断言：“等韵”二字连言，不见于宋代典籍，至明清方见。宋代只有“切韵”、“切韵之学”、“切韵图”等名称。金元亦然，金

韩道昭《五音集韵自序》：“夫切韵者，盖以上切下韵，合而翻之，因其号以为名。”《五音集韵》“韩”字注，叙述韩孝彦注《切韵指玄论》，撰《切韵澄鉴图》，作《切韵满庭芳》，述《切韵指迷颂》。元初类书《居家必用事类》甲集“切韵”类有“切韵捷法诗”，首句为“切韵先须辨四声”。后至元二年（1336）刘鉴《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后附“辨开合不伦”：“今之切韵者多用因烟、人然、经坚、丁颠之类，此法极是浮浅，乃前贤训蒙诱引切韵入门之法耳。”至正十六年（1356）翠岩精舍刻《广韵》牌记，右直格内刻“五音四声切韵图谱详明”十字。^⑦甚至明初人邵光祖《切韵指掌图检例》跋语云：“按广韵凡二万五千三百字，其中有切韵者三千八百九十文正。”其中“切韵”二字仍然符合沈括、卢宗迈的定义。总之，唐宋金元只有“切韵”一名，本文此后对宋代的切韵学、切韵图，不再使用“等韵学”、“等韵图”的名称。卢宗迈等宋代学者所言的“切韵之学”、“切韵法”可以说是宋代的汉语音系学。《卢宗迈切韵法》是留给我们这些后世“同志”的一份珍贵文献。

卢书其他部分将在下面各专节的研究中涉及，此处不赘。

四

《卢宗迈切韵法》的发现使我们力图对宋代切韵学、切韵图作深入的研究。

首先要指出的是图例相辅这一特点。现行《韵镜》前有张麟之“韵鉴序例”，《四声等子》前有七音纲目和九“辨”（如“辨音和切字例”），《切韵指掌图》前有“检例”上下等等，最典型的是杨中修一人同时著例 10 条，为图 44，名曰《切韵类例》。如果发现时只有图，也会有人补作例，如张麟之：“因撰字母括要图，复解数例，以为沿流求源者之端。”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的“切韵之学”条即具有依所

见韵图而言例的性质,我们可据以复原出那类韵图的大致轮廓来(与现存诸图颇有差异)。卢宗迈的切韵法诸表及序跋,内容体系及所用术语如此一致,显然有所依托,当即据“切韵四十四图”立言,遗憾的是此图未能传世。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借助卢书所述诸“例”挖掘出与之配合的这一系切韵图来。

汉语音韵学者无不知《韵镜》《七音略》,罗常培《〈通志·七音略〉研究》曾做过详细的比较,二书小异大同,其结语云:“《七音略》所据之《七音韵鉴》与《韵镜》同出一源”,“要之,皆于原型有所损益,实未可强分先后也。”张麟之《韵镜识语》:“不出四十三转,而天下无遗音。其制以韵书自一东以下,各集四声,列为定位,实以《广韵》《玉篇》之字。”据李新魁《〈韵镜〉研究》,《韵镜》一书所用的字共3700个左右,其中仅有172字不是使用《广韵》小韵首字,^⑥可见张麟之语不诬。《七音略》列字也近于《广韵》。因此从列字所据韵书而言,《韵镜》《七音略》都是广韵系的切韵图。

卢书跋云:“世传切韵四十四图,用三十六母与《集韵》中字,随母所属,次第均布于图间。”可见这韵图列字的根据是《集韵》。卢书(六)“切三十六字母法”的按语中论及门法时说:“若《广韵》《玉篇》《集韵》《类篇》中切脚皆容易反切,便得其字分明者,并名音和切。”孙觌《鸿庆居士文集》卷三十《切韵类例序》:“昔仁庙诏翰林学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韵学,自许慎而降,凡数十家,总为《类篇》《集韵》,而以贾魏公、王公洙为之属。治平四年司马温公继纂其职,书成上之,有诏颁焉。今杨公又即其书科别户分,著为十条,为图四十四,推四声字母相生之法,正五方言语不合之讹,清浊重轻,形声开合。梵学兴而有华竺之殊,吴音用而有南北之辩。解名释象,纤悉备具,离为上下篇,名曰切韵类例。……具见于一图二篇之中。”孙觌《内简尺牍》卷三《与致政杨尚书中修》:“序引纳上,……大意言

《类篇》《集韵》，数巨公更两朝而能成，公因之作类例。”可见宋代确有集韵系韵图在，而且不止一种。

何以有广韵系韵图，又有集韵系韵图？何以张麟之《广韵》与《玉篇》连言，孙覿、卢宗迈二人《集韵》与《类篇》连言？这就须要了解宋代的韵书、字书编纂史。

宋代在统一后，偃武修文，连续编了《太平御览》等几部大书。为了科举取士的需要，宋初诸帝十分重视韵书、字书，据王应麟《玉海》卷四五“小学”，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诏陈鄂等详定《玉篇》《切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景德二年（1005）七月丙子，龙图阁待制戚纶与礼部贡院上言：“今请除官《韵略》外，不得怀挟书策。”可见景德四年的《韵略》（通称《景德韵略》）之前已有用于科举的《韵略》，只是其名不显。真宗修定的三书规模大，且配套，体现了繁荣、稳定的封建帝国的语文规范化政策，故为世所重。据《玉海》卷四五，景德四年（1007）十一月戊寅，诏颁行《新定韵略》和《校定切韵》，章如愚《山堂考索》前集卷十一“诸子百家门韵学类”述及后者云：“景德四年刊正，大中祥符元年命儒臣增损，改为重修广韵。”这是笔者所发现的关于广韵经一次修订、还是两次修订问题的重要史料。关于《景德韵略》，王应麟《玉海》引《崇文总目》云：“略取《切韵》要字，备礼部科试。”按，这《切韵》当为《校定切韵》，即《广韵》。《宋会要辑稿》选举八之三十一：“仁宗天圣五年（1027）三月十八日诏……韵略官中至日给散。”此《韵略》是《景德韵略》。《广韵》依音查字，那么“字之有形而未审厥声者，岂不愈难于检阅乎”？^⑨鉴于前代《切韵》《玉篇》并行，于是在祥符六年（1013）编成《大广益会玉篇》。这是第二代“篇韵”，二者连言，是宋人的习惯，甚至遂以二字简称，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景德二年载戚纶与贡院上言：“旧敕止许以篇韵入试。”《切韵指掌图》“辨匡喻二字母切字歌”：“当今

篇韵少相逢。”赵叔向《肯綮录》：“篇韵皆无馅字”、“味字篇韵皆所不载”、“霭字不见于篇韵”。叶大庆《考古质疑》卷三：“古字音义，有出于经史之通用，而篇韵或不能尽载，亦不可不知也。”后人不察宋代篇韵连言的习惯，就产生误解。《广韵》与《景德韵略》皆是韵书，有详略之别。加上形书《大广益会玉篇》，都是官颁的，可谓第一代的“三位一体”。

据淳熙十四年田氏刊本《集韵》跋记，仁宗景祐元年(1034)宋祁等陈述《广韵》《韵略》的缺误，奏请修订。于是景祐四年(1037)《礼部韵略》成，宝元二年(1039)《集韵》成，较之《广韵》，《集韵》革新之处(包括音韵)甚多。^⑩《广韵》是在《唐韵》等韵书的基础上改编的，而《集韵》才是宋人自己纂修的，所以王观国《学林》卷九“敕”条先言“许氏说文、玉篇、广韵”，继言“集韵本朝所修”。李焘说：“切韵、广韵皆莫如集韵之最详”，“度等复奏，集韵添字极多，与彭年、邱雍等前所修玉篇，不相参协，乞别为类篇”，“集韵、类篇两者相须”。^⑪《类篇》迟至英宗治平四年(1067)方成。这是第三代“篇韵”，李焘说：“自《集韵》《类篇》列于学官，而《广韵》《玉篇》微矣。”^⑫司马光《名苑序》：“窃以为备万物之体用者，无过于字；包众字之形声者，无过于韵。今以集韵本为正。”吴棫《韵补》卷首：“右韵补凡书五十种，其用韵已见集韵诸书者皆不载。”李焘自己的《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定稿时也改从《集韵》，“起东终甲”。^⑬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宋理宗时刊本《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附《韵略条式》中的“淳熙重修文书式”，这一官颁文书详列宋代诸帝的讳字，遵《集韵》而不依《广韵》。凡此可见《集韵》之影响，时代之趋尚。

宋代的切韵学实际上是当时的音系学，多采用图表形式，尤为重要是音节表，如杨中修“一图二篇”中的“一图”。造出这种音节表就需要依傍韵书，如“《七音略》以覃、谈列阳、唐之前，实沿陆(法

言)、孙(恂)旧次”,“至于《韵镜》转次则显依李舟一系重加排定,惟殿以蒸、登,犹可窥见其原型本与《七音略》为同源耳”。^⑭宋真宗颁行《广韵》后,切韵家就旧瓶装新酒,拿旧的韵图骨架,按新的御定韵书填字,当然有可能对原骨架作些改变,如《七音略》“以列图方便而升盐添咸衙严凡与覃谈为伍”,^⑮也许即是,但终留下了些旧痕迹,如《韵镜》之蒸登殿后。这种广韵系韵图论韵图骨架,或可溯自宋前;论列字,也在祥符元年(1008)后,编者名声不显,又是在民间悄悄流传,所以张麟之在嘉泰三年(1203)说:“其来也远,不可得指名其人。”但是他清楚地知道“实以《广韵》《玉篇》之字”,就是说,《指微韵镜》是广韵系的韵图。《七音略》的原型当也是在《广韵》颁行后另一切韵家赶时尚的成品。待到仁宗朝《集韵》列于学官,司马光、李焘都遵奉不违,自然也会有新的切韵家据以列字编出新的韵图,杨中修《切韵类例》之图即是,卢宗迈跋所说的“世传切韵四十四图”也是。

这里也要讲一下第二代“三位一体”中的景祐《礼部韵略》,王之望《汉滨集》卷五《看详杨朴礼部韵括遗状》:“礼部韵止为场屋程文而设,非如广韵集韵普收奇字,务为该洽,故谓之韵略。”新的功令颁行,景德《韵略》当归废弃。此后虽有修订意见,“然每有陈奏,必下国子监看详,再三审定,而后附刊韵末”,“故较他韵书特为谨严”。^⑯景祐《礼部韵略》和淳熙监本《礼部韵略》(《中兴馆阁书目》和《宋史艺文志》均著录)皆佚亡。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附释文互注韵略五卷,以监本增注而释之。”可见是“嫡传”,今尚存。《宋会要辑稿》选举五之二:“孝宗淳熙元年八月九日礼部言,昨福州进士黄启宗上表,礼部韵内有经典所载之字,举人所常用而礼部韵不收入者,各逐本韵次为条目,一一收附。绍兴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指挥许礼部韵后别项刊具,令士子通知。自后场屋士人指为续

降补韵,往往径行压用,有司以非正员,尽行黜落。乞将启宗所类字,各随声韵添入,令士人通压,自淳熙二年省试日为始,从之。”赵彦卫《云麓漫抄》卷五:“绍兴中黄启宗又取六经诸子史常用字为献,元降指挥,今附于礼部韵略之后,令学者通知,淳熙重刊韵略则分入于逐韵之末。”今存宋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正是“分入于逐韵之末”,可见承自淳熙监本《礼部韵略》。试以之与理宗时欧阳德隆、易有开原纂,郭守正增修之《增修校正押韵释疑》比较,后者将启宗所补 245 字“别项刊具”。另南宋初毛晃、毛居正父子私人增订的《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增加了 4166 字,这是为了满足士人求繁的需要,而且吴音化的倾向很重。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吴鉉献《重定切韵》,多吴音。后“诏尽索而焚之”。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毛晃进《增韵》,虽多吴音,但印行不衰,至元犹然。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可见个中消息。

五

我们说卢跋中的“世传切韵四十四图”是集韵系韵图,除了根据原文中的“用”“集韵中字”“次第均布于图间”外,还得有语言内部的证据,这也许更重要些。卢书述及的切韵图虽不传,但仍可窥其一斑。

(一)

卢书(七)“全浊字母下上声去声同呼字图”,依次列“群定澄並奉从邪床禅匣”十母的 47 组字,上、去声字皆以朱笔书写,平、入声字列于两头,如无字则标以“○”。这 47 组四声相承的字当系从韵图中摘出的,我们把它和《广韵》、《集韵》、《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铁琴铜剑楼藏宋刊本,本文此后简称《礼韵》)、《增韵》的相当的小

韵首字相比较。下面“群₁”表示群母第一组,“○”号表示此位无字。同一组异体字《集韵》以见于《说文》者居首,如“达徒”,但切韵家取韵书小韵首字列图时往往仍取常用字形,故异体字皆视作相同。

1. 卢书同于《集韵》而异于《广韵》者 18 组。

	群 ₁	群 ₃	定 ₃	定 ₄ (一)	澄 ₃	並 ₂	並 ₃	並 ₄
广韵	强旁强嘯	裘舅旧○	徒杜渡○	屯圉钝突	晁肇召○	蒲簿捕○	便褰便○	盘伴叛跋
卢书	僵强强嘯	求白旧○	徒杜度○	屯笔钝揆	晁赵召○	蒲簿步○	便褰便敝	盘伴畔跋
集韵	僵强强嘯	求白旧○	徒杜度○	屯笔钝揆	晁赵召○	蒲簿步○	便褰便敝	盘伴畔跋
礼韵	僵僵倜嘯	求白旧○	徒杜度○	屯盾钝揆	晁赵召○	蒲簿步○	便○便○	盘伴畔跋
增韵	僵僵强嘯	求白旧○	徒杜度○	屯盾钝揆	晁赵召○	蒲簿步○	便○便○	盘伴畔跋

	从 ₁	从 ₂ (二)	床 ₂ (三)	床 ₃	匡 ₁	邪 ₃ (四)	匣 ₃ (五)
广韵	裁在裁○	摧罪○○	潺戱戕○	嵒嵒嵒○	魂混恩搯	旋○旋捩	豪皓号○
卢书	裁在在○	罪倅○	潺戱戕○	嵒嵒嵒磔	魂混罔搯	旋腭漩趺	豪皓号○
集韵	裁在在○	摧罪倅○	潺戱戕○	嵒嵒嵒○	魂混罔搯	旋腭漩趺	豪皓号○
礼韵	裁在在○	摧罪○○	潺戱戕○	嵒嵒嵒腭	魂混恩鹄	旋○旋○	豪皓号○
增韵	裁在在○	摧罪○○	潺戱戕○	嵒嵒嵒○	魂混恩鹄	旋○旋趺	豪皓号○

注〔一〕“圉笔”,《集韵》为异体字,《广韵》非异体字。

〔二〕卢书每组字四声相承,若该位无字则标以“○”,但从₂、邪₃平声位空白,可能是抄手漏写。

〔三〕床₂组当是删潜谏黠四声相承,但《广韵》《集韵》删韵崇母无字,而山韵、仙韵的崇母皆有“潺”字,《韵镜》《七音略》外转 23 图皆以“潺”配其后上、去声字。

〔四〕此表《集韵》的上去入三声字均非其小韵的首字,但《广韵》无此三字,卢书当取自《集韵》。

〔五〕这是一组匣母字,《广韵》胡老切小韵有“皓”无“皓”,而《集韵》下老切小韵有“皓”(首字)和“皓”等,《类篇》“皓”字有三音,首列下老切,因此亦可谓卢书之“皓”合于《集韵》。

应予重视的是,卢图床母的三组字都是床二母即崇母字,而禅

母五组字却显示了床三母(即船母)与禅母的相混,《集韵》即具有这种倾向。下面对拟予讨论的字在括弧内注出反切。

	禅 ₁ 〔一〕	禅 ₂ 〔二〕	禅 ₃ 〔三〕
广韵	常上尚灼(市若)	纯盾(食尹)顺(食闰)衙(食事)	铤善缮折(常列)
卢书	常上尚杓	纯盾 顺 衙	铤善缮舌
集韵	常上尚杓(实若)	纯盾(竖尹)顺(殊闰)衙(食律)	铤善缮舌(食列)
礼韵	常上尚杓(实若)	纯盾(竖尹)顺(食闰)衙(食律)	铤善缮舌(食列)
增韵	常上尚杓(日灼)	纯盾(乳尹)顺(食闰)衙(食律)	铤善缮舌(食列)

注〔一〕“常上尚”三字,诸韵书均以禅母字作切语上字,毋庸讨论。《集韵》实若切小韵有“杓灼”等字,是合船禅为一。《增韵》日灼切小韵有“杓勺弱”等,是船禅日混同。卢图四声相承字当系依据《集韵》。

〔二〕“纯”字,四韵书皆以禅母字出切。《广韵》后三字均船母字,绝不能与“纯”构成一组四声相承字。而《集韵》“盾顺”皆以禅母字作反切上字,“衙”虽以“食”作切语上字,但船禅相混,故构成一组四声相承字。卢书显然同于《集韵》。可堪注意的是《增韵》“盾”以日母字出切。

〔三〕《广韵》“折”,常列切,禅母字;“舌”,食列切,船母字。《集韵》食列切小韵有“舌折”等字,船禅合一,故可用首字“舌”承上三字。卢图从之。

2. 卢书与《广韵》《集韵》互有异同者一组:群₂。

3. 卢书同于《广韵》而异于《集韵》者一组:定₁。

	群 ₂	定 ₁
广韵	权 圉 倦 ○	同 动 洞 独
卢书	权 圉 倦 𪔐	同 动 洞 独
集韵	权 圉 券 𪔐	同 动 洞 𪔐
礼韵	权 圉 倦 ○	同 动 洞 𪔐
增韵	权 圉 倦 ○	同 动 洞 𪔐

其余 27 组,卢图与《广韵》《集韵》悉同:群₁ 琴嚙矜及、定₂ 唐

荡宕铎、定₅。坛但惮达、⑰定。团断段夺、定₇。陶道导○、澄₁。长丈仗著、澄₂。厨柱住○、澄₄。俦紂胄○、澄₅。沈朕鸩蛰、並₁。皮被髮○、奉₁。逢奉倖幞、奉₂。汾愤分佛、奉₃。凡范梵乏、从₃。曹阜漕○、从₁。矧坐座○、从₅。情静净籍、邪₁。词似寺○、邪₂。邪地谢○、床₁。狙齟助○、禅₁。韶绍邵○、禅₅。讎受授○、匣₂。寒旱翰曷、匣₃。桓缓换活、匣₄。玄洊县穴、匣₅。何荷贺○、匣₇。遐下暇○、匣₈。侯厚候○(以上少数组中,《礼韵》《增韵》有异,如从₅入声字,《增韵》为“席”,邪₂上声字,《增韵》为“苴”,皆显示从邪无别,不赘)。

可见卢书“全浊字母下上声去声同呼字图”跟集韵系韵书关系密切,尤近于《集韵》。《集韵》和景祐《礼部韵略》是详略的关系,《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和《增韵》都是景祐《礼部韵略》的“后裔”(虽然《增韵》歧异之处甚多),所以我们称之为集韵系韵书。总之,这位宋代的切韵家为进行专题考察,从集韵系的“世传切韵四十四图”中摘取 47 组字而列出了“全浊声母下上声去声同呼字图”。

(二)

卢书(六)“切三十六字母法”给每个字母注了反切,兹依卢书次序移录于下,并与四韵书比较:

	见	溪	群	疑	端	透	定	泥	知	彻	澄	娘
广韵	古电	苦奚	渠云	语其	多官	他候	徒径	奴低	陟离	丑列	直陵	女良
卢书	经电	牵奚	衢云	鱼其	多官	他候	徒径	年题	珍离	敕列	持陵	女良
集韵	经电	牵奚	衢云	鱼其	多官	他候	徒径	年题	珍离	敕列	持陵	尼良
礼韵	经甸	牵奚	渠云	鱼其	多官	他候	徒径	年题	珍离	敕列	持陵	○
增韵	经电	牵奚	渠云	鱼其	多官	他候	徒径	年题	珍离	敕列	持陵	女良

	帮	滂	并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从	心
广韵	博旁	普郎	蒲迴	武兵	甫微	芳无	扶隄	无非	子盈	七情	疾容	息林
卢书	博旁	普郎	部迴	眉兵	匪微	芳无	父勇	无非	子盈	七情	墙容	思寻
集韵	通旁	铺郎	部迴	眉兵	匪微	芳无	父勇	无非	咨盈	亲盈	墙容	思林
礼韵	○	普郎	部迴	眉兵	匪微	芳无	父勇	无非	子盈	七情	墙容	思寻
增韵	○	普郎	部迴	眉兵	芳微	芳无	父勇	无非	子盈	七情	墙容	思寻

	邪	照	穿	床	审	禅	影	晓	匣	喻	来	日
广韵	似嗟	之少	昌缘	上庄	式荏	市连	於丙	馨畛	胡甲	羊戊	落哀	人质
卢书	徐嗟	之笑	昌缘	仕庄	式荏	时连	於境	馨鸟	辖甲	俞戊	郎才	入质
集韵	徐嗟	之笑	昌缘	仕庄	式荏	时连	於境	馨鸟	辖甲	俞戊	郎才	入质
礼韵	徐嗟	之笑	昌缘	仕庄	式荏	○	於景	馨杏	辖甲	俞戊	郎才	入质
增韵	徐嗟	之笑	昌缘	仕庄	式荏	时连	於丙	馨杏	胡甲	俞戊	郎才	人质

注：一)《礼韵》仙韵无“禅”。线韵“禅”，时战切，“〔释〕又时连切，仙字韵不收。”

〔二〕“○”号表示无字。

这 36 字母的反切用字可以作为我们考察《广韵》《集韵》《礼韵》《增韵》和《卢宗迈切韵法》五者之间关系的随机统计资料。五书全同者六母：端透定微穿审。此下的统计数字是就其余 30 字母作出的：

《集韵》同于《广韵》者 1 母，异于《广韵》者 29 母；《礼韵》同于《广韵》者 4 母，同于《集韵》者 18 母，均异于二者 5 母，无字者 3 母；《增韵》同于《广韵》者 8 母，同于《集韵》者 17 母，均同于二者 1 母，皆异者 3 母，无字者 1 母。可见《集韵》系韵书彼此间的相近以及它们各自与《广韵》的距离。《增韵》的“返祖”现象与“变异”现象（如上一小节所指出的船禅日母的相混，从邪的相混，当与吴音

有关)较重,《礼韵》距《广韵》较远,而《集韵》更甚。这是因为景祐《礼部韵略》成书后两年《集韵》方竣工,编者们的改革主张贯彻得更彻底。

卢书“切三十六字母法”的切语同于《广韵》者5母,同于《集韵》者23母,同于《礼韵》者24母(其中的“滂精清”3母,《礼韵》同于《广韵》,卢书亦然,故统计数字高,而《集韵》与《广韵》于此迥别),同于《增韵》者22母(其中的“娘滂精清”4母,《增韵》同于《广韵》,卢书亦然,故统计数字高)。

诚然卢书与《集韵》最近,与《礼韵》关系也密(特别是“敷心”二母的切语仅与《礼韵》同),但也应看到另一面,它们并不尽合,卢书还有同于《广韵》者,何以致此?

我们在上节曾指出切韵图的原型可溯至唐代,因须依傍韵书列字,宋代也就有了广韵系切韵图、集韵系切韵图之别。我们现在所见的韵图只是基本上根据某种韵书列字,一则因为韵书间有继承关系,对原韵图的列字似乎没有铲除净尽的必要和可能,二是韵图在传抄刊刻的过程中不断遭到修改,如郭守正《增修校正押韵释疑序》:“欧阳先生押韵释疑一书,惠学子至矣。书肆板行,漫者凡几,一漫则一新,必增数注释,易一标题,以快先睹。”《韵镜》共有字3700个左右,其中仅有172字不是《广韵》小韵首字,因此《韵镜》是广韵系韵图。但据李新魁研究,《韵镜》中不见于《广韵》而见于《集韵》的有84字。^⑧此外,还有受《集韵》甚或集韵系韵图影响之处,如《韵镜》《七音略》都以“纯”“顺”相承,二图皆列“雄”于匣母下,但“雄”,《广韵》羽弓切,《集韵》胡弓切。可见切韵图无论从框架结构上或是列字上都是在时间的长流中不断增删修改的,都有前面韵书韵图的或多或少的成分、痕迹,又有可能渗进同时代其他韵书韵图甚或后代韵书韵图的因素。我们认为,切韵图是层累地造出

来的。《卢宗迈切韵法》这一派切韵学、切韵图，基本上依据《集韵》，但又与《广韵》有若干相合之处，至于和《礼韵》的密切关系更是不足为奇的。

李新魁《〈韵镜〉研究》认为，《韵镜》系据景德《韵略》而作，我们的看法是，切韵图不可能主要依据韵略（无论是景德韵略或景祐礼部韵略及其各种修订本）列字。且看绍兴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国子监对黄积厚要求礼部韵增字的“答复”：“礼部韵专谓约束举人程文，只得押韵内字，庶几便于考校，故名《礼部韵略》。若广引训释及添入不紧要字，即与《广韵》无异。”^⑩岂止如此，礼部韵也不收那些不登科举之堂的表示俗语词的字。如现存《附释文附注礼部韵略》《增修校正押韵释疑》都不收“帮”字，缺此小韵。《礼部韵略》原只有9000多字，^⑪毛氏父子的《增韵》竟增加了4166字，但也未增“帮”字。王韵无“帮”，《广韵》于唐韵末列“帮”字，注曰：“衣治鞋履”，增加了一个小韵。《集韵》才把它安排到“滂”小韵前，但是诸本韵略仍然拒收。韵图是音节表，每个音节只要有字，即令是“不紧要字”、俗字，也缺不得，满足这种要求的只能是详本韵书如《广韵》《集韵》，而不可能是缺了不少小韵的韵略。否则我们熟悉的36字母代表字就剩了35了，这只是一例而已。^⑫

（三）

《卢宗迈切韵法》同《集韵》的紧密关系还在于开卷的“音释切韵法难识字”。卢书（五）“三十六字母切韵法”，列三十六字母加七十二助纽字，卢氏序云：“切韵法百八字中有难识者字”，“或直音或反切或调声并集于前”。兹录其十四字原文，并与韵书比较（韵书中无关的文字从略）。《广韵》每字下先释义后反切，《集韵》反是，卢书同后者。

祆 卢书：馨烟切。胡谓神为祆。显字平声。

广韵：呼烟切。胡神。

集韵：馨烟切。胡谓神为祆。慎。

慎 卢书：音颠，倒也。

广韵：“颠”小韵下）倒也。

集韵：“颠”小韵下）倒也。

遭 卢书：张连切。屯遭。哲字平声。

广韵：张连切。迺遭也。

集韵：张连切。屯遭。

羶 卢书：尸连切。羊臭也。设字平声。

广韵：式连切。羊臭也。

集韵：尸连切。说文，羊臭也。

倝 卢书：痴邻切。欲仆也。与獫同音。趋字平声。

广韵：侧邻切。字林云，养马者。（獫，丑人切）。

集韵：“獫”小韵内）痴邻切。欲仆也。

延 卢书：抽延切。安步延延。彻字平声。

广韵：丑延切。说文曰，安步延延也。

集韵：抽延切。说文，安步延延也。

缤 卢书：纭民切。纷乱也。匹字平声。

广韵：匹宾切。缤纷。

集韵：纭民切。缤纷乱也。

螾 卢书：蒲眠切。珠名。与玳同。辩字平声。

广韵：部田切。螾珠。（玳，部田切。蚌珠。或与螾同。）

集韵：玳螾，毗宾切。说文，珠也。（玳，蒲眠切。珠名。）

磬 卢书：下珍切。难也。

广韵：下珍切。鞭也。

集韵：下珍切。难也。

榛 卢书：鋤臻切。木丛生。

广韵：榛，士臻切。木丛生。

集韵：榛，鋤臻切。木丛生曰榛。

楠 卢书：武官切。晚字平声。（按，反切与调声矛盾。如在《广韵》，据反切，当为桓韵明母字；据调声，则为元韵明母字。若兼指二音，则悖于其他字的叙述通例。）

广韵：母官切，武元切，莫奔切。

集韵：漠官切，模元切，谟奔切，里党切。

氈 卢书：诸延切。撚毛也。浙字平声。

广韵：诸延切。席也。周礼曰，秋斂皮，冬斂革，供其毳毛为氈。

集韵：诸延切。说文，撚毛也。

纫 卢书：尼邻切。昵字平声。

广韵：女邻切。

集韵：尼邻切。

嫫 卢书：此不是字，系有声无形，借用女联为形，又借女联为切，呐字平声为嫫字。呐，女劣切。

广韵：呐，女劣切。

集韵：呐，女劣切。

总之，卢书所列 14 个难识字，除“楠”外，尚有 13 字（包括“呐”字）。合于《广韵》者二字（也合《集韵》），合于《集韵》者 12 字。《礼韵》无“偵延”，《增韵》无“祆延”。卢书合于《礼韵》者三字：“螾磈纫”；合于《增韵》者二字：“羶纫”。这更可证明卢书和《集韵》关系密切。

六

卢书反映的切韵图的依据既已证明,那么其特点如何?

1. 36 字母,分 23 行,始见终日。何以知之? 卢书(六)“切三十六字母法”首四纵列列牙音四母;其后四列,上为舌头音四母,下为舌上音四母;再后四列,上为唇音重四母,下为唇音轻四母;再后五列,上为齿头音五母,下为正齿音五母;最后六列为喉音影晓匣喻,半徵半商音来日。宋元切韵图 36 字母大多“以一纸列二十三字母为行,以纬行于上,其下间附一十三字母”。唯杨傖《韵谱》(已佚)、《切韵指掌图》变为线性排列。守温韵学残卷、“辨字五音法”(载于《广韵》卷末及《玉篇广韵指南》内)均唇音居首,王宗道《切韵指玄论》、沈括《梦溪笔谈》、《七音略》、《韵镜》皆始帮终日。卢书变革,改为始见终日,其同系统的《居家必用事类·切韵》、《玉篇广韵指南》的“三十六字母五音五行清浊旁通撮要图”、“三十六字母切韵法”自然雷同,其后的《切韵指掌图》、《四声等子》、《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亦然。

2. 喉音四母的排列顺序是影晓匣喻。其前的王宗道是晓匣影喻,但沈括所传述的一种切韵图②、《七音略》、《韵镜》和《切韵指掌图》都是影晓匣喻;卢书后附的指掌图、《四声等子》和《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则为晓匣影喻。

3. 沈括说:“每声复有四等,谓清、次清、浊、平(按,其后的小注又叫‘不清不浊’)也。”《韵镜》为清、次清、浊、清浊,卢宗迈则云:“每音有四等,谓全清,次清、全浊、不清不浊。”《切韵指掌图》、《四声等子》同之(但“邪禅”为半清半浊),《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则为纯清、次清、全浊、半清半浊。

4. 切韵家喜将切韵五音和乐律五音相配,但如沈括所云,“所

分五音,法亦不一”。卢书是逆向换位型:牙一角、舌一徵、唇一羽、齿一商、喉一宫,此以牙音开头,其前切韵图如《七音略》以唇音领先,牙音第三,则乐律五音自后向前秩序整齐,可谓之逆向齐序型。详见本文第十节。

5. 卢书(九)“切韵之学概述”中有“字有四等轻重,如高交骄骁是也”。卢跋述及的切韵四法之三为“随平仄四声念,则有四等重轻法”,溯其源,当为敦煌守温韵学残卷的“四等重轻例”,惜乎卢书语焉不详。

6. 未言及摄。

7. “实以《广韵》《玉篇》之字”的《韵镜》和《七音略》都是 43 转,尽人皆知,而杨中修的《切韵类例》,孙覿序明确指出其图 44,因是孤例,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如今《卢宗迈切韵法》被发现,其跋云:“世传切韵四十四图,用三十六母与集韵中字,随母所属,次第均布于图间。”可谓无独有偶,那么多出了哪一图?

自陆法言《切韵》直至景祐《礼部韵略》的各种修订本总有尤侯幽三韵。《韵镜》内转第 37 开,《七音略》内转四十都列侯韵于一等,尤韵三等、幽韵四等,合为一图。尤和幽在韵书中分居侯的前后,这次序就有点怪。本世纪以来的切韵家几无不认为幽韵也是三等韵,董同龢《汉语音韵学》的话具有代表性:

幽韵字韵图都摆在四等,可是实际上他们都是三等字。因为:

(1)这个韵只有唇牙喉音,反切上字都用“居方”等见于三等韵的那些类的字,而不用“古博”等见于一二四等韵的那些类的字。

(2)有群母字,这是三等韵的特点之一,而四等韵是绝对不会有群母字的。

我们再作补充:《韵镜》《七音略》里,幽黝幼只有“帮滂並明见溪群疑影晓来”11母列字。按切韵学的规定,除群母外,其他10母可以四等俱全。群母虽只限三等,但该图四等有空位置,既然三等的位置全给尤韵占了,因此硬将幽韵11母字统统按捺到四等,这已属不妥。如将韵书诸小韵逐一核查,就会发现《韵镜》《七音略》隐瞒了重要事实:韵书幽韵还有齿音精母字和生母字。这种韵图的特点如张麟之所言,“一纸列二十三母为行,以纬行于上,其下间附一十三字母。”因为假二等庄组和假四等精组的位置也全给尤韵占了,幽韵的齿音字只得被牺牲。现将韵书尤有宥和幽黝幼的“群精生”二母的小韵对立情况列表于下:

	群 母						精 母				生母	
	尤	幽	有	黝	宥	幼	尤	幽	有	黝	尤	幽
工韵	裘	虬	舅	繆	旧	黝	遭	穉	酒	愀	搜	惨
广韵	裘	虬	舅	繆	旧	黝	遭	穉			搜	惨
集韵	求	虬	臼	虬	旧	黝	掌	穉			搜	惨

唯一合理的办法是恢复幽黝幼的三等韵的地位,再列一图,这样的切韵图就必然是44图了。

8. 关于图的次序,《韵镜》和《七音略》即有差异。卢书述及的44图,其次序可以考证出一点:卢书“全浊字母下上声去声同呼字图”列47组字,细排各字母下的次序(本文第五节列有序号)大多合于韵书,只是阳韵字在群澄禅母下均居首,唐韵字在定母组列于东韵后模韵前,当系江韵牵动阳唐移前,项跋本王韵江与阳唐相次,此时或已合流。与《韵镜》比较,或许这是韵图打乱韵书次序的嚆矢。《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江阳唐悉合图,而《切韵指掌图》的列图次序尤与韵书相悖。

七

切韵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门法。其渊源甚早,敦煌写本《守温韵学残卷》即出现“类隔”一词三次。《广韵》前四卷卷末有《新添类隔(今)更音和切》。衢本《郡斋读书志》著录了王宗道的《切韵指玄论》,提要云:“切归本母,韵归本等者,谓之音和,常也。本等声尽泛入别等者谓之类隔,变也。”按,此实为王宗道语,王氏当是仁宗时人,与贾昌朝同时。^{②3}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切韵之学”条也叙述了音和、类隔,而且说:“又有互用借用,类例颇多。”

卢书也述及门法,较上述为详。其(二)“三十六字母切韵诀”:“……德红名音和切,而尚有互用、往来等切。”(六)“切三十六字母法”按语说:“若《广韵》《玉篇》《集韵》《类篇》中切脚皆容易反切,便得其字分明者,并名音和切。此外有类隔、互用、往还等切,如端字母下字为切,却切知字母下字,为类隔;又如精字母下字为切,却切照字母下字,为互用;又如匣字母下字为切,却切喻字母下字,为往还切。”

音和类隔,毋庸多言。这里先讨论互用切,上段引文明确指出是指精照互用,推其原始,敦煌《守温韵学残卷》已有详细叙述(文繁不录),只是未立其名罢了。元刘鉴《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内的“门法玉钥匙”有“精照互用门”。但是卢书(六)“切三十六字母法”末的双行小注去:“明字,《韵略》中作眉兵切,以眉字用明字为母,则是音和。《广韵》中作武兵切,以武字合归(微)字母,则是互用。其他类隔、往还等切,各似此推之。”^{②4}这里的互用,跟常说迥异,录以待考。《广韵》卷一上平声末“新添类隔今更音和切”所举八字全是唇音字。《集韵》卷首《韵例》:“凡字之翻切,旧以武代某,以亡代茫,谓之类隔,今皆用本字。”

卢书往还切(按,“往”为喻三,“还”为匣,拈此二字较“往来”为胜)以匣喻为例,宋本《切韵指掌图》内有“辨匣喻二字母切字歌”:
“匣阙三四喻中觅,喻亏一二匣中穷,上古释音多具载,当今篇韵少相逢。”董同龢《等韵门法通释》:“切韵指掌图的‘辨匣喻二母切字歌’既说到反切,也说到字母等第,历来却不算为门法。”但卢书三次提及“往还切”,这失去的一环终于重现。卢书提供了切韵学门法的早期史料。

八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一”云:“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宋代邵雍的《皇极经世》和祝泌的《皇极经世解起数诀》是象数易学利用切韵学的典型,而《卢宗迈切韵法》则“援易以为说”的色彩较浓,是其特点。

卢跋说:“世传切韵四十四图,用三十六母与《集韵》中字,随母所属,次第均布于图间。而有声有形与有声无形万一千五百二十声,该括世之所有字,并在其中。揣其声数,乃易之大衍,六十甲子,五行之数,若布万一千五百二十筹,以六除之,则筹无余数。”“切韵有四法也,详此四法,乃是前古通晓易数之智士,作而成之。”“四十四图,字字皆然,其非通幽悟微之入,焉能造是?”所谓万一千五百二十声,合于周易的万物之数,《周易·系辞传上》:“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⑤

卢书(四)“三十六字母五音旁通图”将切韵五音与乐律五音和五行相配。就现有文献言,切韵五音和五行挂钩似以卢书为较

疑难。

九

《卢宗迈切韵法》的手抄本长期藏于日本古寺，但在中国行世的古代典籍中有它的部分痕迹。

卢书(九)“切韵之学概述”：“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以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原也。殆与声俱生，莫知从来。今切韵之法，先类其字各归其母。唇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齿音十，半齿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为五音，天下之声，总于是矣。每音有四等，谓全清、次清、全浊、不清不浊，如颠天田年是也，字有平上去入四声，如帮榜滂博是也，字有四等轻重，如高交骄晓是也，字字有此理，皆得之自然，非人可为也。”从“切韵之学”至“总于是矣”系抄自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唯中间删去二句。^{②7}

此下则见于《居家必用事类》甲集“切韵·总论”。关于《居家必用事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不著撰人名氏，载历代名贤格训及居家日用事宜，以十十分集，体例颇为简洁。辛集中有大德五年吴郡徐元瑞《吏学指南》并序。圣朝字俱跳行。又永乐大典屡引用之，其为元人书无疑。”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年影印宽文十三年(1673)松柏堂和刻本，其出版说明云：“就其刻工与内容推定，其成书当在元初到世祖皇帝时代之间。”

《居家必用事类》在其后，还有一段话类似卢书(二)“三十六字母切韵诀”，如“加以熟读诵，自然通悟，如磁石引针，母唤其子”之类，只是文句有点窜。其“三十六字母五音清浊旁通图”全同卢书(四)“三十六字母五音旁通图”，只是上端有“全清、次清、全浊、不

清不浊”“以纬行于上”，又补了“半舌半齿音”五字，五字皆较卢书为强。误置“心审”，脱“来日”，当是刻印粗劣所致。《居家必用事类》还有“切三十六字母总括”，属于卢书(六)“切三十六字母法”的系统，更换了几个字：卢书助纽字“丁慎、廷田、分蕃、芬番、亲干”，此作“丁颠、庭田、分番、芬蕃、清干”，彻母助纽字卢为“偃延”，是，此作“辰迪”，误。

《居家必用事类》甲集“切韵”下之“总论”和“切韵捷法诗”亦见于瞿氏《铁琴铜剑楼书目》卷七著录的影元抄本《切韵指掌图》，此二者宋本《切韵指掌图》所无。^{②8}

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建德周氏藏元刊《大广益会玉篇》卷首《新编正误足注玉篇广韵指南》(下简称《指南》)内有下列四物：

甲 《指南》“三十六字母五音五行清浊旁通撮要图”就是以卢书(四)“三十六字母五音旁通图”为主体，加上卢书(三)“三十六字母分清浊”，合二而一，比卢书和《居家必用事类》精致得多，制图颇费匠心。命名中加了“五行”二字，更为切合。

乙 《指南》“三十六字母切韵法”的内容就是卢书(五)“三十六字母切韵法”(次序凌乱不堪)和(六)“切三十六字母法”，但制图井然，紧凑美观远胜卢书。只有一点差异：照母的助纽字“征氈”，卢书原作“真氈”。拙文《〈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曾研究了宋元直至辍耕录“射字法”条的七种助纽字系统，指出存在着助纽字的后字逐渐全变为山摄三四等字，前字逐渐全变为梗摄三四等字的倾向，^{②9}因此易“真”为“征”，不无意义。

丙 《指南》“切韵内字释音”脱胎于卢书“音释切韵法难识字”，卢书原有14字，被删去“遘氈缤蜃氈纆”六字，很对，此六字是不算“难识字”。《指南》有误字，其“偃”字下注：“与联同音，赳字同音。”卢书作“与獫同音，赳字平声”，卢是。

丁 《指南》在“切韵内字释音”后低二格有一段话：“切韵之法以音和为正，若《广韵》《玉篇》中切脚容易反切，便得其字分明者，谓之音和切。又有互用切，如明字，韵略中作眉兵切，则是音和，《广韵》中作武兵切，则是互用，盖武字合归微字母下也。其他类隔、往还等切，各以此推之。”显然这是节抄卢书（六）“切三十六字母法”按语及小注中语，联缀得宜。惟卢书在“《广韵》《玉篇》”后尚有“《集韵》《类篇》”，被删，也许因书名为“玉篇广韵指南”的缘故吧。又，卢书手抄本夺“微”字，可据以校补。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成化十四年（1478）叶氏南山精舍刻本《广韵》附《玉篇广韵指南》，承陈慕勤先生复印见示，取以相校，知与上述元刊《新编正误足注玉篇广韵指南》几无二致。这是一本小型类书，所以常被书贾取来置于小学书卷首或作附录。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万历刻本）卷一八五“六书考·韵学”收有“三十六字母切韵法”，与卢书相校，更动了十几个助纽字，有的反映了语音之变，如“彻穿”的助纽字同为“称焯”；“娘”的助纽字改成“宁年”，则与“泥”同；“床”的助纽字改为“秦前”，显示“床从”相混；“禅”的助纽字为“辰然”，当是“禅日”合一的反映。

卢书在跋后有一页，指掌图左边自下而上大字书写“仁礼乐智”四字，每字四角有四小字，如“仁”自左下角顺时钟方向写四小字“仁忍认日”。这种调四声法渊源有自，空海《文镜秘府论》天卷“调四声谱”即是，但不是这种四角环列法。宋末陈元靓《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后集卷九幼学类“字有四声”，列图如卢书，四大字为“仁礼义乐”。

宋代印刷术的发达促进了出版事业的繁荣。书商们雇文人编辑各种实用类书，如《事林广记》《玉篇广韵指南》即是，而且常出修订本，于是冠以“新编”等字。岳珂《愧郋录》卷九“场屋编类之书”：

“凡编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转致传习。”所以我们得以从宋元明的类书中发现《卢宗迈切韵法》的痕迹。也许它们源于卢书，也许抄自更早的祖本，但它们后出转精，卢书早于它们则是可以断言的。

十

如今我们可以肯定，南宋初至少有两本同一性质的切韵学著作、切韵图流行。一是杨中修的《切韵类例》，已佚，据赵荫棠考证，杨书编于绍兴八年(1138)左右；一是《卢宗迈切韵法》，卢跋在淳熙丙午年(1186)。两者的共同点是显著的：皆以《集韵》为根据，据孙觌的《切韵类例序》知杨书有“例”十条，图44，卢书所集切韵法也是十条左右，两次言及44图。据《宋会要辑稿》职官55，卢宗迈隆兴元年(1163)在京城做官，据方志本传，他是位“性好文史”的藏书家，孙觌(1081—1169)官高名大，卢宗迈不可能不知，而卢跋只言“世传四十四图”，只字未及孙杨，因此我们没有证据说卢书承自杨书。孙觌是文章老手，这篇序写得有气势，但不无夸张的色彩，他说杨中修“著”“作”类例，用现代话说，实是“编”，最多是“编著”，^⑩因为切韵学、切韵图均前有所承，而又代有更革，层累地造出来的，不可能全部自我作古，卢宗迈自称“集”切韵法，实事求是。既共有所据，同有所承，杨、卢的“例”图当有很多相同和相近之处。

自清同治元年(1862)邹伯奇《切韵指掌图跋》指出《切韵指掌图》的司马光序系抄自孙觌《切韵类例序》，此后大矢透、赵荫棠、董同龢、姚荣松诸家继续证明，已成定讞。既然序可抄孙觌，那些“检例”、九“辨”、图表就毫无抄袭的可能吗？杨书已佚，但是我们却发现了卢书与《切韵指掌图》的若干相同之处。

宋绍定刻本《切韵指掌图》今存,其例与图有矛盾,例与例有矛盾。例如“辨分韵等第歌”：“见溪群疑四等连。端透定泥居两边,知彻澄娘中心纳。帮滂四等亦俱全,更有非敷三等数。中间照审义幽玄,精清两头为真的。影晓双飞亦四全。来居四等都收后,日应三上是根源。”(按,据文义标点)这首歌所表现的韵图是,36母,始见终日(广韵系韵图始帮终日),分23行,知组4母、非组4母、照组5母各自夹插于同类音中,这种“夹心式”的结构与卢书及《韵镜》等全同。而《切韵指掌图》20图中的36母虽也是始见终日,但一线排列,不产生“居两边”“中心纳”的问题。

在切韵五音和乐律五音相配的问题上,《切韵指掌图》例有三套系统,按出现先后,A.“辨五音例”,B.“辨字母次第例”,C.“三十六母切韵五音乐律五音旁通图”(宋本第十一叶上半叶,此名乃笔者所拟)。A和《守温韵学残卷》的“辨宫商徵羽角例”、神珙《四声五音九弄反切图》、安然《悉曇藏》、韩鄂《四时纂要》所载大致相同(歧异处不具言,参看黄耀堃文)。其乐律五音整齐有序,姑名曰齐序型。C系统“牙一角”跃前,谓之逆向换位型,与《卢宗迈切韵法》、《经史正音切韵指南》的“总括五姓分配例”相同。B系统则进一步,唇和喉所配者互换,谓之换位更配型。王应麟《小学紺珠》的甲、乙式分别同于此处的A、B型。今列表,并与其他切韵文献相比较,表中的阿拉伯数字是原书中的出现顺序。

		唇	舌	牙	齿	喉
齐序型	A 七音略	5 羽 1 羽	4 徵 2 徵	3 角 3 角	2 商 4 商	1 宫 5 宫
逆向换位型	C、卢书、经史正音切韵指南	3 羽	2 徵	1 角	4 商	5 宫
换位更配型	B、四声等子	3 宫	2 徵	1 角	4 商	5 羽

上述 A、B、C 三型是各不相同的,《切韵指掌图》的例不管齟齬与否,兼收并纳,这倒像《玉篇广韵指南》、《事林广记》、《居家必用事类》,具有类书的性质。

卢宗迈序言中引的切韵诗有“验人端的处,下口便知音”,《切韵指掌图》“双声叠韵例”的“歌”也有此二句。本文第五节曾经指出,卢书反映的切韵图船禅相淆合于其所依据的《集韵》,《切韵指掌图》船禅亦混,如二者都将“纯盾顺术”列为禅母四声相承的一组字。董同龢、姚荣松二文都列举了很多《切韵指掌图》源于《集韵》的字,兹不赘述。《切韵指掌图》在宋代韵图中无疑是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它根据宋代韵部的简化,归并成 20 图,任何韵图都是层累地造出来的,都有所因革,《切韵指掌图》与《集韵》和集韵系韵图关系密切。图前总要有个例,也许是其后的切韵家或书肆主人纂例时就胡抄乱凑,成为杂烩,以致或自相矛盾,或与图相背。邹伯奇发现了序的抄袭痕迹,我们从“例”的矛盾中发现的不协调的因素,其中有些恰恰都跟卢书相同或相近。

宋本《切韵指掌图》在诸例之末即 11 叶下半叶有一掌图,闻名遐迩。也是左手,所列 36 母顺序是唇音居首(按,唇音领先是《韵镜》、《七音略》和王宗道《切韵指玄论》、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所传述的“切韵之法”的特点),但其后 20 图皆为牙音置前。而且大拇指上所写的唇音八字居然帮组四母殿后,更属胥乱。董同龢因为此图同意其友张政烺的推测,《切韵指掌图》是南宋时江西和尚做的,而其例中有与卢书相同的成份,平田昌司先生提醒我,卢宗迈是淳熙年间的江西人。

十一

《卢宗迈切韵法》不仅在汉语音韵学史上有珍贵的学术价值,

而且也为汉语语音史提供了若干宋代的语音资料。

1. 全浊上变为全浊去。韩愈《讳辨》、李涪《刊误》都是中晚唐全浊上变去的史料,张麟之《韵鉴序例·上声去音字》:“凡以平侧呼字,至上声多相犯。古人制韵间取去声字参入上声者,正欲使清浊有所辨耳。或者不知,徒泥韵策,分为四声,至上声多例作第二侧读之,此殊不知变也。若果为然,则以士为史,以上为赏,以道为祷,以父母之父为甫,可乎?今逐韵上声浊位并当呼为去声。”卢宗迈“三十六母分清浊”表将十个全浊字母及其右下角小字“全浊”都用朱笔书写,而且在该表左下空处大书“全浊字母下字并上去声同呼”。卢书(七)“全浊字母下上声去声同呼字图”,列47组四声相承字,按语:“以上十个字母并属全浊,所以上去二声字同呼。今录出者并上声去声皆有字者,庶明未晓切韵人。以全浊上声字,例调作次清或全清字母下上声字呼之(原注:如‘常上尚杓’却云‘常赏尚杓’,若用‘赏’字为上声,则合云‘商赏饷饫’,是审字母下字也,非禅字母下字也),其误远矣。”卢宗迈和张麟之都指出南宋时人调声的普遍错误,把全浊上声字调作清上字,而变同全浊去才是对的。王辟之《澠水燕谈录》卷十:“范应辰为大理评事,(胡)旦画一布袋,中藏一丐者,以遗范,题云‘袋’里贫士’也。”“士”,崇母上声止韵;“事”,崇母去声志韵,则是浊上变去。同上:“有张献图者,应举久不第,好嘲戏,以五举推恩,得三班奉职,以诗寄其妻云:‘吾今为奉职,子莫怨鸾孤。’“奉职”谐“凤隻”、“奉”,奉母上声肿韵;“凤”,奉母去声送韵,是浊上变去。陈叔方《颖川语小》:“‘父辅妇道抱’数字皆上声也,而以去声读之,其杭浙之音欤?”这也是一则浊上变去的史料。

2. 非敷合一、知照合一、彻穿合一。卢书(八)“知照合一、非敷合一、彻穿合一”图,列若干字,按语云:“以上六个字母下字,若切脚上一字是本母下字,即切归上六字母也。以知照字、非敷字、彻穿

字母下字,呼吸相同,故录出以辩切字时,归母无差。”

先录非敷两字母图:

非 _支	芳	夫	甫府	仿匪风分弗
敷 _虞	方	孚	抚	

原抄“夫”误作“天”,而且在“芳方”“夫孚”“甫府抚”三组同音字间误以线隔开。“方”为非母字,“芳”为敷母字,两字颠倒正说明非敷相混的深入人心,连切韵家都胡涂了。罗常培先生《唐五代西北方音》指出唐五代时非敷为一类,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指出《说文系传》的朱翱反切系统非敷合一。

知 _支	中	张	猪株	珍	冢	微	陟	知	屯展竹卓追
照 _笑	钟	章	朱诸	真	肿	止旨	职	之	甾征庄专邹臻争阻主 煮质侧札簪斩

“札”原抄误作“礼”。上列照母字中照二(即庄母)字为“甾庄邹臻争阻侧札簪斩”,余为照三即章母字。

彻 _脂	痴答摘	仲	椿	耻	楮	敕	抽丑
穿 _仙	蚩	充	春	齿	处	尺赤	窗枢初刍吕叉车称楚敞创测 察姝(音枢)

上列穿母字中穿二(即初母)字为“窗初刍叉楚创测察”,余为穿三(即昌母)字。

据卢图,当是庄章先合,再与知合;初昌先合,再与彻合。仁宗嘉祐元年黄河决口,《宋史》卷九一《河渠志》:“宦者刘恢奏:……河口乃赵征村、于国姓、御名有嫌。”则是仁宗之名“祯”(知盈切)与“征”(诸盈切)同音,可见宋时知照已合一。王力先生《汉语语音

史》认为朱熹反切系统里三组合并。卢宗迈和朱熹为同时人。于此可见,现存宋代韵图都是 36 母,无论是一线排列或 23 行,都不反映语音事实,都是保守的,如知彻或单列或与端透相次,实已与照穿合并。

3. 未言澄床“呼吸相同”,卢书(七)“全浊字母下上声去声同呼字图”列十个全浊声母,其床母字实为床二(即崇母)字,床三(即船母)并入禅母,详见本文第五节。卢书未言浊音消失,但朱熹反切系统浊音清化。《居家必用事类》和元刻本《切韵指掌图》所收的《切韵捷法诗》有“难呼语句皆为浊,易组言辞尽属清”、“字母贯通三十六,要分清浊重和轻”,这说明浊音的清化给切韵家们带来了难题,所以反复叮咛。

4. 鱼虞合一。知照合一图列“猪鱼株虞朱虞诸鱼”为同音字。秦少游词名句“杜鹃声里斜阳暮”的末字,宋人范湜《潜溪诗眼》、项安世《项氏家说》卷八“因讳改字”条、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少游斜阳暮”条、元人黄潜《日损斋笔记》皆曾论及,或以为本作“曙”、“树”,因避英宗讳,而改作“暮”。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庙讳同音,‘署’字常恕反,‘树’字殊遇反,然皆避讳,则以为一字也。……而今学士大夫乃不能辨,方嘉祐、治平之间,朝士如宋次道、苏子容辈,皆精于字学,亦不以为言,何也?”宋刻《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附《韵略条式》第 25 叶载英宗讳字,列“曙(常恕切)署”等 9 字、“树(殊遇切)竖”等 18 字。则是宋代鱼虞混一的铁证。

5. 支脂之微相混。非敷合一图于“非”下注小字“支”,意为“非”是支韵字,而“非”在切韵系韵书中是微韵字。知照合一图列“微止止止旨旨”同音,“知支之之”同音。彻穿合一图列“痴之笞之摘支蚩之”同音。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一“唐人避讳”条:“唐人避家讳甚严。……《语林》载崔殷梦知举,吏部尚书归仁晦托弟仁泽,……殷

梦斂色端笏曰：‘某见进表让此官矣。’仁晦始悟己姓，殷梦讳也。按宰相世系表，其父名龟从。……父名龟从，子不列姓归入于科籍。”按，龟，脂韵字；归，微韵字。是唐时脂微合一。王辟之《澠水燕谈录》卷十：“（刘）贡父晚年鼻既断烂，日忧死亡，客戏之云：‘颜渊、子路微服同出，市中逢孔子，惶怖求避，忽见一塔，相与匿于塔后，孔子既过，颜子曰：‘此何塔也？’由曰：‘所谓避孔子塔也。’”这是利用和“鼻孔子塌”同音开恶性玩笑，可见“避”（寘韵字）“鼻”（至韵字）同音。文莹《湘山野录》卷中：“高副枢若讷一旦召姚嗣宗晨膳，忽一客老郎官者至，遂自举新诗喋喋不已。……姚亦关中诗豪，辨谑无羁，潜计之，此老非玩不起。……又举秋日峡中感怀曰：‘猿啼旅思悽。’姚应曰：‘好对“犬吠王三嫂”。’”“旅思犬”同音为“吕四妻”，“四”是至韵字，“思”是志韵字，可见至志二韵之并。宋词即以支脂之微齐祭废诸韵为一部押韵。如柳永《看花回·屈指劳生百岁期》叶“随支飞微为支稀微眉脂枝支归微”，晏几道《临江仙·身外闲愁空满》叶“稀微诗之时之知支归微枝支”，详见拙文《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下三条同）。

6. 昔职相混。彻穿合一图列“敕职尺昔赤昔”为同音字。《澠水燕谈录》卷十：“有张献图者，应举久不第，好嘲戏，以五举推恩，得三班奉职，以诗寄其妻云：‘吾今为奉职，子莫怨鸾孤。’”“奉职”同音字为“风隻”，“隻”是昔韵字，可见昔职二韵混。其相配的阳声韵“清”与“蒸”亦混，可为佐证。《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附《韵略条式》载宋帝讳字，仁宗名“祯”（陟盈切），讳字有“微”（知陵切）。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二：“仁宗庙讳祯，语讹近蒸，今内庭上下皆呼蒸饼为炊饼。”程大昌《演繁露续集》卷六“蒸饼”条：“本朝读蒸为炊，以蒸字近仁宗庙讳故也。”按，“微蒸”都是蒸韵字，前为知母，后为照母，据卢宗迈书，知照合一，则二字同音，宋代定“微”为仁宗的嫌

名,则是宋代“微蒸桢”三字同音。

7. 东钟混一。知照合一图列“中东钟钟”为同音字。张麟之《韵鉴序例》有三处反映了当时东冬钟合并,例如“归字例”中的归难字法,如得“千竹反”,“取嵩字横呼,则知平声次清是为椶字”。按,“嵩”是东韵字,“椶”是钟韵字,因为实际语音已混,张氏才如此说。

8. 江阳合流。卢书(七)“全浊字母下上声去声同呼字图”列47组字,各组次序合于切韵系韵书,唯阳韵字在群澄禅母组中居首,唐韵字在定母组中位于东韵字后,模韵字前,当系江阳合流牵动阳唐趋前。《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都是江阳同图。

9. 值得注意的是,知照合一图中列“知之”同音,彻穿合一图列“耻齿”同音。而在元代的《中原音韵》里,“知耻”隶齐微韵,“之齿”属支思韵,并不同音,明代的《韵略易通》亦然。何以解释?俟他日以专文讨论。

《卢宗迈切韵法》是宋代切韵学著作中的一种,它在第(八)部分明确指出“知照字,非敷字、彻穿字母下字,呼吸相同”,可是在(一)(二)(三)(四)(五)(六)中不厌其烦地讲述36字母及其助纳字问题,占了全书过半的篇幅。张麟之也特为《韵镜》“撰字母括要图”,《四声等子》和《切韵指掌图》的例也屡屡言及36字母。传世的宋元韵图及已佚的《洪韵》、《切韵心鉴》、杨俊《韵谱》都牢牢死守36字母。大凡难题才会再三解释,36字母早已过时,但又要拘守,所以切韵家反复强调,唯恐不周。至于韵母系统,广韵系韵图、集韵系韵图与宋代实际语音距离颇远,自不必言;即令《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接近从宋词用韵归纳出的韵部系统,它们都未必尽合时音。“全浊上归去”已是宋人共识,但韵图仍然拘泥旧的四声系统不变,张麟之云:“古人制韵间取去声字参入上声者,正欲使清浊有所辨耳。”可谓曲说,还是卢宗迈书(七)“全浊字母下上声去声同呼”

符合事实。总之，韵图是层累地造出来的，有或多或少的因袭，有或多或少的更新，所以对研究汉语语音史的学人来说，就存在一个如何利用切韵图的问题。

十二

清代末年，杨守敬在日本获得《韵镜》，黎庶昌收入《古逸丛书》，其《刻古籍丛书序》：“古书之不亡，古人之精神自寄之，岂予所能增重？而独至搜辑之责似若有默以畀予者，固不敢不勉也。”百余年后，我得平山久雄先生及其高足之助，游学扶桑，获睹此沉埋八百余年之古籍，可谓大幸。平山先生嘱我著文公布此字内孤本，以饗学界，不敢不勉。平山先生殷切关怀，赐教良多，理应同署，请之再三，却之再三，先生高风，令我愈加钦敬。

限于篇幅，有些问题未及讨论，俟之他篇。虽时及廿月，地历三国，勉强成文，误谬必多，祈请方家教正。

1992年6月10日结稿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1993年6月修改，1994年3月再次修改

【附注】

①见曾巩《元丰类稿》卷十二《先大夫集后序》。

②至于平水韵，那是切韵系韵书的末流，此不具论。

③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

④⑨⑪⑫⑬李焘《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序》，见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十六及魏了翁《鹤山渠阳经外杂抄》。

⑤1990年11月、1991年2月我两次去日本国会图书馆阅读《卢宗迈切韵法》，1993年秋又请远藤光晓先生专程查阅此书的版本及装订情况，今据远藤先生复函作一概述。

⑥鲁国尧《长安论韵考——切韵序史实考之一》，中国声韵学国际研讨会（香港，1990年6月）宣读。

- ⑦李致忠《古籍版本学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图版三十。
- ⑧《语言研究》1981年第1期第133、156页。
- ⑩见白涤州《集韵声类考》、邱荣骥《集韵研究》。
- ⑭⑮罗常培《通志·七音略研究》。
- 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
- ⑰《广韵》此四字在寒早翰曷韵中,四声相承。《集韵》“但”(荡旱切)在缓韵,“憺”(徒案切)在换韵,此由于《集韵》将少数开合韵的归字两两移乱,但反切系统不紊。于此亦可见卢书所据的切韵图,仍沿用原来的骨架,详后。
- ⑱《〈韵镜〉研究》,《语言研究》1981年第1期第152、156页。
- ⑲见宋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所附之《韵略条式》。
- ⑳熊忠《古文韵会举要》“凡例”：“礼部韵略元收九千五百九十字。”
- ㉑敦煌文献三十字母无“帮”字,仁宗时王宗道三十六字母有“帮”字,沈括《笔谈》也有,但都在《广韵》颁行之后。
- ㉒《梦溪笔谈》卷十五“帮字横调之为五音,帮当刚臧央是也”,“多有声无字者,”“邕胸止有二字”,可证其喉音四母影居晓前。
- ㉓戴震《声类考》卷一“反切之始”条、章太炎《国故论衡·古双声说》、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声母发音部位异名表”皆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云,皆因不知王宗道生平。《宋会要辑稿》“仪制三”载仁宗景祐四年诏贾昌朝与“祠部员外郎崇文院检讨王宗道”“并兼允天章阁侍讲”,《宋史》卷一六二“职官二”,卷二八五贾昌朝传载王宗道于景祐元年(1034)为崇政殿说书,《切韵指玄论》作者当即此王宗道,另文专论。
- ㉔“微”字原抄夺,据《玉篇广韵指南》补。
- ㉕“大衍之数五十”,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引金景芳《易通》:“当作‘大衍之数五十有五’,转写脱去‘有五’二字。”金先生近著《周易讲座》,亦如是说。但宋人沈作喆《寓简》卷一引陆秉曰:“此脱文也,当云‘大衍之数五十有五’。”
- ㉖王观国(北宋、南宋之际人)《学林》“双声叠韵”条也将五音与五行相配,然与卢书有歧异。
- ㉗“以西域二合之音”之“以”,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以光绪番禺陶氏爱庐刊本为底本,作“似”,今据《卢宗迈切韵法》和文物出版社1975年影印元大德本,“以”为是。

②⑧参见陈操《切韵指掌图重印后记》(附于中华书局 1962 年影印之《切韵指掌图》后),二者几经辗转保存在四库全书本内。

②⑨《中国语言学报》第三期第 110—112 页。

③⑩张麟之《韵镜序作》述及杨侠“撰韵谱”,引杨自序:“得历阳所刊《切韵心鉴》,因以旧书手加校定,刊之郡斋。”可见据底本校定亦谓之撰。

【主要参考文献】

白涤州:1931,《集韵声类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三本第二分。

陈垣:1962,《史讳举例》,中华书局,北京。

董同龢:1974,《董同龢先生语言学论文选集》,食货出版社,台北。 1977,《汉语音韵学》,文史哲出版社,台北。

方孝岳:1988,《广韵韵图》,中华书局,北京。

冈井慎吾:1933 初版,1969 再版,《玉篇の研究》,东洋文库发行,东京。

何九盈:1985,《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

黄耀堃:1982,试释神珙《九弄图》的“五音”——及“五音之家”略说,均社论丛,第 11 期,京都。 1982,有关“五音之家”资料初编(一),同上,第 12 期,京都。 1983,有关“五音之家”资料初编(二),同上,第 13 期,京都。 1991,试论《归三十字母例》在韵学史上的地位,均社论丛第 17 期,京都。

姜亮夫:1990,《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浙江古籍出版社,杭州。

李孟晋:1981,宋代书禁与槧本之外流,《宋史研究集》第十三集,台北。

李荣:1956,《切韵音系》(新一版),科学出版社,北京。

李新魁:1981,《韵镜研究》,《语言研究》1981 年第 1 期。 1983,《汉语等韵学》,中华书局,北京。

刘伯骥:1971,《宋代政教史》,台湾中华书局,台北。

鲁国尧:1988,《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中国语言学报》第 3 期。

1991,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同上,第 4 期。

罗常培:1963,《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中华书局,北京。

宁继福:1987,《金代汉语语言学述评》,《社会科学战线》1981 年 1 期。

潘重规:1974,《瀛涯敦煌韵辑新编·瀛涯敦煌韵辑别录》,文史哲出版社,台北。

- 朴现圭、朴贞玉:1986,《广韵版本考》,学海出版社,台北。
- 平田昌司:1984,《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与《切韵指掌图》——试论语言神秘思想对宋代等韵学的影响,《东方学报》第五十六册,日本京都。
- 邱荣镛:1974,《集韵研究》(稿本影印发行),台北。
- 邵荣芬:1982,《切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 辻本春彦:1986,《广韵切韵谱》(第三版),京都均社,日本京都。
- 王力:1958,《汉语史稿》(修订本)上卷,科学出版社,北京。 1985,《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 薛凤生:1985,试论等韵学之原理与内外转之含义,《语言研究》1985年第1期。
- 姚荣松:1974,《切韵指掌图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第十八号。
- 远藤光晓:1988,敦煌文书 P2012《守温韵学残卷》について,《青山学院大学论集》第29号。
- 赵荫棠:1957,《等韵源流》,商务印书馆,北京。
- 周宝珠:1985,《简明宋史》,人民出版社,北京。
- 周法高:1968,《中国语言学论文集》,崇基书店,香港。
- 周祖谟:1966,《问学集》,中华书局,北京。 1983,《唐五代韵书集存》,中华书局,北京。
- 大宋重修广韵,周祖谟《广韵校本》,余迺永《互注校正宋本广韵》(台北联贯出版社,1975),日本静嘉堂文库藏高宗绍兴间浙刊本。
- 钜宋广韵,日本内阁文库藏孝宗乾道己丑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刊本(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本(缺去声一册)。
- 集韵,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北京图书馆藏孝宗时潭州刻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藏淳熙丁未田氏刊本(缺第一册)。
- 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五卷附韵略条式一卷,四部丛刊续编影印铁琴铜剑楼藏宋理宗时刊本。
- 增修校正押韵释疑,四库全书本。
-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日本内阁文库藏元至正本,东京八木书店影印元至正本(1982)。
- 校订五音集韵(韩道昭著,宁忌浮校订),中华书局,1992。
- 七音略,元至治本。

韵镜,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55),龙宇纯《韵镜校注》(艺文印书馆,1976),李新魁《韵镜校证》(中华书局,1982)。

切韵指掌图,宋绍定刻本(中华书局影印,1986),渭南严氏音韵学丛书本。

等韵五种,艺文印书馆(台北,1981)。

玉篇广韵指南,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元刊《大广益会玉篇》卷首,明成化十四年叶氏南山精舍刻本《广韵》附。

史书十余种,如《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路史》、《宋史》、《续资治通鉴》、《宋史纪事本末》等。

宋人文集近四百种(单刊本、点校本、校注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丛书集成初编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如周麟之《海陵集》(海陵丛刻本、四库全书本),孙覿《鸿庆居士集》《内简尺牍》(常州先哲遗书本、四库全书本),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刻本),王之望《汉滨集》(四库全书本)等。

宋元明类书数十种,如王应麟《玉海》(元后至元三年庆元路儒学刊本),陈元靓《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元刻本),章如愚《山堂考索》(四库全书本),佚名《居家必用事类》(北京图书馆藏明刻本,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年影印宽文十三年即1673年松柏堂和刻本),凌迪知《万姓统谱》(四库全书本)、廖用贤《尚友录》(光绪刊)等。

宋元笔记百种,如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文莹《湘山野录》、王观国《学林》、刘攽《贡父诗话》、龚鼎臣《东原录》、朱翌《猗觉寮杂志》、许观《东斋记事》、白斑《湛渊静语》、刘壎《隐居通议》、俞成《萤雪丛说》、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等。

宋以来书目近百种,如《四库阙书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中兴馆阁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通志艺文略》、《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述古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另藤原佐世《日本见在书目》、《日本国会图书馆汉籍目录》等。

地方志数种,如天顺五年大明一统志,康熙西江志,雍正江西通志,同治南安府志,同治大庾县志。

卢联桂:江西卢氏通谱(民国十年石印本)。

大正藏。

1990年9月我应日本学术振兴会之邀,赴日与东京大学平山久雄教授合作研究,在平山久雄、远藤光晓先生的帮助下,发现了《卢宗迈切韵法》,在研究和撰文的过程中得到平山久雄、平田昌司、岩田礼、远藤光晓诸先生的热情帮助。初稿也曾请薛凤生、侍建国先生赐阅,陈慕勤先生为我提供了若干资料。为写此文,我先后在日、中、美读了与课题有关的大量论著,又发奋翻阅了近400种宋人别集,近百种古代书目。承《中国语文》破格,将拙文连载于1992年6期、1993年1期。1993年春河南教育出版社约我出自选集,于是又翻阅了数十种宋元明类书,1993年6月对拙文作了第一次修订。承查道元先生允许,我在读了百种宋元笔记后,于1994年3月再作修改,在修改的过程中还承唐作藩,胡双宝、何九盈、远藤光晓、黄耀堃等先生赐教、赐助,鼓励良多,谨于此向海我、助我的诸位先生统致谢忱。

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

【提要】

本文作者对两万首宋词的用韵作了穷尽式的研究,又下探至金元词韵,旁及部分宋金元诗韵和元曲韵。本文首先指出宋人填词并无词韵书可循,清人编的多种词韵书均有不同程度的错误,也批评了毛奇龄、纪昀等的宋人词韵漫无定纪、不足推求的观点。继而对宋词用韵的一般规律和纷繁复杂的通叶现象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总结,指出宋词韵 18 部类植根于宋代通语。进而研究元好问、白朴等金元词人的用韵,并与元好问的近体诗韵、白朴曲韵相比照,说明金元词韵不循两宋旧轨,建立了新的用韵模式。本文旨在对自北宋初至元末的 300 多年的词韵作历时的研究,以揭示词韵随语音之变而变的客观规律。

从元好问、白朴词韵与其前的宋代词韵、金代前期词韵比较可以推测,13 世纪初乃是北方汉语发生重大变化之时,元白师弟的词韵及时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性的语音变化,因而早于周德清的《中原音韵》约百年之久,其在北

* 本文初稿在中国语言学会第四届学术讨论会(1987 年底,广州)的小组会与全体会上宣读,1988 年 4 月修订,承《中国语言学报》第四期主编俞敏先生审阅,教正多处,拙文逾二万,俞先生破格刊用,也令我十分感激。在修改过程中得到吕叔湘、周祖谟、杨耐思等先生的鼓励,文中引用了很多友人的手稿,统致谢忱。

音史以至汉语语音史上的价值弥足珍贵。

—

清代著名学者焦循曾云：“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余尝欲自楚骚以下”“撰为一集”，“宋专录其词”。“晚唐渐有词，兴于五代，而盛于宋，为唐以前所无。故论宋宜取其词，前则秦柳苏晁，后则周吴姜蒋，足与魏之曹刘，唐之李杜相辉映焉。其诗人之有西崑、西江诸派，不过唐人之绪余，不足评其乖合矣”。（《易余篇录》卷十五）焦循对宋诗的评价是否偏低，自当别论，但是说宋词因为具有重大特色而且成就辉煌，所以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确为不刊之论。北宋（960—1127年）、南宋（1127—1279年）时代，词家辈出，群星灿烂，其作品万象毕陈、五彩缤纷。现存宋词过两万首，唐圭璋先生编的《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第一版，1980年第二次印刷）五巨册录人词人1330余家，词作1.99万余首，残篇530余首。孔凡礼先生的《全宋词补辑》（中华书局，1981年）辑得140余人的430余首词。宋词数量之巨，可谓洋洋大观。

众所周知，宋词与音乐有密切的关系，它是韵文，必须押韵。宋人填词是不是像作诗赋那样要根据某种韵书押韵呢？《宋史·选举志》：“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御试之日，诗赋文论共为一场，……或音韵中一字有差，虽生平苦辛，即时摒逐；如音韵不失，虽末学浅近，俯拾科级。”诗赋押韵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是官韵，南宋宁宗时人胡柯的《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记载欧阳修初次应举时，“坐赋逸官韵，黜”。宋李廌《师友谈记》：“少游言赋中工夫不厌子细，先寻事以押官韵。……凡押官韵须是稳熟浏亮。”《宋会要辑稿》“选举

四”载绍兴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诏书,原注:“自来举人许带《礼部韵略》入试院。”虽至元代,仍旧遵用。《元史·选举志》:“乡试、会试,许将《礼部韵略》外,余并不许怀挟文字。”延及明清,对官韵依然不敢越雷池一步。

宋代文士填词有无众所遵循的词韵书?他们怎么用韵?

第一种看法以明万历时的著名戏曲理论家王骥德《曲律》为代表,该书《论韵》云:“韵书之夥也”,“作近体则用今韵,始沈约《韵谱》,今裁于唐而为《礼部韵略》”,“宋词尚沿用诗韵,入金未能尽变”。这种观点对后世(如纪昀)有一定影响,但显然是错误的。

第二种看法以清人毛奇龄、纪昀、焦循为代表。毛氏《西河词话》云:“词本无韵,故宋人不制韵,任意取押”,“词则无不通者”。“至如人韵,则信口揣合方音俚响,皆许入押”,“是一入声而一十七韵展转杂通,无有定纪”,“词韵之了无依据,而不足推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词曲类《仲恒〈词韵〉提要》云:“考填词莫盛于宋,而二百余载作者云兴,但有制调之文,绝无撰韵之事。核其所作,或竟用诗韵,或各杂方言,亦绝无一定之律”,“当日所讲,在于声律,抑扬抗坠,剖析微茫。至其词则雅俗通歌,惟求谐耳。所谓有井水吃处都唱柳词是也,又安能以《礼部韵略》颁行诸酒炉茶肆哉?”焦循《雕菰楼词话》云:“毛大可(按,即毛奇龄)称词本无韵,是也”,“按唐人应试用官韵,其非应试,如韩昌黎赠张籍诗,以‘城堂江庭童穷’一韵,则庚青江阳东通协,不拘拘如律诗也。至于词,更宽可知矣”。他举秦观《品令》,柳永《迎春乐》等为例,云:“凡此皆用当时乡谈里语,又何韵之有?”毛奇龄、纪昀、焦循对清人编的词韵书都持否定态度。他们是极端派,认为宋词用韵无章可循。

而大多数词学家认为应该有词韵书。本世纪的词学家论及此事时无不认为宋人即编有词韵书,如现代著名词曲专家吴梅的《词

学通论》：“韵书最初莫如朱希真作应制词韵 16 条，其后张辑释之，冯取洽增之，至元陶宗仪，曾讥其混淆，欲为更定，而其书久佚，无从扬榷矣。”^①夏承焘、吴熊和《读词常识》云：“北宋末年朱希真尝拟应制词韵十六条，而外列入声韵四部。”^②唐圭璋、金启华《历代词学研究述略》认为“这当是最早的词韵著作”，^③此说辗转相传，在现代词学界几成定谳，其实此论实抄自清人戈载《词林正韵·发凡》。进一步追溯其源，最早见于清康熙时沈雄的《古今词话》（1688 年刊），其《词品》卷上《详韵》：“陶宗仪《韵记》曰：‘本朝应制颁韵，仅十之二三，而入争习之。户录一编以粘壁，故无定本。后见东都朱希真，复为偃韵，亦仅十有六条。其闭口侵寻、监咸、廉纤三韵，不便混入，未遑校讎也。鄱阳张辑，始为衍义以释之。洎冯取洽重为缮录增补，而韵学稍为明备通行矣。值流离日，载于掌大薄蹄，藏于树根盎中，湿朽虫蚀，字无全行，笔无明画，又以杂叶细书如半菽许。愿一有心斯道者详而补之。然见所书十六条与周德清所辑，小异大同，要以中原之音，而列以入声四韵为准。南村老人记。’”陶宗仪为元明之际的知名学者，著述颇丰，其《南村辍耕录》影响明清迄今。沈雄引录的所谓《韵记》语，玩其内容及体制，似为《辍耕录》中的一条。据拙文《〈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篇首的考证，《辍耕录》集结成书之时，当为 1366 年秋朱元璋令徐达、俞通海率军攻克张士诚占领的松江之后，陶宗仪本人亲自定稿。^④现存元刊本有二：1936 年上海涵芬楼影印吴县潘氏滂熹斋藏元刊本，1923 年武进陶氏影元刻本，明本则更多，皆为完帙，并无残缺。笔者曾在南京、北京查阅了陶氏的现存著作及存目，均未见此条。《辍耕录》卷十七“哨遍”条录其友钱抱素的套数，末加按语：“乐府中押‘逐、赅、菊’字韵者，盖中州之音轻，与‘尤字韵’相近故也。”却不使用周德清书的“尤侯韵”这一术语。元代是否有“应制颁韵”事，此“颁韵”与

词韵是何关系,都大可怀疑,而且朱敦儒《樵歌》词的用韵亦与16条不合(见第四节表)。跟沈雄的《古今词话》同年刊行的徐钺的《词苑丛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誉为“采摭繁富,援据详明,足为论词者总汇”。徐氏之编此书曾得其友朱彝尊、陈维崧参订,其卷二“音韵”毫未言及所谓朱敦儒草创词韵事。沈雄另一同时代人毛奇龄《韵学要指》云:“宋人亦并无有造词曲韵者。”《西河词话》:“词本无韵,故宋人不制韵。”毛奇龄“淹贯群书”^⑤,“著述之富,甲于近代”^⑥,朱彝尊亦博极典籍,是《词综》的编者,二人均是一代学人,对前代著名学者陶宗仪的著作安有不知之理?跟沈雄同时的沈谦编《词韵略》,仲恒著《词韵》(1679年刊)也未提及此事。纪昀之渊博尽人皆知,曾为沈雄《古今词话》撰提要,评价甚低,^⑦他坚决否认宋人有词韵书。^⑧今人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云:“康熙间吴江沈雄,亦著《古今词话》八卷,其书芜陋不足道。”唐圭璋先生亦曾屡加批评。^⑨可见沈雄所录陶宗仪语实令人生疑,而当今词学家未能考镜源流,因迷信戈载书,遂转相抄录,众口一词。

真正的词韵书则自明胡文焕《文会堂词韵》始。清初词学复兴,填词成为风尚,词韵书也就“应运而生”。何以宋人无词韵书,而清人却迫切需要?“金元以来,南北曲行而词律亡。作是体者,不过考证旧词,知其句法平仄,参证同调之词,知某句可长可短,某字可平可仄而已。当时宫调已茫然不解。”^⑩清人对宋词既如此“依样画葫芦”,岂能在押韵上独依清代语音,那成何体统!故也必须亦步亦趋。自清初迄道光末年,约有十五六种词韵书问世,除个别外都是归纳或基本是归纳宋词用韵而成。这类词韵书虽然遭到毛奇龄、纪昀等极端派的反对,^⑪但还是盛行不衰。

清代词韵书大致可分三个时期。清代初期沈谦著《词韵略》,吴绮著《词韵简》,赵钥亦著词韵书。“沈氏词韵出,而四方翕然宗

之”^⑫，然有错误，仲恒据沈书而参以吴绮、赵钥二书，编成《词韵》二卷，刊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康熙年间刊行的还有曹亮武的《词韵》和李渔的《笠翁词韵》，李书分词韵为27部，显然受曲韵的影响，其余诸书皆分为19部，其中舒声14部，促声5部，仲书较通行。此为第一时期。乾隆三十年（1765年）吴烺、江昉、吴镗、程名世等人的《学宋斋词韵》出，迄嘉庆末，“填词家”“奉为圭臬，信之不疑”^⑬，该书舒声分11部，促声分4部，共15部。其后郑春波的《绿漪堂词韵》，还有叶申芑的《天籁轩词韵》（刊于道光十四年即1834年），也分15部。这一时期尚有吴应和《榕园词韵》（1784年刊），舒声分14部，入声分7部。许昂霄《词韵考略》（刊于嘉庆时），舒声分17部（实为19部），入声9部。《榕园词韵》虽得吴衡照《莲子居词话》（1818年）的颇高评价，但终不敌吴烺之书。此为第二时期。道光元年（1821年）戈载《词林正韵》刊行，力排李渔、吴烺、郑春波、许昂霄诸书，痛斥毛奇龄的否定词韵说，“毛氏论韵穿凿附会，本多自我作古，不料丧心病狂，败坏词学至于此极”。^⑭其实戈书是继承了仲恒《词韵》及《晚翠轩词韵》（附于嘉庆时的《白香词谱》后）的19部，而于“发凡”中未明言。他自称“是书所分19部，一以唐宋诸名家为据，无敢稍纵”，“是书入声所列5部，历观古人名词，无有出此范围者耳”。杜文澜《憩园词话》云：戈顺卿“以词学提倡江南北者三十年，所著《词林正韵》三卷，取李唐以来韵书，以校两宋词人所用，博考互证，辨析入微”，“永为词家取法”。况周颐《蕙风词话》：“《词林正韵》，则最为善本”，“倚声家圭臬奉之”。《詹安泰词学论稿》云：“戈书后出，为词韵之南董，近代名家，咸极重视，多所遵从。”^⑮当今的各种词学论著，以及涉及词学的文学史常识、古汉语知识之类的书，介绍词韵时，无不抄录戈氏19部。甚至有的汉语语音史专著以《词林正韵》作为论列宋代语音的依据，^⑯可见影响之

深远。戈书刊行后,某些词家不无微词,如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惟词韵初无一定,作者十数家,各持一义。宝士(笔者按,即戈载)之书,亦未必尽出诸家之上。”吴梅《词学通论》嫌戈书入声5部“未免过宽”,厘为8部,则加舒声14部,共为22部。^{①7}这些批评或未搔着痒处,甚或以讹订讹。戈书错误不少,不足为典要,入声分五部即属不当,舒声部分亦有纰缪,详后。

清代诸种词韵书,其间颇有分歧,入主出奴,喧争不休。可以说,除了李渔的《笠翁词韵》(例如其“家假驾”、“嗟姐借”之分为二,“鱼雨御”、“夫甫父”之分为二,“甘感紺”、“兼检剑”之分为二之类,显然是受元明曲韵的影响),其他诸书都是归纳的。既然都同是采取归纳法,何以却有数种结论?答案是,诸家对宋词并没有作过穷尽式的研究,这是症结之一。他们择取名家词,甚或是名家的名篇,必然是见仁见智,各执一辞。宋词用韵之复杂,令人目眩,而词韵书的编者对若干出现频率较高的通叶现象未能作出正确的分析,遂导致反复争辩,主要是15部词韵与19部之争。还有一重要原因,编著者是词学家或是词人,受诗韵和曲韵的影响很深,音韵学造诣却很浅,对方言也只有些朦胧而肤浅的认识而已,他们不能从语音历史的观点来研究宋词韵,故其书均有较多谬误。简言之,未能从音韵学的角度对全部宋词用韵作穷尽的归纳与合理的分析,清人之失在于此。

至此,我们的结论是,宋代无人编词韵书,宋词用韵并无功令可遵循。清人十几种词韵书虽然都声称是依据(或主要依据)宋词编成,但皆不能反映宋词用韵的真实面貌。

真正拟从音韵学的角度来研究词韵的是罗常培先生。他打算著《唐五代宋金元词韵谱》,^{①8}笔者亲闻邵荣芬、蒋希文两位先生云,罗先生生前只请人抄了资料,而未能着手进行研究即逝世,至

为可惜,这些原始资料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因此长期以来宋词韵的研究在汉语语音史上是空白。

笔者不揣谫陋,从事于此前后 20 余年(“文革”初、中期中断),对宋词韵作了穷尽式的研究,又下探至金元词韵,旁及部分宋金元诗韵和元曲韵。谨先将对宋词韵的了解撮述其要点于下。

二

现存宋词数量甚巨,其用韵确是纷繁复杂,但笔者分地区研究宋词用韵^⑨以后认为,虽然有的词人(特别是闽、赣、吴地区词人)或以方音入韵,或有若干特殊用韵现象,但据其大体,可分为 18 部:阴声 7 部,阳声 7 部,入声 4 部。

词的押韵要求是:平声字相押,上去声字相押,入声字相押。我们把平声字与上去声字统为一个韵部,这样做,既为了简化,也照顾了清代多数词韵书的传统,而且也有少数词调如《西江月》、《哨遍》、《殿前欢》等要求同部的平声字与上去声字通押。

下面列出宋词韵 18 部,每部下指出含《广韵》哪些韵,除去声祭泰夬废四韵外,一概举平以赅上去。每部一般举一例。

阴声韵

1. 歌戈部(《广韵》歌韵戈韵):张先《南歌子·蝉抱高高柳》—67叶“波柯和多酴歌”。(按,《》号内前为词牌名,圆点后为首句。外右下角汉字为《全宋词》册数,阿拉伯数字为页数,下同。)

2. 家车部(麻韵,佳韵之“佳涯崖”,蟹韵之“罢”,卦韵之“挂画”,夬韵之“话”,歌韵之“他”,戈韵之“靴”,梗韵之“打”等):柳永《二郎神·炎光谢》—29叶“谢洒挂驾泻雅价亚下夜”,蒋捷《女冠子》五3434叶“也画射挂夜要打借地帕砑话下”。

3. 皆来部(哈皆佳夬韵,又灰泰韵的多数字):欧阳修《南乡

子·好个人人》-154叶“腮猜鞋来钗挨怀”，秦观《南歌子·愁鬓香云坠》-468叶“裁开猜灰回来”（“灰回”是灰韵字）。

4. 支微部（支脂之微齐祭废韵，又灰韵及泰韵合口字的少部分）：晏几道《临江仙·身外闲愁空满》-222叶“稀诗时知归枝”，李纲《渔家傲·木落霜清秋色霁》-903叶“霁碎水会至外泪意蕊醉”（“碎”是队韵字，“外”是泰韵合口字）。按，戈载《词林正韵·发凡》云：“即以词论，灰哈本为二韵，灰可以入支微，哈可以入皆来。”在该书韵谱里，他把灰韵字及泰韵合口字均与支脂之微齐同部，唯“外”字两收，一注“五会切”，一注“五泰切”。事实上，《广韵》灰韵字及泰韵合口字在宋词韵中，入皆来部较多，入支微部较少，有若干字兼入2部。这表示正处在音变的过程中，至元代方完成，详后。

5. 鱼模部（模鱼虞韵，又侯尤韵的部分唇音字如“亩母浮否妇负阜”等）：苏轼《谒金门·今夜雨》-311叶“雨暑浦去醋否许语”，辛弃疾《鹊桥仙·松冈避暑》-1899叶“暑雨度处妇女语露”。

6. 尤侯部（侯尤幽韵）：晁补之《蓦山溪·兰台仙史》-566叶“否后旧叟袖口”，辛弃疾《感皇恩·七十古来稀》-1917叶“有久妇母袖后寿酒”。按，戈载《词林正韵·发凡》：“《中原音韵》诸书则以……尤韵之‘罌蜉’入鱼虞，此在中州音则然，止可施之于曲。词则无有用者，唯有借音之数字，宋人多习用之。”他举数例：“负”叶方布切，“否”叶方古切，“浮”叶房逋切，“亩”叶忙补切。该书韵谱于第四部（即本文的鱼模部）平声末“增补”“浮”字，上声末“增补”“缶否母某亩”字，去声末“增补”“妇负阜副富”字。戈载以这些《广韵》侯、尤韵的唇音字入第12部（即本文的尤侯部）为本音。如此措置，表明他不明白这也是一种语音演变现象，词学家言词韵易于致误，于此可见一斑。

7. 萧豪部（豪肴宵萧韵）：周邦彦《忆旧游·记愁横浅黛》-1599

叶“宵潇摇销迢铤招桥桃”。

阳声韵

8. 监廉部(覃谈咸衔盐严添凡韵):李之仪《天门谣·天堑休论险》-349叶“险占敛览滟滥檻点”。

9. 寒先部(寒桓刪山元仙先韵):朱敦儒《桃源忆故人·飘萧我是孤飞雁》-852叶“雁怨浅看院转遍见”。

10. 侵寻部(侵韵):姜夔《一萼红·古城阴》-2176叶“阴簪沈禽临心寻金深”。

11. 真文部(痕魂臻真諄欣文韵):史达祖《阮郎归·旧时明月旧时身》-2328叶“身新人春尘魂温痕”。

12. 庚青部(登蒸庚耕清青韵):黄升《南乡子·万籁寂无声》-2998叶“声更清明凝成情瓶”。

13. 江阳部(唐江阳韵):吴潜《水调歌头·宛水才停棹》-2728叶“江阳湘乡苍量茫王”。

14. 东钟部(东冬钟韵):吴文英《燕归梁·白玉搔头坠髻松》-2936叶“松重东空逢风中”。

人声韵

15. 铎觉部(铎觉药韵):贺铸《玉京秋·陇首霜晴》-519叶“落漠昨作泊觉乐薄约”。

16. 屋烛部(屋沃烛韵):张元干《念奴娇·江天雨霁》-1074叶“绿曲促玉醪木足鹜”。

17. 德质部(缉没栳质术迄物德职陌麦昔锡韵):姜夔《暗香·旧时月色》-2181叶“色笛摘笔席国寂积泣忆碧得”。

18. 月帖部(合盍洽狎叶业乏帖曷末黠谪薛月屑韵):张辑《醉蓬莱·记澄湖抱练》-2558叶“节列雪怯叠歌鸩月”。

戈载分人声为5部。本文的第17德质、18月帖两部,戈氏分

为3部:第17部质术栻陌麦昔锡职德缉,第18部物迄月没曷末黠鏹屑薛叶帖,第19部合盍业洽狎乏(戈氏用《集韵》韵目名称,现改用《广韵》名称)。吴应和《榕园词韵》析本文的德质、月帖2部的入声字为5部,吴梅主张区分为6部,都不合宋词用韵实际,即汉语中古音深、臻、曾、梗四摄(高元音为其主元音)的入声字混为1部,咸、山二摄(低元音为其主元音)的入声字混为1部,惜乎词学家不明此理。

以上18部是以两万首宋词为研究对象,据其大体归纳而得。我们也应承认宋词用韵确实歧异纷杂,颇令人目眩,然而如果只注视那些超乎常规的用例,是会走上词韵否定派的道路的,毛奇龄开其端,纪昀、焦循畅其说。杜文澜的话颇为简括,其《憩园词话》云:“宋词用韵有三病,一则通转太宽,二则杂用方音,三则率意借协。”戈载也屡言宋人误处,《词林正韵·发凡》评论吴棡、程名世等的《学宋斋词韵》时说:“其书以学宋为名,宜其是矣。乃所学者皆宋人误处,真淳臻文欣魂痕庚耕清青蒸登侵皆同用,元寒桓删山先仙覃谈盐沾严咸衔凡又皆并部,入声则物迄入质陌韵,合盍业洽狎乏入月屑韵。滥通取便,驻驳不堪。”(按,吴棡书的入声分部基本正确,但将没韵并入月帖部则不当。)

笔者对宋词韵中歧异纠杂的用韵现象作了详尽的研究。有些可根据古代典籍对宋代方音的记载及现代方言直指为当时词人确是根据方音押韵,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鲁直(即黄庭坚)在戎州,作乐府曰:‘老子平生,江南江北,爱听临风笛,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予在蜀见其稿。今俗本改‘笛’为‘曲’以协韵,非也。然亦疑‘笛’字太不入韵,及居蜀久,习其语音,乃知泸戎间谓‘笛’为‘独’。故鲁直得借用,亦因以戏之耳。”^②又如笔者十余年前研究辛弃疾词韵时,发现辛弃疾有一首俚俗词《南乡子》三1908,全词为

“好个主人家。不问因由便去喏。病得那人妆晃了，巴巴。系上裙儿稳也哪。别泪没些些。海誓山盟总是赊。今日新欢须记取，孩儿。更过十年也似他。”按照韵律，此阙叶“家喏巴哪些赊儿他”，“儿”是支微部字，何以与家车部叶？百思不得其解，但必须记录在案。^②过了10年，研究黄庭坚词时，发现一首《丑奴儿·济楚好得些》—409“济楚好得些。憔悴损，都是因它。那回得句闲言语，傍人尽道，你管又还鬼那人吵。得过口儿嘛。直勾得，风了自家。是即好意也毒害，你还甜杀人了，怎生申报孩儿。”也是俚俗词，也是家车韵，无独有偶，辛弃疾的“孩儿”就是黄庭坚的“孩儿”。原来辛弃疾政治失意，在江西闲居多年，用江西话写俚俗词。今南昌话“小孩子”叫“细伢子”，“伢”音 ŋa，^③所以北宋乡贤黄庭坚，南宋寓公辛弃疾皆以江西方音入韵。有些通叶现象在某些地区比较普遍，就令人怀疑是方言的问题，但在另一些地区则是个别现象，可能是个人特点，也可能因游宦偶或以他地音入韵。有些现象较长时期存在，就有可能是语音发生变化所致，但也未尝不可能是用韵风尚，沿袭前辈名公的传统使然。我们发现百首左右的《念奴娇》，有些注明“用坡仙韵”，有的干脆不注，这样的用韵只能记在苏轼一人的账上。还有个别现象，甚为特殊，何以如此，只得存疑，留待今后深入研究。下面论述时指出某些词人的时代或里贯。

兹述各部间的重要通叶现象于下，限于篇幅，多为举例性质。

阴声韵

1. 歌戈部与家车部通叶。这现象在辛弃疾词中比较突出：叶歌戈部18次，叶家车部8次，两部合叶达11次，如《玉蝴蝶·古道行人来去》三1921叶“花遮麻多鸦家沙些何呵佳”（下有黑点的为歌戈部字），《鹧鸪天·水荇参差动绿波》三1943叶“波蛙花多戈斜”。近人夏敬观《跋毛抄本稼轩词》云：“稼轩词往往以乡音叶韵，全集中不

胜枚举。《江神子》‘博山道中书王氏壁’词,前结‘不争多’句,以‘多’字入佳麻韵叶,此其例甚夥。”但在宋代其他山东词人中,歌戈与家车通叶有李清照一首《转调满庭芳·芳草池塘》二₉₂₆叶“纱_下渺_下涯_下茶_下车_下花_下那”,该词末句为“如今也,不成怀抱,得似旧时那”,此“那”乃语气词。“那”字,见于《广韵》平声歌韵诺何切,去声个韵奴个切,后者释曰“语助”;《集韵》收于戈、哿、个三韵;在《中原音韵》里除入歌戈平声阳、上、去声外,又人家麻去声。也许在李清照时,“那”可读家车,^②上举辛弃疾俚俗词《南乡子》的“哪”或许与之同为同一物。夏敬观指歌麻相叶为辛弃疾乡音,尚欠确证。辛弃疾曾在江西铅山闲居多年,是否受江西话的影响?查宋代江西籍词人180家约1300首词皆无此现象。

倒是四川籍词人有两例:苏轼《西江月·马趁香微路远》一₃₃₃叶“斜_下华_下挂_下波_下沙_下马”,魏了翁《眼儿媚·乃翁表里玉无瑕》四₂₃₉₀叶“瑕_下多_下他家_下窠”。又吴方言区词人张先《菩萨蛮·藕丝衫剪猩红窄》(前片三四句)一₇₇叶“波_下家”,史浩《满庭芳·微霰疏飘》二₁₂₆₃叶“纱_下花_下蓑_下涯_下沙_下家_下华_下车”。

唐韩愈、白居易、元稹,北宋河南人邵雍的诗皆有歌麻相叶的现象,^③那么苏、辛诸人歌与麻押可能是根据的汴洛音。但是北宋、南宋之交的洛阳人朱敦儒、陈与义、曾几的诗、词用韵却未出现歌麻通协例,^④苏、辛诸人或许是仿古。

2. 歌戈部与萧豪部相叶。福建词人用韵中出现此种现象达十次,如黄裳《蝶恋花·水鉴中看尤未老》一₃₇₇叶“老_下过_下个_下到_下坐_下倒_下早_下道”,郑域《念奴娇·蕊宫仙子》四₂₃₀₀叶“果_下口_下颗_下堕_下枣_下过_下破_下岛”。传为词坛佳话的是林外《洞仙歌·飞梁压水》三₁₇₆₇叶“晓_下草_下老_下帽_下我_下过_下锁_下扫”,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高宗绍兴十八年编)前集卷五十八录载此词,按语云:“近时吴江长桥垂虹亭屋山壁上草书一词,人亦以为

吕仙作,其果然邪?”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三:“林外”,“泉南人,词翰萧爽,诙譎不羈”,“尝为垂虹亭词”,“人传为吕翁作”,后传入禁中,“惟高庙识之,曰:‘是必闽人也,不然何得以锁字协扫字韵?’已而知其果外也”。宋杨湜《古今词话》则指为孝宗。宋人笔记如刘攽《贡父诗话》云:“五方语异,闽以高为歌。”陆游《老学庵笔记》:“四方之音有讹者,则一韵尽讹,如闽人讹高字,则谓高为歌,谓劳为罗。”歌豪相混,现代闽语仍然。

但南宋四川蒲江人魏了翁亦有一首:《卜算子·风雨满空霏》四2398叶“妙_△洧料笑”,“洧”《广韵》过韵字。《宋史》本传云:“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抚使。”此首是否与这一经历有关,录以存疑。

3. 歌戈部、萧豪部与鱼模部通叶或歌戈部与鱼模部通叶。葛长庚《贺新郎·倚剑西湖道》四2580叶“道草抱老破坐那个过暮么帽”(下有△号者为鱼模部字),陈合《宝鼎现·神鳌谁断》四2989叶“造左枣报补藻到锁做老过考早”;仅为歌戈叶鱼模例:曾慥《临江仙·子后寅前东向坐》二919叶“鼉摩多弩和萝”,黄裳《霜叶飞·谁能留得年华住》-375叶“住处数过暮去舞聚主语故字”(《全宋词》以“过”字非韵,然《词谱》卷三十五定为入韵,所列其他诸体在相当于“过”的位置上的字均入韵,故从之)。以上皆福建人。张继先(张天师,居江西)《喜迁莺·深源密坞》二758叶“所路素苦护悟顾古火果负破”。此种现象当亦与方音有关。

4. 尤侯部与萧豪部通叶。这在福建、江西词人是较普遍的现象,如柳永《红窗回·小园东》-55叶“柳了走有逗后”(下有黑点者为萧豪部字),张元干《鹊桥仙·靓妆艳态》二1100叶“笑调瘦峭草”。江西人黄庭坚、张继先、杨无咎各有三首词两部通叶,赵长卿则有

六首词两部相叶。如黄庭坚《洞仙歌·月中丹桂》—387叶“老草昼守棹斗”，文天祥《齐天乐·南楼月转》_{五3304}叶“早袅透晓绕老笑草斗柳小”。江西文士不仅词，诗中也有这种现象，^{②6}如黄庭坚《赣上食莲有感》诗叶“手枣”，文天祥《回京口》诗叶“留舟鞦艘”，按，“艘”在《广韵》、《集韵》兼入豪韵和萧韵，在《中原音韵》及明代的《韵略易通》、《韵略汇通》均入萧豪韵。《西儒耳目资》音 sāo、siāo、seū，《现代汉语词典》（北京，1978）音 sōu，高树藩《正中形音义综合大字典》（增订一版，台北正中书局，1974）音 sau。在现代南昌、临川、高安、福州、厦门方言中，萧豪与尤侯有些字有相同韵母。^{②7}

但四川人吴泳有两首尤萧合用：《谒金门·将进酒》_{四2508}叶“酒调峭透皱斗道又”，《鱼游春水·东里韶光早》_{四2509}叶“早了皱少草扫抱啸老渺”。汴人曾觌《钗头凤·华灯闹》（前片首三句）_{二1316}叶“闹照透”。吴兴人周密《水龙吟·燕翎谁寄愁笺》_{五3285}叶“草峭酒后骤袖透勾否”。

5. 支微部与鱼模部通叶。苏轼有两首，吴泳有一首，辛弃疾有一首。如苏轼《渔家傲·一曲阳关情几许》—287叶“许去住处雾雨絮路似度”（下有黑点者为支微部字），辛弃疾《祝英台近·绿杨堤》_{三1940}叶“渡去睡雨苦误处语句”。

支鱼通押在赣、闽、吴地区词人中比较普遍。姜夔有3首，刘辰翁有两首，如姜夔《长亭怨慢·渐吹尽》_{三2181}叶“絮户许树此暮数付主缕”（按，“此”是前片最末一字，必为韵字无疑）。闽人支鱼通叶达10余次，其中柳永即有3次，如《斗百花·煦色韶光明媚》—14叶“媚树絮绪户度处雨”。吴方言区词人张先（湖州人）有两首，^{②8}史浩（鄞县人）有7首，蒋捷（阳羨今宜兴人）有5首。如史浩《千秋岁·吾乡我里》_{二1283}叶“里比起戏字吕似侣醉纪”，蒋捷《贺新郎·甚矣君狂矣》_{五3446}叶“矣去鬼子里铸水处气此取语”。但吴方言区的其

他词人如周邦彦、范成大、陆游、仇远、王沂孙、张炎却不混。婺源（今婺源话属徽语区）人王炎支鱼相叶达 11 次之多，如其《柳梢青·葭管风微》三 1858 叶“微维池裾都”。如果把这些现象与现代方言联系起来的话，可知为词人用方音入韵的结果。

阳声韵

1. 监廉部与寒先部通叶。吴棫、程名世等的《学宋斋词韵》与其前的仲恒《词韵》、其后的戈载《词林正韵》的重大分歧之一正在于如何处理监廉部与寒先部的通叶问题。仲氏名之曰元阮韵、覃感韵，戈氏命名为第 7 部、第 14 部，吴、程则合为一：第 7 部。

监廉与寒先的合韵现象在北宋和南宋，在各地区的词人中都确实存在。但因人而异，如苏轼押监廉部 3 次，押寒先部 80 次，而混用者只 1 次，即《渔家傲·些小白须何用染》—320 叶“染点箭厌敢忝冉渐减”（下有黑点者为监廉部字），而其他四川词人李流谦、程垓、魏了翁、李从周、吴泳、家铉翁概不相混。在江西词人中，北宋的晏殊、晏几道父子以及欧阳修、黄庭坚相混的很少，南宋的赵师侠、姜夔混用的就较多，姜夔无独押监廉部例，押寒先部仅 1 次，可是混押达 4 次之多，如《眉妩·看垂杨连苑》三 2177 叶“眼燕款感暖限散翰缆点远见”。与姜夔同时的郭应祥，临江军（今江西清江）人，押监廉 3 次，寒先 23 次，却无 1 次混用。北宋南宋之交的洛阳人朱敦儒使用监廉部 1 次，寒先部 46 次，混叶 15 次，如《渔家傲·鉴水稽山尘不染》二 851 叶“染健漫扇劝散减转伴燕”。同时汴人曾觌无单用监廉例，用寒先韵 14 次，通叶只 1 次，即《减字木兰花·一声杜宇》一 1315 后片一二句叶“卷艳”。吴方言区词人周邦彦混用特多，达 10 次，其后的吴文英、周密、仇远、王沂孙也有不少通叶现象，但史浩、陆游却很少，蒋捷却无。鄞县人楼钥（1136—1213 年）的近体诗《送赵子固吏部帅合肥》之二叶“惭凡山衔帆”。^{②9}福建 44 家词人只

有 10 家使用监廉部,共 14 次;41 家使用寒先部,押韵 257 次;7 家混叶共 9 次。柳永、张元干各有两首混叶,但南宋末的陈德武词作甚多,却无一首互混。

监廉与寒先二部的混叶与否从空间与时间似乎都还不能找出其分布的规律。我们同意仲恒、戈载的分为两部的主张。何以在词里独押监廉部的很少?因为监廉部字少,而可作韵脚的字更少,须知词是文学作品,不是任何字都能进入词或充作韵字的,监廉部就成了险韵。词人们往往与寒先部通叶,二者的区别在于一有 m 尾,一具 n 尾,主元音相同或相近。从汉语语音史看来,宋时 m 尾韵仍旧独立存在,《中原音韵》里闭口三韵依然保存。从《南村辍耕录》卷十九“射字法”条可知,元代吴方言松江方音仍有 m 尾韵。^⑧现代方言中保存 m 尾的仍很多,如临川、高安、厦门(文读尤然),这些都是不利于吴焘、程名世并部的有力理由。

2. 侵寻部、真文部、庚青部 3 部,或两部混叶,或 3 部合用。这是仲恒、戈载与吴焘、程名世分歧的又一要点所在。吴、程合之为第 6 部。此三部之分在于其韵尾分别为 m、n、ŋ,而主元音相同。词人很喜欢用真文、庚青 2 部韵,因为二者是宽韵,侵寻部虽然不像监廉部那样“险”,但使用频率还是逊于真文,庚青。宋代福建词人 44 家使用情况如下:侵寻 35 次,真文 59 次,庚青 85 次;侵真互叶 2 次,侵庚互叶 3 次,真叶庚 45 次,三部通叶 7 次。即独用 179 次,占 76%;合用 57 次,占 24%。其他各区情况类似,举此以见一斑。河南人朱敦儒 3 部间互叶甚多,而曾觌仅侵寻叶真文 1 次,真文叶庚青 2 次而已。吴方言区词人 3 部混叶情况最严重的是周密,仇远、王沂孙,张炎也很多;但是周邦彦、陆游、吴文英却很少,史浩与蒋捷却不混。周邦彦词监廉与寒先通叶特甚,而侵寻与真文,真文与庚青的通叶只各一首。《减字木兰花》8 句,要求 4 换韵,两仄两平

递转,周邦彦的“风鬟雾鬓”阕二⁶²⁵前4句先押“鬓近”,后换“明成”,有意识地区分真文与庚青。鄱阳人姜夔监廉与寒先通叶多,此3部通叶亦多。看来3部间是否通叶,叶多叶少,因人而异。总之分为3部是对的。兹举通叶数例于下:朱敦儒《胜胜慢·红炉围锦》二⁸³⁹叶“云_△纷_△尊_△中_△人_△兴_△深_△平”(下有黑点者为侵寻部字,△号者为真文部字,余为庚青部字)。陈楠(广东博罗人)《望江南·形透日》四²³¹⁴叶“腾凝能清冰新”,李吕(福建光泽人)《临江仙·家在宋墙东畔住》三¹⁴⁸¹叶“音_△沉_△春_△针_△心_△匀”。宋诗亦有3部混用例,如楼钥近体诗《送赵清臣宰姚江》之五叶“寻胜琴”,古体诗《寄题高汝一少卿识山堂》叶“城_△宾_△真_△人_△新_△心”。^⑩

3. 江阳部与庚青部通叶。吴文英(四明,今宁波人)有6首词如此,兹举3例:《法曲献仙音·风拍波惊》四²⁸⁸⁸叶“上浪冷向响荡唱帐”(下有黑点者为庚青部字),《还京乐·宴兰渚》四²⁸⁸⁸叶“响哽影冷竟整暝醒镜”,《风入松·春风吴柳几番黄》四²⁹⁰⁶叶“黄窗香妆莺江量坊”。其宁波同乡多人特别是史浩,词作颇多,竟无一首江阳叶庚青例。其同乡楼钥的古体诗《朱季公寄诗有怀真率之集次韵》共有35个韵字,34字为江阳韵字,中夹一“卿”字。^⑪江阳与庚青相叶显然是吴音特点,今吴方言可证。

但是葛长庚《摸鱼儿·这身儿》四²⁵⁷³叶“障攘想俩广省壤两仰往强幌掌”也是江阳与庚青合叶。葛长庚,闽清人,家居琼州,后学道武夷山,但在宁宗嘉定(1208—1224)年间,曾被征召至京城临安,也许这是他在浙江时所作。

4. 真文部与寒先部通叶。这在福建、江西地区也较普遍,不过要作具体分析。元魂痕3韵合用是六朝时期汉语的一种现象,陆法言《切韵》把3韵排在一起,在唐诗韵中这3韵也常同用,而在宋词

韵中,元韵入寒先部,魂痕入真文部。但有若干例,它们仍相叶,如晏几道《两同心·楚乡春晚》—247叶“源尘门尊魂昏痕”(下有黑点的是《广韵》元韵字),刘克庄《沁园春·华发萧萧》四2596叶“门孙村魂闾樽言温蕃”。还有一种情况是,寒先部的字不只是《广韵》元韵字,真文部的字也不只是原魂痕韵字。如刘克庄《贺新郎·南国秋容晚》四2625叶“晚馆遍寸传见愿冕远算宴浅”(“寸”是恩韵字)。前者可以视作诗韵(平水韵)叶法在词里的影响,后者是其扩大。在辛弃疾词中真文与寒先相叶共五例,一例是典型的元魂痕合用,其他四例也都含有这三韵字,如《六州歌头·西湖万顷》三1908叶“门云轩吞嫫烟咽看军存勋坤韩边园”(“门吞存坤”是魂痕韵字)。夏敬观《跋毛抄本稼轩词》认为“殆亦其乡音如此”,此语颇可怀疑,除上述理由外,晁端礼、晁补之、李清照等山东人词里皆无此现象。

5. 寒先部、真文部与庚青部互叶。黄升(福建人)《鹧鸪天·天气清和仅两句》四2999叶“旬辰明贤_△龄人_△”(下有黑点者为寒先部,有△号者为庚青部)。吴泳(四川人)《贺新郎·一片湖光净》四2512叶“净镜韵鬓近进隼_△尽定印姓景_{△△}”。关于吴泳,拙文《宋代苏轼等四川词人用韵考》曾指出他的合韵现象十分突出。查《宋史》本传,他是潼川人,长期在京城临安做官,也曾“知宁国府”,“知温州”,“知泉州”,从其词里,知其足迹所至有“宣城”、“温州”、“洪都”。这也许是他用韵复杂的原因。

6. 寒先部与庚青部相叶。邓肃(福建沙县人)《菩萨蛮·廉纤细雨连天远》(前片一二句)二1107叶“远冷_△”(下有△号者为庚青部字),赵长卿(江西南丰人)《鹧鸪天·门外寒江泊小船》三1802叶“船前生灯眠边_△”,赵文(庐陵人)《莺啼序·初荷一番濯雨》五3326叶“卷远遍宴片婉扇见浅转恋脸箭染肯晚_△”(“脸染”是监廉部字,此处合韵)。

7. 江阳部与监廉部,江阳部与寒先部合叶。刘学箕(福建崇安人)《渔家傲·汉水悠悠还漾漾》四2439叶“漾浪桨放上项盞唱纛傍”(下有黑点者是监廉部字)。惠洪(筠州,今江西高安人)《西江月·入骨风流国色》二713叶“香妆暗塘茫帐”。欧阳修《渔家傲·近日门前溪水涨》一151叶“涨访帐向帐菖上浪障往”。江阳与寒先叶例:吴泳《鹊桥仙·二童一马》四2507叶“伴望样半”(“伴半”是寒先部字)。

8. 江阳部与真文部通叶。刘子寰(福建建阳人)《沁园春·长寿真人》四2707叶“寰春乡章翔方樯堂厖”(“春”是真文部字)。

9. 江阳部与东钟部通叶。辛弃疾有三例,如《声声慢·停云霭霭》三1912叶“漾江窗从风容同翁”(下有黑点者为江阳韵字),《醉翁操·长松》三1939叶“松风公从中同江枫东重容封童翁龙忡逢钟”。《康熙字典》卷二二“醉翁操”调注云:“辛词以东冬江三韵同用,犹遵古韵。”辛弃疾以“掉书袋”著称,在用韵上偶或沿用“古韵”,不无可能。其他山东人无此现象。刘学箕《水调歌头·三载役京口》四2437叶“江窗降撞硿双龙”,蒲寿晟(泉州人)《欸乃词·白头翁》五3303叶“翁翁粮郎”(但“粮郎”在《广韵》是阳韵、唐韵字)。今厦门话东阳相混。

人声韵

1. 铎觉部与屋烛部分用清楚,柳永、周邦彦、吴文英皆然。二部间相叶乃是少数现象,如赵长卿《瑞鹤仙·海棠花半落》三1784叶“落扑阁幕著恶昨索却约著削”(“扑”是屋烛部字),兹不赘言。

2. 铎觉部与德质部通叶。如姜夔《凄凉犯·绿杨巷陌》三2183叶“陌索角恶薄漠乐落著约”(“陌”是德质部字)。

3. 屋烛部与德质部通叶。如姜夔《疏影·苔枝缀玉》三2182叶“玉宿竹北独绿屋曲幅”(下有黑点者为德质部字)。周密《楚宫春·香迎晓白》五3267叶“白谷足国绿北曲屋宿玉”,刘克庄《满江红·赤

日黄埃》四2613叶“麓独竹北屋烛束玉读”。这种现象在吴、赣方言区词人作品中较多出现。毛奇龄《西河词话》：“若‘北’之音‘卜’，则不特从来韵书无是读押，即从来字书，亦并无是转切。此吴越间乡音误呼，而竟以入韵。”

4. 铎觉部与月帖部合叶。如欧阳光祖（福建崇安人）《瑞鹤仙·得毛韩经学》三2061叶“学业甲鹗塔洽愜壑匝浹颊乏”（“学鹗壑”是铎觉部字）。

5. 屋烛部与月帖部合叶。如黄人杰（江西南城人）《满江红·解语宫商》全宋词补辑62叶“曲馥宿玉淑绿说睦足”（“说”是月帖部字）。

6. 德质部与月帖部通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其数量远较前几项为多。如朱敦儒《念奴娇·见梅惊笑》一835叶“白客隔雪蝶月歌折”（下有黑点者为德质部字），赵鼎（山西闻喜人）《花心动·江月初升》二945叶“叶结雪册灭越阔色石”，陆游《满江红·疏蕊幽香》三1581叶“绝叠说月发侧阙色折”。

7. 三部或四部入声混叶。如苏轼《满江红·江汉西来》一280叶“碧色客说读惜瑟忽鹤”（下有黑点的是铎觉部字，有△号的是屋烛部字，°号的是月帖部字），姜夔《淡黄柳·空城晓角》三2181叶“角陌侧绿识寂食宅色碧”。

宋词人声韵颇为复杂，笔者在分地区研讨的诸文中都曾缕述，兹不再赘。^③

宋词押韵中有阴声韵与入声韵相叶的现象，万树《词律》、戈载《词林正韵》、王国维《人间词话》、夏承焘《词韵约例》^④等都讨论到这个问题，戈载较为详细。《词林正韵·发凡》云：“曲韵不可为词韵也，惟入声作三声，词家亦多承用。”举晏几道、晁补之等九例。其词谱于阴声七部都有“入声作平声”、“入声作上声”、“入声作去声”三

项,收列大量入声字,其归类同于《中原音韵》等曲韵书。如此处置,是《词林正韵》的大病之一,这是受曲韵书的影响太深,奇怪的是词学家们对此很少有微词,大概是由于他们未作深入而全面的研究,故人云亦云。笔者对现存宋词两万首作了穷尽式的搜辑,得阴入通叶约 70 例,涉及的入声字仅 116 字,使用 194 次。而且戈氏所举 9 例中有 4 例可疑。词韵具阴入通叶现象的有北宋词人,也有南宋词人;有北人,也有南人,详见拙文《宋词阴入通叶现象的考察》^⑤。兹举两例如下:晁补之(北宋山东人)《西平乐·凤诏传来绛阙》—569 叶“辅卜去绪驻睹举部诉住主”,(下有黑点的为入声字),赵长卿(南宋江西新淦人)《醉蓬莱·正金风零露》三2085叶“气瑞极外世比被醉”。

限于篇幅,还有些特殊押韵现象不再赘言,以上所列二十几项也是举例性质,容他日以专书缕述,以就正于语言学界和词学界。

总之,宋词用韵有其有规律的一面,又有因方音、仿古、取便等原因造成的若干纷繁复杂的通叶现象,这两方面我们都要充分认识到。经穷尽的研究后,“知其分而后知其合,知其合而后愈知其分”,宋词用韵有规律可求的一面是主要的,因此毛奇龄、纪昀、焦循的宋词用韵了无定纪、不足推求的观点不能成立。但是清代编词韵书的词学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及主观认识和所取方法的错误,诸书分部皆有不当。我们从汉语语音史的角度对宋词用韵进行了穷尽式的研究,分为 18 部,虽然有些词人的某些作品并不全合,但大多数词人的大多数作品是符合我们所归纳、分析出的 18 部的。其所以如此,并非因为当时有一本大家遵循、人人翻检的词韵书,而是因为多数词人都是以当时的通语为准绳,例如闽音歌豪无别,林外据以押韵,但大多数福建人并不仿效;吴文英以庚青叶江阳,但其同乡史浩却依通语截然分用。北宋时期,经济发达,文化繁

荣,汴洛的中州之音当即通语的基础,南宋虽偏安江左,并不以吴语为通语。词人按照通语押韵,相从成风,相沿成习,于是造成了宋词用韵 18 部的模式。

两宋词韵的 18 部模式,并不因南宋亡(1279 年)而止,那些由宋入元的南方词人如周密(吴兴人,生于宋理宗绍定五年即 1232 年,卒于元成宗大德二年即 1298 年),蒋捷(阳羨今宜兴人,宋度宗咸淳十年即 1274 年进士),王沂孙(会稽人,元至元间任庆元路学正),仇远(钱塘人,生于宋理宗淳祐七年即 1247 年,卒于元泰定三年即 1326 年),张炎(临安人,生于宋理宗淳祐八年即 1248 年,约卒于元仁宗延祐七年即 1320 年^⑤),他们词的用韵仍然遵守十八部的传统。

在此我们也要指出,两宋长达三百余年,其词韵必有时代差异,如早期的欧阳修,王安石入声皆为七部:铎觉、屋烛、德昔、合叶、缉立、曷月、没迄,同于五代词人,而中后期则不然。但与金元词韵作比较,宋词韵的区分 18 部的总体模式肯定是能成立的。

三

言词者必宗宋,然宋以后仍有词,词韵在宋以后如何发展这一颇有意义的课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⑥笔者研究宋词用韵后,认为有必要下探至金元词。其实金与南宋对峙,1234 年蒙古灭金,继而与南宋对峙。1279 年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1368 年元顺帝北遁。金元时期词的成就逊于两宋,但数量仍很可观,唐圭璋先生编《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 年),辑录金代词人 70 家,3572 首,元代词人 212 家,3721 首,而有若干由宋入元的词人如仇远、张炎等人的作品如果计算入内,当更多。以上都是我们研究金元词韵的根据。

在金元两代,最杰出的词人当推元好问,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卒于蒙古宪宗七年(1257年),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市)人,从幼年至老死,足迹遍北中国,而居于中州时间颇久。“为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独步几三十年”,^⑧在诗、文、词诸方面都有卓越成就,隋树森《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辑得元好问散曲九支,套数一套(残)。元人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评其词“清雄顿挫,闲婉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元人虞集以元好问与辛弃疾并称:“辛幼安自北而南,元裕之在金末国初,虽词多慷慨,而音节则为中州之正,学者取之。”(《中原音韵序》)所以我们把作为中州正音的元好问词看作金元词的代表,重点研究其词韵。现以彊村丛书本《遗山乐府》217首为依据,此系朱孝臧据明弘治高丽刊三卷本校定,^⑨唐圭璋《全金元词》第71至108页收录。

元好问词的用韵比起两宋词韵来有如下特点:

1. 宋词韵的支微部,元好问词分为两部:支思部(所含相当于《中原音韵》的支思韵,但除去派入的入声字,此点下同)和机微部(所含为《中原音韵》的齐微韵,除去《广韵》灰韵和泰韵合口字,因这些字在元好问词韵中均入皆来部)。元好问词押支思部韵六次,押机微部韵12次,此疆彼界,了不相涉,兹各举一例:《江城子·旗亭谁唱渭城诗》_{金85叶}“诗卮思枝姿儿丝辞脂时”(按,《 》号右下角“金”代指《全金元词》上册即金词部分,“元”代指下册即元词部分),《水龙吟·百年同是行人》_{金78叶}“地遂戏意坠味睡醉”。

2. 宋词韵的萧豪部,元好问词分为豪高部(《广韵》豪韵)、萧遥部(《广韵》宵萧二韵)。前者押韵8次,如《水龙吟·接云千丈层崖》_{金78叶}“好倒橐道抱草灶老”;后者押用5次,如《洞仙歌·青钱白璧》_{金82叶}“绕少钓调照笑”;二者合用1次:《品令·西斋向

晓》金99叶“晓悄照鸟老恼少了”。

3. 宋词韵的监廉部,元好问词分为两部:监咸部(所含相当于《中原音韵》的监咸韵),押用1次,《临江仙·试上古城城上望》金92叶“涵谈参三酣衫”;廉纤部(相当于《中原音韵》的廉纤韵),押用3次,如《临江仙·世故迫人无好况》金89叶“沾蟾严帘添髯”。

4. 宋词韵的寒先部在元好问词韵里应分为寒桓与先天2部。前者(相当于《中原音韵》的寒山与桓欢2部)共用韵20次,另有两次是寒桓部中属人监廉部字,各举一例:《水调歌头·相思一尊酒》金74叶“欢安寒宽冠还难看”,《鹊桥仙·梨花春暮》金93叶“挽眼玳减”,“减”为监咸部字,这是寒桓与监咸合韵。元好问词的先天部(所含相当《中原音韵》的先天韵)使用22次,如《太常引·衣冠人物渺翩翩》金102叶“翩仙泉天言年传”。

5. 宋词韵中,侵寻、真文、庚青3部常相混叶,而在元好问词中此三部分用划然,毫不杂厕。侵寻部押用6次,如《八声甘州·许君祠》金83叶“深阴侵心镗金襟临”;真文部出现10次,如《南柯子·粉淡梨花瘦》金100叶“颦春人云尘真”;庚青部叶用16次,如《三奠子·上高城置酒》金86叶“陵名灵争平生耕情”。

对于宋词用韵来说,元好问词的用韵不循传统,有破除藩篱的“改革”精神。不仅如此,他的近体诗用韵,也充分表现了这种革新精神。现存元好问近体诗1050首。只有两首押仄声韵:《梁父吟扇头》叶“坐和”,《唐子达扇头》叶“玉屋”。余皆押平声韵,系联结果可得19部。现存元好问散曲甚少(其中的《人月圆》二首,《全金元词》因词里亦有此曲牌,故亦收录),使用了6韵。现将元好问的词韵、近体诗韵、曲韵列比较表于下页。

元好问近体诗押支思部韵30次,押机微部韵43次,互不相涉,应分为两部,与词韵同。^④近体诗韵豪高与萧遥分用,也与词一

致。监咸与廉纤二部之分亦然。但在近体诗中,《广韵》的元韵独用,当立元言部;而在词里,押先天部韵的 22 次中只有 4 次夹有“言

元好问词韵、近体诗韵、曲韵比较表

	阴 声 韵												阳 声 韵								入 声 韵			
词 韵	歌 戈部	家 车部	皆 来部 (含灰韵)	机 微部 (偶叶)	支 思部	鱼 模部 (偶叶机微)	尤 侯部	豪 高部 (偶叶)	萧 遥部	廉 纤部	监 咸部 (偶叶)	寒 桓部 (偶叶)	先 天部	侵 寻部	真 文部	庚 青部	江 阳部	东 钟部	铎 觉部	屋 烛部	德 质部	合 叶	月 帖部	
近 体 诗 韵	歌 戈部	家 车部	皆 来部 (含灰韵)	机 微部	支 思部	鱼 模部	尤 侯部	豪 高部	萧 遥部	廉 纤部	监 咸部	寒 桓部	元 言部	先 天部	侵 寻部	真 文部	庚 青部	江 阳部	东 钟部	屋 烛部				
曲 韵	歌 戈韵		皆 来韵 (不含灰)				尤 侯韵						先 天韵		真 文韵			东 钟韵						

注:“偶叶”指二部互叶很少,“合叶”指互叶较多。栏中空白者表示无此部(韵)。

远”等元韵字,此乃二者之异。如果把元好问近体诗用韵的部类与当时通行的官韵(传世的元刊本金王文郁《新刊韵略》可证)相比,我们会对元好问在叶韵问题上冲决罗网的精神既惊且敬。这既由于他对“音韵乖叶,尤切致恳”^①,更重要的是他以当时的中州之音为依据,因而其词用韵也就必然与两宋词韵的 18 部模式有相当大的差别。

但我们也应指出元好问的词韵与近体诗韵尚受习惯叶韵法的影响,即家车部未能像《中原音韵》那样,分为家麻与车遮二部。如果按家麻与车遮来衡量,词里前者使用 4 次,二者混用 13 次;在近体诗里前者使用 27 次,二者混用 13 次,故均不应分开。进一步的革新还有待于后来者。

白朴,祖籍隰州(今山西曲沃)。父白华,金代显宦,著名文士,是元好问的好友。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 年)白朴生于汴京,1232

年蒙古军侵金,1233年幼年的白朴为元好问携离汴京北渡,居聊城、济南、冠氏。蒙古太宗九年(1237年)白朴由元好问送归其父,此后居真定(今河北正定),故为真定人。“遗山每过之,必问为学次第,尝赠之诗曰:‘元白通家旧,诸郎独汝贤。’”^{④2}1280年白朴移居建康,1306年81岁游扬州,^{④3}卒年不详。白朴是元曲四大家之一,也是词人,自言“平生留意于长短句,散失之余,仅二百余篇”^{④4},编为《天籁集》,现仅存104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朴词清隽婉逸,意惬韵谐,可与张炎玉田词相匹。”我们研究白朴词韵据唐圭璋《全金元词》下册所录现存《天籁集》中的词,参校以王文才《白朴戏曲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附编《天籁集编年》。

白朴深得元好问的教诲,在词韵方面,他是元好问革新精神的继承者。白朴词韵的特点如下:

1. 宋词韵的家车部,白朴分为家麻部(所含相当于《中原音韵》的家麻韵)和车遮部(相当于车遮韵)。前者使用七次,如《沁园春·流水高山》元635叶“牙蔑涯家沙榭茶花佳”;后者使用一次,《沁园春·千载寻盟》元635叶“车靴遮賒蛇嗟些奢耶斜”,如此长篇用韵,却无一例外。

2. 皆来部、灰颓部、机微部、支思部四者分立。皆来部(所含相等于《中原音韵》的皆来韵)共押三次,如《木兰花慢·渺高情公子》元639叶“哉苔开埃阶台怀斋来”。在白朴词韵中,《广韵》的灰韵字不入皆来部,此与元好问有异;也不像《中原音韵》及白朴曲韵那样入齐微韵,而是独叶,故应立为一部,名之曰灰颓部,押用两次,如《风人松·使君高宴》元635叶“梅雷魁枚杯回墨颓”。白朴的机微部(相当于《中原音韵》的齐微韵但除去灰韵字),使用五次,如《踏莎行·冻结南云》元647叶“吹坠瑞地翠醉”。支思部出现两次,如《清平乐·箜篌朱字》(上阕)元646叶“姿时枝”。

3.《广韵》宵萧二韵使用两次,而与豪肴合用达五次之多,因此应合为一部即萧豪部,如《烛影摇红·三叠枯桐》元636叶“少了悄渺表晓老草好岛”。元好问词韵和近体诗韵皆分为二部,实为洪细之分,可能是他用韵偏严的表现,白朴并不仿从,但元代的姚燧、张翥、宋褰却与元好问同,详后。

4. 监咸部押用两次,不杂廉纤部字及寒桓部字,如《水调歌头·疏云暗雾树》元627叶“潭龕县探岚南谈骖”。现存白朴词未见使用廉纤部韵者。

5. 在白朴词韵里,《广韵》桓韵字押用两次,如《水龙吟·绶云萧史台空》元629叶“伴馆箴换畔贯断半”,而寒山删韵使用两次,但有3次是上述二者的合叶,如《沁园春·自古贤能》元634叶“闲残间山冠烦欢还看”,“冠欢”为桓韵字,“烦”为元韵合口唇音字(在《中原音韵》入寒山韵)。因此只应有一寒桓部,此与元好问同。白朴先天部韵使用11次,无元韵独用例。

6. 白朴词韵侵寻部、真文部、庚青部分别使用1、7、4次,无通叶现象。

7. 入声韵中未见叶铎觉部者。叶屋烛部两次:《石州慢·千古神州》元642叶“谷鹿哭屋独玉束绿菊”,《满江红·云鬓犀枕》元632叶“物独曲续促绿卜玉复”,其中“物”本为德质部字,此首似为屋烛与德质合叶,但此词题为“庚戌春别燕城”,王文才《白朴年谱》系此词于1250年白朴25岁时,游燕京留别燕妓之作,^④“物”与其他诸字叶韵,当是依据北音,《中原音韵》“物”收于鱼模韵“入声作去声”下,其他诸入声字也派入鱼模韵。

8. 入声月帖部与德质部分用,但是《满江红·云外孤亭》元632叶“客别血歇结杰雪说”,“客”本为德质部字,其他为月帖部字,此首似为二部合用,但是在《中原音韵》里,“客”有二音,其一在车遮

韵“入声作上声”项下(按,另一入皆来),其他七字皆派在车遮韵。

若以《中原音韵》来衡量,上述两阙《满江红》各自独叶一韵,通合无窒。白朴是元曲大家,周德清所尊崇的前辈名公,明王骥德《曲律·论韵》论及周德清,“其所谓韵,不过杂采元前贤词曲,掇拾成编”。今人陆志韦先生大畅其说,认为《中原音韵》是归纳诸大家北曲韵脚而成 19 韵。^{④6}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④7}但是白朴的曲韵确与以中原之音为准绳的《中原音韵》基本一致,而白朴词韵又与其曲韵颇相吻合,足证白朴词韵也是植根于当时的中原之音的,因而进一步发扬了其师元好问词韵的革新精神。

白朴现存《梧桐雨》、《墙头马上》、《东墙记》三杂剧全本及《流红叶》、《箭射双雕》两剧的残折,共得 235 支曲子,另有套数四套,含 23 支曲子,小令 37 首,计 295 支曲。现将归纳所得的白朴曲韵^{④8}与白朴词韵比较于下,末附《中原音韵》19 韵,以资参照。

白朴词韵、曲韵比较表

	阴 声 韵										阳 声 韵										入 声 韵			
词 韵	歌戈部	家麻部	车遮部	皆来部	灰颊部	机微部	支思部	鱼模部	尤侯部	萧豪部	监咸部			寒桓部	先天部	侵寻部	真文部	庚青部	江阳部	东钟部		屋烛部	德质部	月帖部
曲 韵	歌戈韵	家麻韵	车遮韵	皆来韵	齐微韵		支思韵	鱼模韵	尤侯韵	萧豪韵		廉纤韵	寒山韵		先天韵	侵寻韵	真文韵	庚青韵	江阳韵	东钟韵	与阴声 字互叶			
《中原音韵》	歌戈韵	家麻韵	车遮韵	皆来韵	齐微韵		支思韵	鱼模韵	尤侯韵	萧豪韵	监咸韵	廉纤韵	寒山韵	桓欢韵	先天韵	侵寻韵	真文韵	庚青韵	江阳韵	东钟韵	派入阴声			

注:白朴曲韵的若干互叶现象不列。栏内空白者表示无此部(韵)。

元代词人中,继白朴后有张可久,庆元(今鄞县)人,元顺帝至

正初,年70余,至正八年(1348年)犹在世,则是当生于1270年前,长期在江南为吏,是著名的散曲作家,也写词,《全金元词》录其词66首。张可久的词韵堪为白朴之后的金元词韵的代表之一,其特点为:

1. 家麻部独用,如《鹧鸪天·一点芳春近破瓜》元933叶“瓜瓞花鸦华家”。

2. 支思部、齐微部、皆来部分用划然。支思部使用6次,如《绿头鸭·别来时》元928叶“时思施姿脂祠枝差诗之丝儿”。齐微部使用7次,如《太常引·溶溶一叶不成衣》元931叶“衣晖迟怡眉飞知”,“迟知”二字在《中原音韵》属齐微韵。与元好问、白朴不同的是,张可久词韵里,《广韵》灰韵字既不入皆来,也不独用,而是入齐微部,《青玉案·柳眠花困春如醉》元935叶“醉悴被起翠睡讳臂碎泪”,其中“碎”为对韵字。所以张可久词韵,应立齐微部。张词皆来部不杂灰韵字:《太常引·霖铃秋雨打空阶》元931叶“阶斋莱来苔怀开”。

3. 萧豪部使用3次,均洪细不分。如《凤栖梧·塔拥平山银瓮小》元934叶“小道沼爪老草杪少”。

4. 廉纤部独用:《百字令·舣舟一笑》元930叶“占滟崦厌掩酴点渐”。未见押监咸者。

5. 寒山部、桓欢部、先天部分开,各举一例:《木兰花慢·看红梅未了》元930叶“兰鬟竿滩间攀干寒山斑玕闲”,《人月圆·西风吹得闲云去》元926叶“盘团宽鸾”,《风入松·哀筝一抹十三弦》元932叶“絃烟连莲天边钱年”。虽然桓欢部使用只1次,但押寒山的词中却绝不杂叶桓欢一字,故桓欢独立为部。

6. 侵寻、真文、庚青三部毫不杂厕,长篇如《六州歌头·灵鹫何物》元928叶“阴深寻临襟森簪沉斟心音林”,纯为侵寻字。

7. 入声押屋烛部一次,月帖部3次。另有一首《霜角·淡烟微

隔》元927叶“隔翻索拍白客宅”。需加解释的是“索”字，该句为“千古澄江秀句，空感慨，有谁索”，按《广韵》“索”有三音：铎韵苏各切，“尽也，散也，又绳索”；陌韵山戟切，“求也”；麦韵山责切，“求也，取也，好也”（《集韵》麦韵色责切未收“索”）。张可久此词之“索”，义与陌、麦韵音相合，则非德质与铎觉通叶，实为纯叶德质。如依曲韵观察此词更属顺畅，“隔拍白宅”在《中原音韵》里皆派入皆来韵，“索客”有二音，其一亦皆在皆来，《中原音韵》未收“翻”，但收“鞞”，二字于《集韵》皆为麦韵下革切，因此“翻”也应为皆来韵字。于此亦可见曲家填词，其词韵受曲韵影响之深。

张可久之后有张翥（1287—1368年），晋宁（今常州）人，清王士禛谓为元末大家，“以一身历元之盛衰”，“其词乃婉丽风流”，^④有《蜕岩词》传世，共134首。他是南入，但长期在大都及河南为官。其词韵也颇有特点：皆来与齐微、支思分用，但皆来部杂有《广韵》灰韵字，如《水龙吟·水宫仙子归来》元1007叶“背佩碎在外态采再”（按，“外”为泰韵合口字，《中原音韵》入皆来韵）。萧遥与豪高分用，家车不分，则同于元好问。其他监咸与廉纤，寒桓与先天，侵寻与真文、庚青的分部均同于元好问与白朴。

元好问、白朴、张可久、张翥时代依次相接，词韵小有差异，但正好反映了金元词韵的逐步发展，元好问家麻、车遮不分，而白朴、张可久分之。《广韵》灰韵字，元好问入皆来，白朴独用，二张入齐微。元好问、张翥严于用韵，洪细之别遂使萧豪分部，而白朴、张可久异趋。元好问还有若干两部偶叶现象：皆来与机微，机微与鱼模，监咸与寒桓，白朴、张可久则无此现象。至于监咸与廉纤之分，寒桓与先天之别，侵寻、真文、庚青三部概不相杂，则元、白、张可久皆然。只是张可久桓欢独用，此其异于他人者。张翥亦有些通叶现象。

元好问以大胆的革新精神，基本破除了宋词的18部模式，根

据实际语音用韵,白朴、张可久、张翥继承之,建立了金元词韵的用韵模式,其特点是,除了入声独叶(白朴、张可久在此问题上亦受曲韵影响)外,几与曲韵一致,这更加证明了他们的词韵是植根于金元时代的中原之音的。

金元时代的其他词人的用韵较之宋词用韵也有相当的变化,但也有因袭传统叶韵法的一面。限于篇幅,不再缕述,兹取 9 位词人的用韵列表于下,以见一斑。此表未列元好问、白朴、张可久、张翥,故须与第四节的两宋金元 11 家词韵比较表对照阅看。

金元 9 家词韵比较表(一)

蔡松年 (1107—1159) 真定(今正定)人	歌 戈	家 车	皆 来 (含灰韵)	支 微 (含灰韵)	鱼 模	尤 侯	萧 豪
李俊明 (1176—1260?) 泽州(今晋城)人	歌 戈	家 麻	皆 来 (灰)	支 微	鱼 模	尤 侯	萧 豪
刘秉忠 (1216—1274) 邢州(今邢台)人	歌 戈	家 麻	皆 来 偶叶	机 微 偶叶	支 思	鱼 模	尤 侯 萧 豪
卢 挚 (1235—1300) 涿郡(今涿州)人	歌 戈	家 麻		机 微	支 思	鱼 模	尤 侯 萧 豪
姚 燧 (1239—1314) 洛阳人	歌 戈	家 麻	皆 来 (灰) 偶叶	机 微 偶叶	鱼 模 偶叶	尤 侯	豪 高 偶叶 萧 遥
刘敏中 (1243—1318) 章丘人	歌 戈	家 麻 偶叶	皆 来 (灰)	支 微 (灰)	鱼 模	尤 侯	萧 豪

蒋 捷 (1274年进士,入元不仕) 阳羨(今宜兴)人	歌 戈	家 车		支 微 (灰)	合叶 鱼 模	尤 侯	萧 豪
虞 集 (1272—1348) 崇仁人	歌 戈	家 车	皆 来 (灰)	支 微	鱼 模		萧 豪
宋 聚 (1292—1344) 宛平(今丰台)人		家 麻	皆 来	支 微	鱼 模	尤 侯	豪 高 萧 遥

注:① “灰”代指《广韵》灰韵字及泰韵合口字。

② “偶叶”表示两部间互叶次数少,“合叶”表示次数多。

③ 栏内空白者表示无此部字独用。

金元9家词韵比较表(二)

蔡松年	监 廉	偶叶	寒 先	侵 寻	真 文	偶叶	庚 青	江 阳	东 钟	附:《广韵》 元魂痕同用一次
李俊明	监 廉	寒 桓	偶叶 先 天		真 文	偶叶				
刘秉忠		寒 桓	偶叶 先 天	侵 寻	真 文		庚 青	江 阳	东 钟	
卢 挚			寒 先		真 文		庚 青		东 钟	
姚 燧		寒 桓	先 天	侵 寻	真 文		庚 青	江 阳	东 钟	

刘敏中	监咸		寒先		真文	庚青	江阳	东钟	
蒋捷			寒先		真文	庚青	江阳	东钟	
虞集	监咸		寒桓	先天		庚青	江阳	东钟	
宋 瑩			寒桓	先天	真文	庚青	江阳	东钟	附:《广韵》 元魂痕同用一次

金元 9 家词韵比较表(三)

蔡松年	铎觉	屋烛	德质	合叶	月帖	
李俊明	铎觉 (质、月帖、 偶叶德)		德质	偶叶	月帖	
刘秉忠	铎觉	屋烛	德质	偶叶	月帖	
卢 挚			德质		月帖	
姚 燧	铎觉	屋烛		偶叶	月帖	

刘敏中	铎 觉	屋 烛	……偶叶…… 德 质	……偶叶…… 月 帖	阴声韵、入声韵 偶叶
蒋捷	铎 觉	屋 烛	德 质	月 帖	
虞集	铎 觉		德 质	月 帖	
宋褰		屋 烛	……偶叶……	月 帖	

从此表可见(请与元、白及二张对照)金元词人的用韵显得参差不齐,寒桓、先天,支思、机微,豪高、萧遥或分或合,但是侵寻、真文、庚青三部之分则几乎是诸家所同。我们将蒋捷列于此中,理由:一是由宋入元者应与由金入元者一视同仁,而不论其在元出仕与否,二是蒋捷的真文、庚青截然区别与其他人相同,也许与元之习尚有关(当然也可能是个人用韵特点)。值得注意的还有宋褰,他是宛平人,即今北京市丰台人,与周德清同时,他的《蝶恋花·门外红尘溪上竹》元1055叶“竹玉俗肉忽躅足续”,其中七字为屋烛部字,“忽”,按词韵当为德质部字,然据《中原音韵》则亦派入鱼模韵。金元人亦有仿古之处。蔡松年、宋褰均有元魂痕相叶例。王恽(1228--1307)竟有《木兰花慢·怅居庸北口》元666、《鹧鸪引·簪绂潇然自谢林》元680以“林心深”等侵寻字叶“南”字,乃是仿《诗经》音的结果。^{⑤⑥}。

尽管金元词人用韵有参差和复杂的现象,但其主流应以元好问、白朴、张可久、张翥为代表。

四

我们认为,将两宋词韵与金元词韵加以比较,最好列表显示。兹选择 11 家:自柳永起,北宋 3 家,北宋、南宋之交 1 家,南宋 3 家,金元 4 家,迄于张翥,其卒年值元亡之时。他们知名度高,时代依次相接,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各具特色,生前身后均有较大影响,籍贯亦遍布全国,因此具有代表性。

两宋金元 11 家词韵比较表(一)

柳 永 (978? —1053?) 崇安人	歌 戈	家 车	皆 (灰多) 来	支 (灰少) 微	偶叶	鱼 模	尤 侯	萧 豪
苏 轼 (1036—1101) 眉山人	歌 戈	偶叶 家 车	皆 (灰多) 来	支 (灰少) 微	偶叶	鱼 模	尤 侯	萧 豪
周邦彦 (1056—1121) 钱塘人	歌 戈	家 车	皆 (灰) 来	支 (灰) 微		鱼 模	尤 侯	萧 豪
朱敦儒 (1081—1159) 洛阳人	歌 戈	家 车	皆 (灰少) 来	支 (灰多) 微		鱼 模	尤 侯	萧 豪
辛弃疾 (1140—1207) 历城人	歌 戈	合叶 家 车	皆 (灰多) 来	支 (灰少) 微	偶叶	鱼 模	尤 侯	萧 豪
姜 夔 (1155? —1220?) 鄞阳人		家 车	皆 (灰多) 来	支 (灰少) 微	偶叶	鱼 模	尤 侯	萧 豪

吴文英 (1200—1260?) 四明(今宁波)人		家 车		支 (灰少) 微	偶叶	鱼 模	尤 侯	萧 豪			
元好问 (1190—1257) 秀容(今忻州)人	歌 戈	家 车	皆 (灰) 来	偶叶	机 微	支 思	鱼 (偶叶机微) 模	尤 侯	豪 高	偶叶	萧 遥
白 朴 (1226—1306?) 真定(今正定)人	歌 戈	家 麻	车 遮	皆 来	灰 颓	机 微	支 思	鱼 模	尤 侯	萧 豪	
张可久 (1270? —1348?) 庆元(今宁波)人		家 麻		皆 来	齐 (灰) 微	支 思	鱼 模	尤 侯	萧 豪		
张 翥 (1287—1368) 晋宁(今常州)人	歌 戈	家 车	皆 (灰) 来	齐 (灰) 微	偶叶	支 思	鱼 模	尤 侯	豪 高	偶叶	萧 遥

注：柳永生卒年据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载《词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两宋金元 11 家词韵比较表(二)

柳永	监 廉	偶叶	寒 先	侵 寻	真 文	庚 青	江 阳	东 钟
苏轼	监 廉	偶叶	寒 先	侵 寻	偶叶 真 文	偶叶 庚 青	江 阳	东 钟
周邦彦	监 廉	合叶	寒 先	侵 寻	偶叶 真 文	偶叶 庚 青	江 阳	东 钟

朱敦儒	监廉	合叶	寒先	三部间彼此互叶甚多				江阳	东钟
辛弃疾	监廉	合叶	寒先 (叶真文)	三部间彼此有互叶				江阳	偶叶 东钟
姜夔	监廉	合叶	寒先	三部间互叶多				江阳	东钟
吴文英	监廉	合叶	寒先	三部间互叶少				合叶 江阳	东钟
元好问	廉纤	监咸 偶叶	寒桓	先天	侵寻	真文	庚青	江阳	东钟
白朴		监咸	寒桓	先天	侵寻	真文	庚青	江阳	东钟
张可久	廉纤		寒山	桓欢	先天	侵寻	真文	庚青	江阳 东钟
张翥	廉纤 (桓、先天) (偶叶寒)	监咸	寒桓	偶叶 先天	侵寻	真文	偶叶 庚青	江阳	东钟

两宋金元 11 家词韵比较表(三)

柳 永	铎觉	屋烛	德质	月帖	
-----	----	----	----	----	--

苏轼	铎 (质、月帖) 偶叶德 觉	屋 烛	德 质	合叶	月 帖	四部入声 有混叶
周邦彦	铎 觉	屋 烛	德 质		月 帖	
朱敦儒	铎 觉	屋 烛	德 质	合叶	月 帖	阴声韵、入 声韵偶叶
辛弃疾	铎 (质、月帖) 偶叶德 觉	偶叶 屋 烛	偶叶 德 质	合叶	月 帖	阴声韵、入 声韵偶叶
姜夔	铎 (德质) 偶叶 觉	屋 烛	偶叶 德 质		月 帖	
吴文英	铎 (德质) 偶叶 觉	屋 烛	偶叶 德 质	合叶	月 帖	
元好问	铎 觉	屋 烛	德 质	合叶	月 帖	
白朴		屋 烛	德 质		月 帖	
张可久		屋 烛	德 质		月 帖	
张翥	铎 觉	屋 烛	德 质	偶叶	月 帖	

从上表可见,两宋词韵与金元词韵有很大差别。吴文英与元好问是同时代人,各处于分裂的中国的两端,而其词用韵大异,吴文英除以江阳通叶庚青显示其吴音特点外,余与其他宋代词人相同。元好问则有较大革新,白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发扬光大,张可久、张翥在某些方面又继续完善之。较之宋词用韵的模式,元、白、张建立了一套新的模式,亦即自己时代的用韵模式。元好问、张翥是有突出成就的诗人,白朴是《中原音韵》的作者极为尊崇的元曲四大家之一,张可久将朱权《太和正音谱》誉为“诚词林之宗匠也”。他们的词的用韵除了人声独叶这一点外,与《中原音韵》所代表的曲韵相当密合。这说明元代的词韵与曲韵都是植根于当时的“中原之音”的。

元好问与吴文英同时而不同地,白朴与蔡松年,张可久与吴文英,姚燹与朱敦儒同地而不同时,他们之间的词韵各自有较大差异,何以致此?可归结为空间与时间两大因素,简言之,至金元时代,北方汉语有较大变化,这促使词人,特别是“通权达变”的词人用韵也随之变化。较之友人李俊明(泽州人)和段克己、段成己兄弟(河东人),元好问是走在时代前列的词人,时人称他对“音韵乖叶,尤切致恳”,并非虚言。

金人占领北中国后,其前期的北方籍词人如蔡松年(真定人)、赵可(高平人)、王寂(玉田人)、党怀英(泰安人)、王庭筠(盖州人)、王特起(崞县人),以及那些山东全真道士,他们的词韵尚未有太多的特点,至元好问崛起,词韵始以较新的面目展现于世,我们揣测在13世纪初年北方汉语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元好问的词韵(及其近体诗韵)是反映这种变化的较早的可靠证据,其晚年诸大曲家竞起,白朴以其词韵(及曲韵)进一步反映了这一变化。^⑤他们的作品的用韵给汉语语音史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献。至14世纪终以周德

清的《中原音韵》而集大成。

总之,本文对宋词韵的有律可循的一面和它的纷繁复杂的通叶现象作了较详尽的描述,并以宋词韵与金元词韵作比较,旨在对自北宋柳永起至元末张翥止的300多年的词韵史作历时的研究,揭示词韵随语音之变而变的客观规律。

最后,我们要引录一段白朴的话,因为颇能发人深省。白朴《满庭芳·雅燕飞觞》小序:“屡欲作茶词,未暇也。近选宋名公乐府,黄、贺、陈三集中,凡载《满庭芳》四首,大概相类,互有得失,复杂用元寒删先韵,而语意若不伦。仆不揣狂斐,合三家奇句,试为一首。”^⑥案,此序中“贺”指贺铸,当为秦观之误,贺集中无茶词,且白朴词首数句即袭用秦词亦可证。既然白朴不满的是“杂用元寒删先韵”,那我们就看看三家四词的具体韵字:

黄庭坚《满庭芳·北苑春风》-386叶“关删烟先边先斑删
贤先山山源元前先”

黄庭坚《满庭芳·北苑龙团》-401叶“关删烟先凡凡斑删
翻元山山边先前先”

秦观《满庭芳·雅燕飞觞》-464叶“贤先团桓泉仙圆仙鬟删
莲先阑寒轩元连仙”

陈师道《满庭芳·闽岭先春》-586叶“间山团桓边先潺山阑寒
鬟删寒寒澜寒斑删”

确是“寒桓删山”与“元仙先”杂用,而且带上了凡韵字。我们再考察白朴词的韵字:

白朴《满庭芳·雅燕飞觞》元642叶“欢桓团桓翻元斑删鬟删
寒寒山山鞍寒残寒”

果然与北宋三家不同,全是寒桓删山,加一元韵唇音字“翻”。

究其实,白朴押的是金元时代的寒桓部韵,而黄、秦、陈三家押

的是宋代的寒先部韵,宋之寒先部至金元裂为寒桓、先天二部(见前表)。白朴站在自己时代的语音立场上,故对黄、秦、陈三家的寒桓与先天混叶啧有微辞,反其道而行之。

在我们看来,白兰谷的用韵,“此亦是也”;黄秦陈的用韵,“彼亦是也”。焦循所云“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语音何独不然?

黄秦陈的词韵与白兰谷的词韵何以皆是?“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故也。

黄秦陈的词韵与白兰谷的词韵何以歧异?“字有更革,音有转移”故也。

【附注】

①吴梅《词学通论》,第15页,商务印书馆,1932年。

②夏承焘、吴熊和《读词常识》,第68页,中华书局,1962年。

③《词学》第一辑,第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

④鲁国尧《〈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中国语言学报》第3期,第108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

⑤《四库全书总目》之《〈古文尚书冤词〉提要》。

⑥同上书《〈西河文集〉提要》。

⑦同上书《〈古今词话〉提要》云:“是编所述,上起于唐,下迄康熙中年,杂引旧文,参以近人之论,亦间附己说。……征引颇为寒俭,又多不着出典,所引近人之说,尤多标榜,不为定论。”

⑧同上书《〈词韵〉提要》:“考填词莫盛于宋”,“绝无撰韵之事”。

⑨唐圭璋《词学论丛》,第6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⑩《四库全书总目》之《〈填词名解〉提要》。

⑪毛奇龄《西河词话》反对其友沈谦之《词韵略》:“况词盛于宋,盛时不作,则毋论今不必作。万一作之,而与古未同,则揣度之胸,多所兀臬。从之者不安,而刺之者有间,亦何必然?”《四库全书总目》之《〈西河词话〉提要》云:“其论沈去矜《词韵》一条,尤为精核。”《〈词韵〉提要》批评沈谦“强作解事”,仲恒“沿讹踵谬,糅辑弥增”,并云“大抵作词之韵,愈

- 考愈歧”，“必欲强立章程，不至于非马非驴不止”。
- ⑫仲恒《词韵·论略》。
- ⑬⑭戈载《词林正韵·发凡》。
- ⑮《詹安泰词学论稿》，第2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
- ⑯史存直《汉语语音史纲要》第56、57、112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 ⑰吴梅《词学通论》，第20—22页。
- ⑱罗常培《我是如何走上研究语言学之路的》，见《罗常培纪念论文集》，第433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
- ⑲已刊者有《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第104—118页；《宋代苏轼等四川词人用韵考》，《语言学论丛》第8辑，第85—117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待发表者尚有数篇。
- ⑳据中华书局1979年版，校勘记曰：“‘谓笛为独’，‘独’何校、津逮本作‘曲’。”
- ㉑《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第109页。
- ㉒俞敏先生在拙稿上批曰：“两湖某些地方亦如此”。“从《管子》‘吾子’变来”。
- ㉓俞敏先生在拙稿上批曰：“语气词的读音常较保守，也许在李易安时，歌戈已向o流变，‘那’仍读o，可叶家麻。”
- ㉔荀春荣《韩愈的诗歌用韵》，《语言学论丛》第9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鲍明炜《白居易、元稹诗的韵系》，南京大学《语文集刊》第一辑，1982年。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年。
- ㉕吴臻《陈与义诗词用韵研究》（稿本），1986年。程朝晖《宋代洛阳诗人曾几诗韵考》（稿本），1986年。
- ㉖见程朝晖《欧阳修诗词用韵研究》，《中国语文》1986年第4期，第305页。罗德真《王安石诗词用韵研究》（《南京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指出王诗《和吴冲卿鸦鸣树石屏》以“手”与“巧”叶，《幽谷引》将“漱”与“笑”共押。
- ㉗见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罗常培《临川音系》，科学出版社，1958年；《厦门音系》，科学出版社，1956年；颜森《高安（老屋周家）方言的语音系统》，《方言》1981年第2期。
- ㉘清宋翔凤《乐府余论》：“张子野《庆春泽》‘飞阁危桥相倚，人独立，东风’

满衣轻絮’，以‘絮’字叶“倚”，用方音也。后姜尧章《齐天乐》，以‘此’字叶‘絮’字，亦此例。”前人往往举例而已。

②③④夏文蓉《楼钥诗韵研究》(稿本)，1987年。

⑤鲁国尧《〈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中国语言学报》第3期，第116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

⑥见笔者之分地区研究宋词韵诸文，笔者因德质部与月帖部合用颇多，曾主张合为1部，名为“德业部”，后接受师友建议，析为2部。

⑦见夏承焘《唐宋词论从》，中华书局，1962年。

⑧鲁国尧《宋词阴入通叶现象的考察》，《音韵学研究》第2辑，第140—147页，中华书局，1986年。

⑨张炎卒年据吴则虞校辑《山中白云词》的“序言”，中华书局，1983年。

⑩仅有李爱平《金元山东词人用韵考》，《语言研究》1985年第2期。

⑪元人郝经《陵川集·遗山先生墓铭》。

⑫关于吴重熹石莲庵刊《遗山新乐府》，《全金元词》“引用书目”云：“颇多混入他人之作，且多错误。”据笔者《元遗山诗词用韵考》(《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这部分词的用韵现象与元好问的诗韵及彊村丛书本的词韵颇相径庭，故不取为研究对象。

⑬拙作《元遗山诗词用韵考》论及元氏近体诗韵时，未能将支思与机微分开，兹特更正。

⑭元人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遗山先生口海》。

⑮⑯元王博文《白兰谷〈天籁集〉序》。

⑰此依王文才《白朴年谱》说，《白朴戏曲集校注》，第3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⑱《白朴戏曲集校注》第326页。

⑲陆志韦《释中原音韵》，《燕京学报》第31期，1946年。

⑳㉑见拙作《白朴曲韵与〈中原音韵〉》。

㉒《四库全书总目》之《〈蜕岩词〉提要》。

㉓《广韵》、《集韵》“南”只入覃韵，宋高宗手书《草书礼部韵》、《五音集韵》(1212年)、王文郁《新刊韵略》(1229年)、张天锡《草书韵会》(1231年)、《蒙古字韵》亦然。唯毛晃父子的《增韵》(1162年)于侵韵内“增入”“南”字，此系据沈重《毛诗音》。在《诗经》里，“南”入侵部，与“林心音琴”等叶韵。熊忠《古今韵会举要》(1297年)步《增韵》后，亦兼收入

“金字母韵”。可见姚燧二词如此押韵是仿古的表现。

⑤俞敏先生于拙稿上批曰：“元人用当时音可能与演戏有关。‘俗人’不能为文人之浅斟低唱也。”

⑥据《全金元词》及《白朴戏曲集校注》，歧异处择善而从。

【参考文献】

唐圭璋：《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第一版，1980年第二次印刷。《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词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

孔凡礼：《全宋词补辑》，中华书局，1981年。

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

王文才：《白朴戏曲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隋树森：《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

吴梅：《词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2年。

宛敏灏：《词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沈祥源：《唐五代词用韵考》，《研究生论文选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

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年。

鲁国尧：《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宋代苏轼等四川词人用韵考》，《语言学论丛》第8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宋代福建词人用韵考》，《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89年。《宋元江西词人用韵研究》，《近代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年。《宋词阴人通叶现象的考察》，《音韵学研究》第2辑，中华书局，1986年。《校辑本〈山中白云词〉之讹误》，《古籍整理与研究》1987年第1期，上海古籍出版社。《元遗山诗词用韵考》，《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白朴的词韵和曲韵及其同异》，《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

《白朴曲韵与〈中原音韵〉》，《中原音韵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从曲律、曲韵查核诸家对白朴曲点校的失误》，《中华国学》创刊号，1988年3月，香港。《〈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中国语言学报》第3期，商务印书馆，1988年。

程朝晖:《欧阳修诗词用韵研究》,《中国语文》1986年第4期。《宋代洛阳诗人曾几诗韵考》(稿本),1986年。

罗德真:《王安石诗词用韵研究》,《南京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

林 亦:《黄庭坚诗词用韵研究》(稿本)。

吴 臻:《陈与义诗词用韵研究》(稿本),1986年。

夏文蓉:《楼钥诗韵研究》(稿本),1987年。

王韞佳:《刘过诗词用韵研究》(稿本),1988年。

刘青松:《王恽诗词用韵研究》(稿本),1988年。

何生荣:《姚燹诗词用韵研究》(稿本),1986年。

李爱平:《金元山东词人用韵考》,《语言研究》,1985年第2期。

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第2版,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

罗常培:《临川音系》,科学出版社,1958年。《厦门音系》,科学出版社,1956年。

颜 森:《高安(老屋周家)的语音系统》,《方言》1981年第2期。

纪 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本文发表于《中国语言学报》第四期,(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我自研究生时期起即研究宋词韵,“文革”后陆续发表了若干论文,这篇文章是我多年工作的总结。其他论文概不收入这本自选集,因为我想从头重做,完成一部宋词韵的专著。

元遗山诗词曲韵考

一、引言

元好问,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卒于蒙古宪宗七年(1257年),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市)人,字裕之,因曾在遗山(在今山西定襄县城东北18里)读过书,自号遗山山人。他是金、元两代最杰出的诗人、词人,生前身后都有巨大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元人徐世隆云:“大较,遗山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乐府则清雄顿挫,闲婉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遗山先生文集序》)清人施国祁曰:“遗山先生诗文大家,杰出金季,为一代后劲,上接杜韩,中揖欧苏,下开虞宋。”元好问是位雄视一代承先启后的大作家,他的诗词曲用韵具有代表性、典型性。

他的经历具有特殊性。元好问是山西人,5岁至14岁随继父(亲叔)元格在山东掖县度过童年。此后又随元格至山西陵川县任上,得从著名学者郝天挺学习6年。19岁至21岁时,元格调官陇城(今甘肃秦安县东北),亦随往,因参加秋试,在长安(今西安)住过七八个月。元格死后,回家乡。因蒙古军南侵山西,元好问从27岁(1216年)起便离开故土,直至44岁(1233年)蒙古军攻取汴京(今开封),一直转徙于今河南宜阳、登封、叶县,又在今河南镇平、

内乡、南阳、开封任官。金亡后居今山东聊城、冠县。50岁时(1239年)回到故乡,专力著述,但不断外出,数至燕京(今北京),“周流乎齐鲁燕赵晋魏之间,凡三十年”。(上引徐世隆文)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山西人,就假定他的诗词曲用韵以山西乡音为根据。他出身于文士门第,有高度的文化,其生平足迹遍于整个北中国,而居于中州的时间又颇长。其诗律切精深,其后辈王恽记述1254年春元好问对他的海导一事,“而于体要工拙,音韵乖叶,尤切致恳。”(《秋涧集·遗山先生口海》)无怪乎元末虞集云:“辛幼安自北而南,元裕之在金末国初,虽词多慷慨,而音节则为中州之正,学者取之。”(《中原音韵序》)所以元遗山的诗词曲用韵应该能反映金元中州话或北方话的语音现象,治汉语语音史的学人应予以重视。

元遗山的晚年及身后正是北曲的鼎盛时期,关汉卿稍晚于他,白朴在幼年时曾得到元好问的抚养。汉语语音史的杰作《中原音韵》就是周德清所作的北曲韵书,元好问的诗词曲用韵是在《中原音韵》前的反映北方话语音的一项颇有价值的史料。音韵学界一直注重唐诗用韵,近30年来对口语性较强的韵文如敦煌变文、曲子词、宋词、诸宫调、元曲的用韵也比较注意,论文亦伙,但对宋诗则关心不够,以为不能反映实际语音,更无论金元诗了。周祖谟先生1942年著《宋代汴洛语音考》,①首次将宋代汴洛文士的用韵作了系统的归纳与分析。我们认为有必要探索更多的宋诗甚至金元诗的用韵,开拓新的领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研究汉语语音的发展,因此将遗山诗词作为研究宋金元诗词用韵的一次尝试。

唐宋金元科举基本上以诗赋取士,近体诗用韵须要遵守功令。例如,据刘钧杰同志的统计,杜甫近体诗用韵:韵脚字99.8%符合官韵(系指按功令可以“同用”的,基本上如后来的“平水韵”),不符合官韵的占0.2%。②而正式的106韵的“平水韵”的确立是在金

代,钱大昕于黄丕烈处得见元刊本金王文郁《新刊韵略》(卷首有许古正大六年即1229年序)后,首倡此说。^③王国维又见金张天锡《草书韵会》,前有赵秉文序,署正大八年(1231年),二书分韵同为106韵,遂认为二书皆祖金人功令。^④元好问与王文郁、张天锡同时,兴定五年(1221年)进士及第,三年后应宏词科,权国史院编修官,科场得意,岂能不深谙功令?因此可以以遗山近体诗的用韵与106韵的官韵比较,观察其异同。这也是我们研究元遗山诗词用韵的目的之一。

据郝经《陵川集·遗山先生墓铭》,元好问有诗约5800首,而现存仅1362首,笔者研究元遗山诗依据清人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⑤其例言云,遗山友人张德辉“类次,又将古今体分编”,则是其中何者为古体诗,何者为近体诗是元人张德辉所定。个别错字则以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明弘治本《遗山先生文集》改正。研究遗山词则据唐圭璋先生编《全金元词》^⑥中的遗山词,可分为两类:甲类,第108页以前的218首,绝大部分源自彊村丛书本《遗山乐府》三卷本;乙类,158首,系据吴重熹石莲庵刊《遗山新乐府》五卷本,参校他本,剔除混入之作若干首而得。^⑦诗集卷一有古赋四篇,亦

	首(篇)数	韵段数
古体诗	312	488
词	376	426
近体诗	1050	1050
古赋	4	5
曲	11	11
总计	1753	1980

附入研究。隋树森《全元散曲》辑得元好问散曲九支，套数一套（残）。《西江月》一首、《人月圆》二首重见于词甲类和词乙类。《人月圆》二首又为《全元散曲》所收。

有些诗、词不换韵，但有些换韵，甚至达 9 次之多，因此一首诗词可能不止一个韵段。兹将现存元遗山诗、词及古赋的数目与韵段数统计于表中（见上页）。

二、古体诗和词的韵系

我们将元遗山的古体诗和词的用韵并合叙述。

以《广韵》206 韵为基准，元遗山的古体诗和词均有数韵同用，系联归纳应为一个韵部的现象。各部内诸韵的独用与合用数字，兹不赘录，仅举《广韵》庚耕清青蒸登六韵在元遗山古体诗和词中的押韵情况的统计数字为例：

广韵韵目	庚	庚 耕 清	庚 清 青	庚 耕 清 青	清 青	青	登	登 蒸	登 耕 清	蒸 庚 清	蒸 庚 清 青	蒸 庚 耕 清 青	蒸 青
古体诗			6	11	1	1	1	1			1	1	1
词	1	1	6	10	2	3	3			1	1	2	1

可见无论古体诗或词，青、登、蒸都不能各自成为一部，而必须与“庚耕清”合为一部，命名为庚青部。《寄赵宜之》_{五246}叶“棱陵饬譬仍朋腾僧登鹰”，^⑧显然是有意仅押登韵和蒸韵字，但还是夹入了清韵的“饬”。其他诸部立部的根据和过程类此。

元遗山古体诗和词的用韵共分 18 部：阴声 7 部，阳声 7 部，入声 4 部。先列阴声和阳声韵的部目表如下：

韵部	古 体 诗				词 (举平以赅上去)
	平声	上 去 声			
		上声	去声	上声·去声	
东钟	东冬钟			董 肿 · 送 宋 用	东冬钟
江阳	江阳唐	养	漾	荡 养 · 宕 漾	江阳唐
支微	支 脂 之 微 齐	纸 旨 止 尾 荠	至 志 未 霁 祭		支 脂 之 微 齐 祭 废
鱼模	鱼虞模	语 虞 姥 · 姥 * 厚	御遇暮	语 虞 姥 · 御遇暮	鱼虞模 * 有
皆来	佳皆灰哈		卦 怪 队 代 泰 夬	海 · 怪 代 队 泰	佳皆灰哈 泰 夬
真文	真 淳 臻 文 欣 魂 痕 * 元	混 很 * 阮	震 稔	轸 隐 · 震 稔 问	真 淳 文 欣 魂 痕
寒先	元 寒 桓 删 山 先 仙	阮 旱 潜 产 猕 铤	愿 翰 换 霰 线	阮 产 铤 · 愿	元 寒 桓 删 山 先 仙
萧豪	豪肴宵萧	皓 巧 小 篠			豪肴宵萧
歌戈	歌戈		个过	哥 果 · 个 过	歌戈
家车	麻 * 佳	马	禡 * 卦		麻 * 佳 * 歌 * 卦 * 夬
庚青	庚 耕 清 青 蒸 登	梗 耿 静 迥 拯	映 净 劲 径 证	梗 · 耿 静 迥 映 劲 证	庚 耕 清 青 蒸 登
尤侯	尤侯幽	有厚		有 厚 · 有 候	尤侯幽
侵寻	侵				侵
监廉	覃 谈 衔 盐 添 凡				覃 谈 衔 盐 添

左上角有 * 号者见下论述。

古体诗 488 个韵段,四声分押情况如下:

平	上	去	上·去	入
290	72	23	24	79
(59.43%)	(14.75%)	(4.71%)	(4.92%)	(16.19%)

119

(24.38%)

仄声 198

(40.57%)

若干问题讨论如下:

1. 元遗山古体诗家车部除含《广韵》麻韵外,尚有佳韵之“佳涯”,卦韵之“画”。词之家车部,则有佳韵“涯”,卦韵“画”,夬韵“话”,歌韵“他”。

2. 《广韵》元韵的归属问题。古体诗中真淳欣文四韵常同用(偶有臻韵加入),魂韵独用 2 次,魂与真、文、真文、淳分别同用各 1 次,魂痕文同用 1 次,因此定六韵共居一部。但是魂痕又与元韵牵混 4 次;而元韵系字与寒先部韵字同用达 12 次,元韵无独用例。在词里,“元”不独用,与真文部诸韵亦不叶,而与寒先部相叶 15 次。因此元韵应归寒先部,而古体诗中魂或魂痕、混很(不夹“真淳臻文欣”)之与元、阮互叶当是受了传统诗韵习惯的影响,我们在表中真文部内“元”、“阮”二字上加上特别标志。

3. 在诗里,厚韵与语麌姥韵同用 1 次:《曲阜纪行》之七叶“谱亩鲁所武侮举庀鹵古”,“亩”为厚韵字。在词里,有韵与鱼模部上去

声互叶 1 次:《摸鱼儿·笑青山》⁷⁵叶“举雨否怒苦土渡屨处树主去路”,^⑨“否”为有韵字。《广韵》侯、尤韵系的其他唇音字则与尤侯部相押:元遗山古体诗中有“矛不谋复仆浮”,词里有“眸侔浮”,如《赠答刘御史云卿》之三—⁸⁷叶“尤留仇羞矛柔由酬疣流不周俦优投欧”^⑩,《南乡子·迟日惠风柔》¹²³叶“柔稠眸浮侔头流侯”。《广韵》的侯、尤韵系唇音字在宋代词人用韵中押入鱼模的较元遗山的诗词为多。

4. 古体诗中,侵寻、真文、庚青界限清楚;监廉、寒先亦不相杂厕。元遗山词韵的一个重大特点是,侵寻、真文、庚青共使用 58 次,鼎足三分,概不相混。而宋代词人如欧阳修、晏几道、黄庭坚、朱敦儒、辛弃疾、姜夔、刘辰翁等人皆有不少合用之例,^⑪遗山则与之异趋。词中监廉部与寒先部有少量相混:监廉部独用 4 次,全在 108 页前,即全在甲类;寒先部独用 66 次;此外尚有 6 次主体押寒先部而杂入一监廉部字,如《烛影摇红·红叶翻阶》¹³²叶“暖宴远转软院脸伴劝见”,“脸”是监廉部字。(按,此相混的 6 首词内有 4 首出于乙类,即吴重熹《遗山新乐府》五卷本。)

5. 下列部有分组倾向:寒先部内二组的分用与合用次数如下:

A 寒桓刪山 元(合口三等唇音字)		B 先仙元	C 二者合用
古体诗	16	31	8
词 {	甲类	22	0
	乙类	9	12

在诗里,元韵合口三等唇音字如“蕃返晚”不出现于 A 和 B 组中,仅出现在 C 组内。如《曲阜纪行》之十二¹⁴⁶叶“间蕃年贤鏤传篇

言焉然”。而在词里，则出现于 A 组，如《朝中措·帘旌烘日》¹²⁴叶“翻寒斑山间”；也出现于 C 组，如《点绛唇·连夜春寒》¹²³叶“暖断短管晚远满”。不论诗与词，C 组是 A 组与 B 组的相混，纵无元韵合口三等唇音字，也是相混的。

监廉部内二组分用与合用次数如下：

	A 覃谈衔凡	B 盐严添	C 二者合用
古体诗	2	2	0
词 {	甲类	2	0
	乙类	0	0

凡韵只一“凡”字：《历下亭怀古》¹²⁰叶“谈三函潭嵌龛岚酣南凡芟探覃参”。

萧豪部也有分组倾向：

	A 豪 肴	B 宵 萧	C 二者合用
古体诗	8	4	3
词 {	甲类	5	1
	乙类	4	8

此三部的分组倾向都是广韵音系一、二等韵（加上合口三等的唇音字）和三、四等韵之别。而遗山词的乙类（即辑自《遗山新乐府》五卷本者）混用颇甚，我们揣测可能有些词并非元遗山词，而为吴重熹误采收入。

支微部的情况：

	A 支脂之(开口 精庄章日组)	B 支脂之(非开口 精庄章日组)微齐	C 二者合用
古体诗	9	33	13
词	甲类	12	0
	乙类	14	5

词甲类当可分为两部:支思与机微(后者不含灰韵系字,故不谓之齐微)。

6.《广韵》灰韵系字及泰韵合口字在元遗山古体诗和词用韵中的情况:这批字在古体诗里全部押入皆来部,与哈佳皆同叶。在词里情况基本如是,但有例外:《千秋岁·玳筵晨启》¹²⁴叶“启绘遼脆喜至戏醉贵岁”,“绘”是《广韵》泰韵合口字,其他均为支微部字。而在宋代词入用韵中,这批字很多押入支微;在《中原音韵》中多数收入齐微韵。

7. 词里皆来部与机微部字相混 2 次:《江城子·春风花柳》⁸⁴叶“催梅开醺堆台崖苔杯来”,其中“醺”是《广韵》支韵字,应为机微部字。《愿成双·绣帘高卷》¹³⁴叶“细开脰气比飞岁水”,其中的“开”,应为皆来部字。古体诗中无此现象。

8. 词里支微与鱼模相押 1 次:《玉楼春·烟炉不断》¹²⁸下片以“絮”与“岁”叶。

元遗山古体诗与词的入声韵可分为四部:

1. 铎觉部——《广韵》的铎药觉韵字。古体诗使用 3 次,词使用 5 次。

2. 屋烛部——《广韵》的屋沃烛韵字。古体诗使用 10 次,内有 1 次《过晋阳故城书事》^{四201}叶“秃没鏃”,“秃鏃”是屋韵字,但“没”

为没韵字，非屋烛部。词使用 4 次。

3. 德质部——《广韵》的缉没质术物德职陌麦昔锡韵字。古体诗使用 42 次，词使用 10 次。如《满江红·元鼎诗仙》⁸⁰叶“迹昔壁锡日质及缉夕昔戟陌敌锡笔质忆职”，这说明广韵音系的 p、t、k 三种入声尾已混，很可能变成喉塞音尾。

4. 月帖部——《广韵》的叶帖曷末黠薛月屑韵字。古体诗使用 11 次，词使用 2 次。如《下黄榆岭》²⁶⁷叶“铁屑纈屑叠帖绝薛阙月月月帖帖”，说明 p、t 尾已混。

德质部和月帖部有合用，古体诗 9 次，词 4 次。如《郎文炳心远斋二首》之一¹⁵⁹叶“勃没物物发月月月”。二者与屋烛部合叶 1 例：《云岩》⁴²⁰⁹叶“被沐物”。

德质部和屋烛部通叶 2 次：《后平湖曲》⁶²⁹⁷叶“物足”，《解剑行》⁶³⁰¹叶“没物𦏧”，“足𦏧”是屋烛部字。

月帖部和屋烛、铎觉部也有合叶现象：诗《后芳华怨》⁶²⁹³叶“药督活渴”。词之《念奴娇·小山招饮》¹⁰⁹叶“杰月复歿没阙发𦏧”。“督复”为屋烛部字，“药”乃铎觉部字。）

值得重视的是，元遗山词里有一例是阴声韵字与入声韵字相押：《蓦山溪·梁州夏早》¹²⁵叶“媚世里地北岁”，“北”为《广韵》入声德韵字，此处与五个支微部字通叶（《中原音韵》齐微韵“入声作上声”收“北”字）。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元遗山的词韵，词甲类可分为 22 部：东钟、江阳、支思、机微、鱼模、皆来、真文、寒桓、先天、豪高、萧遥、歌戈、家车、庚青、尤侯、侵寻、监咸、廉纤、铎觉、屋烛、德质、月帖。词乙类其质不纯，纠葛甚多。若就乙类或甲乙类混言，分类当如本节表 2，监廉部押韵字少，论音理，其内部之分与合当依寒先部平行类推。

附论元遗山古赋四篇的用韵。《元遗山诗集笺注》卷一收有古赋四篇,首篇为《秋望赋》-65,有两个韵段,第一韵段兼押《广韵》庚耕清青蒸五韵,第二韵段是入声 t 尾字与 k 尾字混叶:“激锡笔质食职室质瘠昔失质击锡”(“笔室失”是 t 尾字)。《蒲桃酒赋》-67叶皆来部韵,灰韵字“媒梅杯回”等均在內。《新斋赋》-69叶真文部韵,有魂韵字“门存”,而无元韵字。《行斋赋》-71叶江阳部。总之,此四篇古赋用韵悉与古体诗和词的用韵相同,无特殊现象。

三、近体诗的韵系

现存元遗山近体诗 1050 首。其中 2 首押仄声韵:《梁父吟扇头》+-520 叶“坐和”(“和”为“唱和”之“和”,去声),《唐子达扇头》+-523 叶“玉屋”。1048 首押平声韵。如第一节所述,金时功令为 106 韵,其中平声 30 韵,元遗山除未押下平三肴与十五咸外,共押了 28 韵。

元遗山近体诗用韵的重大特点是颇多“借韵”和“出韵”。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借韵”条云:“五七言近体第一句借用旁韵,谓之借韵。唐诗:‘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雨浓。’‘锦帟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始启其端。至皮陆《松陵集》,则举之不胜举矣。宋人借韵尤多,近代名家,以此为戒,此后生之胜于前贤者。”王力先生《汉语诗律学》继畅钱说:“盛唐以前,此例甚少,中晚唐渐多。谁知这样一来,竟成了一种风气!宋人的首尾用邻韵似乎是有意的,几乎可说是一种时髦,越来越多了。”“近体诗不得通韵,仅首句可用邻韵。”“以排列相近而音又相似的韵认为邻韵。”⑫近体诗首句可押韵,也可不押,如首句押邻韵,即为钱大昕和王力先生所说的“借韵”,而元好问颇多。如《广韵》庚耕清青蒸登六韵,金王文郁《新刊韵略》定庚耕清为下平的“八庚”,青为“九青”,蒸登为“十

蒸”，三者紧相邻接。《甲寅九日》之二十⁴⁹⁰叶“青明纓平声”，《前高山杂诗》之二十三⁶³⁰叶“凭生名”，这两首诗都押“八庚”，但前者首句“借”青韵，后者首句“借”蒸韵。又如《别张御史》九⁴¹³叶“成冥庭经星”，是押“九青”而首句“借”庚。《胡寿之待月轩》之一十四⁶⁴⁹叶“生冰丞”，是押“十蒸”而借“庚”韵。

元遗山近体诗中的“借韵”也不一定是“借”邻韵，如下平的“七阳”竟超越多韵而“借”到上平的“三江”：《与同年敬鼎臣》九⁴⁴²叶“窗床觴藏忘”。上平的“四支”可以借到“八齐”：《京居辛卯八月六日作》八³⁷⁹叶“低移迟期彦”；反之亦有其例：《自赵庄归冠氏》之二叶“离齐啼”。这种“借韵”现象很值得探讨。

如果与“出韵”现象一并考察的话可得个中真谛。近体诗的偶句必须押韵，如不用“本韵”字而押其他韵字，即为“出韵”，王力先生说：“‘出韵’是近体诗的大忌。”“科场中，诗出了韵（又称‘落韵’），无论诗意怎样高超，只好算是不及格。”^⑬但是元遗山近体诗“出韵”也不少，如《独峰杨氏幽居》八³⁷⁵叶“晴青生屏平”，其中“青屏”是“九青”韵，“晴生平”是“八庚”韵，此首既“出”又“借”；《杏花杂诗》之二十一⁵³⁶叶“光窗郎”，是押阳韵而“出”江韵。《赠李文伯》十⁵⁰⁹叶“奇倪谁期迟”，“倪”为齐韵字，其余四字是支韵字，此首“出韵”。综合研讨“借韵”和“出韵”，可知绝非是诗人的标新立异。以上只是举例，现将元遗山近体诗的全部“借韵”、“出韵”统计于下，表中第一栏是本韵，不加括弧的字是王文郁《新刊韵略》平声韵的韵目，括弧内的字是该韵所包含的《广韵》的韵目。第四栏是根据这些“借韵”和“出韵”现象系联、归纳得出的韵部。

近体诗，五言的一般首句不押韵，七言的首句押韵为多。元遗山押平声韵的 1048 首中首句入韵的 900 首，“借韵”101 次，“出韵”22 次，这种现象尤其密集于若干韵之间。这显示了金代官定韵

本韵	上平	一东	二冬(钟)	三江	(下平) 七阳(唐)	四支(脂之)	五微	八齐	六鱼	七虞(模)
“借韵”	冬 ₁₂	东 ₅		江 ₃		微 ₉ 齐 ₁	支 ₆	支 ₂ 微 ₁	虞 ₈	鱼 ₆
“出韵”	冬 ₁	东 ₁		江 ₁		齐 ₂	支 ₁		虞 ₃	鱼 ₂
归纳韵部	东钟			江阳		支思	机微		鱼模	

九佳(皆)	十灰(哈)	十一真 (淳臻)	十二文 (殷)	十三元 (魂痕) 元	十四寒 (桓)	十五刪 (山)	下一先 (仙) 平	二萧 (宵)
灰 ₁	佳 ₅	文 ₁	真 ₅	文 ₁		刪 ₆	寒 ₃	
灰 ₁	佳 ₂	文 ₂	真 ₁			刪 ₃		
皆来		真文			元言	寒山		先天 萧遥

四豪	五歌(戈)	六麻	八庚 (耕清)	九青	十蒸(登)	十一尤 (侯幽)	十二侵	十三覃 (谈)	十四盐 (添严)
			青 ₈ 蒸 ₂	庚 ₁₂	庚 ₁				
				庚 ₂					
豪高	歌戈	家车	庚青			尤侯	侵寻	监咸	廉纤

书中分开的某些韵,甚至是距离较远的某些韵实际上有亲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是说,某韵与某韵主要元音和韵尾(如果有的话)相同,因而应该归为一部,这必然是植根于当时语音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

1. 在元好问近体诗韵中,支思与机微应分部,分别押韵 30 次和 43 次。支思部与其他韵不发生“借”“出”关系。

2. “五微”“八齐”所“借”“出”的“支”均是机微部韵字。

3. “豪”与“萧宵”截然分开。“寒桓”与“删山”间互有“借”、“出”，从不涉及“先仙”；“先仙”押韵 112 次，与“寒桓”、“删山”风马牛不相及。元好问的“覃谈”与“盐添”也无关系。广韵音系的效摄、山摄、咸摄一二等韵与三四等韵在元好问近体诗韵中无瓜葛可言。

4. 元好问魂痕押韵 23 次，元韵独押 3 次，《示白诚甫》七 344 叶“萱源言轩”，《哀武子告》十 464 叶“原辕园元源”，《宗人明道老师》之一十三 623 叶“源轩元”。元与仙先也无关系，应立元言部。历来公认元韵从中古到近代的运动轨迹是：

魂痕元(《广韵》)→先仙元(《中原音韵》)

而元遗山近体诗元韵独立这一事实给我们以启发，元韵可否中经独立的过程，即：

魂痕元→元→先仙元

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与元韵有关的诸韵在两部韵书中的排列次序是：

《广韵》：真淳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

《五音集韵》：真(臻)淳文殷痕魂元寒桓山(删)仙(先)

看来金韩道昭《五音集韵》(写成于 1212 年)把“元”的次序挪后，置于“痕魂”之后，“寒桓”之前，是有其道理的，《五音集韵》卷首“入册检韵术”系统地叙述了 16 摄的名称，奇怪的是，独将“元”韵提出，游离于臻摄之外。^⑭这些都与元好问诗词用韵中元韵的地位相互印证，显示了当时的语音情况。

把从元好问近体诗的“借韵”、“出韵”表所归纳出的韵部与《中原音韵》19 韵部相较，可以看出，二者相当接近。元好问，山西人，在汴京与中州的其他地方住过很长时间，足迹遍于整个北中国，多次去过燕京，他很重视“音韵乖叶”的问题，被誉为“律切精深”，为中州之正，他的诗词用韵必然植根于当时的北方话的基础上。《中

《中原音韵》是反映的“中原之音”，二者都各自表现了北方话语音的一个历史横断面，而且是紧相接近的历史横断面。其间有一些差异，有的却是各自的材料本身的特点所决定，《中原音韵》是北曲韵书，元好问的诗词用韵受着习惯押韵法的支配，如“家麻”与“车遮”在12世纪确已分立，毛居正在《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微”韵后的案说指出，麻韵“一韵当析为二”，“以中原雅声求之，迥然不同”，但是二者相通之习惯，“施用既久”。又如诗、词规定入声韵必须单押，而在《中原音韵》的韵谱里，却可派入三声，附丽其后。

音韵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观点：古体诗的用韵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语音现象，而近体诗都是牢守功令的，于研究语音史无甚价值。其实不可一概而言，元好问虽然进士及第（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中宏词科（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但是他的近体诗用韵并不遵守金代功令，本节的近体诗用韵与王文郁《新刊韵略》韵目比较表便可证明，其近体诗韵颇能反映当时语音，接近《中原音韵》，这不能不令我们注目。

四、曲 韵

《全元散曲》辑得元好问散曲9支，套数残曲2支，共11支。材料太少，但可以作为辅助资料使用。今将《元遗山诗集笺注》中的近体诗用韵、疆村丛书本《遗山乐府》中的词韵、《全元散曲》中的曲韵列表于下（见下页）：

五、若干韵字的讨论

我们研究诗词用韵，当然主旨在整个语音系统的探讨，但是某些韵字的使用，也应该观察。

兹讨论若干韵字如下（见下页表下）：

阴声韵										阳声韵										入声韵		
近体诗韵	歌戈部	家车部	皆来部 (合灰韵)	机微部	支思部	鱼模部	尤侯部	豪高部	萧遥部	廉纤部	监咸部	寒桓部	元言部	先天部	侵寻部	真文部	庚青部	江阳部	东钟部	屋烛部		
词韵	歌戈部	家车部	皆来部 (合灰韵)	机微部 偶叶	支思部	鱼模部 (偶叶机微)	尤侯部	豪高部 偶叶	萧遥部	廉纤部	监咸部 偶叶	寒桓部	先天部	侵寻部	真文部	庚青部	江阳部	东钟部	铎觉部	屋烛部	德质部 合叶	月帖部
曲韵	歌戈韵		皆来韵 (不含灰)				尤侯韵						先天韵		真文韵			东钟韵				

注：“偶叶”指互叶很少，“合叶”指互叶多。空白者表示无此部(韵)。

“涯”字，早在唐代就有麻韵音，但《广韵》只有佳韵五佳切，支韵鱼羈切；《集韵》增加了麻韵牛加切；《五音集韵》麻韵五加切，“溪也”，佳韵、支韵音亦收。王文郁《新刊韵略》麻韵“新添”栏目下有“涯”，五加切，也注明另有二音。元好问古体诗2次，词7次，近体诗8次押入家车部，但是在古体诗中2次、古赋中1次押入皆来部，如《游泰山》五282叶“台哉阶垓谐苔哀涯回……”。可见金代麻车部音占优势，皆来部音还保存。而《广韵》鱼羈切音也在语言中有表现，如南宋福建词人曾以“涯”与支微部字叶；陈德武《望海潮·三分春色》叶“菲知时诗期涯眉飞宜衣归”。只是在同时代的北方，此音似不存，《五音集韵》、《新刊韵略》仍录鱼羈切音，只是抄旧书罢了。

“他”字，《广韵》歌韵托何切，《五音集韵》、《新刊韵略》只收入歌韵。连《中原音韵》也只收入歌戈韵。宋代山东词人与歌戈部叶，福建、四川词入则与家车部叶，江西词人两叶。元好问词出现1次：《鹧鸪天·姚宋光明》96叶“家沙衙花华他”，末两句“新生黄雀君体笑，占了春光却被他”。“他”的口语音很迟被韵书采录，颇可注意，

而遗山词则也较早使用此音入韵。

“涂”字,《眼儿媚·阿仪丑笔》₁₀₂叶“家涂鸦华涯”,首二句为“阿仪丑笔学雷家,绕口墨糊涂”,“涂”下注“音搽”。按,《广韵》麻韵:涂,宅加切,“涂饰”,《集韵》直加切,义同,《五音集韵》亦然,《新刊韵略》未收此字。“涂”音搽,恐当时已不通行,故特加注。

“大”字,《广韵》个韵唐佐切,泰韵徒盖切,《五音集韵》、《新刊韵略》亦然,《中原音韵》则歌戈、皆来、家麻三韵并收。宋代江西、山东、四川词人皆叶歌戈部。元好问古体诗和词皆只与歌戈部或皆来部叶,尚未有家麻部音。

“仆”字,《广韵》遇韵芳遇切,“僵仆”;宥韵敷救切,“前倒”;候韵匹候切,“倒也”;德韵蒲北切,“倒也”。《新刊韵略》遇韵,宥韵及其所附的候韵都收有此“仆”字,唯职韵所附的德韵未收。元好问诗使用“仆”两次,分押二部:《鹿泉新居二十四韵》_{四232}叶“渡树路故去顾付父屣附聚仆……”该句为“泚水鼓旗纷僵仆”;《宝岩纪行》_{二147}叶“瘦垢叩漱窞……覆仆……籀留岫”,该句是“诸峰出头角,随起随僵仆”。

“留”字,《广韵》尤韵力求切外,尚有宥韵力救切,“宿留,停待也”等等,《新刊韵略》亦然。上条引《宝岩纪行》诗,“留”与尤侯部上去声叶,该句为“僧夏容宿留”,与韵书切合。

“覆”《广韵》有四音,主要是宥韵敷救切,“盖也”;屋韵,芳福切,“反覆,又败也,倒也,审也”等。《新刊韵略》亦然。元好问《宝岩纪行》诗“屹立柱图覆”,与尤侯部上去声字叶;《贺新郎·赴节金钗促》₇₉叶“促筑哭宿绿掬玉属谷覆曲烛”,该句为“入世事异常翻覆”。

《戊戌十月山阳雨夜》之二_{二130}叶“盆润阵靳分趁晋鬓吝顺尽烬”,其中的“分”既然与其他仄声字相叶,当音去声。可是该句为

“山阳冬候暖，麦脚易滋分”，此“分”于义应为平声，元好问何以与仄声相叶？明弘治刊本此“分”下注“去”，为临时改读乎？

六、结 语

本文首次考察了金、元诗词曲用韵。

元遗山诗词曲用韵所归纳出的韵系正处于《中原音韵》韵系的前期阶段，遗山韵系与《中原音韵》相当接近。遗山诗词用韵应该是北方话语音史上的颇有价值的史料。

元遗山诗词用韵某些方面，如元韵的使用可与其同时代人韩道昭《五音集韵》对元韵的处置相互参证。

元遗山诗词用韵与其同时代的诸宫调、略后的北曲的用韵及《中原音韵》音系有一定差异，这也与诗词用韵的习惯约束有关，如入声韵必须单押等。但是诸宫调的 *m* 尾韵与 *n* 尾韵混用特甚，而元遗山诗词用韵只在词里有少量的监廉（—*m*）杂入寒先部（—*n*），整个来说，鼎足三分，壁垒清楚，比较能反映当时语音。金元时代 *m* 尾尚未消失是语言史家都承认的，*m* 尾、*n* 尾、*ng* 尾的混押是词、诸宫调甚或元曲的用韵习惯。

元遗山之时，作为功令的 106 韵的诗韵已经确立，传世王文郁、张天锡二书可证，元遗山的近体诗并不遵守。钱大昕、王力的关于近体诗“借韵”、“出韵”的解释可以商榷，这是韵母语音变化造成的归并简化现象，诗人们也是企图以现实语音为根据而押韵的。

从诗、词用韵的某些项目的综合比较推测，吴重熹石莲庵刊《遗山新乐府》五卷本所收是否全是遗山所作大有可疑之处。

要了解某字在古代某个时期的读音，主要靠中古及其后的韵书、字书，但是这些书往往将不同来历的又音兼收并蓄，释义又简。而诗词用韵对确定某些字的读音来说，是有效的手段。如“论”，《广

韵》平声卢昆切,去声卢困切,《集韵》、《新刊韵略》同,释义并为“议也”。《中原音韵》亦有平去二音。区别究竟何在?元遗山《临江仙·自笑》⁹⁰“新诗凭寄取,憔悴不须论”,与平声字叶;《别覃怀幕府诸君》之一⁹¹是七律,颌联“百年人物存公论,四海虚名只汗颜”,此“论”定是去声。因此可知平声是动词,去声是名词,是四声别义问题。

【附注】

- ①见《问学集》下册,中华书局,1966年。
- ②刘钧杰《再说〈杜诗与唐代口语〉》,《中国语文》1984年第1期。
- ③《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平水韵”条。
- ④《观堂集林》卷八《书金王元郁〈新刊韵略〉张天锡〈草书韵会〉后》。
- ⑤施国祁注,友朝枢校《元遗山诗集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
- ⑥《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
- ⑦《全金元词》“引用书目”云:“遗山新乐府,吴重熹石莲庵刊五卷本,颇多混入他人之作,且多错误,兹据张家鼐南塘本及罗振玉殷礼在斯堂本校补。”又参见第135页案语。本文据用韵现象,疑其中尚有很多误收而剔除未尽者。
- ⑧诗题若过长,则节录。右下角汉字为卷数,阿拉伯数字表页数。有些诗有几个韵段,只摘录其中某韵段的韵字为例。
- ⑨《》号内首为词牌名,后为首句,如首句过长则截取前四字,右下角数码为《全金元词》页数。
- ⑩“不”有数音,其一见《广韵》尤韵:“不,弗也。……甫鳩切。”《五音集韵》亦然。
- ⑪见鲁国尧《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2期;《宋代苏轼等四川词人用韵考》,《语言学论丛》第八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宋元江西词人用韵研究》(稿本)。
- ⑫王力《汉语诗律学》,第53、71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 ⑬同上,第48、49页。
- ⑭原文为:“通江止摄一,遇蟹新为二,臻摄载元三,山效果假四,宕梗曾

须五，流深咸六次。”

本文原题为《元遗山诗词用韵考》，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现作删改。为更好地了解宋词韵的实质，我研究了金元词韵、元好问诗韵，还指导过校内外好几位青年学人研究宋金元诗韵及元曲韵等。

白朴的词韵和曲韵及其同异

一

词与曲都是中国文学史上光彩夺目的瑰宝，大盛于宋元两代。现存宋词过两万阙，金词 3572 首，元词 3721 首。现存元杂剧约 160 多种，小令 3853 首，套数 457 套。如此丰富的资料岂止是文学史家的“禁脔”，对研究汉语语音史的学人来说，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为词人、曲家创作时用韵，归根结底，总是要以当时的语音为根据的，所以词韵与曲韵无疑地是音韵学上值得开发的“富矿”。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词与曲不同，词韵与曲韵似乎也是截然二物，但实际上二者既有先后的历时关系，又有重叠的并时关系，既有同又有异。如果在对词韵与曲韵分别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以后加以比较，自然是理想不过的了。但若有一位作家既填词又作曲，我们比较其词韵与曲韵的同异，进而追寻其根源，也不失为一佳法。然而这样的作家颇难觅求，因为需有一定数量的作品可供研究，而且作家本人也要有相当的代表性。

白朴恰恰符合我们的要求。周德清《中原音韵》尊崇“关、郑、白、马”为元曲四大家，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云：“然以其年代及造诣论之，宁称关、白、马、郑为妥也。”白朴亦擅词能诗，明初孙大雅《天籁集序》云：“先生少有志天下，已而事乃大谬。……于是屈己降志，玩世滑稽。徙家金陵，从诸遗老放情山水间，日以诗酒优游，用

示雅志,以忘天下,诗词篇翰,在在有之。”惜乎其诗已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惟以制曲掩其词名,故沉晦者越数百年。”幸而白朴词、曲尚有部分传世,可供我们研究。

白朴祖籍隰州(今山西曲沃),1226年生于金之汴京,金亡后居真定(今河北正定),故又为真定人。1261年辞中书右丞相史天泽之荐,南游,1280年移居建康(今南京),1306年81岁游扬州(此依王文才《白朴年谱》说,《白朴戏曲集校注》第3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卒年不详。

白朴有词集《天籁集》。白朴自言:“平生留意于长短句,散失之余,仅二百余篇。”(王博文《白兰谷天籁集序》),明时又渐残佚,清初朱彝尊、洪升等为整理刊行,今仅存104阙。其友人王博文评白词“辞语迢丽,情寄高远,音节协和,轻重稳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朴词清隽婉逸,意惬韵谐”。其曲名更甚,周德清谓四大曲家“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誉其曲“如鹏搏九霄”。元人钟嗣成《录鬼簿》载白朴杂剧《秋江风月凤皇船》等15本,外加《李克用箭射双雕》(其残折收于《盛世新声》、《词林摘艳》、《雍熙乐府》等明代散曲、戏曲选集中),则为16本。现仅存《梧桐雨》、《东墙记》、《墙头马上》三杂剧全本及《流红叶》三折,疑属其四折残曲的[越调·酒旗儿]一支,《箭射双雕》残折;套数四套,小令37首,共295支曲子。我们研究白朴曲韵依据今人王文才《白朴戏曲集校注》,并以《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影印之诸明本曲集校其个别误字。研究白朴词韵据唐圭璋《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10月)及上述王文才书的附编《天籁集编年》。

二

白朴词现存 104 首(王文才《天籁集编年》收有曲[小桃红],应除去),中有六首“清平乐”,上下阕换韵,故共得 110 个韵段。白词的特点是长调多,一韵到底,含八韵字及八韵字以上的韵段数达 85,最长的一阕押 17 个韵字,即《摸鱼子·问双星》⁶³⁶叶“许古户语处女度句暮树诉浦渡苦雨驻路”(《 》号内,前为词牌名,后为首句。外边数字为《全金元词》页数)。白朴曲现存 295 支,曲子都是一韵到底,但白曲有十余支存在孱入他韵字的现象。

白朴现存词使用了 21 个韵部,下面将依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三大部分来叙述其词韵特点。现存白曲共使用了 17 韵,只有阴声韵与阳声韵,因中古入声字与阴声韵字同押。下面将白朴的曲韵与词韵并合缕述,一般各举一例,并加以讨论。

阴声韵

1. 词—歌戈部:《秋色横空·儿女情多》⁶⁴¹叶“多磨戈娥阿婆歌河他波娥何”。按,本部所含为《广韵》歌韵(举平以赅上去,下同)字及戈韵一等字。

曲—歌戈韵:套数[小石调·恼煞人么篇]叶“寞破个”(《 》号内前为宫调名,后为曲牌名)。按,此韵所含除《广韵》歌韵及戈韵一等字外尚有若干古入声字(后面将集中讨论)。

2. 词—家麻部:《木兰花慢·览香囊无语》⁶⁴⁰叶“纱他花家华沙瓜霞涯”。按,本部所含字为《广韵》麻韵开、合口二等字及佳韵之“佳涯”等。

曲—家麻韵:《梧桐雨》三折[双调·驻马听]叶“涯搭下家花洒纱瓦”。按,此韵所含多与词之家麻部同,唯增入若干入声字。

《广韵》歌韵之“他”字,《中原音韵》只收入歌戈韵,但在宋元即

已有不少词人以“他”与家麻相叶，如苏轼《减字木兰花·琵琶绝艺》（下阙三四句）叶“家他”，张元干《满庭芳·三十年来》叶“沙华花涯家霞他差”，元好问《鹧鸪天·姚宋光明到此家》叶“家沙衙花华他”。白朴词使用“他”为韵字，一见于歌戈部（上举之《秋色横空》），一见于家麻部（上举之《木兰花慢》）。白朴现存曲中七次叶“他”，皆入家麻，不入歌戈，如《梧桐雨》三折〔双调·落梅风〕叶“花跨他下”。《中原音韵》于家麻韵漏收“他”字，是为失误。

3. 词一车遮部：《沁园春·千载寻盟》⁶³⁵叶“车靴遮賒蛇嗟些奢耶斜”。按，本部均为《广韵》麻韵开口三等字，另“靴”为戈韵合口三等字。

宋代词韵家麻、车遮两部不分，如欧阳修《越溪春·三月十三寒食日》叶“涯霞家车纱斜花”（下有黑点者为后世之车遮部字），杨炎正《水调歌头·踏碎九街月》叶“华家佳车花嗟遮鸦”。

曲一车遮韵：《墙头马上》三折〔双调·驻马听〕叶“杰阙烈车接谢别月”。按此韵大于词之车遮部，因很多古人声字进入，所含同于《中原音韵》之车遮韵。

4. 词一皆来部：《江梅引·一溪流水隔天台》⁶⁴¹叶“台栽开来苔哀解崖怀台”。按，本部所含悉为《广韵》咍皆佳韵字。

曲一皆来韵：《墙头马上》二折〔南吕·菩萨梁州〕叶“钗客奶来乖债败改获”。按，此韵所含同词之皆来部，但纳入若干古入声字。

5. 词一灰颓部：《风入松·使君高宴出红梅》⁶³⁵叶“梅雷魁枚杯回叠颓”，《浣溪沙·世事方艰便猛回》⁶⁴⁷叶“回培梅灰杯”。按，本部纯为《广韵》灰韵字。

在宋代词韵中，《广韵》灰韵字及泰韵合口字，与皆来部叶者多，如晏殊《采桑子·樱桃谢了梨花发》叶“催来开杯哀回”（下有黑点者为《广韵》灰韵字及泰韵合口字）；也或与支微部字叶，如李纲

《渔家傲·木落霜清秋色霁》以“霁碎水会至外泪意蕊醉”为韵；还有同一作家两叶的现象，如黄庭坚《绣带子·小院一枝梅》叶“梅开回杯来堆”，其《水调歌头·瑶草一何碧》叶“溪鹞霓衣微杯为归”。灰韵字在中古音系里本为哈韵的合口字，在宋词韵中摇摆于皆来和支微二部间，在《中原音韵》里入齐微韵，可见这些字的语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变动中，而前于《中原音韵》的白朴词韵对灰韵字的处理办法是，绝不与皆来部牵混，然亦不阑入机微部，此颇发人深省，或许是这些字与机微部字尚有区别，或许是白朴用韵偏严。

6. 词——机微部：《水龙吟·醉乡千古人行》⁶³⁰叶“地寐蚁味翠里睡起”，《踏莎行·冻结南云》⁶⁴⁷叶“吹坠瑞地翠醉”。按，本部含《广韵》支脂之微齐诸韵字（除去进入支思部的字）。

曲——齐微韵：《墙头马上》一折[仙吕·后庭花]叶“窥假席期意已”（下有黑点者为《广韵》灰韵字），小令《中吕·阳春曲》叶“醉杯飞疾稀”。按，白曲之齐微韵所含字相当于白词之机微部加灰颓部，另纳入若干古人声字。

7. 词——支思部：《清平乐·箜篌朱字》（上片）⁶⁴⁶叶“字是子事”，《清平乐·前村潇洒》（下片）⁶⁴⁶叶“姿时枝”。按，本部所含为《广韵》支脂之韵的精组、照组字。

宋人词，机微部、支思部及部分灰颓部字混而不分，故合称为支微部。如向子諲《水调歌头·天公深藏巧》叶“回梅支谁时奇衣飞”（下有黑点者为白朴词韵之灰颓部字，下有△号者为支思部字）。姜夔《江梅引·人间离别易多时》叶“时枝思携徊知题飞晖非姜衣”。

曲——支思韵：小令[中吕·阳春曲]叶“事词思儿时”，《流红叶》

“四折残曲”[越调·酒旗儿]叶“至司肢事子市”。按,此韵内容相当于词之支思部。

8. 词—鱼模部:《玉漏迟·睡香花正吐》⁶⁴¹叶“土主所绪取语许女浦去苦雨”。按,本部所含为《广韵》鱼虞模三韵字。

曲—鱼模韵:《东墙记》楔子[仙吕·尝花时]叶“夫谋途步孤”,《墙头马上》四折[中吕·斗鹌鹑]叶“母女雨属祖”。按,此韵相当于词之鱼模部,但有古入声字叶入。

《广韵》侯韵、尤韵的唇音字如“母亩浮谋妇负否”等字在两宋词韵内或叶鱼模部、或叶尤侯部,如魏了翁《蝶恋花·早岁腾身》叶“路度母舞许数去举”,辛弃疾《感皇恩·七十古来稀》叶“有久妇母袖后寿酒”,也有同一词人两叶的现象,如姜夔《念奴娇·楚山修竹》叶“暑许趣苦遇亩处雨”,其《角招·为春瘦》叶“瘦柳岫手久亩首有袖秀溜候旧酒奏友”。可见这批字动摇于鱼模部与尤侯部之间。而至白朴词,尤侯部七首中只有一首内有“否”,即《水龙吟·绣衣揽辔西行》⁶³⁰叶“否酒九后昼首岫柳”。白曲的鱼模韵,除上举的“谋”、“母”外,尚有《墙头马上》四折的[中吕·十二月]中的“妇谋”,[上小楼]中的“妇”等均为韵字。

9. 词—尤侯部:《沁园春·玉节星轺》⁶³⁴叶“忧愁州流留稠筹游舟”。按,本部为《广韵》之尤侯两韵字。

曲—尤侯韵:《流红叶》三折[正宫·倘秀才]叶“柳沟久流头”。按,此韵同于词之尤侯部,唯有少数古入声字“逐烛”等叶入。

10. 词—萧豪部:《玉漏迟·故园风物好》⁶⁴⁰叶“好倒草道觉抱恼报捣闹晓老”。按,本部所含为《广韵》豪肴宵萧四韵字。

曲—萧豪韵:《梧桐雨》四折[正宫·呆骨朵]叶“庙朝熬高梆了”。按,此韵相当于词之萧豪部,但《广韵》铎觉药韵(入声韵)字派入若干。

阳声韵

1. 词—监咸部:《水调歌头·疏云暗雾树》⁶²⁷叶“潭龕昙探岚南谈骖”。按,本部字皆为中古音咸摄一等覃韵、谈韵字。

现存白朴曲无单独押监咸韵者。

2. 曲—廉纤韵:小令[中吕·阳春曲]叶“俭甜钳严忼”。按,此韵所含为中古咸摄三四等盐严添韵字。

现存白朴词无单独押廉纤部者。

在两宋词人的用韵中,监咸部、廉纤部混而不分,如欧阳修《于飞乐·宝奁开》叶“蟾添鹑南男蚕兼帘”(下有黑点的字在白朴词韵里为监咸部字),郭应祥《西江月·碎影乱筛月地》叶“檐三淡嫌帘欠”。

3. 词—寒桓部:《满庭芳·雅燕飞觞》⁶⁴²叶“欢团翻斑鬟寒山鞍残”。按,本部为中古音山摄一二等寒桓山删韵字及三等元韵合口字(上例中的“欢团”为桓韵字)。

曲—寒山韵:《梧桐雨》二折[中吕·红芍药]叶“干弯珊鬟翻散寒残阑”。按,此韵所含为寒山删韵及元韵合口字。

在《中原音韵》里,另有桓欢韵,由《广韵》的桓韵字组成。白朴曲无单独押桓欢韵者。

4. 词—先天部:《凤凰台上忆吹箫·笳鼓秋风》⁶⁴²叶“边悬迁田轩筵前川烟”。按,本部所含为中古音三四等元仙先韵字。

两宋词人用韵,寒桓部、先天部混而不分,名之为寒先部。如晏殊《渔家傲·嫩绿堪裁红欲绽》叶“绽_△畔_△散_△乱_△万_△限_△恋面玩岸_△”(下有黑点者为《中原音韵》寒山韵字,有△号者为桓欢韵字),魏了翁《贺新郎·此别情何限》叶“限_△雁_△暖_△散_△万_△乱_△电_△划_△见_△泮_△眼_△免_△”。就是说,宋词的寒先部,白朴词韵析为寒桓、先天二部,而至《中原音韵》,寒桓更分为寒山、桓欢二韵,连同先天韵,计为三韵。

曲—先天韵:《东墙记》五折[双调·折桂令]叶“圆缘言浅娟悬迁天”。按,此韵内容同词之先天部。

5. 词—侵寻部:《木兰花慢·倦区区游宦》⁶³⁹叶“阴心寻深吟襟临今林”。按,本部相当于《广韵》侵韵。

曲—侵寻韵:小令《越调·天净沙》叶“簪金阴愠襟”(内“愠”为真文韵字,可能与侵寻互叶)。按,此韵所含同词之侵寻部。

6. 词—真文部:《木兰花慢·记罗浮仙子》⁶³⁸叶“村樽痕根温论门昏魂”。按,本部所含为中古臻摄真谆臻文欣魂痕韵字。

曲—真文韵:《东墙记》一折[仙吕·油葫芦]叶“唇纷人信印魂问神”。按,此韵同于词之真文部。

7. 词—庚青部:《绿头鸭·黯消凝》⁶⁴²叶“凝清情荆亭名争灵青行生”。按,本部所含为《广韵》登蒸庚耕清青六韵字。

曲—庚青韵:《梧桐雨》一折[仙吕·金盏儿]叶“觥屏等羸轻程”。按,此韵所含同上,但有个别字,如“永”庚青韵、东钟韵两叶:《东墙记》二折[正宫·满庭芳]叶“影兵性明整名敬永盈”,《东墙记》四折《越调·斗鹌鹑》叶“空永风拢东钟”。

8. 词—江阳部:《沁园春·我望山形》⁶³⁴叶“康唐香汝江亡行乡凰榔”。按,本部所含为《广韵》江阳唐三韵字。

曲—江阳韵:小令[双调·驻马听]叶“肠娘梁上扬往”。此韵所含同上。

9. 词—东钟部:《秋色横空·摇落初冬》⁶⁴¹叶“冬通容融风红浓拢逢重封中”。按,本部所含为《广韵》东冬钟三韵字。

曲—东钟韵:《东墙记》四折[越调·小桃红]叶“容重共穷送空胸”。按,此韵所含同上。

入声韵

词的押韵规律是:平声字互叶,上去声字互叶,入声字互叶。宋

词有四个入声韵部：铎觉部、屋烛部、德质部、月帖部。

白朴词入声仍自互叶，但现存词作中未见押铎觉部（所含为《广韵》铎药觉三韵字）者，仅见下列三部：

1. 屋烛部：《石州慢·千古神州》⁶⁴²叶“谷鹿哭屋独玉束绿菊”。按，本部所含为《广韵》屋沃烛韵字，乃通摄入声字。

2. 德质部：《夺锦标·孤影长嗟》⁶²⁵叶“北德泣緝适昔迹昔湿緝笔质夕昔息眠”（右下小字为该字所属的《广韵》韵名），《满江红·过了重阳》⁶³³叶“日质泣緝湿緝觅锡橘术栗质寂锡笔质吸緝”。按，本部所含为中古深摄入（收 p 尾），臻摄入（收 t 尾）和梗、曾摄入（收 k 尾），如此众多的入声韵合叶至少可以说明三种入声韵尾已混同为一。

3. 月帖部：《念奴娇·露团渐冷》⁶³²叶“月月阙月雪薛隼叶别薛叶叶节屑说薛”。按，本部所含为中古咸摄入（收 p 尾）、山摄入（收 t 尾）。

古入声字在白朴曲里，与阴声字相叶，九个阴声韵除支思韵外，齐微、鱼模、皆来、萧豪、歌戈、家麻、车遮、尤侯八韵皆有古入声字，其如何分配同于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兹不赘述。至于具体字的派入，如“烛”分别见于鱼模韵和尤侯韵，“着”分别见于萧豪韵及歌戈韵，此与《中原音韵》同。但就现存白朴 295 支曲子观察，“客”和“额”只见于皆来韵，不见于车遮韵，“竹”只见于尤侯韵，不见于鱼模韵，此其异者。

在入声韵字问题上，白朴词韵与曲韵大相径庭。

三

两宋词人用韵侵寻、真文、庚青三部往往两部或三部互叶，如黄裳《瑶池月·扁舟寓兴》叶“姓[△]认[△]醒[△]信[△]影[△]听[△]冷[△]问[△]境[△]定[△]病[△]径[△]艇[△]甚[△]圣[△]”

(下有黑点的为侵寻部字,有△号的是真文部字),监廉、寒先两部亦常常通押,如谢逸《鹧鸪天·桐叶成阴拂画檐》叶“檐帘莲天传烟”(下有黑点者为监廉部字),德质与月帖二部亦然,如赵善括《满江红·三十年前》叶“月雪壁识履石日液力”(下有黑点者为月帖部字)。而白朴词韵可分为21部,各自壁垒分明。然亦有可讨论者:

1.《念奴娇·江山信美》⁶³¹叶“物壁雪杰发灭发月”,其中“物壁”为德质部字,其他为月帖部字。但该词小序明言“用坡仙韵”,即袭用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韵。

2.《满江红·云外孤亭》⁶³²、《满江红·行遍江南》⁶³²皆叶“客别血歇结月杰雪说”,其中“客”非月帖部,乃德质部字,是为二部混叶,但词序言“用冯经历韵”。犹有可言者:这两阙《满江红》如以曲韵衡量,后八字皆车遮韵字,“客”字在《中原音韵》里两属,一为皆来韵,一为车遮韵,如是则通首皆叶车遮韵,“冯经历”原词以这种方式押韵可能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受曲韵影响,白朴是曲家,依样和词自是情理中事。

3.《春从天上来·枢电光旋》⁶²⁴叶“旋乾燕莲前烟园联仙绵年天”,此从王文才《天籁集编年》,通首押先天部。唐圭璋《全金元词》“联”作“班”,“班”乃寒桓部字。

现存白朴曲共使用了17韵,无通首用桓欢与监咸二韵者,但此二韵中的个别字并入他韵中。白朴曲韵有若干通叶现象,较重要的是:

1.寒山、先天、桓欢偶叶。

《东墙记》五折[双调·沽美酒]叶“宣颜天殿见”,“颜”为寒山韵字,余为先天韵字。

《梧桐雨》二折[中吕·迎仙客]叶“甘绽间慳安践”,是为先天韵字“践”叶入寒山。

《梧桐雨》二折〔中吕·普天乐〕叶“限山盼雁鞍_·园安”，“园”是先夭韵字，其他为寒山韵字。以《元曲选》、《元刊杂剧三十种》同曲牌作品排比，“园”的位置上或押韵或不押韵，白曲此首“园”字可能押韵。

《东墙记》五折〔双调·梅花酒〕叶“沿川原延鞭穿选_·銮边宣传”，“銮”是《中原音韵》的桓欢韵字，此处叶入先天。

《东墙记》五折〔双调·水仙子〕叶“喧缘怨然年_·断远圆”，“断”为桓欢韵字，排比同曲牌作品，“断”可能是韵字。

2. 廉纤偶叶先天，监咸偶叶寒山。

《东墙记》五折〔双调·驻马听〕叶“坚仙贱_·檐源眷选践”，“檐”为廉纤韵字。

《东墙记》五折〔双调·得胜令〕叶“前宣筵烟_·剑绵贤”，“剑”是廉纤韵字。

《梧桐雨》二折〔中吕·迎仙客〕叶“甘_·绽间慳安践”，“甘”为监咸字，排比同曲牌作品，“甘”可能入韵。

3. 庚青与东钟互叶。

《东墙记》四折〔越调·秃厮儿〕叶“东钟惊_·重”，“惊”为庚青韵字。

《东墙记》四折〔越调·圣药王〕叶“境_·中浓松重东溶”，“境”为庚青韵字。

《东墙记》四折〔越调·麻郎儿〕叶“浓重_·萦弄”，“萦”为庚青韵字。

《东墙记》四折〔越调·拙鲁速〕叶“丛盈_·种共枕送梦”，“盈”为庚青韵字。

《东墙记》四折〔越调·绵打絮〕叶“庭_·风重拥逢中”，“庭”为庚青韵字。按，此曲首二句，《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作“深闺静悄，

幽僻空庭”，王文才《白朴戏曲集校注》认为“庭”字失韵，改为“幽僻庭空”，是不明东钟与庚青通叶的韵例而误改。

《梧桐雨》一折〔仙吕·金盏儿〕叶“蒙盛敬卿情顶擎”，“蒙”乃东钟韵字。

《梧桐雨》一折〔仙吕·混江龙〕叶“兴醒鞋灯令拥呈”，“拥”是东钟韵字，排比同曲牌作品，“拥”可能入韵。

4. 其他。

《箭射双雕》残折〔中吕·六幺令〕似叶“士威议起欺随”，小令〔仙吕·寄生草〕似叶“思字事志非是”，“上”支思韵字，“非”齐微韵字，则是支思与齐微偶叶。《墙头马上》四折〔中吕·耍孩儿〕叶“诉古湖炉禄车福妻”，“妻”是齐微韵字。套数〔小石调·恼煞人〕叶“波索”，〔小石调·恼杀人·伊州遍〕叶“肚末苦着挫阁过锁”，据《中原音韵》，“索阁”是派入萧豪韵的入声字，“肚苦”为鱼模韵字。小令〔越调·天净沙〕似叶“簪金阴愠襟”，“愠”是真文韵字。

白曲的通叶现象多出于剧曲中。与小令、套数不同，剧曲多是长篇，现存白朴杂剧一折少则 12 支曲子（如《墙头马上》一折，《东墙记》一折），多则 23 支曲子（如《梧桐雨》四折），按规定，一折必须一韵到底，为了剧情的需要，故偶或采用邻韵，如寒山、桓欢、先天都是 n 尾韵；廉纤之与先天，监咸之与寒山都是主元音相同，而韵尾前为 m，后为 n。东钟与庚青的通叶可能与当时的北方方言有关，白朴是真定籍作家群的领袖，其他真定作家如李文蔚、尚仲贤、史九敬先的杂剧中也有这种现象，大都入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东平人高文秀、李好古的作品亦然。

四

宋代词人用韵总的来说，根据于自己时代的通语，当然也有的

词人偶或以方音入韵(福建、江西、浙江的词人尤其如此),或袭用前辈建立的用韵规范,或用韵有宽严之别,但宋词用韵有一个大致的模式,可分为18部。阴声7部:歌戈、家车、皆来、支微、鱼模、尤侯、萧豪;阳声7部:监廉、寒先、侵寻、真文、庚青、江阳、东钟;入声4部:铎觉、屋烛、德质、月帖。

白朴词韵较之宋人词韵有很大的差异。皆来、支微2部析为皆来、灰颓、机微、支思4部。至于家车、监廉、寒先各分为二,皆是洪细之别使然。

白朴曲韵的阴声与阳声两大类别与其词韵大致相同,唯词之灰颓与机微2部至曲合而为一,这与《中原音韵》完全一致。但在白朴剧曲中较多阳声韵的偶通和互叶现象,文学创作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可有一定的灵活性,而欲作为他人规范的韵书则不能如此。

在入声韵的问题上,白朴词韵仍承用传统的叶韵法,即入声独叶,而曲韵则与阴声通押。对白朴的创作用韵来说,这正是区分词韵与曲韵的分水岭。宋代词韵模式的阴声韵与阳声韵的叶法,白朴可以“改革”,因那基本上是分部广狭的问题(当然有其深层根源);而入声韵的叶法,则是模式的核心所在,不得越雷池一步。如若认为当时已无入声,故白朴曲韵入声归并于阴声,那么词韵中的入声独叶法则是因袭传统。如若象另一派《中原音韵》研究家的说法,元代中原之音入声的喉塞音已削弱但仍能自成一调,周德清的“入派三声”的做法只是将与阴声相近的某些入声字暂时派入,“广其韵耳”,那么白朴曲子用韵的实际情况与此相合。正由于它还是入声,所以在词里还是要独叶的。

兹列宋代词韵、白朴词韵、白朴曲韵、《中原音韵》分韵比较表于下:

	宋代词韵	白朴词韵	白朴曲韵	《中原音韵》
阴声	歌戈部	歌戈部	歌戈韵	歌戈韵
	家车部	家麻部	家麻韵	家麻韵
		车遮部	车遮韵	车遮韵
	皆来部	皆来部	皆来韵	皆来韵
	支微部	灰颊部	齐微韵	齐微韵
		机微部		
		支思部	支思韵	支思韵
	鱼模部	鱼模部	鱼模韵	鱼模韵
	尤侯部	尤侯部	尤侯韵	尤侯韵
阳声	萧豪部	萧豪部	萧豪韵	萧豪韵
	监廉部	监咸部	×	监咸韵
		×	廉纤韵	廉纤韵
	寒先部	寒桓部	寒山韵	寒山韵
			×	桓欢韵
		先天部	先天韵	先天韵
	侵寻部	侵寻部	侵寻韵	侵寻韵
	真文部	真文部	真文韵	真文韵
	庚青部	庚青部	庚青韵	庚青韵
	江阳部	江阳部	江阳韵	江阳韵
入声	东钟部	东钟部	东钟韵	东钟韵
	铎觉部	×	与阴声字互叶	派入阴声
	屋烛部	屋烛部		
	德质部	德质部		
	月帖部	月帖部		

注：×号表示无单独叶此韵者，或无此部韵字。

从上表可见：白朴曲韵与其后的曲韵专书《中原音韵》很为相似，而众皆公认《中原音韵》反映了元代的中原之音，因此白朴剧曲和散曲都是根据他自己时代的语音押韵的。白朴的词韵，除了在入声韵字的措置上有异外，与其曲韵大体相同，这说明白朴词韵也是根据实际语言用韵的。白朴词韵对传统的宋代词韵既有同的一面，

又有异的一面,而其同异的根源在于白朴时代的语音与宋代的语音,既有继承,又有变化。总之白朴词曲的用韵反映了语音的变化,它早于《中原音韵》数十年,是近代汉语语音史上的宝贵资料。

本文发表于《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

白朴曲韵与《中原音韵》

一

元代著名戏曲作家、戏曲理论家周德清所著《中原音韵》系戏曲学不祧之祖。而自本世纪 20 年代起,经由钱玄同、赵荫棠、罗常培诸专家大力表彰,遂亦成为汉语音韵学的经典著作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日本、美国等国的学者竞相研究,论著以百计,时至今日,《中原音韵》之学已成为显学,可谓成果辉煌。

当然,《中原音韵》还有待作更深更广的研究,我们认为,从元曲用韵的角度来考察《中原音韵》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元代是北曲空前繁荣的时期,名家辈出,佳作迭现,洋洋大观,元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之一。周德清云:“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其盛,则自缙绅及间阎歌咏者众。其备,则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其难,则有六字三韵,‘忽听,一声,猛惊’是也。诸公已矣,后学莫及!”(《中原音韵序》)《中原音韵》的前半部分即是元曲韵谱,后半部分《正语作词起例》中很大部分内容也关乎曲韵。而元曲作品数量颇巨,今知有记载的元杂剧作家(包括金末和明初杂剧作家)在 120 人左右,现存杂剧有 160 多种;现存小令 3853 首,套数 457 套,残曲在外(据隋树森《〈全元散曲〉自序》)。按理,有如此可观的作品为依据,元曲用韵的研究应该得到充分重视,然而就笔者所

知,仅有廖珣英《关汉卿戏曲的用韵》(《中国语文》1963年第4期)、曹正义《元代山东人剧曲用韵析略》(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1年第2期)、杨耐思、蓝立葵《元曲里的“呆”字音》(《语言学论丛》第13辑,1984),因不揣冒昧,继诸贤之后研究元代大曲家白朴的用韵,并试图与《中原音韵》对比,显其同异。

二

白朴字太素,号兰谷,原名恒,字仁甫。祖籍隰州(今山西曲沃),其父白华为金朝官员,著名文人。1226年(金哀宗正大三年)白朴生于汴京,1232年蒙古军南下侵金,1233年幼年的白朴为元好问抚养,被携离汴京北渡,居聊城、济南、冠氏。1237年(蒙古太宗九年)白朴年十二,始由元好问送归其父,此后居真定(今河北正定县),故又为真定人。1261年36岁南游,1280年55岁居建康(今江苏南京),1306年81岁游扬州(此依王文才《白朴年谱》说,见《白朴戏曲集校注》第307—344页),卒年无考。叶德均《白朴年谱》则止于“至元28年辛卯(1291年),66岁”,并云:“按朴之事迹可考者,已尽于此。”(见其《戏曲小说丛考》上册第368页,中华书局,1979年)。

据元代钟嗣成《录鬼簿》载,白朴作杂剧凡15本。明正德12年刊印的《盛世新声》收有白朴的《李克用箭射双雕》残折,则白朴剧作可知者共16种,遗憾的是现仅存《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董秀英花月东墙记》、《裴少俊墙头马上》三杂剧全本,《韩翠颦御水流红叶》、《李克用箭射双雕》二杂剧的残折。白朴还作了若干散曲。笔者研究白朴曲子的用韵,系据今人王文才《白朴戏曲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上述三杂剧的全本及两杂剧的残折皆被收录,第143页录载辑自《太和正音谱》的[越调·酒旗儿]一曲,《流

红叶》残折缺[墙头花]，《箭射双雕》残折缺[尾声]，则是白朴现存剧曲实共 235 支曲子。《白朴戏曲集校注》又收有套数 4 套，含 23 支曲子，另小令 37 首，[仙吕·醉中天]（疑是杨妃在），王文才断非白朴所作，我们仍置于研究范围内，故共 295 支曲子。现存白曲共使用了正宫、大石调、小石调、仙吕、中吕、南吕、双调、越调、般涉调共 9 个宫调。

王文才氏的《白朴戏曲集校注》（以下简称《戏曲集》）所录《梧桐雨》、《墙头马上》二剧系以明臧晋叔《元曲选》为底本，《东墙记》则基本据《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移录，皆曾参校他本，重要异文有校记。笔者研究曲韵时曾以《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继志斋《元明杂剧》、《占名家杂剧》、《新镌古今杂剧·柳枝集》等书中的有关内容参校，发现韵字的异文不多，且多与曲韵的研究宏旨无关。但亦有《戏曲集》因不谙曲韵而臆改致误，如《东墙记》四折[越调·络丝娘]作：“粉花笺写下更长漏水，专诉着瘦减香肌玉容。写罢了眉尖一皱，更教人悲痛。”“皱”，《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1939 年商务印书馆覆排本《孤本元明杂剧》均作“纵”。而《元曲选》中使用[越调·络丝娘]的十剧《合汗衫》、《小尉迟》、《倩女离魂》、《丽春堂》、《举案齐眉》、《两世姻缘》、《赵礼让肥》、《倚梅香》、《萧淑兰》、《望江亭》共 11 支，《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徐沁君校点，中华书局，1980 年）中的 6 剧《疏者下船》、《汗衫记》、《东窗事犯》、《七里滩》、《周公摄政》、《衣锦还乡》共 6 支皆于第三句押韵，曲律要求押韵，故白朴用“纵”。又，元好问套数[双调·乔牌儿]：“病将愁断送，愁把病来弄。春山两叶愁眉纵，断肠诗和泪封。”马致远《汉宫秋》一折：“眉头一纵，计上心来。”此亦可证王文才先生臆改为“皱”之误。

研究白朴曲韵，第一步工作是确定韵字，这比勾稽诗韵和词韵的韵字要难得多，原因是曲的韵律十分复杂，尤其是剧曲里数量众

多的衬字干扰了曲韵的辨认,而迄今尚无一本“完”而且“善”的曲韵书。笔者辨定韵字的主要方法是排比同曲牌的曲子。“正宫”、“大石调”、“仙吕宫”三个宫调的多数曲子,毛玉章的《元词斟律》(商务印书馆,1936年)据《元曲选》作了排比,故尽量利用其成果。惜乎该书只出了上编,而“小石调”、“中吕”、“南吕”、“双调”、“越调”、“般涉调”则付阙如。笔者和畏友宁继福自制《元曲选》全部索引,以资排比。另对《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也依法炮制。隋树森先生的《全元散曲》也是我们排比曲韵的重要资料。但剧曲与散曲的“习惯”要求似乎也有差异,如〔中吕·迎仙客〕首句,散曲58首中24首不叶,34首叶;《元曲选》36支曲中10支用韵,《元刊杂剧三十种》11支中3支入韵。

现存诸种曲谱当然是我们经常查阅的重要参考书,如今人吴梅的《南北词简谱》、王玉章的《元词斟律》、涂宗涛的《诗词曲格律纲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唐圭璋的《元入小令格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王力《汉语诗律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新二版)及明人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李玉的《北词广正谱》、清代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还有 Yuarn Music Dramas: Studies in Prosody and Structure and a Complete Catalogue of Northern in the Dramatic Style(《元代北曲之结构与曲律及金元戏曲北词谱》),by Dale R. Johnso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1980。

三

系联归纳,以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曲韵19韵来衡量,白朴剧曲及散曲的用韵情况如下表:

白曲用韵情况表

	剧 曲	散 曲
一东钟	东墙记四折[越调]14支	天净沙2支 德胜乐1支 阳春曲1支
二江阳		驻马听1支 阳春曲1支 小桃红1支
三支思	[越调·酒旗儿]1支	阳春曲1支 寄生草1支
四齐微	墙头马上二折[仙吕]12支 箭射双雕[中吕]14支	天净沙1支 德胜乐2支 阳春曲2支
五鱼模	梧桐雨楔子[仙吕]2支 墙头马上四折[中吕]13支 东墙记楔子[仙吕]2支	德胜乐1支 阳春曲2支
六皆来	墙头马上二折[南吕]13支 东墙记三折[中吕]16支	德胜乐1支 醉中天1支
七真文	东墙记一折[仙吕]12支	天净沙1支 阳春曲1支
八寒山	梧桐雨二折[中吕]14支	青杏子3支
九桓欢		
十先天	东墙记五折[双调]13支	天净沙1支
十一萧豪	梧桐雨四折[正宫]23支	庆东原1支 德胜乐1支
十二歌戈		恼煞人2支 伊州遍2支 尾声1支
十三家麻	梧桐雨三折[双调]20支	点绛唇7支 庆东原2支 天净沙1支 德胜乐2支
十四车遮	墙头马上三折[双调]18支	乔木查6支 驻马听1支
十五庚青	梧桐雨一折[仙吕]14支 东墙记二折[正宫]17支	
十六尤候	流红叶三折[正宫]17支	驻马听2支 阳春曲1支 沉醉东风1支

十七侵寻		天净沙 _{1支}
十八监咸	**	
十九廉纤		天净沙 _{1支} 阳春曲 _{1支}
曲数总计	235 支	60 支

* 《流红叶》杂剧残存[越调·酒旗儿]一支。“疑属四折残曲”，此曲叶支思韵。

** 无通首押桓欢、监咸二韵的曲子，但此二韵有少数字叶入其他韵。

四

在白朴现存作品中，除桓欢与监咸二韵未见通首使用外，其余 17 韵并非都各自壁垒分明，若干韵之间有通叶，甚至这种合韵现象颇为突出。兹述如下：

1. 东钟与庚青互叶

①个别东钟韵字叶入庚青。

《梧桐雨》一折[仙吕·金盏儿]叶“蒙盛敬卿情顶擎”。

按，“蒙”为东钟韵字。《元曲选》共使用[仙吕·金盏儿]85次，皆首句入韵，《元词斟律》于白朴此曲“蒙”下注“借韵”。《元刊杂剧三十种》出现 32 次，首句皆用韵。

《梧桐雨》一折[仙吕·混江龙]似叶“兴醒鞦灯令拥呈”

按，此曲最末两句为“多嗟是胭娇簇拥，粉黛施呈”，“拥”为东钟韵字。现存白曲共用[混江龙]四支，《东墙记》一折押真文韵，其最末两句也是对句，为“憔悴了玉肌金粉，瘦损了窈窕精神”，“粉神”皆叶。《墙头马上》一折及套数中的[混江龙]于“拥”、“粉”处则不押韵。《元曲选》有[混江龙]98首，其中《金钱记》、《争报恩》、《东堂老》、《楚昭公》、《梧桐雨》、《蝴蝶梦》、《救孝子》、《偈梅香》、《金线池》、《误入桃源》、《盆儿鬼》、《罗李郎》于“拥”处用韵。考虑到白朴

四支[混江龙]的押韵情况,《梧桐雨》一折中的“拥”字可能是韵字。

②一些庚青韵字叶入东钟。

《东墙记》四折[越调·秃厮儿]叶“东钟惊重”。

按,“惊”为庚青韵字,《元曲选》中《赚蒯通》、《争报恩》、《楚昭公》、《来生债》、《老生儿》等共19剧皆于“惊”处押韵。《元刊杂剧三十种》之《疏者下船》、《冤家债主》、《介子推》等9剧亦全如是。

《东墙记》四折[越调·圣药王]叶“境中浓鬆重东溶”。

按,“境”为庚青韵字。《元曲选》19剧中《鸳鸯被》、《赚蒯通》、《争报恩》、《楚昭公》等18剧,首句皆押韵,唯明初入贾仲名之《萧淑兰》不叶。《元刊杂剧三十种》9剧中,《调风月》、《疏者下船》等8种首句皆叶,唯郑光祖《周公摄政》不叶。

《东墙记》四折[越调·麻郎儿]叶“浓重紫弄”。

按,“紫”为庚青韵字。《元曲选》出现[麻郎儿]9次,如《鸳鸯被》、《小尉迟》、《谢金吾》、《倩女离魂》等于“紫”的位置均用韵。《元刊杂剧三十种》之《七里滩》、《周公摄政》二剧全叶韵。

《东墙记》四折[越调·绵打絮]叶“庭风重拥逢中”。

按,“庭”为庚青韵字。《白朴戏曲集校注》此曲首四句为“深闺静悄,幽僻庭空。月轮展纸,几扇屏风”(“空”为东钟韵字)。《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及覆排本《孤本元明杂剧》皆作“深闺静悄,幽僻空庭。月轮展纸,几扇屏风”,李玉《北词广正谱》作“深闺静悄,幽僻空庭。月轮碾纸,几扇围屏”,王文才的校语云:“作‘空庭’,失韵。”则是不了解白曲庚青时与东钟通叶的韵例,臆改而失误。《元曲选》之《倩女离魂》、《丽春堂》二剧之[绵搭絮]皆于“庭”处押韵,《元刊杂剧三十种》中《调风月》、《冤家债主》、《周公摄政》三剧于“庭”的位置上押韵,《东窗事犯》则否。

《东墙记》四折[越调·拙鲁速]叶“丛盈种共枕送梦”。

按,“盈”为庚青韵字。《元曲选》之《倩女离魂》、《丽春堂》、《两世姻缘》、《柳毅传书》四剧的[拙鲁速]皆于“盈”的位置上用韵。《元刊杂剧三十种》之《调风月》、《东窗事犯》、《周公摄政》三剧亦然。

2. 支思与齐微互叶

《箭射双雕》残折[中吕·六么令]似叶“士威议起欺随”。按,此曲系据《盛世新声》逐录,首二句为“他道是纵横壮士,他道是末周德威”,其中“士”是支思韵字。但李玉《北词广正谱》以此曲作为其紧上之《六么序》曲之部分,首句作“他道是纵横壮上周德威”,则“士”非韵字。但广正谱所录较今存明本曲集省减者不少。

小令[仙吕·寄生草](欢饮)似叶“思字事志非是”。按,“非”是齐微韵字,其他为支思韵字。《全元散曲》收[仙吕·寄生草]22首(内一首重见),第六句即“非”位置上押韵者有查德卿一首及无名氏5首。《元词斟律》录臧本68支同调作品,其中《金钱记》、《墙头马上》、《老生儿》、《儿女团圆》、《两世姻缘》、《金安寿》、《倚梅香》、《单鞭夺槊》于此处叶韵。《元刊杂剧三十种》31首内《调风月》、《老生儿》、《贬夜郎》、《周公摄政》用韵。白朴《墙头马上》一折[仙吕·寄生草]叶“密飞类碎系籍悴”,因此这首小令的“非”有可能是韵字。

3. 齐微与鱼模偶叶

《墙头马上》四折[中吕·耍孩儿]叶“诉古湖炉禄车福妻”。

此据《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本。《新镌古今杂剧·柳枝集》和《元曲选》本叶“诉古湖如曲车福炉”,则通支叶鱼模韵。

4. 歌戈与萧豪、鱼模互叶

套数[小石调·恼煞人]叶“波索”。

套数[小石调·伊州遍]叶“肚末苦著挫阁过锁”。

按,在《中原音韵》,“索”“阁”为萧豪韵字,“肚苦”为鱼模韵字。吴梅《南北词简谱》卷一云:“小石调曲,作者绝少,欲取他曲比附,又无从搜采。”“此曲只白兰谷一套”。吴氏批评《太和正音谱》、《钦定曲谱》与《北词广正谱》之误析,故笔者据吴梅所辨,确定韵字。

5. 先天与寒山、桓欢互叶

①寒山叶入先天。

《东墙记》五折[双调·沽美酒]叶“宣颜天殿见”。

按,“颜”为寒山韵字。白朴杂剧使用[双调·沽美酒]3次,另2次为《梧桐雨》三折,《墙头马上》三折,皆于“颜”处押韵。《元曲选》42剧如《金钱记》、《陈州糶米》、《冻苏秦》、《儿女团圆》、《渔樵记》、《青衫泪》、《隔江斗智》、《误入桃源》等均于“颜”处叶韵。《元刊杂剧三十种》9剧如《拜月亭》、《单刀会》、《博望烧屯》等亦然。

②先天叶入寒山。

《梧桐雨》二折[中吕·迎仙客]叶“甘绽间慳安践”。

按,“践”为先天韵字。凡押韵之文学作品末句必须用韵,故毋庸证明。此句末句为“因此上教驿使把红尘践”,明代李开先《词谑》嫌此字为先天,改“践”为“犯”。

《梧桐雨》二折[中吕·普天乐]似叶“限山盼雁鞍园安”。

按,“园”为先天韵字。该曲末三句为“伤心故园,西风渭水,落日长安”。《元曲选》内出现[普天乐]27支,在“园”位置上押韵的有《玉镜台》、《楚昭公》、《梧桐雨》、《合同文字》、《倩女离魂》、《王粲登楼》、《梧桐叶》、《误入桃源》、《百花亭》、《抱妆盒》、《赵氏孤儿》、《还牢末》12剧。另《墙头马上》四折[中吕·普天乐]末三句为“怎做家无二长,男游九郡,女嫁三夫”。脉望馆抄校本亦如是,《新镌古今杂剧·柳枝集》“家无二长”作“家无二主”,则叶韵。《元刊杂剧三十种》有[普天乐]的11剧中,《疏者下船》、《赵氏孤儿》、《范张鸡黍》、

《焚儿救母》4 剧在“园”的位置上押韵，另一剧似有脱文。故此《梧桐雨》二折[普天乐]中的“园”很可能是韵字。

③桓欢叶入先天。

《东墙记》五折[双调·梅花酒]叶“沿川原延鞭穿选銮边宣传”。

按，“銮”为桓欢韵字。《元曲选》录[梅花酒]35 支，如《汉宫秋》、《张天师》、《墙头马上》、《冻苏秦》、《渔樵记》、《刘行首》、《碧桃花》等皆于“銮”处押韵。

《东墙记》五折[双调·水仙子]似叶“喧缘怨然年断远圆”。

按，“断”为桓欢韵字。《元曲选》34 剧中《合同文字》、《玉壶春》、《蝴蝶梦》(二、四折)、《倩女离魂》、《扬州梦》、《王粲登楼》、《青衫泪》、《忍字记》、《红梨花》、《灰阑记》、《东坡梦》、《气英布》、《货郎旦》中第六句叶韵。《元刊杂剧三十种》13 剧中《调风月》、《赵氏孤儿》、《紫云亭》、《周公摄政》、《追韩信》、《博望烧屯》在“断”的位置上用韵，有一剧文字上可能有脱漏。

6. 廉纤与先天互叶，监咸与寒山互叶

①廉纤叶入先天。

《东墙记》五折[双调·驻马听]叶“坚仙贱檐源眷选践”。

按，“檐”是廉纤韵字。白朴《梧桐雨》三折，《墙头马上》三折，小令四首[双调·驻马听]于第四句均押韵，《元曲选》36 剧亦然，如《汉宫秋》、《荐福碑》、《城南柳》、《留鞋记》、《张生煮海》、《冯玉兰》。《元刊杂剧三十种》15 剧亦如是，如《拜月亭》、《单刀会》、《追韩信》、《竹叶舟》。

《东墙记》五折[双调·得胜令]叶“前宣筵烟剑绵贤”。

按，“剑”为廉纤韵字。《元曲选》出现 51 次，如《汉宫秋》、《救风尘》、

《墙头马上》、《虎头牌》、《桃花女》、《生金阁》、《冯玉兰》等皆于“剑”处用韵,《元刊杂剧三十种》出现 16 次,如《单刀会》、《遇上皇》、《替杀妻》、《焚儿救母》等亦如是。

②监咸叶入寒山。

《梧桐雨》二折〔中吕·迎仙客〕似叶“甘·绽间难·慳安·践”。按,“甘”为监咸韵字。《元曲选》36 支同调曲子中,《楚昭公》、《梧桐雨》、《合同文字》、《王粲登楼》、《鲁斋郎》、《后庭花》、《桃花女》、《红梨花》、《冤家债主》、《梧桐叶》首句叶韵。《元刊杂剧三十种》11 剧内《疏者下船》、《介子推》、《东窗事犯》、《焚儿救母》4 者亦如是。

7. 真文与侵寻偶叶

小令〔越调·天净沙〕(夏)似叶“簪·金·阴·愠·襟”。

按,“愠”为真文韵字。白朴《东墙记》四折〔天净沙〕叶“容·松·同·痛·胧”,小令一首叶“添·甜·檐·簾·帘”,皆为第 4 句用韵。《元曲选》5 剧即《楚昭公》、《来生债》、《酷寒亭》、《盆儿鬼》、《看钱奴》悉于第 4 句叶韵。《元刊杂剧三十种》之《调风月》、《汗衫记》2 剧亦如是。《全元散曲》108 首(内有复收)中商衞 1 首,张弘范 1 首,严忠济 1 首,白朴 2 首,马致远 1 首,张养浩 1 首,乔吉 4 首,张可久 32 首,徐再思 7 首,吴西逸 1 首,朱庭玉 1 首,李致远 1 首,王举之 1 首,周德清 2 首,孟昉 13 首,汤式 3 首,无名氏 7 首共 87 首于第 4 句叶韵。因此似可认为“愠”为韵字。

五

为给《中原音韵》及元曲研究者提供数据,列下表:

白朴曲韵韵字表

依《中原音韵》次序排列,字的右下角为出现次数,若为 1 次,则不标出。

1. 东钟

平声 阴 东₄○钟中₄ 衷终○通○冲○空₅○风₄○鬆₃○功攻公₂
 ○胸 阳 同₄ 桐鞏○穷○胧栊₂○浓₄○重○逢₂○丛○容₄ 溶
 蓉○蒙○红₂ 鸿 上声 种₃○拢○拥₂ 永₂○冗 去声 风○
 共₂○送₃○弄₂○控○痛₄○重₆○纵○梦₂

2. 江阳

平声 阴 妆₂○光○香₂○妨 阳 扬○梁○肠○娘₂ 上声
 往 去声 样恙○上₂○唱

3. 支思

平声 阴 肢○思₂ 司 阳 儿○时○词 上声 子 去
 声 是市士事₄○字○志至

4. 齐微

平声 阴 机₃ 基○归₂ 闺○低₃○妻₂ 姜栖○西₄ 嘶○杯○威₄ 偃
 ○非非飞₆○溪欺○稀₂○衣₄○推₂○盔窥○催○钼○知 阳
 离篱漓○媒₂ 眉○雷○随₄○齐₃○回○围₄○肥○期₃ 旗○移 疑
 宜仪○提○垂○皮○迟₃○谁₃ 人作平 实石₂ 射食拾○直₂○
 疾₂○习席₂ 上声 倚○美○己○里裹₃○底₂○起₄○你₃○喜○
 叁○水₂ 人作上 只○七戚○湿₃○息○的₃○得○隙 去声
 味○悴○议₂ 艺₂ 意₂○气₂ 器₂ 契○地₆○备辈被○唉○砌○细媚
 ○醉₃○队₂○计系₂ 骑○闭○睡₂○退○碎○坠○治○势₆○播类○
 珮辔○戏₂○内 人作去 蜜○密₂○力

5. 鱼模

平声 阴 居车○珠○疏₃○虚吁○孤姑辜○书₆○鬚醋○夫₂○
 初₂○都₂ 阳 闾○如₄○无₂○模^① 谋₃○图₂ 途○炉₂○與愚○
 娛₃○除踰○糊湖壶乎 人作平 毒突○属○俗○蜀 上声
 语雨与宇○缕○主○祖○古○府○母○举₂○许○取○苦₂○女₂

入作上 福○烛○曲○哭○簇 去声 觊○住柱○绪○妒
肚度○辅付妇₂○户扈护○诉○暮○路○顾○簿₂ 步○处○去₃○
聚 入作去 禄₂○睦○辱○玉狱₂

6. 皆来

平声 阴 堵₃ 阶街○该₃ 垓○栽灾₂○钗₄ 差○台胎○哀₂ 埃○猜
○挨₅○腮₄○歪₂○开₁₁○斋₂○乖₂ 阳 来₉ 莱○鞋谐₂ 骸₂○排
脾○怀₅ 槐○埋₂○捩₃^②○才₉ 财○台₅ 抬₂ 苔 入作平 白₅○宅
○划 上声 海₅○骇○霭○姝^③○解₅○改₃ 入作上 策₂○
格○客₄○摘侧○色₆○摔 去声 债₂○恣₃ 泰○盖₂○爱₇○奈₁
○害₇○带待₃ 黛○界₂○外₄○快○在₅○迈○赖₂○拜₂ 败○煞○赛
入作去 额

7. 真文

平声 阴 分₂ 纷₂○昏₅○因○身₂○春₃○跟○欣○真○新₂○滨
○君○温₂○村○亲₂ 阳 邻○频○人₁₀ 仁○伦○勤○门₃○论
○文○辰₇○唇○巡○匀○焚₂○魂₅○神₇○存 上声 引○狠
○忍₂○忖₂○粉 去声 阵○信○愠○尽晋○近○印○俊○顺
○润○问₃○闷₄○训○困₂○寸○恨₃○嫩○褪○趁^④

8. 寒山

平声 阴 山₄○干₂ 乾₂○安₃ 鞍○𡵓间₄○看₂○关₂○斑斑○弯○
番翻○珊○慳○餐 阳 寒₃○阑₃ 兰 栏○环₇ 鬟₂ 寰○残₂○闲₃
○檀₂ 弹○繁₂○难₃○蛮○颜₄ 上声 反○晚₂ 挽○板○简拣₂
○产○罕○盍₂○眼₂ 去声 汉翰汗○旦惮○万○按₂○灿○栈
綻₃○盼褰○僎○慢₂○惯₂○间○办瓣扮○泛^⑤○限○雁₂○散₃

9. 桓欢

平声 阳 銮 去声 断

10. 先天

平声 阴 先仙₂ 鲜₂○坚○娟○边编鞭○喧○迁○轩○烟○偏○
宣₃○川穿₂○天₄ 阳 连○绵○然○前₃○钿○贤₃ 悬○延筵₂
缘₃ 言₂ 沿○圆₃ 园原源○全₂○传₂○联○年₃ 上声 远○卷○
蹇○撚○显₂○浅○选₂ 去声 愿₂ 怨○见○殿₃○宴○眷₃○面
○便○羨₂○贱践₂○篆○恋

11. 萧豪

平声 阴 箫潇绡消₃ 宵₃ 霄○凋○梢₂○娇₃○蕉焦○标○交○
高₃ 膏皋○叨○骚○遭○朝₂○邀夭么腰○飘₂ 漂○敲₂○烧○操₂
阳 饶○苗₂ 描○迢条₂○朝○熬₂○翘○袍○咷○槽 人
作平 铎度○箔₂○着₃ 上声 袅鸟○了₄○遶绕○悄○搅○
老₂○恼₂○扫○早○倒₃ 捣○挑○沼₂○少○巧○晓○炒○草
人作上 角觉○索○剥○错○阁 去声 笑₂○调₂○爆瀑○抱
报₃○哀○兆照诏○道₃ 到₂○叫₃ 觉○罩○貌₂○噪○庙○闹₃○竅
○哨 人作去 乐约₂○幕寞○落₂ 乐₃○萼₂ 恶○虐

12. 歌戈

平声 阴 歌○过₂^ㄅ○波 人作平 着 上声 锁○舸○我
人作上 聒 去声 舵○挫○和○那○个○破 人作去
末寞○落

13. 家麻

平声 阴 家₃ 加₂ 茄₁○沙₃ 纱₁○鸦₂ 呀₂○差○花₁₃○瓜 阳
麻₂○诤华₃○牙₂ 芽涯₃○霞₄ 遐○琶₂○茶₃○拿○咱₃ 人作平
达踏₃○峡匣₃○伐₂ 罚○拔○杂 上声 马₄○洒₃○贾○寡刷
○瓦○打 人作上 榻塌○杀₄ 霎○察○法₂ 發₂ 髮○甲₂○搭
○飒₂ 撒○刮○八○掐₂ 去声 驾嫁价架○跨○亚讶○帕怕₃
○乍₂○下₁₃ 诿₂ 暇○化画₂ 话₄○那○罢₃ 霸○卦₂ 挂₄○骂 人作
去 腊○纳○押○袜₂

14. 车遮

平声 阴 嗟₃○奢₃○车₄○遮₂○些₁ 阳 爷₂ 呆₃○斜₂ 邪₂
 ○蛇○癩 入作平 穴₃ 挟₃ 纈○杰₃ 碣○叠₄ 迭牒₄○折₂ 舌○
 截₃○别₃○绝₄ 上声 野也₇ 冶○者₃○捨○惹₂○扯 入作
 上 切₄ 妾₂○结₅ 沾○怯₂○节₃ 接₃○血歇蝎○阙₂ 缺○决○铁帖
 ○撇○别₃ 撇₂○辙○折○雪₃○说₃ 去声 舍₂ 赦₂○谢₃ 榭○夜
 ○藉 入作去 灭○叶○业○洌○月₄○热₂○劣₂

15. 庚青

平声 阴 更惊○生₁₁○肩○兵○灯○撑○称○英紫○轻₄ 卿○
 清₅○声₆○听₃ 鞋○星₂ 醒○觥 阳 平屏₃ 瓶₂○明₅ 盟₃ 名₃ 鸣₃
 冥○灵₄ 棣零冷陵○盈赢瀛迎○擎₇○行₆ 形₁○情₁₀○婷庭₂○澄呈
 程₂ 成₆ 城₂ 诚₂ 盛₂ 乘○横○宁₃ 上声 景₃ 境₂○省○影₃○整₃
 ○鼎₂ 顶○冷○等○永₂ 去声 敬₂ 径镜○应₃ 硬₂○庆○命₂○
 挣○证₂○莹○病₁₄ 并凭○令₇○盛○性₆○娉聘○净静₂○幸₂ 倖兴₃
 ○称○定₇○听

16. 尤侯

平声 阴 揪₂○搜颺₂○休○鸥瓠₂○钩沟₂○兜○秋₃○幽₂○修羞
 ○洲州舟₂○收₄ 阳 游₃ 悠₂○侯○留₂ 流₆○柔₃○缪眸₂○楼
 楼○酬₂ 筹○毳○头₁₀ 投₂○愁₂ 入作平 逐₂○熟 上声
 友○柳₂○醜○久○手₃ 守○叟○偶○酒₂○走○口₃ 入作上
 竹烛 去声 又○昼○旧₃ 究₂○受₃○袖₃○皱○溜○候₃ 後₁○
 就₃○逗₃○穀○瓮○嗅○瘦₁○憊○透₂ 入作去 肉

17. 侵寻

平声 阴 金襟○簪○阴

18. 监咸

平声 阴 甘

19. 廉纤

平声 阴 缣○炊○添 阳 钳○檐严○甜； 去声 剑俭

总计如下：

白朴曲韵分韵字数及使用次数表

	东 钟	江 阳	支 思	齐 微	鱼 模	皆 来	真 文	寒 山	桓 欢	先 天	萧 豪	歌 戈	家 麻	车 遮	庚 青	尤 侯	侵 寻	监 咸	廉 纤	总 计
字数	44	13	14	114	84	73	56	65	2	57	100	18	78	68	88	67	4	1	9	955
使用 次数	89	17	17	189	113	186	97	105	2	88	147	19	159	136	190	128	4	1	10	1697

《中原音韵》未收字：

齐微：歧籍₁狼籍₁膝职₁ 皆来：歹₁碍₂获概₂杀₁ 萧豪：榔靠₃桌₁ 家
麻：娃他₇焮煞₁ 车遮：彻₃蜚辄烈₂咽捻₁ 庚青：莺楹₁饼幢另₅映₂⑦
尤侯：倏叩₁ 廉纤：簪₁

六

用其后的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衡量，现存白曲用了 17 韵，桓欢与监咸两韵字只零星地孱入他韵中。大体说来，《中原音韵》厘分 19 韵是符合元曲（我们这里只研究了白曲）用韵实际的。这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此可谓“大同”。

但二者也有一定差异，最显著的是白曲有若干通叶现象。据现今所知，白朴作曲时并无曲韵专书可循，只能凭自己的口语用韵。当然，不同的作家有押韵宽严的某些区别，再次，出于剧情等的需要，虽名家有时也难免落韵（《墙头马上》一折[仙吕·混江龙]“一刻春宵”句，《元词斟律》注“应叶”，则是落一韵。套数《仙吕·点绛

唇》中的[寄生草]“归绣帟”的“帟”字处亦落-一韵)、趁韵或借用邻韵的现象。当然,哪些是方言音同,或用韵宽泛,或牵强叶韵,则有待研究。

白朴曲韵的独用与同用可以下表显示:

东钟	江	支思	鱼	歌戈	皆	真文	监	寒	先	廉纤	家	车	尤
庚青	阳	齐微	模	萧豪	米	侵寻	咸	山:天	桓欢	麻	遮	侯	

(隔以实线者表示彼此不相杂厕,有虚线相连者表示有互叶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通叶现象主要在剧曲内:

《东墙记》五折共 13 支曲子,主体押先天韵,但一支入寒山,两支杂入桓欢,两支叶进廉纤。又,《梧桐雨》二折共 14 支曲子,押寒山韵,然叶入监咸韵一字,先天韵二字。先天与廉纤互叶,寒山共监咸同用,即周德清以为大病的“开合同用”。

东钟与庚青的通叶最为突出:《梧桐雨》一折 14 支曲子,叶入东钟两次;《东墙记》四折 14 支曲子,5 支叶入庚青字。据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云:白仁甫为真定籍曲家之首,其他作家为李文蔚、尚仲贤、史九敬先等,他们的现存剧作也有东钟与庚青相叶的现象,如李文蔚《燕青博鱼》三折[中吕·滚绣球么]叶“精清定_·权_·松_·青_·证生灯明”,《圯桥进履》一折[朝天子]叶“童_·精_·幸_·横_·共_·定_·恐_·并_·脰_·命”,尚仲贤《气英布》二折[南吕·骂玉郎]叶“柄_·生_·并_·重_·成_·定”,史九敬先《庄周梦》一折[仙吕·那吒令]叶“成_·空_·凶_·用_·瞳_·”。如为真定籍作家的共同特点,即是方言问题。但关汉卿、马致远也有这种现象,也许在“中原”曲家间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吧。

白朴曲韵有若干通叶现象,关汉卿及其他作家也存在或多或少的类似现象,那是不是周德清的书大有问题?我们认为,周德清的书是正音之书,煌煌书名下明标着“正语之本,变雅之端”。他大

声疾呼,要宗“中原之音”,要使戏曲家用韵一归于正。在《中原音韵序》中责备杨朝英,指出他的[德胜令]以“檐帘恹尖炊炊”(廉纤)与“怨”(先天)同押。在《正语作词起例》中又指出杨朝英的[水仙子]以“名清英”(庚青)“印村”(真文)和“今寻”(侵寻)“开合同押,用了三韵”,痛斥杨氏“词之法度全不知,妄乱編集板行,其不耻者如是”。周德清嘲笑、严责同时的曲家用韵混乱,然而他推崇备至的前贤白朴、关汉卿、马致远又何尝没有通叶现象呢?也许是为贤者讳,也许是不敢忤权威。他要推行他的根据实际语言分韵,曲家应严格遵循的主张,故据“中原之音”而著此书。可以说《中原音韵》是“作”而不是“述”。

明王骥德《曲律》卷二《论韵》:“德清浅士,……其所谓韵,不过杂采元前贤词曲,掇拾成编,非真有晰于五声七音之旨,辨于诸子百氏之奥也。又周江右人,率多土音,去中原甚远,未必字字订过,是欲凭影响之见,以著为不刊之典,安保其无离而不叶于正者哉!”既说周德清采编前贤词曲以着韵书,又说他多江右土音,是自相矛盾。不过二说皆影响深远,尤以前者为甚。陆志韦先生的《释中原音韵》(《燕京学报》第31期,1946年)开题就说:周德清“因为唱曲的需要,把当时盛行的北曲的韵脚,用纯粹归纳的工夫,排列成十九个韵部”,“所以他的老师是关郑白马”。廖珣英先生也说:“《中原音韵》是归纳关汉卿和别的元曲大家的杂剧用韵来区分韵部的。”如果仅用纯粹归纳的方法,怎样来对付前代和当代曲家中有同有异的各种合韵现象呢?只能说,周德清对“中原之音”有深刻的研究,据以审音定韵,有破有立,旗帜鲜明,绝非“述而不作”,所以《中原音韵》这部著作才有其永不磨灭的价值。

关于具体字的归韵,详见第五节白曲韵字表,略举数例以见其与《中原音韵》的同异,如“永”分别见于东钟、庚青,“烛”入鱼模和

尤侯,“着”两属歌戈与萧豪。但“射”只见于齐微,“客”和“额”只见于皆来不见于车遮,“觥”只见于庚青不见于东钟,“竹”只见于尤侯不见于鱼模。可注意者,[小石调·恼煞人]“波”叶“索”,[伊州遍]“锁”等叶“阁”,“索阁”是《中原音韵》的萧豪韵字。按,中古铎药觉韵的入声字重见于《中原音韵》的萧豪、歌戈二韵,白曲既以“阁索”叶歌戈,是不是《中原音韵》的歌戈韵漏收了呢?更堪重视的是白曲韵字中《中原音韵》未收者达 31 字(其中皆来的“杀”与家麻的“煞”也许是字形问题),如果周德清真的下了纯粹归纳的功夫就不应漏收这些字,尤其是那些文学作品中的常用字。须要申言的是,本文所研究的只是白朴的现存作品,估计约占白朴作品的 1/5,如若白朴全部作品传世,那与《中原音韵》的同处也必增多,而异处也必增多。

关于声调,首先,中古人声字在白曲中与阴声字通叶,《中原音韵》派入何声皆著之于谱,而在白曲中是不是也押入那一声呢?其次,有些非入声字在同韵内有两调,如“醒听过凭”等,怎样确定它们在某具体押韵位置上的声调呢?如能确定它们,以与《中原音韵》相较该是件有意义的工作。得凭同曲牌的作品排比,如《梧桐雨》一折[仙吕·醉中天]叶“凭擎扇静影听盟”,小令[醉中天]叶“在灾来杀白恁腮”,要辨“凭杀白听”的声调,我们以《元曲选》所收同调作品 44 首,《元刊杂剧三十种》12 首,《全元散曲》20 首同部位的韵字各自排比,结果只能得到“凭”是仄声(因同部位的多是去声、上声和入声字,平声字只有两个)而不知它是去声抑或上声。“听”是去声(同部位的多是去声字,少数上声字,一个平声字)。“杀”字(中古入声字)只能定为仄声字。至于“白”字(中古人声字),无法确定,因相当位置上的字的分布百分比如下表:

	《元曲选》	《元刊杂剧三十种》	《金元散曲》
平	45.5%	50%	40%
上	29.6%	16.7%	25%
去	18.1%	33.3%	20%
入	6.8%		15%

又如《梧桐雨》一折[仙吕·醉扶归]第五韵字“听”字,以上表三书同曲牌的作品排比,相同部位的韵字分布很散,平上去入皆有一定数量,结果这一“听”字在白曲里该是何调,难定。古入声字更是难以确定其声调,故本文第五部分古入声字的排列位置悉据《中原音韵》,并非从白曲或其他曲韵排比归纳得来,有些非入声字而具两调的又读字姑置于其中一处,皆不得已也。以元曲具体用韵来核校《中原音韵》入派三声是否正确,是有意义的,也是艰难的。

【附注】

- ①《墙头马上》四折[中吕·满庭芳]第六七两句,王文才本作“他那三昧手能修手,模读五车书,会写休书”,则是两“书”字入韵,《元曲选》作“他那三昧手能修手模,读五车书会写休书”,则“模”、“书”叶韵,甚是。据 D. R. Johnson 书,此曲第六七两句均六字句,且为对句,又“手模”,不应拆开,义为“手印”,《任风子》三折[中吕·普天乐],《遇上皇》一折[仙吕·天下乐]之“手模”可证。
- ②“捱”,《中原音韵》有平去二音,现将白曲韵字“捱”姑置于平声内,《东墙记》三折[中吕·醉春风]第三句,《孤本元明杂剧》叶“捱”字,王本改为“移”,兹从前者。
- ③“姝”即《中原音韵》之“奶”。
- ④《东墙记》一折[仙吕·寄生草幺]“郎才女貌皆相趁”,“趁”字脉望馆本及《孤本元明杂剧》本作“称”。
- ⑤《梧桐雨》二折[中吕·古鲍老]“更带着瑶琴音泛”,“泛”诸本作“范”。
- ⑥“过”有平去二音,姑置于此。

⑦《中原音韵》有“𦉑”，《正字通》云：“𦉑，俗之映字。”

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宁继福同志的大力支持，如为我制《元曲选》索引即是一端，高谊可感；周维培同志的帮助也令我感激。本文发表于《中原音韵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近读宁宗一《白朴杂剧创作研究综述》（《元杂剧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该书指出《东墙记》的作者问题有争议：一说白朴作，一说经明人篡改，一说乃元末明初无名氏作。看来《东墙记》用韵的特殊并非无因。

从曲律、曲韵查核诸家对白朴曲点校的失误

元代著名散曲作家、戏剧评论家周德清在其《中原音韵·序》中说：“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关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说：“元代作家，自明以来，称关马郑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诣论之，宁称关白马郑为妥也。”作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历来得得到高度的评价。白朴剧作，据《录鬼簿》著录，共 15 本，加上见于明代戏曲选本的《李克用箭射双雕》残折，共 16 本。他也作了不少套数和小令。遗憾的是，散佚甚多。近 40 年，中国大陆出版的元杂剧选集几乎无不收录白朴的作品，王文才的《白朴戏曲集校注》是现存白朴作品的汇集，既有剧曲，又有散曲，兼附词集。

元曲的格律十分复杂，较词为甚，较诗更甚。而辨析曲律，戏曲又远难于散曲，所以研究曲律的专书，无代无之，至今不衰，甚至西洋学者亦有著作，且水平甚高，于此亦可见个中消息。若要从事元曲的断句及校勘工作，除了必须具备校勘学教科书中所要求的条件、学养、方法等外，尚须娴熟地掌握曲律、曲韵，令人抱憾的是，这恰恰被忽视，也许是曲律、曲韵之学过于专门，一般的校勘家、点校者难于兼通之故。笔者依据曲律和曲韵，查核近 40 年大陆出版的收有白朴作品的集子，发现诸书对白朴曲的点校均有或多或少的错误。以白朴剧曲而论，现存 235 支曲子，其中 42 支曲子（占

18%)出现点校错误 66 次。

现将诸书开列于下,其点断失误数随记于后。

《白朴戏曲集校注》(以下简称《校注》),王文才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收《梧桐雨》、《墙头马上》、《东墙记》3 全本及《流红叶》残折、《箭射双雕》残折,另散曲 60 首。点断错误数 47。另误校 2 则。

《元曲选》,明臧晋叔编,中华书局本,笔者使用的本子其版权页作“1958 年 10 月第 1 版,1979 年 6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卷首有隋树森 1961 年《校订说明》:“中华书局利用过去世界书局的旧版本,嘱我作一次校勘,改正了不少断句和排版上的错误,重印以应读者需要。”中华书局编辑部 1977 年《重印说明》:“这次重印,我们以 1961 年重印本与涵芬楼影印本校对,并重新审核断句有无差错,改正了 200 余处明显的错误。”其第 1 册收《墙头马上》、《梧桐雨》2 剧。1989 年出重排本。旧本点断错误数 17,重排本改正了 1 处错误,而较严重的错误则未改,还新增 3 处错误。中华书局的《元曲选》是印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本子,至少经过 3 次修改,而重排本点断失误反有增加,颇为费解。“重新校勘和标点”,当待何日?

《元曲选外编》,隋树森编,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 版,1987 年第 4 次印刷。隋树森 1981 年《编者附言》说,第 3 次、第 4 次印刷时都改正了若干错误。收《东墙记》。点断错误数 3。

《元人杂剧选》,顾肇仓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年印刷本。收《梧桐雨》。点断错误数 9。

《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王季思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年。收《墙头马上》。点断错误数 4。

《元曲四大家名剧选》,徐沁君、陈绍华、熊文钦校注,齐鲁书社,1987 年。收《梧桐雨》、《墙头马上》。点断错误数仅为 1。

《元杂剧选注》，王季思等选注，北京出版社，1985年。收《梧桐雨》第二、三折，《墙头马上》三折。点断错误数5。

《中国戏曲选》上，王起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收《梧桐雨》第三、四折，《墙头马上》三折。点断错误数3。

《元代杂剧赏析》，陈俊山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收《梧桐雨》第四折。点断错误数5。

《元代戏曲选注》，胡忌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收《墙头马上》第二折。点断错误数1。

《元人杂剧钩沉》，赵景深辑，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收有《流红叶》残折，《箭射双雕》残折。点断错误数2。

笔者查核诸家对白朴曲点校失误的程序是，每读白朴一曲后，即查曲谱一类的书，了解其曲律、曲韵，以决定其某一位置是否应点断。如诸曲律书有相互矛盾处，经比较研究后择善而从。重要办法是，笔者及畏友宁继福曾将《元曲选》及《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徐沁君校，中华书局，1980年）的曲子制成索引（后见Johnson书，亦有索引），因此某一曲牌某位置点校是否有误，曲律书孰是孰非，一般地说，只要将同宫调同曲牌的曲子类聚在一起，辨析后便可得知。

笔者使用的曲律书有下列9种：一、《太和正音谱》，明朱权撰。二、《北词广正谱》，清李玉撰。三、《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清周祥钰等编。四、《南北词简谱》，吴梅著。五、《元词斟律》上编，王玉章著，商务印书馆，1936年。六、《汉语诗律学》（增订本），王力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年。七、《元人小令格律》，唐圭璋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八、《诗词曲格律纲要》，涂宗涛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九、Yuan Music Dramas: Studies in Prosody and Structure and a Complete Catalogue of Northern in the Dramatic

Style(《元代北曲之结构与曲律及金元戏曲北词谱》), by Dale R. Johnso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1980。下文征引此 9 书时概以著者名代书名。

本文所认为的断句上的失误,不是指点断后用新式标点符号时,打句号还是打逗号甚或顿号的问题(这当然也有是非,但见仁见智的因素也不在少,故不具论);也不是指按律不应点断而据文意点断的问题,如《梧桐雨》3 折[双调·沉醉东风]第 6 句“剿除了贼徒救了国家”,有的书在“徒”后点断。本文认为的点断的失误是指:一、依曲律为一句,应点断而不断者,特别着重指出的是,押韵处必须点断。元人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二“续补句读例”：“凡诗铭韵语,以韵为句。”可是不少点校元曲者往往在这儿犯错误,原因是不谙曲韵,特别是对那些古入声字在剧曲中如何辨别的问题闹不清楚。二、也指那些据律不该断,从词汇学角度也不应断的问题。至于文字的脱漏和讹误现象附于文末。下面依白曲的顺序胪列诸家的失误之处。

一、断句之误

(一)《梧桐雨》

楔子 [仙吕·端正好么篇]首 2 句

《校注》页 6“且着你做节度渔阳去”,《元曲选》页 350、《元人杂剧选》页 82 并同。

按,[仙吕·端正好]正格与么篇句法悉同,首 2 句皆为 3 字句,朱权、吴梅、王玉章、Johnson 都如此认为。吴梅云:“《广正谱》又将么篇首句作 7 字语,更误。”此处“且着你”是衬字,“做节度”为正字,与“渔阳去”皆为 3 字句,且“度”押韵,故应于其后点断。可为佐证的例子有《薛仁贵》楔子“你如今离了村庄,别了乡党”(按,衬

字下加点),《金线池》楔子“郑六遇妖狐,崔韬逢雌虎”等等(为节省篇幅,此后一般不举此类佐证例)。

一折 [仙吕·天下乐]第2、3句

《校注》页12“惊的那娉婷将銮驾迎”

按,李玉、周祥钰、吴梅、王玉章、涂宗涛、Johnson皆认为第2句为2字句,第3句为3字句。王力页806将2、3两句并为5字句,Johnson第279页以为非是。王玉章定“惊的那”为衬字,“娉婷”为正字,“婷”押韵,点断,是为第2句。“将”衬字,“銮驾迎”是第3句。《校注》页100《东墙记》一折[仙吕·天下乐]第2、3句为“欢欣,可意人”,点断。甚是。王文才先生对同一曲牌,点断与否,前后相违。

一折 [仙吕·赚煞尾]第6、7句

《校注》页15“月澄澄银汉无声”

按,朱权、吴梅、王玉章、涂宗涛、Johnson皆认为此曲共11句;第6句为3字句,第7句为4字句,王玉章卷三页191指出2句“皆须调韵”。则“月澄澄”为1句,“澄”字押韵,必断,“银汉无声”为1句。《校注》页56《墙头马上》一折[仙吕·赚煞]第6、7句为“莫疑迟,等的那斗转星移”,如此断句,方为正确。

二折 [中吕·叫声]第2、3句

《元人杂剧选》页91“等闲等闲”,《元杂剧选注》页128同。

按,周祥钰、吴梅、王力、Johnson皆以第2、3句为叠句,两“闲”字押寒山韵,应断。

二折 [中吕·醉春风]第4句

《校注》页18“把一搭儿亲自拣拣”

按,李玉、周祥钰、吴梅、王力、涂宗涛、Johnson以此章第四句为叠字,或叠前句末字,或自叠;可叠2字,也可叠3字,且押韵,故

两“拣”间应点断。《校注》页 112《东墙记》、页 145《箭射双雕》的[中吕·醉春风]第四句的两叠字皆点断,可见其前后不一。

二折 [中吕·古鲍老]首句

《元曲选》页 354 “屹刺刺撇开紫檀黄翻绰向前手拈板”

按,“檀”是韵字,应于此后断开。

二折 [中吕·古鲍老]第 5、6、7 句

《校注》页 20 “红牙筋趁五音击着梧桐按”,《元人杂剧选》页 93 同,《元杂剧选注》页 129 同(但“按”作“案”)。

按,李玉、周祥钰、吴梅、Johnson 皆认为 5、6、7 句悉为 3 字句,因此“筋”、“音”二字后须点断。

二折 [中吕·剔银灯]第 5、6 句

《校注》页 20 “那些个齐管仲郑子产”,《元人杂剧选》页 93、《元杂剧选注》页 130 并同。

按,朱权、李玉、周祥钰、吴梅、王力、Johnson 皆认为第 5、6 两句是两个 3 字句,“那些个”是衬字,“齐管仲”后应断。

三折 [双调·搅筝琶]第 10、11 句

《元曲选》页 358 “看寡人也合饶过他一地胡拿”

按,吴梅卷三第 11 叶指出“他”处叶韵,应点断,甚是。

三折 [双调·太平令]第 5、6、7 句

《元曲选》页 359 “你呀。见他问咱。”

按,李玉、周祥钰、吴梅、王力、唐圭璋、Johnson 皆认为 5、6、7 句均为 2 字句,末字均叶韵,如是则“他”后应断。请看《元曲选》对同宫调同曲牌同一位置如何点断,页 292《楚昭公》“这信誓。在彼。怎悔。”(1989 年重排本反而增加错误,“彼”不点断。)页 342《墙头马上》“相公便把贱妾。拷折。下截。”(1989 年重排本竟然也在“折”处不断。)页 731《陈抟高卧》“纵有那女娘。艳妆。洞房。”同一

书内自乱其例,不同版间矛盾齟齬。

三折 [双调·川拨棹]第1、2句

《元曲选》页360 “痛怜他不能勾水银灌玉匣”,《元人杂剧选》页103、《元杂剧选注》页140、《中国戏曲选》页89 并同。

按,李玉、吴梅、王力、Johnson 均认为首句为3字,“他”字叶家麻韵。Johnson 页124 注指出,《元曲选》应于“他”后点断,加标点,其说甚是。

四折 [正宫·端正好]第1、2句

《校注》页36 “自从幸西川还京兆”,《元曲选》页360、《元人杂剧选》页106、《元代杂剧赏析》页148 并同。

按,朱权、周祥钰、李玉、吴梅、王玉章、王力、涂宗涛、Johnson 皆定此章共5句,首2句皆为3字句,对仗。“川”后应点断,“自从”乃衬字。

四折第3曲 [正宫·滚绣球]第5、6句

《校注》页37 “这待诏手段高”,《元代杂剧赏析》页148 同。

按,王玉章谓此章格律第1、2、3、4句为第1叠,第5、6、7、8句为第2叠,句法大抵相同,两叠首句“均可叶韵,或均不叶韵”。白朴《梧桐雨》此曲叶韵,“诏”系韵字,应于其后点断。类似例子有《鸳鸯被》二折“他为咱,我为他”,《救风尘》三折“你则是忒现新、忒黄昏”。

四折第4曲 [正宫·倘秀才]第4、5句

《校注》页37 “谁想你乘彩凤返丹霄”

按,朱权、周祥钰、李玉、吴梅、王玉章、涂宗涛、Johnson 都认为第4、5 是两个3字句,对仗,则“乘彩凤”后应断,“谁想你”是衬字。

四折第4曲 [正宫·倘秀才]第5、6句

《元曲选》页 361 “返丹青命天”

按,“命天”为 1 句,其前为 1 句,“霄”叶韵。

四折第 10 曲 [正宫·倘秀才]第 4、5 句

《校注》页 38 “甚法儿捱今宵”

按,“甚法儿”为 1 句,应断,理由同上“乘彩凤返丹青”两句。

四折第 10 曲 [正宫·倘秀才]第 5、6 句

《元曲选》页 361 “捱今宵懊恼”

按,“捱今宵”为 1 韵,“宵”是韵字。

四折 [正宫·芙蓉花]第 3、4 句

《校注》页 38 “玉漏迢迢才是初更报”

按,据朱权、李玉、周祥钰、吴梅、王玉章、Johnson,“玉漏迢迢”为 1 句,“迢”叶韵。

四折第 14 曲 [正宫·倘秀才]第 4、5 句

《校注》页 39 “道太真妃将寡人邀”,《元人杂剧选》页 108、《中国戏曲选》页 94、《元代杂剧赏析》页 150 并同。

按,“太真妃”为 3 字句,其后应断。

四折第 14 曲 [正宫·倘秀才]第 3、4、5、6 句

《元曲选》页 362 “忽见青衣走来报道太真妃将寡人邀宴乐”

按,连续四句竟不点断。吴梅于“报”后点断,王玉章在“道”后点断,是为第 3 句。“妃”“邀”后也应点断。“报(或道)”、“邀”、“乐”皆萧豪韵字。

四折第 17 曲 [正宫·滚绣球]第 7、8 句

《元人杂剧选》页 109 “碎声儿剝剥增百十倍歌和芭蕉”,《元人杂剧赏析》页 151 同。

按,此为第 2 叠第 3、4 句,同折有 3 支[滚绣球],自可比较。通折押萧豪韵,“剥”在周德清《中原音韵》隶萧豪韵“入声作上声”,系

韵字,其后应点断。

四折第17曲 [正宫·滚绣球]第10、11句

《元曲选》页362 “平白地漈瓮番盆下一宵惹的人心焦”

按,“宵”为第10句末字,押韵。1989年重排本改正了这一错误。

四折第19曲 [正宫·倘秀才]第4、5句

《校注》页40 “只好把泼枝叶做柴烧”,《元曲选》页363、《元人杂剧选》页109、《中国戏曲选》页95、《元代杂剧赏析》页151并同。

按,应于“叶”后点断,理由见前。此折使用了4支[倘秀才],而断句往往不一致,良可注意,这是由于编者据文意信手点来,置曲律于不顾,连一折之内的4支同曲牌的曲子都不能取来比较,遑论他剧?

四折第19曲 [正宫·倘秀才]第5、6句

《元曲选》(1989年重排本)页363 “做柴烧锯倒”

按,韵字“烧”后应点断。此曲第4、5、6句“只好把泼枝叶,做柴烧,锯倒”,《元曲选》1979年第3次印刷本“叶”后未断,但“烧”后点断;1989年重排本对前者改谬为正,但对后者却弃正从误,可谓得之东隅,失在桑榆。

四折第20曲 [正宫·滚绣球]第9、10、11句

《元曲选》页363 “是兀那当时欢会栽排下今日凄凉厮挨着暗地量度”

按,21字竟不分句!“下”后应点断,“着”后也应点断,“着”“度”皆为《中原音韵》萧豪韵“入声作平声”字,与其他古阴声字相叶,《梧桐雨》第四折押萧豪韵。如将本折所使用的3支[滚绣球]略作比较,这一错误便不致发生。

(二)《墙头马上》

一折 [仙吕·天下乐]第2、3句

《校注》页53 “嗜萱堂又觑着面皮”，《元曲选》页333、《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页37、《元曲四大家名剧选》页497 并同。

按，“萱堂”为第2句，两字句，应点断，其前之“嗜”是衬字，理由见上《梧桐雨》一折[仙吕·天下乐]条。王玉章卷四叶74：“其第二语为两字”，“而并不叶韵者”，“如《墙头马上》是”。

一折 [仙吕·那吒令]第1、2句，第3、4句，第5、6句

《校注》页53 “本待要送春向池塘草萋，我且来散心到荼蘼架底，我待教寄身在蓬莱洞里”，《元曲选》页333、《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页37 并同。

按，朱权、李飞、吴梅、王玉章、唐圭璋、涂宗涛、Johnson 皆以第1句为2字句，第2句为4字句。第3、4句，第5、6句同之。所以“送春”、“散心”、“寄身”后应点断，其前3字、后1字乃衬字。

一折 [仙吕·寄生草]第3句

《校注》页54 “这人、人和柳浑相类”

按，于曲律此为1句，不宜点断。“人人”是宋元常用词，对昵爱者之称，如欧阳修《南乡子·好个人人》“好个人人，深点唇儿淡抹腮。花下相逢，忙走怕人猜。”周邦彦《红窗回·几日来》：“有个人人，生得济楚。”杨端臣《渔家傲》“有个人人情不久，而今已落他人手。”《董西厢》卷四《中吕调·占轮台》“怎不教那稳色的人人挂心头。”“人人”岂能拆开？

二折 [南吕·骂玉郎]第5、6句

《校注》页61 “把你那小性格且宁奈”，胡忌《元代戏曲选注》页59 同。

按,朱权、李玉、周祥钰、吴梅、王力、唐圭璋、Johnson 皆以此章末两句为两个 3 字句。通首押皆来韵,在《中原音韵》里,“格”为皆来韵“入声作上声”字,此亦为应点断的理由之一。“把你那”是衬字。

三折 [双调·太平令]第 5、6、7 句

《校注》页 73 “相公便把贱妾拷折下截”,《元曲选》(1989 年重排本)页 342“相公便把贱妾。拷折下截”。

按,据曲律应分为 3 句,详见前述。按曲韵“妾”“折”“截”3 字皆为古入声字,在《中原音韵》都变为车遮韵字,其后均应点断。《元曲选》原排本不误,重排本反误。

三折 [双调·七弟兄]第 1、2、3 句

《校注》页 74 “是那些劣愒,痛伤嗟也”,《元曲选》页 342 同。

按,朱权、李玉、周祥钰、吴梅皆认为此曲牌前 3 句依次是 2 字句、2 字句、3 字句,因此“些”后也应点断,“些”“愒”均车遮韵字。《喜剧集》页 48、《元杂剧选注》页 118、《中国戏曲选》页 108、《元曲四大家名剧选》页 537 皆以第 3 句为“痛伤嗟”,“也”字属下,“嗟”亦为车遮韵字。Johnson 页 116 注云:“第一句缺。”可能是据中华书局《元曲选》本标点误言。

四折 [中吕·醉春风]第 4 句

《校注》页 82 “怎想有这场苦苦”

按,两“苦”间应断,理由见前。

四折 [中吕·满庭芳]第 6、7 句

《校注》页 83 “他那三昧手能修手,模读五车书,会写休书”

按,据李玉、周祥钰、吴梅、唐圭璋、涂宗涛,第 6 句应押韵。据 Johnson,第 6、7 句皆 6 字句,且为对句,因此应作“他那三昧手能修手模,读五车书会写休书”,“模”“书”均叶鱼模韵。“手模”2 字不

应拆开，义为手印，旧时契约文书，有关之人须打手印。元曲中不乏此词，如《任风子》三折〔中吕·普天乐〕“将手帕铺在田地，就着这水渠中插手在青泥内，打与你个泥手模便当休离。”《遇上皇》一折〔仙吕·天下乐〕“动不动要手模，是不是取招状”。

四折〔中吕·石榴花〕第4、5句

《校注》页83 “你是簪付、负与、何辜”，《元曲选》（1989年重排本）页345“你是簪付负与何辜”。

按，朱权、李玉、周祥钰、吴梅、Johnson皆以第5句为4字句，故应作“你是簪付、负与何辜”。《元曲选》第1版不误，重排本反而失误。

四折〔中吕·上小楼〕第6、7句

《校注》页84 “幸得个鸾凤交琴瑟谐”

按，李玉、周祥钰、吴梅、唐圭璋、Johnson皆以第5、6句为两个3字句，则“交”后应断开，“幸得个”是衬字。

四折〔中吕·上小楼么篇〕第6、7、8句

《校注》页85 “一个儿一个女都一时啼哭”

按，“儿”“女”后都应点断，与同曲牌曲子比较亦可知。

（三）《东墙记》

一折〔仙吕·油葫芦〕第6、7句

《校注》页100 “罗帏绣被寒孤，欲断魂”

按，《元曲选外编》页203作“罗帏绣被，寒孤欲断魂”。王玉章卷四叶61：“此章正格九句”，“第6、7语均三字”。Johnson亦持是说，但于页313为此曲特加注云，第6句不合常规，为两个2字并列的4字词组“罗帏绣被”，则“寒孤”属下。

一折〔仙吕·赚煞〕第5、6句

《校注》页102 “串香焚被冷谁温”

按,此曲又名“赚煞尾”,应有11句,而此章只10句。Johnson页197云,第5句缺,则“串香焚”为第6句,末字押韵;“被冷谁温”实为第7句。参见上关于《梧桐雨》一折[仙吕·赚煞尾]条。

二折 借[中吕·上小楼]第3、4、5句

《校注》页108 “想前夜月下,鸣琴韵,和新诗,福至心灵”

按,依律此3句为3个4字句,如同书页84《墙头马上》四折作“治国忠直,操守廉能,可怎生做事糊突”(下加点者为衬字),同书页112《东墙记》三折作“只见他东倒西歪,倚床靠枕、身体斜挨”,故此处应为“想前夜月下鸣琴,韵和新诗,福至心灵”。

四折 [越调·秃厮儿]第4、5、6句

《校注》页120、121 “恨人,又见花梢儿窗影下重重”,《元曲选外编》页214则通为1句。

按,Johnson页287云,此曲前四句皆以“恨人”2字置前。朱权、周祥钰、王力、涂宗涛、Johnson以第4、5句均为3字句,第6句为2字句,因此应作“恨人又见花梢儿,窗影下,重重”。

五折 [双调·七弟兄]第1、2、3句

《校注》页126 “我这里向前,谢得完全”,《元曲选外编》页217同。

按,“我这里”为首句,“向前”为次句,“谢得完全”乃第3句。理由见上关于《墙头马上》三折[七弟兄]条。

(四)《流红叶》三折

[正宫·端正好]第3、4句

《校注》页135 “趁西风独步闲游想一年世事如翻手”

按,“游”后应断。

借[中吕·古鲍老]第5、6、7句

《校注》页136 “浑一似血染般胭脂透”，《元人杂剧钩沉》页8同。

按，应于“似”、“般”后点断，参见前《梧桐雨》二折[古鲍老]条。

(五)《箭射双雕》残折

[中吕·粉蝶儿]第4、5句

《校注》页145 “一个个手张狂脚趂趂”

按，朱权、李玉、周祥钰、吴梅、涂宗涛、Johnson皆以4、5两句为两个3字句，故“狂”后应断（“一个个”乃衬字）。

(六)散曲

[仙吕·寄生草]第1、2句

《校注》页162 “凭阑久归绣纬”

按，朱权、李玉、吴梅、王力、涂宗涛、唐圭璋、Johnson皆以首2句为两个3字句，故此处应折作两句。

[双调·挂搭沽序么篇]第5、6、7句

《校注》页158 “柳絮飞玉砌。长郊万里，粉污遥山千叠”

按，李玉、周祥钰及隋树森《全元散曲》以“玉砌”属下，则后2句大致相对，似较胜。

二、误校

以上均为断句之误。误校两则如下。

《校注》页122《东墙记》四折[越调·绵打絮]“深闺静悄，幽僻庭空；月轮展纸，几扇屏风。似海棠半醉春睡重，鲛绡上绿鬓拥。有情人何日相逢，几时得赴高唐梦中。”明赵琦美脉望馆抄校本《古今

杂剧》及商务印书馆 1939 年复排本《孤本元明杂剧》第 2 句皆作“幽僻空庭”，李玉《北词广正谱》首 4 句作“深闺静悄，幽僻空庭；月轮碾纸，几扇围屏”。王文才校记云：“作‘空庭’，失韵。……今乙转。”孰是孰非？依律，此曲第 2 句必押韵，如是“庭”字，在《中原音韵》为庚青韵字；如是“空”字，为东钟韵字。其下之“风重拥逢中”皆隶东钟韵。《东墙记》四折共用越调 13 个曲牌 14 支曲子，有 4 支确是东钟与庚青通叶：[秃厮儿]叶“东钟惊重”（下有。号者为庚青韵字），《圣药王》叶“境中浓松重东溶”，[麻郎儿]叶“浓重萦弄”，[拙鲁速]叶“丛盈种共枕送梦”，则此[绵打絮]岂无可能为第 5 支？又，白朴《梧桐雨》一折也有 2 例：[仙吕·金盏儿]叶“蒙威敬卿情顶擎”，[仙吕·混江龙]叶“兴醒鞋灯令拥呈”。白朴是真定人，其他真定作家如李文蔚《燕青博鱼》3 折[中吕·滚绣球么]叶“精清定棖松青证生灯明”，尚仲贤《气英布》2 折[南吕·骂玉郎]叶“柄生并重成定”，史九敬先《庄周梦》11 折[仙吕·那吒令]叶“成空凶用瞳”皆为东钟、庚青互叶例。关汉卿剧曲亦有此现象（详见廖珣英《关汉卿戏曲的用韵》，《中国语文》1963 年 4 期）。可见此[绵打絮]曲首韵作“庭”为是，不明曲韵通叶之例则致误改。

《校注》121《东墙记》四折[越调·络丝娘]“粉花笺写下更长漏永，专诉着瘦减香肌玉容。写罢了眉尖一皱，更教人悲痛。”校记：“原抄‘皱’作‘纵’。”此不言证据而径改。“纵”是而“皱”非，有 3 证：一、脉望馆抄校本、《孤本元明杂剧》均作“纵”。二、作“纵”叶韵，反是不叶，此须考察[络丝娘]第三句是否押韵。查《元曲选》中《合汗衫》、《小尉迟》、《倩女离魂》、《丽春堂》、《举案齐眉》、《两世姻缘》、《赵礼让肥》、《伯梅香》、《萧淑兰》、《望江亭》10 剧中的 11 支[络丝娘]均于第 3 句叶韵。《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的《疏者下船》、《汗衫

记》、《薛仁贵》、《东窗事犯》、《七里滩》、《周公摄政》6 剧中的 6 支曲子亦然。三、在元代,主语“眉”后可用动词“纵”,如元好问[双调·乔牌儿]“病将愁断送,愁把病搬弄。春山两叶愁眉纵,断肠诗和泪封。”马致远《汉宫秋》第一折前宾白:“眉头一纵,计上心来。”今尚有人如此使用,汪曾祺《云致秋行状》:“致秋有个习惯,说着说着话,会忽然把眉毛、眼睛、鼻子‘纵’在一起,嘴唇紧闭;然后又用力把嘴张开,把眼睛、鼻子挣回原处。这是用粉彩落下的毛病。”(1983 年)

白朴作品散佚甚多,现存者未见有元刊本,皆为明本,校勘问题本不多,上述二则系臆改致误,原因在不明韵例,不谙曲律。

三、文字脱漏、讹误及其他

《校注》页 135《流红叶》[正宫·叨叨令]“啗两个去来也波哥”句应叠,竟夺一句。

《元曲选外编》页 212《东墙记》三折[中吕·三煞]“几得一发明白”,“几”后脱“时”。

《校注》页 99[吕仙·点绛唇],“吕仙”应乙转。同书页 145[中吕·活快三],“活快”应乙转。

《元人杂剧选》页 88《梧桐雨》一折[仙吕·金盏儿]“咱也合赢”,《校注》页 14 亦然,“赢”乃“赢”之误。

《校注》页 30《梧桐雨》三折[落梅花],“花”乃“风”之误。页 32 同上折[川拨掉],“掉”系“棹”之误。

王文才《白朴戏曲集校注》附编《天籁集编年》(词集)收“小桃红”(页 256),而“散曲”部分亦收“小桃红”(页 181),重出。按,只应收于曲中。

郑骞《北曲新谱》(台北,1973)久闻其名,奈南京无此书,惜未能征引。然 Johnson 书对郑谱观点屡屡引用、评论,故可略补斯憾。

此为笔者近两年研究白朴词韵、曲韵的第3文,以此奉献给曲学家、校勘家、古籍整理与出版部门的专家和领导,希不吝指正。笔者研究曲韵时,曾得到宁继福、杨耐思、周维培、俞为民、吴新雷等先生的帮助,谨致谢忱。

1988年12月2日于南京大学中文系

此文原发表于《中华国学》创刊号(香港,1989年)。承师友认为,此文虽非纯汉语史论文,但对曲学和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不无裨益,故略作修改。中华书局的《元曲选》于1989年出重排本,自应取以相校,白朴两剧,改正原版点断错误1条,较重错误未改,而新增错误3条,颇出意外。

1994年3月16日于南京

《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

【提要】

钱大昕云：“元人说部，莫善于《南村辍耕录》。”该书记载了很多吴方言的语音和词汇现象，本文作穷尽式的辑录与研究。从历史、助纽字系统、现代松江音等方面论证“射字法”条反映了元代松江音。汇编了《辍耕录》中涉及吴方言的 40 余条，寻溯其文献渊源，对其中的近 60 条吴方言词语，援引宋元明清文献加以疏证，又查阅多种近代吴方言区地方志及现代方言志，向 20 多位吴方言区人士作了调查，宗旨在从语言史的角度观察这些元代吴方言词语的变化与发展。

—

陶宗仪是元明之际的著名学者，著述颇丰，《说郛》、《南村辍耕录》、《书史会要》、《南村诗集》等皆著称于世，尤以《南村辍耕录》对后世影响最大。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云：“元人说部，莫善于《南村辍耕录》。”今人张元济《涵芬楼影印元刊本南村辍耕录跋》说：“四库提要称其详于有元法令制度，考订书画文艺，足备参证。且不止此，戏剧之学至元极盛，是书于院本、杂剧、曲名、歌调考订极详。他如园林、建筑、书画、標轴、制墨、斲琴、窑器、髹漆，无一不罗而列之，其有裨于时人之研习艺术者非浅。”全书 30 卷，23 万余

字,涉及面之广诚如张说,但还可增加若干项目,“方言”即其一,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记录了元代吴方言的重要的语音现象和大量词语,对此本文作穷尽式的爬罗、搜辑,并根据宋元明清文献、吴方言区近代地方志、现代方言志和笔者近年对若干吴方言人士的调查结果作仔细的研究,探讨其变化发展。

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居士。(浙江)黄岩人。父陶煜,仕元为小官,母赵德真,“故宋宗室孟本女也”(据郑元祐《侨吴集·白云漫士陶君墓碣》)。其友孙作《沧螺集·陶先生小传》称赵雍为其舅氏,《辍耕录》卷十七“崔丽人”条,陶氏亦自述赵雍为舅氏。赵雍之父乃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孙作《南村辍耕录叙》云,宗仪“少工举子业,晚乃弃去,阖户著书”,邵亨贞《南村辍耕录疏》称之为“南村田叟”。《辍耕录》卷十九“钱武肃铁券”条:“吾乡钱叔琛……尝出示所藏铁券。……时余就录券词一通,叔琛又出武肃当日谢表稿并录之。昨晚检阅经笥,偶得于故纸中,转首已三十余年矣。”其时当已是半百之人。《明史》本传云:“洪武二十九年率诸生赴礼部试,读大诰,赐钞归,久之卒。”陶宗仪《南村诗集》中的《己卯元旦》诗,中有“风历新颁纪建文”句,是年为1399年,陶氏当已年过80。

陶宗仪在元、明两代都曾生活过很长时间,那末《辍耕录》究竟是在什么时期撰著的呢?据该书孙作叙可知,1351年红巾军起义后,陶宗仪“避兵”居于松江农村,以10年之力著成此书。孙叙结署“至正丙午夏六月”,是为1366年。笔者曾钩稽此书载有时间的数十条,未见有超过该年的,如卷一“列圣授受正统”条有“至正今二十六年”之语,载明最后时间的一条是卷二四“天陨鱼”条,“至正丙午八月”。现存元刊本语涉元帝、后、太子,皆空格,称元顺帝为“今上”,称元为“国朝”、“本朝”、“我大元”等。这是因为陶氏是在张士诚占领区内著书的缘故,张士诚1353年在江北起事,1356年占平

江(今苏州)、松江等地,次年降元,封为太尉,1363年自立为吴王,均奉元正朔^①。至正二十六年八月朱元璋下令讨张士诚,十一月徐达大军围平江,偏将俞通海在此前攻克松江(见郎瑛《七修类稿》卷九“本朝取天下先后”条),所以陶宗仪不得不停止写作。可以说,《辍耕录》结集成书不能晚于1366年冬,所记载的吴方言语音和词汇现象亦如是。

陶宗仪是吴方言区南部的黄岩人,中年以后定居于吴方言区北部的松江,直至老死。除了在元时到过江汉和大都^②,入明后去过都城(今南京)外,其生平行踪基本不出吴方言区。他所记载的吴方言现象,所作的论述有很高的价值,若干条目600年来一直为学人所重视,所征引。

笔者研究时所使用的是1923年武进陶氏影元刻本,1936年上海涵芬楼影印吴县潘氏滂焘斋藏元刊本及1959年中华书局铅字排印本。有歧异处择善而从。

二

《辍耕录》中涉及吴方言语音处不少,以卷十九“射字法”条最有价值。

南宋赵与时(吴兴人?1175—1231年)的《宾退录》卷一云:“俗间击鼓射字之技,莫知所始。”他记述了三种“射字之技”,第一种乃是利用“切韵之法”的射字法:在分析了某一方言音系的声母、韵母、声调系统之后,编成易于记诵的歌诀,实际是将汉字字音的三要素分解,编成数码,然后按要求击鼓,以鼓点的先后和点数逐码传送信号,听者接受信号后,又依声母诗、韵母诗的歌诀译码,复原成汉字。这与现代电报的汉字四位数码传送法原理近似。

《宾退录》的这则射字法为陶宗仪抄录,但它反映的是宋代语

音,本文不予讨论。

陶氏所录的第一则,反映了元代某地方音,周祖谟先生早就作过论述③,笔者谨再作较详细的说明。兹录原文于下:

有教予射字法,必须彼我二人俱聪明,熟于翻切,优于记问者,方乃便捷。倘遇人以诗词或言语示我,彼在隔坐,不及知闻,我则拊掌,彼便说出,与所示同。然片段文章皆可成诵,非特一句一字而已。用拊掌代击鼓,殊无勾肆市井俗态。此天下太平,优游无事,漫以取一时之笑乐耳;使鼙鼓之声震天,干戈之锋耀日,又能留情于此耶?其法:七字诗十二句,逐句排写。前四句括定字母,后八句括定叶韵。诗曰:

轻轻牵兵兵边平平便明明眠逢○○兴兴掀征征煎,
 经经坚迎迎年俦俦偏停停田应应烟成成涎声声髓,
 清清千澄澄缠星星鲜晴晴涎丁丁颀繁繁虔盈盈延,
 能能○称称千非(○)精精煎零零连汀汀天橙橙缠。
 尔蒙钟江支兹为,微鱼胡模齐乖佳,
 灰哈真谆臻匡亏,元魂痕寒欢关山,
 先森萧宵爻豪歌,戈麻阳唐耕斜荣,
 青蒸登尤侯车侵,潭谈盐添横光凡。

如欲切“春”字,清谆,清清千春。“清”字在第三行第一字,“谆”字在第七行第四字。拊掌则前三后一,少歇,又前七后四。“夏”字平声为“霞”,盈麻,盈盈延霞。“盈”字在第三行第七字,“麻”字在第十行第二字。拊掌则前三后七,少歇,又前十后二。少歇,又三,盖“夏”字去声,所以又三也。若入声,则四矣。余仿此。但字母不离二十八字,而叶韵莫逃五十六字,此为至要。

这一条的写作时间须要考定。孙作《南村辍耕录叙》云:“余友天台陶君九成,避兵三吴间,有田一廛”。“作劳之暇,每以笔墨自

随,时时辍耕”,“遇事肯纂,摘叶书之,贮一破盎,去则埋于树根,人莫测焉。如是者十载,遂累盎至十数。一日,尽发其藏,俾门人小子,萃而录之,得凡若干条,合三十卷,题曰《南村辍耕录》”。陶氏“避兵”居松江农村,得一时之安,故有可能学习这种“无勾肆市井俗态”的高雅游戏,但思及战乱,不免系之感慨:“此天下太平,优游无事,谩以取一时之笑乐耳;使鼙鼓之声震天,干戈之锋耀日,又能留情于此耶?”学习射字法一事,不可能是在明王朝建立,天下统一之后,前已论证整本《辍耕录》成书于1366年。也不可能是在1351年全国范围的红巾军起义之前,一介书生即使“居安思危”,也不可能设想将有大规模的内乱,也不敢形诸笔墨。陶宗仪是在战乱时期于松江学习这则射字法的,松江距黄岩甚远,而当时又群雄割据,张士诚统治区南只及杭州、绍兴,方国珍(黄岩人)长期占今宁波、台州,朱元璋据有浙东之金华、诸暨,交通梗阻如此,故《辍耕录》卷十五“隐趣”条:“余家天台万山中,……虽行江海上,而泉石草木之胜,未尝不在梦寐时见也。……风尘溷洞,豺虎咬人,几赋归与之诗,计无所得,又未知何日可以遂吾志也。”此时在松江教陶宗仪射字法的不大可能是黄岩人。利用音韵分析的射字法有强烈的地域性即方言性,依据甲地方音的射字法不能施之于乙地,“倘遇人以诗词或言语示我,彼在隔坐,不及知闻,我则拊掌,彼便说出,与所示同”,而且要达到“片段文章皆可成诵,非特一句一字而已”的程度,必须紧密依据方音,才能如此。而且今松江方言,属吴语太湖片即北吴语片,黄岩方言属台州片^④,差异较大,谅元时未必不如此。这种射字法反映的当为元时松江方音,下将剖析其音韵系统,作进一步论证。

其声母诗“四句括定字母”,这28字主要是梗摄、曾摄字,每个字下另出两个助纽字,其第一字与声母代表字相同,其第二字全是

山摄开口三四等字,两字声母全同,且皆为平声字。须要说明的是“非”、“逢”、“能”三个代表字及其下的圆圈(涵芬楼影印元刊本不用圆圈,而是空缺无字)。f、v 二母在梗,曾撮字中找不到代表字,只好以“非”、“逢”代之,其后应加的助纽字也无法按通例觅得,只得各以两个小圆圈标志。“能”是曾撮登韵字,泥母,而山摄开口四等字中的泥母字“年”另有安排,于是第二个助纽字只好空缺。

研究这些助纽字是确定《辍耕录》射字法性质的一把钥匙。这个助纽字系统很有特色,与其前后的助纽字作历史比较便可知道。现存的载有助纽字的早期文献有涵芬楼影印元本《玉篇》卷首的“三十六字母切韵法”,《切韵指掌图》检例的“三十六字母图”,《四声等子》的“七音纲目”,《韵镜》前的“归纳助纽字”,都是宋时之物,大同而小异。与此四者有一定区别的是上述元刊本《玉篇》卷首的“切字要法”,只有 30 母,其中“四字无文”：“非微”二母无助纽字,以“——”表示。元至顺间(1330—1333 年)福建建安椿庄书院刊刻的《事林广记》后集卷九幼学类的“切字要法·六十字诀”几与之全同。《辍耕录》射字法的助纽字则属于这个系统。下面列一比较表,第一类助纽字系统取《韵镜》为代表,紧接《辍耕录》的是《并音连声字学集要》的 27 对助纽字,陶承学于明万历二年(1574 年)得之于吴中,反映的是苏州音,未附《声韵会通》“二十八声”,昆山人王应电撰于嘉靖十九年(1540 年)⑤。

字 母	帮	滂	并	明	非	敷	奉	微	端
韵 镜	宾边	缤篇	频蟠	民眠	分蕃	芬翻	汾烦	文楠	丁颠
归纳助纽字	宾边	缤篇	频蟠	民眠	分蕃	芬翻	汾烦	文楠	丁颠
玉 篇	宾边	娉偏	平便	民眠				——	丁颠
切字要法	宾边	娉偏	平便	民眠	——			——	丁颠
事林广记	宾边	娉偏	平便	民眠	——			——	丁颠
切字要法	宾边	娉偏	平便	民眠	——			——	丁颠
辍耕录	兵边	俜偏	平便	明眠	○○		○○		丁颠
射 字 法	兵边	俜偏	平便	明眠	○○		○○		丁颠

字学集要	宾边	娉偏	平便	明眠		分番	坟烦		丁颠
声韵会通	兵	丕	弼	明	法			文	等
字母	透	定	泥	知	彻	澄	娘	见	溪
韵镜 归纳助纽字	汀天	廷田	宁年	珍遣	獫迪	陈廛	纫缣	经坚	轻牵
玉篇 切字要法	汀天	亭田	宁年			陈缠		经坚	轻牵
事林广记 切字要法	汀天	亭田	宁年			澄缠		经坚	轻牵
辘轳耕录 射字法	汀天	停田	能○			澄缠⑥		经坚	轻牵
字学集要	汀天	亭田	迎妍			澄廛		经坚	轻牵
声韵会通	天	同	宁			承		教	坤
字母	群	疑	精	清	从	心	邪	照	穿
韵镜 归纳助纽字	勤虔	银言	精煎	亲千	秦前	新仙	汤涎	真毡	瞋焮
玉篇 切字要法	擎虔	迎妍	精笺	清千	秦前	新鲜	汤涎	真毡	称焮
事林广记 切字要法	擎虔	迎妍	精笺	清千	秦前	新鲜	汤涎	真毡	称焮
辘轳耕录 射字法	擎虔	迎年	精煎	清千		星鲜	晴涎	征煎	称千
字学集要	擎虔		精笺	清千	汤涎	新鲜		征毡	称川
声韵会通	乾	义	子	清	字	恤	是	哲	昌
字母	床	审	禅	影	晓	匣	喻	来	日
韵镜 归纳助纽字	臻潺	身臙	辰禅	殷焉	馨袄	磬贤	匀缘	邻连	人然
玉篇 切字要法		声臙	神禅	因烟	兴掀	刑贤	寅延	零连	人然
事林广记 切字要法		声臙	神禅	因烟	兴掀	刑贤	寅延	零连	人然
辘轳耕录 射字法		声臙	成涎	应烟	兴掀		盈延	零连	
字学集要		声臙		因烟	兴掀	刑贤	匀缘	零连	人然
声韵会通		圣		英	兴		月	礼	日

从上表可知,《韵镜》等的 36 对助纽字代表了 36 字母。元本

《玉篇》卷首的“切字要法”30对,缺“敷奉知彻床娘”,而且与《韵镜》等相比,其助纽字的第一字表现了一种倾向:臻摄字减少,梗、曾摄字增多。《事林广记》的“切字要法”几乎是照抄前者,但是将“陈缠”改成“澄缠”,梗、曾摄字的助纽首字又多了一个。至《辍耕录》射字法,助纽首字全部统一为梗曾摄字,是这一趋势的继承与最后完成,而且影响及声母代表字,几乎全部采用梗曾摄字。表的下三栏显示了,《辍耕录》射字法的声母字和助纽字系统反映了一个吴方言的声母的若干特点,与《字学集要》、《声韵会通》的助纽字系统和声母非常近似,把《辍耕录》射字法放在这历史背景下,再结合现代松江音⑦加以考察,就易于理解它是反映的元代松江音。

这个方言的声母系统有如下特点:

1. 塞音、塞擦音、擦音清浊对立。众所周知,汉语中古音是有浊声母的,而在1324年的《中原音韵》的音系里,浊音清化,可是在成书于1366年的《辍耕录》里,这则射字法的声母系统保留有浊声母。按照赵元任提出的“三级分法”,即闭塞音声母分为清不送气、清送气和浊音三套,是现代吴语的决定性特征的标准⑧,这则射字法的字母诗反映了600年前吴方言的特点。“兵”、“俚”、“平”为p、p'、b;“丁”、“汀”、“停”为t、t'、d,余类推。

2. 轻唇音只剩两个:非、逢,即f、v。《字学集要》的二十七声中只有“敷奉”二母,兹录该书的《切字要法》有关内容如下:

分番	芳茺切	芳分番敷敷分番
坟烦 𣎵𣎵𣎵	父勇切	父坟烦奉奉坟烦

其中的“分番”、“坟烦”是助纳字,芳茺切“敷”,父勇切“奉”。“分”是非母字,“番芳敷”都是敷母字,可见非敷相混。“坟烦父奉”皆奉母字,“文楠”均微母字,注明“坟烦”即“文楠”,“楠音凡”,表明奉微相混。《声韵会通》以“法”、“文”二字表示。这些实际上都反映了古

“非”、“敷”二母，吴方言并为 f，古“奉”、“微”二母并为 v。今松江话唇齿音只有 f、v。

3. 从、邪合一，以“晴”作代表字。“晴”下两助纽字为“晴涎”，“晴”是古从母字，“涎”乃古邪母字，按照通例，两字代表一母，说明从、邪相并。据《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从、邪合并的方言点有苏州、无锡、上海、嘉定、松江；从、邪分立的方言有常州、常熟、海门。据《现代吴语的研究》，黄岩从、邪二母（今开合）为“dz‘；z”，从、邪二母（今齐撮）是“dz‘；z（作 dz‘；z 者少）”（黄岩籍民族语专家王敬骝同志认为今音犹是）。《字学集要》切字要法中的这一条作：

𣎵𣎵_{音精全} 墙容切 𣎵𣎵_{从从𣎵}

可见明代的苏州音，古从、邪二母已合并，该书标“从”而舍“邪”。《声韵会通》以“字”表从母（该书《论声》云“‘仕’、‘墙’同归‘字’字”可证），“是”表邪母，今昆山话尚有 dz‘、z 两母。《辘耕录》射字法所表示的显然是松江话而非黄岩话。这个字母诗于齿头音只有四个代表字，“晴”下两助纽字又为“晴涎”，考虑到现代从、邪合一的吴方言里有 z 无 dz，而且这则射字法中“晴”、“成”的助纽字第二字相同，所以我们把这四字排列为“精”、“清”、“星”、“晴”，拟音当为 ts、ts‘、s、z。

4. 这个声母系统里，还有一组“征称澄声成”。“澄”是古澄母字，其余四字是古照穿审禅四母字。以 36 字母的系统衡量，缺知彻床娘。元刊本《玉篇》卷首的“切字要法”、《事林广记》的“切字要法”早就如此。这说明知、照两组的合并，至于合并后总是以原澄母字表示第三位即浊塞擦音，娘归泥，都是传统使然，《辘耕录》射字法和《字学集要》皆承袭了这个传统。

这组声母与“精清星晴”对立，但助纽字有部分重复：

甲、精精煎	清清千		星星鲜	晴晴涎
乙、征征煎	称称千	澄澄缠	声声膾	成成涎

还有另一组声母:

丙、经经坚 轻轻牵 檠檠虔 兴兴掀

在现代黄岩话里,黄岩人王敬骝同志云:甲乙丙三组字完全同音,五纵行分别为:tsiŋ tsʰiŋ dʒiŋ ɕiŋ ziŋ。现代松江话三组字分别为:

tsiŋ	tsʰiŋ		siŋ	ziŋ
tsəŋ	tsʰəŋ	zəŋ	səŋ	zəŋ
tɕiŋ	tɕʰiŋ	dʒiŋ	ɕiŋ	

则是甲乙二组声母相同,丙组异。《辍耕录》既然分立为三组,现代松江话显然比黄岩话更近于这个系统。

据《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现代北部吴方言中这三组声母能分立的是无锡与常熟,分别为 ts、tsʰ、tɕ,这两点位于苏州、松江之北而毗邻,可以设想在古代吴方言(至少是北部吴方言)精组、知照组与见组原本是鼎足而立的,在元、明时期的苏州话、松江话也基本如是,《辍耕录》射字法和《字学集要》的 27 声都反映了这种状况。

可是从《辍耕录》的助纽字看来,甲乙两组又有密切的关系,“煎”、“千”、“涎”分别同为“精、征”、“清、称”、“晴、成”的第二助纳字。陶宗仪记述这则射字法的拼音规则时说:“如欲切‘春’字,清漳,清清千春。”可见“清千(古清母字)春(古穿母字)”三字声母相同。似可认为,在元代松江方言里,甲乙两组分立,助纽字不全混;但又有部分字相混的现象,或许反映了乙组字(古知照组)向甲组字(古精组)过渡的历史演变。

5. 禅、日相混，在《辘耕录》的声母诗里，古日母无代表字及助纽字。据《现代吴语的研究》，松江话古日母的白音与泥、娘的齐撮混，日母的文音与禅、床、澄、从、邪混。征之古文献，《字学集要》切字要法：

人然即神禅 石质切 石人然日日人然

《声韵会通》“论声”：“故旧字母……‘时’、‘日’同归‘日’字。”二者可作为《辘耕录》射字法有禅无日的旁证。

6. “经轻繁兴”即古“见溪群晓”，现代吴方言依开合与齐撮的条件分为 k、tɕ 两组（个别点分为三组）。在元代松江方言里还是 k、kʰ、g、h 一组。

7. 匣、喻合一。这则射字法以“盈”、“延”两个古喻母字同作助纽字，表一母，可是拼法规则举例之二：“霞，盈麻，盈盈延霞。”而且又指明“霞”的去声字为“夏”。据此，“霞”、“夏”，“盈”、“延”四字声母相同，其中“霞”、“夏”乃古匣母字。匣喻合一的现象在《字学集要》里也存在：

刑贤即寅延 以一切 以刑贤逸逸刑贤

《声韵会通》亦云：“旧字母……‘辖’、‘喻’同归‘月’字。”现代吴方言里，匣喻相混，很多同为 ɲ。

8. “能”与“迎”的分立问题。“迎”是射字法字母诗的 28 字之一，代表古疑母，其下助纽字为“迎”和“年”，“年”为泥母四等字，按通例，二者同表一母。《字学集要》：

迎妍^{疑年} 年题切 年迎妍泥泥迎妍

这说明了泥母的细音与疑母的细音合并了。《辘耕录》里另有“能能○”，“能”是泥母洪音的代表字，为何缺第二助纽字？按通例只有山摄开口四等字如“年”才能填入此空，可是“年”已作为“迎”的第二助纽字。《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的字音对照表所载八

个今吴方言点(包括松江)“迎”、“年”、“女”、“牛”声母同为 n 。

因射字法中泥母已有“能”代表,而无疑母洪音字,《玉篇》卷首和《事林广记》两《切字要法》皆以“迎”表疑母,所以我们把“迎”排在见溪群这一组内,代表疑母。

9. “明”、“零”、“应”分别为 m 、 l 、 ϕ 。

最后,28个代表字中既有“澄澄缠”,又有“橙橙缠”,为何犯复?一载思索方悟:这个元代松江方音只需27字即能表示其声母系统,但必须以四句七言诗的形式表示,只得在最后添一个赘物“橙橙缠”。

总之,《辍耕录》记载的这则射字法字母诗四句28字基本上摆脱了36字母的传统形式,按一定标准选择代表字和助纽字,反映了600年前松江方言的声母系统:

p兵	p'博	b平	f非	v逢	m明	
t丁	t'汀	d停			n能	l零
ts精	ts'清		s星		z晴	
tʂ征	tʂ'称	dʒ澄	ʂ声	ʒ成		
k经	k'轻	g繁	h兴	ɦ盈	ŋ迎	
ϕ应						

现代松江音声母系统的格局,元时已经具备。所不同者有二:
1. 元代的 k 、 k' 、 g 、 $ŋ$ 、 h 尚未在细音前分化出 $tɕ$ 、 $tɕ'$ 、 $dʒ$ 、 $ŋ$ 、 $ɕ$ 这一套来。但是泥母细音字“年”偏离洪音字“能”,而与“迎”共居以表疑母,即是一个征兆:可能受前高元音的影响,有部分字舌根声母发音部位前移。
2. 与 ts 、 ts' 、 s 、 z 相对的还有一套 $tʂ$ $tʂ'$ 、 $dʒ$ 、 $ʂ$ 、 $ʒ$,像现代常熟、无锡方言那样。但是后一套已有部分混入前者。这两种音

变继续前进,便是现代松江音了。

而其韵母诗 8 句 56 字基本上按《广韵》这样的传统韵书的平声 57 韵目排列,但也更换了若干字。看来有道理在,如变“支脂之”为“支兹为”,当是前三字已同音;在“文欣”的位置上另立“匡亏”占之,因已有“真淳臻”;已有“先”和“尤”,所以不再出现“仙”和“幽”;为“唐”的合口韵母立了“光”,相应地“阳”的合口呼是“匡”;“寒欢”与“山关”犹如“哈灰”与“佳乖”;“侵”外立“森”当是无 i 介音之故;“模”与“胡”今松江音分别为 -o、-u;“齐”与“兹支”的并列或许显示了 i 和 1 的并存等等,这些该都反映了实际语音。有些难以索解,如“为亏”均为《广韵》支韵合口字,今松江音韵母同为 ue,“蒙东”均为《广韵》东韵一等字,今松江音韵母同为 oŋ,何以各自分立为二?须知韵母系统的复杂性及其变化远较声母为其,因此较古时期的韵母总是与后代距离很大,而《辘耕录》的记载所能提供的韵母方面的材料又是如此之少,实在难以据现代音逐一辨认。

试将“括定叶韵”的 56 字作如下排列:“麻车斜 歌戈 模胡 鱼 齐兹支微为亏 哈灰佳乖 豪爻宵萧 侯尤 潭谈盐添凡 寒欢山关元先 森侵 痕魂真淳臻 登蒸 青荣耕横 江 唐光 阳匡 蒙东钟”现以之与明代昆山音比较,《辘耕录》早于《声韵会通》,但松江与昆山距离颇近,从其异同处以覘《辘耕录》射字法韵母的若干特点,《声韵会通》“论韵”云:“一声统摄 45 韵,如用‘月’字声,则有‘刑恒荧横容红寅痕云魂言玄寒桓闲还淫○盐含咸○阳降杭黄兮○○于河湖耶○牙遐华谐孩怀回尤侯爻豪’凡 40 韵,‘簪谈资之靴’,于‘月’声不可通,则空其目。”二者异同在于:-m、-n、-ŋ 三个阳声韵系列在二书中仍成鼎足之势,《辘耕录》的“森侵”相当于《会通》的“簪淫”;“潭谈盐添凡”一组相当于“含谈盐咸”一组(《辘耕录》多一韵);“痕魂真淳臻”一组相当于“痕魂寅云”一组

(《辍耕录》又多一韵);“寒欢山关元先”即《会通》的“寒桓闲还言玄”;“江”均不并于“阳唐”;“蒙东钟”相当于《会通》的“红容”;“齐兹支”即“兮资之”;均有“尤侯”而无“幽”,等等。但是《辍耕录》“蒸登”未融入“耕青”,所以不像《会通》只有四个韵母;“阳唐”合口尚未混;“萧宵肴豪”仍分为四,不像《会通》并为二;《会通》有“华”,乃麻韵合口二等字,《辍耕录》无此韵(今松江音“华”韵母同于“麻”);等等。总的来说,元代松江音的韵母系统比明代昆山音复杂。

最后,从“射字法”条可知,这个元代松江音声调有四个:平上去入。

三

《辍耕录》里还有几条反映了吴方言的某些语音现象:

卷八“双砚堂”条:“周待制白岩先生仁荣买地于府城之郑捏儿坊”,“筑础时,掘地深才数尺”,“获双砚,砚有款识,乃唐郑司户虔故物”。“虔字弱齐,俗讹为‘捏儿’云”。按《元史·周仁荣传》谓仁荣为台州临海人,则陶氏所云“府城”为台州府城无疑。《新唐书·郑虔传》不载郑虔字,仅云“贬台州司户参军事”,“后数年卒”,则是郑虔死于台州。其所居里弄,后人名为“郑捏儿坊”,陶宗仪是台州人,认为“捏儿”乃虔之字“弱齐”之讹,是必“捏”与“弱”音近,“儿”与“齐”音近,方可讹转。民国《临海县志稿》关于郑虔及其居住遗址有以下记载:卷二十七“寓贤”：“郑虔字若齐。”卷四“坊乡”：“宋嘉定时十四坊五巷”，中有“户曹巷”，“在州东一里，以唐郑虔为户曹日居此，故名”。“清康熙十九坊”，“广文坊”“在城东旧户曹巷，以郑虔为司户居此，故名，有巷五”，第五“曰犖泥，即尼巷，又曰若齐”。（按，康熙志未若如此详细。）则是“捏儿”又讹转为“犖泥”。“犖泥”二字因声母相同，韵母近似，“犖”又脱落。清时此巷俗名“犖

泥”与正名“若齐”、简名“尼”三者并存。)

那么这些字音的时代关系为:

唐:弱(“若”同音)齐 元:捏儿 清:鞞泥

今黄岩话“弱[ziɛʔ₂]——捏[nieʔ₂]——鞞[nie₃]”,“齐[ɛzi]——儿[ɛŋ]——泥[ɛni]”。从唐至元,大概是声母从z至n的转变。问题在“弱”与“捏”,今音韵母相距较远,而陶宗仪言之凿凿,说明元代台州话可能较近。

卷二九“字音”条:“吾衍子行《闲居录》云:舜生诸冯及冯妇等,皆音皮冰切,古不音符容切也。冯妇与徐夫人皆男子,三国时,有暨艳,乃吴人,附陆抗传,当音结,不音暨也。”按,“冯”,《广韵》房戎切,《集韵》符风切,《增韵》符中切,都是东韵三等字。而吾衍音符容切,容是钟韵字,说明吾衍之音,东钟合一。“暨”在《广韵》有四音:去声至韵其冀切;去声未韵居家切;入声质韵居乙切,“姓也,吴尚书暨艳”;入声迄韵居乞切,“姓也,吴有尚书暨艳”。南宋俞德邻《佩韦斋辑闻》卷一:“元丰五年,廷试进士有暨陶者,胪唱久不应。上顾左右,苏丞相云:‘恐当呼迄,吴有既艳,造营府之论,恐其后也。’上命以迄音呼之,果出应。”从吾衍的话可知,作姓的“暨”有入读成去声,他说应读入声“结”,“结”是屑韵古屑切,这证明在吾衍的语音中,质韵或迄韵与屑韵音相同。吾衍是钱塘人,元代著名的学者、书家,陶宗仪的师辈。

卷三十“屨烏屨考”条引毛晃《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的“屨”字注,中有“草曰扉(原注,芳未反)”之语。覆检《增韵》,“扉”的反切是父沸切,《集韵》、《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并同,《广韵》作扶沸切,皆为奉母字。芳未切乃陶氏自作的反切,“芳”乃敷母,此乃以敷切奉。按,今吴方言敷、奉有别。

卷十八“鞞鞋”条:“西浙之人,以草为屨而无跟,名曰鞞鞋。

……靺,悉合切,在颯字韵下。今俗呼与翼同音者,误。”按,《广韵》、《集韵》、《增韵》,“靺、颯”皆合韵字;“翼”在狎韵。陶氏指出元代西浙“俗呼”同音。“西浙”指现今松江、苏州一带^⑨。靺字,今松江音seʔ。

卷一“江南谣”条:“汲郡王公《玉堂嘉话》云:宋末下时,江南谣云:‘江南若破,百雁来过。’当时莫喻其意,及宋亡,盖知指丞相伯颜也。”此条抄自元人王恽《玉堂嘉话》卷四,则是彼时江南“百雁”、“伯颜”谐音,今杭州话“伯”有二音,其一与“百”同;“颜”、“雁”只是声调之别。

《辍耕录》记述的吴方言词汇,有些涉及到字音的声调问题:

卷二八“嘲回回”条录杭州人王梅谷下火文,内有“毳丝脱兮尘土昏”句,注曰:“毳上声”,“其服也”。卷十一“贤孝”条:“杭州有郑万户者……母诞日垂至,预市文绣毳段。”二者所述皆杭州事。卷十一“写象诀”条言及“调合服饰器用颜色”时有“毳子”、“毳绫”二词。“毳”字,宋俞琰《席上腐谈》卷上“音‘模’”,金韩道昭《改并四声篇海》引《俗字背篇》作末胡切,明梅膺祚《字汇》“莫胡切,音模。”而陶宗仪自注“上声”。饶以和老先生曾为我向杭州的一位老丝绸工调查,答曰不知。

卷三十“髹器”条:“凡造碗碟盘盂之属,其胎骨”,“炆牛皮胶,和生漆,微嵌缝中,名曰梢当去声”。又,“车磨糙漆,绢帛挑上声去浆迹”。又,“然后用揩光石磨去漆中𩇛雷上声”。

元明时代,浙西盛产漆器,嘉兴斜塘杨汇尤著,名家辈出。而陶宗仪兴趣极为广泛,此条及“鎔金银法”条当为陶氏采访后的记录。

今人王世襄《髹饰录解说》云:现代“北京匠师,……周身上漆灰一道,亦即是胎子上的第一道漆灰,名曰‘梢当(读如扫荡)灰’。这个名称说明了‘梢当’两字还保留在北京漆工的术语中”^⑩。王氏

所述正合《辍耕录》注音。

“挑”是多音字,《广韵》、《集韵》皆录上声一音,然与此“使之去”义不尽合。明末嘉兴漆工杨明为黄成(隆庆时人)《髹饰录》加注,亦屡提及“挑”字^①,当为漆工常用词,陶氏特录其音,注其声调。

“颧”,《辍耕录》后,黄成《髹饰录》及杨明注多次提到“颧”、“颧点”,王世襄云:“颧是丝上所形成的结节。……本书拿它来形容漆面极小的点粒。”^②“颧”,《广韵》、《集韵》并去声队韵卢对切,《中原音韵》齐微韵去声。但陶宗仪特别注明“雷上声”,当是依据吴方言区髹漆工人的语音。

卷三十“鎗金银法”条载“嘉兴斜塘杨汇髹工鎗去声金鎗银法”(文繁不录)。按,黄成《髹饰录》云:“鎗金,鎗或作戣,或作创,一名镂金,……。”今人王世襄说:“关于漆工鎗金的记载,据已知材料,最早见于陶宗仪《辍耕录》。”“鎗金或戣金,其源当始自鹄金。”^③《诗·周颂·载见》“條革有鹄”,陆德明《释文》:“鹄,七羊反,本亦作鎗。”是则陆音平声,而陶特注明去声。元史浩《两抄摘腴》引毛诗郑笺后云:“疑今世所谓抢金者,以平声为去声呼耳。”明方以智《通雅》:“今之谓抢金宣盒”,“作去声”,史、方之语可为陶氏佐证。字书至清吴任臣《字汇补》始据《辍耕录》载“鎗”之去声音“青向切,鎗去声”。《康熙字典》仍之。

陶宗仪、王世襄对“鎗”的工艺有明确叙述,“鎗”之义即如明杨慎《丹铅总录》所云之“镶嵌”,关于“鎗金”一词,杭州饶以和先生为我向一位老年油漆工调查,答曰不知。但是在吴方言中有一普通动词叫“鎗”,去声。陆学海同志云:杭州话中,指“在某一物中渗入另一物”,如某种颜色的漆水加入另一颜色的漆水,叫鎗。“渗入”,杭州话叫“鎗进去”。还有一种食物叫“鎗蟹”,即置小蟹于器皿内,渗

入盐水制成,其他吴方言点甚至北邻的江淮方言亦然。看来,吴方言早就有表“镶嵌、渗入”义而为阳韵去声的动词“鎔”,诸书不载,陶宗仪首先记录了专门术语“鎔金、鎔银”,今虽漆工亦难晓,但用于通常意义的“鎔”今仍在吴方言中普遍存在。

四

陶宗仪是吴方言区人,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吴方言区,所以他对吴方言词语有浓厚的兴趣,《辍耕录》中常列专条录述,并考证某词的出处,列举古代的用例。这部分内容颇为后代珍视,明清以来的笔记,关于近代汉语词汇的专著如明胡震亨《唐音癸签》、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清陈棠《知新录》、钱大昕《恒言录》、翟灏《通俗编》、赵翼《陔余丛考》等直至今人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元曲释词》等无不录引之。

这些有高度价值的材料应予重视。笔者的工作是:1. 将《辍耕录》中有关吴方言词语的条目加以辑录。2. 陶氏博综群书,“尝览杂传记一千余家,多士林所未见”(宋濂《书史会要叙》),编有笔记丛书《说郛》,因而《辍耕录》中有若干条目是抄摘或源于前人笔记,但未明言。此于陶宗仪未足为病,因为此书系辍耕之时,摘叶书之,最后萃录而成,容或不载出处。时贤关于近代汉语词汇的论著在追寻某词语的出处或早期记载时,往往至《辍耕录》而止,而未能再进一步溯源,今就笔者阅读所及,特为补出,如源自《宾退录》、《能改斋漫录》、《困学纪闻》、《容斋随笔》、《老学庵笔记》、《续释常谈》等皆有数条。值得注意的是,陶氏所摘引者多是吴方言区学人的笔记,因吴方言词语是其兴趣所在;多数不是简单的抄录,或在其前加释义,或在其中加例证,或改写。3. 援引唐宋元明清典籍(吴越学人著作为多)、吴方言区近代地方志和现代方言志的记载,还有近两年

的调查结果,目的不止是对这些词语作一般的疏证,而力图从语言史的更广角度探赜其千百年来的变化与发展。

上节论及语音时,已涉及到一些吴方言词。

卷五“发烛”条:“杭人削松木为小片,其薄如纸,熔硫黄,涂木片顶分许,名曰发烛,又曰焠儿,盖以发火及代灯烛用也。……宋翰林学士陶公谷《清异录》云:‘夜有急,苦于作灯之缓,有知者,批杉条,染硫黄,置之待用,一与火遇,得焰穗然,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货者,易名火寸。’按此,则‘焠寸’声相近,字之讹也。然引光奴之名为新。”“引火奴”、“发烛”皆是雅名,此物当于近代消失,今一位84岁的杭州老人亦不知。从此条可知宋初杭州话的“火寸”至元末已谓之“焠儿”。现代学者指出,浙江、安徽、江苏地区的吴方言、徽州方言都曾有过或存在有表指小爱称的儿尾或儿化韵,其特点是n或ŋ自成音节表儿尾,或充当韵尾与前面的元音形成阳声韵,则为儿化韵。^⑭“火寸”在当时为新奇的发明,故陶谷《清异录》“器具门”特加记载,以“寸”为名必甚短,符合心理上的指小爱称的特点,而“寸”字以n收尾(元代松江音n尾与m尾、ŋ尾兼存,宋初杭州话谅亦然,今杭州话“寸”收n尾)。《清异录》中的“火寸”是以汉字形式表现的,却引起我们的推测:最后的n有可能是吴方言的儿化韵或儿尾。可是“南宋建都杭州达148年(公元1128—1276年),越中方言受了北方话(中州音)的影响,明显地反映在今日带有浓厚‘官话’色彩的杭州话里。……儿尾词很发达……”^⑮“浙江有些地方有‘儿’尾,大概是南宋以后受了杭州话的影响。杭州话‘儿’尾自成音节。”^⑯由于南宋时期中原方言的影响,杭州话“火寸”的n尾脱落,代之以同部位的前元音i^⑰,加上了中原方言的表指小爱称的词尾“儿”,于是“寸”变成了“焠儿”(“寸”与“焠”声母,声调本来就相同)。“焠儿”是双音节词,因此原来的词素“火”也被抛弃。到

了陶宗仪,这项音变的结果就被记录在《辍耕录》里了。现代杭州话儿尾词甚多,如“纸儿”、“画儿”、“帕儿”、“凳儿”等等。《辍耕录》此条至少可以看作杭州话具有北方话式的儿尾词的一项早期记录,是颇有价值的一条。

卷八“长年”条:“吾乡称舟人之老者曰长年。长,上声。盖唐已有之矣。杜工部诗云:‘长年三老歌声里,白昼摊钱高浪中。’《古今诗话》谓川峡以篙手为三老,乃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耳。因思海舶中以司舵曰大翁,是亦长年三老之意。”按,宋人江休复《江邻几杂志》、陆游《入蜀记》卷五、赵与时《宾退录》卷四、戴埴《鼠璞》都言及川峡、海壖呼篙手为长年,陶氏此条较近于《鼠璞》,戴曰“海壖”,陶曰“吾乡”,黄岩近海,则是“长年”、“大翁”皆为元末黄岩话。今黄岩县75岁老人尤伯翔先生云:“长年之长读上声,年读去声,音如涨念,指船夫。如二字均平声,则为地主之雇工。”作船工义的“长年”在明清文献中屡见,如明沈周(吴县人)《石田杂记》:“长年同至山下。”明清之际的吴伟业(太仓人)《避乱》:“长年篙起舞,扁舟疾如箭。”“大翁”一词今似已不存,黄岩掌舵者名“老大”,“大”读“渡”音。《越谚》(光绪会稽范寅著)下:“撑漕船者名老大,(大)呼平声。”乾隆、光绪、民国《崇明县志》并收“老大”,释义为“呼舵工曰老大,以一船之司命也”。今松江话亦为“老大”,这在吴方言区是通用词。

卷十七“丫头”条:“吴中呼女子之贱者为丫头。刘宾客寄赠小樊诗:‘花面丫头十二三,春来绰约向人时。’”按,此条源自宋龚颐正(遂昌人)《续释常谈》“丫头”条,但首句为陶氏所加。宋人王洋《弋阳道中题丫头岩》:“不谓此州无美艳,只嫌名字太粗生。”自注:“吴楚之人谓婢子为丫头。”陶宗仪所述与此注颇相合。清张南庄(乾嘉时上海人)《何典》卷四、卷七中的“委尿丫头”、“骚丫头”皆指婢女。吴方言区地方志多收此词,仅举嘉庆二十二年《松江府志》为

例：“呼女子之贱者曰丫头。”今松江话、天台话及很多吴方言点仍存此词，指旧时的婢女丫鬟；有人认为尚指女孩子，或是对女儿和小辈女子的昵称，或是骂詈语，区别在于语调^⑩。“丫头”一词在清代小说如《红楼梦》等中普遍使用，今非吴方言区也常用。根据王洋及陶宗仪的话，宋元时代“丫头”本为南方方言词，但后来就进入了官话，成为普通词。

卷八“温噉”条：“南人方言曰温噉者，乃微暖也。唐王建《宫词》‘新晴草色暖温噉’，又白居易诗‘池水暖温噉’，则古已然矣。”按，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四抄引后注：“又李商隐诗‘疑穿花透迤，渐近火温磨’，亦暖气之意。”唐宋习见此词，如皮日休《奉和鲁望玩金鸿鹄戏赠》“温磨飘出麝脐熏”，宋吕本中《轩渠录》述京师营妇托一教学秀才写书寄夫云：“不要吃温吞蠖托底物事。”《朱子语类》卷六十：“利与善之间，不是冷水，便是热汤，无那中间温吞暖处也。”则是唐宋时期通语中同一叠韵词有三种不同的写法（第二字音近）：一、温噉（《广韵》他昆切）；二、温吞；三、温磨（《广韵》奴昆切）。

此词可上溯至汉代：大徐本《说文》：“𦛐，安𦛐，温也。”又“𦛐，𦛐地，以巾搨之。……读若水温𦛐也。”同一“𦛐”字，孙愐音异：

安𦛐（奴案切）。则二字叠韵，元部字。

温𦛐（乃昆切）。则二字叠韵，真部字^⑪。

“安温”均影母字，“奴乃”均泥母字，至于韵母，东汉河南地区真、元二部音同或音近，许慎自己的《说文解字后叙》即以元部之“传藩山”叶真部之“门濒神申”等^⑫，南阳西鄂人张衡、陈留圉人蔡邕均有元真二部通押例^⑬。在《说文》中一词出现两种形式原因即在此。此词由汉而唐宋，韵母的真部读音定型化，即全为魂痕韵字。“温磨”上继“温𦛐（乃昆切）”，只是字形有别。但又新生歧异形式“温

噉”、“温吞”。

这通语之词，至元缩小了范围，陶宗仪明确指为“南人方言”。此后用例甚多，如明末苏州人冯梦龙编《山歌》卷五《茶注》“冷热温噉待子多少人”，《何典》卷四“吃得温噉耐得热的精胖小伙子”，胡文英（武进人）《吴下方言考》（乾隆四十八年刊）卷四：“温噉（原注：下音吞），今吴谚谓水微暖曰温噉。”康熙、嘉庆《松江府志》，乾隆、道光《苏州府志》，民国《吴县志》，光绪《杭州府志》等皆收此词。今吴方言中普遍存在，杭州、绍兴亦作“温吞吞”，黄岩尤伯翔老先生于拙稿上批云：“温噉今亦读温能。”则是东汉与唐代泥母音的“温𪔐”、“温𪔐”仍保存于现代口语中。此词还用来形容性情或言辞不爽利：范寅（会稽人）《越谚》（光绪四年刊）中：“温噉水，谓微热水也。”同书上“借喻之语”：“𪔐噉水（温吞史），懦弱无刚也。”鲁迅《并非闲话（三）》：“不过是温噉之谈，两可之论。”

卷十二“拗花”条：“南方或谓折花曰拗花。唐元微之诗：‘试问酒旗歌板地，今朝谁是拗花人。’又古乐府‘拗折杨柳枝’。”按，所引唐诗出自李贺《酬答》诗之二。吴方言中普遍有此词，乾隆《象山县志》、道光《苏州府志》、民国《吴县志》、光绪《镇海县志》等皆收此词。今松江、杭州、无锡、宁波、东阳、天台、黄岩皆有此词。但绍兴叫“捉花”，云和叫“掏花”。

卷十八“鞞鞋”条：“西浙之人，以草为履而无跟，名曰鞞鞋。”其引用书证直至宋初人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所载唐人包贺“船为水鞞鞋”，前已指出，元代的“西浙”指平江、松江、常州、杭州一带。冯梦龙编《古今小说》卷三三：“有个妇女”“脚下拖双鞞鞋”，清咸丰《鄞县志》收有“鞞鞋”。但今松江、苏州叫“拖鞋”，杭州叫“踢拖鞋”，据《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吴方言区诸点都叫拖鞋，反而是江淮方言区的句容、南京、扬州、高邮、淮阴，中原方言区的邳县、徐州

叫“鞞鞋”或“鞞鞋子”，再往北也有叫“鞞鞋”的。比较《辍耕录》与今吴方言，可见“鞞鞋”一词在北部吴方言中逐渐消失。

卷十一“贤孝”条：“国朝妇人礼服：达鞞曰袍，汉人曰团衫，南人曰大衣，……然俗谓男子布衫曰布袍，则凡上盖之服或可概曰袍。”元代统治者管华北地区的汉族人叫汉人，管原南宋统治区的汉族人叫南人。因此“大衣”是元代吴方言词。今吴方言区的“大衣”一词则指较长的西式外衣，与元代的南方妇人礼服了不相干，云和称妇女的结婚礼服为大通。至于“袍”，则长期存在，松江叫袍、长衫，杭州则有长袍、夹袍、棉大袍之别。解放后，“袍”也将不复存在。

卷七“屈戌”条：“今人家窗户设铰具，或铁或铜，名曰环纽，即古金铺之遗意。北方谓之屈戌，其称甚古。”既下言“北方”，则上之“环纽”或为南方词，朱慧娟同志云：苏州旧式木窗尚有此物，名曰环纽。

卷二七“金甲”条：“嘉定州大场沈氏，因下番买卖致巨富。一日，自番中还，先报家信有云：‘番船今到何处，发金甲先回。’金甲者，碓坊甲头也。后因逐一干仆，仆出此书首告，以为玉印未到，金甲先回。沈厚赂官府，得理。”这是利用方言词制造的政治诬陷案。“甲头”、“金甲”当是嘉定地区的吴方言词，因是碓坊用具，今颇难调查。《辍耕录》涉及许多专门技艺，内有若干吴方言专业词，兹不赘论。

以上基本上都是陶宗仪明言为吴方言词者。以下诸词，陶宗仪只是用“俗呼”、“今人指”、“世言”之类的话领起，但后代吴方言区学人的笔记、小说、戏曲中使用之，地方志中还收录，或现在还保存，可证这些也是14世纪吴方言词，或在当时的吴方言区常使用。

卷十四“妇女曰娘”条：“‘娘’字，俗书也，古无之，当作‘孃’。

……今乃通为妇女之称。故子谓母曰娘，而世谓稳婆曰老娘，女巫曰师娘，都下及江南谓男覩亦曰师娘，娼妇曰花娘，达旦又谓草娘，苗人谓妻曰夫娘，南方谓妇人之无行者亦曰夫娘，谓妇人之卑贱者曰某娘，曰儿娘，鄙之曰婆娘。”接着引书证若干条（文繁不录）。按“达旦”即“鞑靼”，指蒙古人，苗人指元末在江浙作战的苗军。

“娘”、“娘子”作为妇女的通称，中古已然，陶氏举例甚多。吴方言区一直使用，冯梦龙编《挂枝儿》杂部十卷《乡下夫妻》“俏娘儿遇清明”，《山歌》卷五《大人家阿嫂》“花花轿里个娘娘弗比得跟轿个好”，明末凌濛初（吴兴人）《二刻拍案惊奇》卷二一“店家娘子不必发怒”，《何典》卷四“娘娘们都掉他不落”。又，康熙、嘉庆《松江府志》：“娘子，妇女之通称。”光绪《川沙厅志》：“称妇人曰娘娘。”等等，以“娘”为词素构成的许多词，均指女性，详见《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子谓母曰娘”，吴方言区一直如是，《辍耕录》卷十二“贞烈墓”条述天台妇郭氏持子痛哭之语：“汝爷行且死，娘死亦在旦夕。”《何典》卷七：“你今替娘烧香，是一团正经。”乾隆、道光、民国《象山县志》：“母曰娘。”咸丰《鄞县志》：“称母曰娘。”今无锡、苏州、丹阳、杭州、绍兴，“母亲”的称呼之一是“娘”或“娘娘”。

“世谓稳婆曰老娘”，陶氏未举例。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七：“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试馆职。一日，谒晏丞相，晏语之曰：‘君久从吏事，必疏笔砚，今将就试，宜稍温习也。’振率然答曰：‘岂有三十年为老娘，而倒绷孩儿者乎？’”吴方言区常用此词：《越谚》中：“老娘婆，即收生婆。”卷上：“多年做老娘婆，错剪脐带。”康熙、嘉庆《松江府志》：“谓稳婆为老娘。”乾隆、道光、民国《象山县志》：“世谓稳婆曰老娘，……则江浙皆有此称，不独象邑。”今无锡、吴江、天台、黄岩仍谓收生婆为“老娘”，但绍兴叫“收生婆”，云和叫“洗囡

囡”。谈池平师傅说：松江指替人非法打胎，为人所鄙的接生婆叫“老娘”，为良家妇女合法接生，备受礼待的接生婆为“茶婆”，后者命名似有寓意。今多医院接生，此词行将消失。汪维辉先生说，宁波骂人话有“多老娘钿”（意谓本来就不该生下来）。又，非吴方言区也有管接生婆为老娘的。

“女巫曰师娘，都下及江南谓男觊亦曰师娘。”按，凌濛初《拍案惊奇》卷三九：“男巫女觊……汉时谓之下神，唐世呼为见鬼人”，明时苏州“男称太保，女称师娘”。康熙、嘉庆《松江府志》，民国《太仓州志》、《金山县志》、《崇明县志》均谓女巫为师娘。上述《崇明县志》谓男巫为童子。今松江、苏州、无锡、吴江谓女巫为师娘，绍兴曰巫婆，云和曰讲花。男巫特少，好多调查对象不知，绍兴叫灵菩萨，云和叫问神。

“娼妇曰花娘”。按，“花娘”原指歌舞伎，李贺《申胡子觿箴歌序》：“命花娘出幕，徘徊拜客。”梅尧臣《花娘歌》：“花娘十二能歌舞，籍甚声名居乐府。”至元代陶宗仪明言为娼妓之名。《水浒》第五十一回：“那花娘的父亲被雷横打了。”吴方言至清代尚保存此词：乾隆、道光《象山县志》：“娼妇曰花娘，则江浙皆有此称，不独象邑。”咸丰《鄞县志》亦然。咸丰《宝山县志》：“花娘，骂妇人之贱者。”^②笔者调查的吴方言区各点，“花娘”一词已不存。又《辍耕录》卷二八“醋钵儿”条：“婊子，总贱娼滥妇之称。”明代周祈《名义考》卷五：“俗谓倡曰表子。”《金瓶梅词话》第十五回：“如何一向不进来看看姐姐儿，想必别处另叙了新婊子来。”《二刻拍案惊奇》卷二一：“便思量淫荡起来，接着两个表子。”下一事实可见语词之嬗变：乾隆、道光《象山县志》叫“花娘”，民国15年的《象山县志》则曰“婊子”。今无锡、吴江、天台、杭州、绍兴、云和等地皆曰“婊子”，今苏州、松江叫“野鸡”，则是受上海话的影响。在明清吴方言区，娼妓还

有“小娘”一名：《挂枝儿》杂部第十《妓》“小娘们就是活强盗”，《山歌》卷五《瘦妓》“嫖小娘儿没嫖个胖婆娘”，《何典》卷五“也有领他去闯花门嫖小娘的”。但是近百年来吴方言词“花娘”、“小娘”都让位于通语词“婊子”。

“南方谓妇人之无行者亦曰夫娘。”乾隆十五年《宝山县志》：“夫娘，俗骂妇女之淫贱者曰夫娘，盖本元末苗寇平江、松江，以妇人艳而皙者畜为妇，曰夫娘，今遂成此语，作骂词。”此乃倒因为果，其误源于《辍耕录》此条之叙述欠明，《辍耕录》卷八“志苗”条记述元末杨完者率领的苗军在江浙地区横行时的若干专门词，多数为借自汉语的词，其一为“妇人艳而皙者，畜为妇，曰夫娘”。汉语吴方言以“娘”为词素的表女性的词很多，“夫娘”当为这支苗军吸收自吴方言的“外来词”，而非吴方言从苗语吸收的词。笔者调查的吴方言区人士，皆云不知此词。

“南方”“谓妇人之卑贱者曰某娘，曰几娘，鄙之曰婆娘”，陶氏举例甚多。此数词吴方言区一直使用。如《古今小说》卷三八：“婆娘无礼。”《挂枝儿》欢部二卷《眼里火》：“是那一个有福的婆娘也，独自受用得你好。”《何典》卷六：“就到外边吃花酒，偷婆娘。”康熙、嘉庆《松江府志》：“又曰某娘曰几娘，鄙之曰婆娘。”咸丰《鄞县志》：“骂妇人为婆娘。”民国《金山县志》亦然。今吴江、松江、无锡、绍兴、台州皆有婆娘一词，苏州话“婆娘”指泼妇之类的女人。解放前苏州有为富家丧事助哭之“哭娘”。“婆娘”一词，非吴方言区也一直使用，如《窦娥冤》、《水浒》三二回，民国《云阳县志》及今很多方言皆如是。

卷七“客作”条：“今人之指佣工者曰客作，三国时已有此语，焦光饥则出为人客作，饱食而已。”按，此例出于《三国志·魏书·管宁传》注引《魏略》。又晋皇甫谧《高士传》卷下：“夏馥”“入林虑山中

为冶工客作，形貌毁悴。……留赁作不归。”《北齐书·邢邵传》：“邢家小儿尝客作章表，自买黄纸，写而送之。”值得注意的是，《高士传》中的“赁”与“作”二动词并列，“客作”当是偏正词组（“客”乃名词作状语），至多也只是个动词。《北齐书》亦然。唐王梵志诗《鸿鹄尽飞颺》：“他家求官宦，我专慕客作。”方为宾语。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俗骂客作”条：“江西俚俗骂人，有曰客作儿。按陈从易《寄荔枝与盛参政》诗云：‘……橄榄为下辈，枇杷客作儿。’……凡言客作儿者，佣夫也。”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九“俗语有所自”条录吴曾语后曰：“斥受雇者为客作。”亦可证。陶宗仪也是以“客作”作名词来解释的。嘉庆《松江府志》：“诟人佣工曰客作。”乾隆、道光《苏州府志》，乾隆、民国《吴县志》并云：“骂佣工曰客作。”乾隆、民国《吴江县志》，光绪《青浦县志》，民国《象山县志》皆收此词。今黄岩无此词，佣工有“长（平声）年”、“帮月”之分。松江话城里的佣工则叫佣人，农村的则叫长工、短工。云和则叫长年、零工。

卷十“麀糟”条：“俗语以不洁为麀糟。”按，宋庄绰《鸡肋编》中：“许昌至京师道中……有大泽，弥望草莽，名好草陂。而夏秋积水，沮洳泥淖，遂易为‘麀糟陂’。”元剧《铁拐李》四“醉春风”：“一个麀糟叫化头出去。”本为通语之词，元明至今遂为吴方言词：《山歌》卷一《娘打》“汗衫累子麀糟拚得洗”，《古今小说》卷三“如何容得这等麀糟的在此住”，《何典》卷一“麀糟弥陀佛”，卷二“懊躁弥陀佛”。嘉庆《松江府志》：“言不洁曰麀糟。”光绪《黄岩县志》、道光《苏州府志》、乾隆《崇明县志》皆收此词。今吴方言普遍有此词，杭州话尚可加形容词尾，如“麀糟刹了”。无锡、黄岩、松江、苏州的调查对象说，此词尚有不惬意、不悦义，此源于“麀糟”的另一义，《吴下方言考》卷五曰：“吴中谓执拗生气曰麀糟。”宁波北仑区（旧属镇海县）引申为倒楣晦气义，可加形容词词尾，如“麀糟不赖”。

卷十一“不快”条：“世谓有疾曰不快。陈寿作华陀传，已然。”按，此条系抄自《宾退录》卷九，陶宗仪仅加一“世”字。元曲《窦娥冤》二：“我身子十分不快哩。”《西厢记》四之一：“猛见他可憎模样，早医可九分不快。”明郎瑛（杭州人）《七修类稿》卷二四“谚语始”条：“有疾曰不快，见三国华陀传。”嘉庆《松江府志》、乾隆《震泽县志》、光绪《杭州府志》等皆收录，这是吴方言的通用词。今松江老年人叫“勿快”，60岁以下者叫“勿好”或“勿舒服”。苏州叫“勿适意”。黄岩叫“勿爽快”、“勿舒服”。

卷十九“经纪”条：“今人以善能营生者为经纪。唐滕王元婴与蒋王皆好聚敛，太宗尝赐诸王帛，敕曰：‘滕叔、蒋兄自能经纪，不须赐物。’韩昌黎作柳子厚墓志云：‘舅弟卢遵，又将经纪其家。’则自唐已有此言。”按，唐太宗语出于张鷟《朝野僉载》卷三，《三国志·魏书·朱建平传》“经纪其门户”，王梵志诗“经纪须平直”，这些早期用例都说明是动词，即《辍耕录》卷二四“结交重义气”条“吾辈若不为之经纪”，元蒋子正《山房随笔》“赵经纪棺殓且致祭”，明郑晓（海盐人）《今言》卷二“吴文恪公力为经纪”均系动词用法，可能是仿古。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经纪语”条：“江西人以能干运者为‘作经纪’。”吴自牧《梦粱录》“夜市”条：“又有经纪人，担瑜石……。”《辍耕录》卷十二“阴德延寿”条：“妾之夫作小经纪。”还有陶氏于此条所下的定义，均可证宋元时“经纪”已变成名词，沿用至今：《古今小说》卷三八：“城边无数经纪行贩，挑着盐担。”《二刻拍案惊奇》卷二一：“他是个做经纪的人”，“张善是个经纪人”。《越谚》中：“经纪，习商贾谋利者。”嘉庆《松江府志》：“营生曰经纪。”笔者所查阅的收有“经纪”的19种清代和民国的吴方言区地方志中，有11种指明此词带贬义，如乾隆《宝山县志》：“俗鄙人营生曰经

纪。”今天台、东阳仍有此词。松江叫“经纪人”。苏州亦然,但更多说“生意人”。云和叫“生意经”。

卷十一“牙郎”条:“今人谓狙侏者为牙郎,本谓之互郎,谓主互市事也。唐人书互作牙,互与牙字相似,因讹而为牙耳。”按,此条抄自宋孔平仲《谈苑》卷四。宋刘攽《贡父诗话》有类似说法,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四“牙郎”条误《谈苑》为《贡父诗话》。《旧唐书·安禄山传》、《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并作“牙郎”。此词又作“牙人”、“牙侏”:变文《庐山远公话》“牙人闻语”,《辍耕录》卷七“雇仆役”条“命牙侏雇一仆役”。民国《象山县志》收有“牙侏”、“市牙”、“牙郎”、“牙子”。黄岩今称“牙行先生”,松江、苏州的调查对象云:这种人叫“掮客”。非吴方言区也有“牙人”一词,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十“善谑”条:“京师有市猾某者,本骡马行牙人。”

卷十一“暖屋”条:“今之人宅与迁居者,邻里醺金治具,过主人饮,谓曰暖屋,或曰暖房。王建《宫词》‘太仪前日暖房来’,则暖屋之礼,其来尚矣。”宋周辉《清波别志》“暖屋”条:“里巷间有迁居者,邻里醺金治具过之,名暖屋。”元施惠《幽闺记》:“明日再取一樽酒与你暖房。”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四“谚语始”条亦收“暖房”一词。现代松江盖新房、新婚时有暖房的仪式,无“暖屋”一词,尤伯翔先生说:“黄岩解放前尚流行‘暖房’,但指新婚前夕。”天台新婚前夕要暖房、暖屋,头顿饭叫“暖房饭”。绍兴有“暖屋”,天台、无锡“暖屋”、“暖房”二词皆可,云和叫“暖灶”。

卷十三“太公”条:“今人谓曾祖父曰太公,此盖相承之谬,当称祖父为是。”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六“太公”条谓古代亦有称曾祖父为太公者。汉语各方言的亲属称呼本来就十分复杂,从《辍耕录》可知,从元代起吴方言“太公”指曾祖父,今犹如是。民国《崇明县志》:“曾祖父曰太公。”今黄岩称曾祖父为太公,远代也统称太

公,如祭祖叫拜太公。临海、天台、云和、宁波、绍兴、杭州、无锡、苏州均管曾祖父叫太公。吴江一般叫太公,有的地方叫老太公。松江人多数叫太公,少数叫大大。

卷六“家翁”条:“世言家之尊者曰家主翁,亦曰家公。唐代宗谓郭子仪曰:‘鄙谚有云:不痴不聋,不作家翁。’”按,唐代宗语系出唐赵璘《因话录》卷一,原末句为“不作阿家阿翁”,《隋书·长孙平传》作“未堪作大家翁”,《通鉴》卷二二四作“不作家翁”。本通语词,吴地亦通行,有“家公”、“家主公”、“家主”、“主翁”几种说法:《辍耕录》卷十三“释怨结婚”条:“吾所仇者,其家公也。”《水浒传》第二十回:“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时疫死了。”《山歌》卷八《求老公》:“别寻一个好家公。”明袁于令(苏州人)《西楼记》第十出:“客人弗知家主公要见弗要见。”《拍案惊奇》卷三二:“叫两个使婢在床前相伴家主。”《二刻拍案惊奇》卷五:“主翁多曾看见榜文赏帖的。”民国《金山县志》:“家之尊者曰家主翁。”今绍兴有文化者尚有此称。松江亦有称“家公”者。

与此相对的称呼有“家婆”、“家主婆”,《山歌》卷五《姘量》:“思量家公真难做,弗如依旧做家婆。”《拍案惊奇》卷六:“那春花丫头见家主婆睡着,……”《现代吴语的研究》第110页:苏州、常熟、昆山、宝山、青浦,“妻”的名称之一是“家主婆”。

卷十七“点心”条:“今以早饭前及饭后、午前、午后、晡前小食为点心。唐史:郑僖为江淮留后,家人备夫人晨饌,夫人顾其弟曰:治妆未毕,我未及餐,尔且可点心。则此语唐时已然。”按,此条源于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点心”条。庄绰《鸡肋编》:“上至院,微觉馁,孙(卖鱼)出怀中蒸饼云:可以点心。”可见“点心”本为动词,吃小食义。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有卖烧饼……等点心者”,吴曾的界说是“世俗例以早晨小食为点心”,这两语的点心才是名词,陶宗

仪将吴曾词义范围扩大,当是据元时习俗。点心是吴方言中的通用词,《拍案惊奇》卷三一“我拿些点心,下饭与他吃。”明李诩(江阴人)《戒庵老人漫笔》卷五:“午前午后小食谓上昼点心,下昼点心。”光绪《镇海县志》引《俗呼小录》同之。光绪《杭州府志》:“言日间小食曰点心。”光绪《川沙厅志》:“食半饱曰点心。”光绪《嘉定县志》:“俗谓清晨及午后小食也。”今黄岩、天台、东阳、云和、绍兴、无锡皆通用此词。陆学海同志云:杭州指非三次正餐的随意小吃,但吴江中南部则专指中午饭。松江白天的小食叫点心,夜宵则叫半夜饭。但苏州晚上八九点吃的也叫点心。现代吴方言中尚有“点点心”、“点心点心”的说法,则为动词用法。

卷八“利市”条:“利市之说,到处皆然。《易·说卦》‘巽,为利市三倍。’”按,此实本宋王应麟(宁波人)《困学纪闻》卷十九:“俗语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说卦》。”钱大昕《恒言录》卷四“利市”条指出,“《说卦》实以‘近利’为句,‘市三倍’为句”,利市始见于《左传》、《易林》。中古以后常用此词,如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三谓夏侯孜曾为时人号曰“不利市秀才”,《快嘴李翠莲记》“花红利市多多赏”。吴方言区尤常用:《梦粱录》“嫁娶”条:“房门前先以彩帛一段,横挂于楣上,碎裂其下,婿入门,众手争扯而去,谓之利市。”《戒庵老人漫笔》卷五“喜事为利市”,明沈璟(吴江人)《情笑记》:“老爹昨日才到任,你说这般不利市的话。”《何典》卷六“走到一个大人家去发起利市来”。范寅《越谚剩言》收“利市”。乾隆、道光、民国《苏州府志》:“喜事曰利市。”民国《太仓州志》:“得财曰利市。”今黄岩、无锡等处皆有此词。陆学海同志云:今吴江农村做生意还讲“利不利市?”

卷十四“上头入月”条:“今世女子之笄曰上头,……花蕊夫人《宫词》:‘年初十五最风流,新赐云鬟使上头。’又天癸曰月事。……然入月二字尤新,王建《宫词》:‘密奏君王知人月,唤人相伴洗裙

裾。”按，女子及笄曰上头本为通语词，梁萧纲《和人渡水》诗“婉婉新上头”，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清明节”：“子女及笄者，多以是日上头。”乾隆《震泽县志》：“男女冠笄曰上头”，光绪《宝山县志》、民国《吴江县志》并同。今东阳人尚知有此词，云和旧时称女子结婚笄头为“渊主客”（音）。解放后无此习俗，此词亦消失。

范寅《越谚剩言》：“月头，妇女经期”，“讳言月头上”，“又取当曰赶月头”。今黄岩说月经，文人尚说月事。松江老人叫“醒醒”，月经来叫“醒醒来”，中年人说“月经”，宁波老人叫“麀糟”。“入月”一词未能调查到。

卷七“课马”条：“俗呼牝马为课马……”按，此条抄自孔平仲《谈苑》，当作“骡马”，本通语词。宋王禹偁《小畜集》“记马”有“不幸而骡”句，自注“牝马为骡”，《元朝秘史》卷二“与了他一个……不生驹的骡马”，明张自烈《正字通》：“骡，俗呼牝马。”范寅《越谚》中：“课马，牝马也。”则是吴方言中亦有此词。但清初萧山人毛奇龄《越语肯綮录》：“马之牝者曰驢马。”此词早见于《尔雅·释畜》郭注、《颜氏家训·书证篇》。咸丰《鄞县志》、民国《新昌县志》皆曰：“畜之牝者曰驢。”今黄岩、温州叫草马，绍兴、新昌则叫雌马。有趣的是，今沿海由南而北，大致上南部吴方言叫驢马，北部吴方言叫雌马，江淮官话叫母马，中原官话的徐州和北方官话的济南及其北叫骡马。

卷十七“方头”条：“俗谓不通时宜者为方头。陆鲁望诗云：‘头方不会王门事，尘上空缁白纁衣。’”按，此条源于宋赵令畤《侯鯖录》卷八。罗隐《堠子》“只是恨头方”，宋苏辙《唐相二绝》之一：“已得惠妃欢喜见，方头笑杀曲江公。”吕南公《寄邓师厚》“方头言论易乖违”，皆强项、耿直之意，故吴越诗人陆、罗喜用之。郎瑛《七修类稿》卷二七“方头”条：“今人言不通时宜而无顾忌者曰方头。……今

读陆鲁望《苦雨》之诗，又曰：“有头强方心强直，撑住颓风不量力。”……方头亦是好称。”至元明时变成贬义，观陶、郎释义可知。元曲中亦用，见《绯衣梦》、《冤家债主》。“方头”一词后在吴方言中似已不存。光绪《杭州府志》：“言人不通时宜者曰方头……按以上谚语昔有今无。”今似只有近义词，如松江的“硬头颈”，指坚持歪理，有贬义。

卷七“咸杙子”条：“今人以米汤和人盐草灰以团鸭卵，谓曰咸杙子。按《齐民要术》，用杙木皮淹渍，故名之，若作圆字写，则误矣。”按，晋左思《吴都赋》刘注：“豫章有之（指杙）”。《齐民要术》卷六述及咸杙子，注：“吴中多作者。”宋洪迈（波阳人）《容斋续笔》卷十六“咸杙子”条：“今吾乡处处有此”，“至藏鸭卵，则又以染其外，使若赭色云”。杨万里（吉安人）《野店》：“深红杙子轻红鮓，难得江西风味美。”从《辍耕录》可知，元时吴人腌咸蛋并不以杙木皮，故多写作“咸圆子”，陶氏考证词源而特为正之。今似已不存。现松江人以盐、稻草灰、烧酒加少量水，叫腌咸蛋，云和叫咸蛋罐。

卷十七“传席”条：“今人家娶妇，舆轿迎至大门，则传席以入，弗令履地，然唐入已尔。……”此条源于宋龚颐正（遂昌人）《芥隐笔记》“转席”条。清初金埴（绍兴人）《巾箱说》引陶文后曰：“今吾越彩舆将迎之时，其兄若弟一人，于闺中抱之而升，迨至门，则自中堂及室，步致花烛，铺列一带红毡，转辗更番以达于新妇之居。……杭俗不以毡，而用米袋，名曰传袋，又曰袋袋相传。”清初王棠《知新录》卷三二“传代”条云：“令新妇步袋上，谓传袋，代袋同音也。”光绪《镇海县志》收“传代”一词，引《知新录》。是则《辍耕录》所记者为吴越习俗，“传席”、“传代”至清代犹存。宁波农村解放前尚存“传代”。天台二词皆有。

卷六“奴才”条：“世之鄙人之不肖者为奴才。郭子仪曰：子仪诸

子，皆奴材也。”按，所引郭语见赵璘《因话录》卷二。“奴才”一词，古籍常见，如酈道元《水经注》卷二十，《北史·尔朱荣传》等；近现代小说、戏曲中也常见，当是通语词，然吴方言中也常用，如咸丰《鄞县志》、民国十五年《象山县志》皆收有此词。

卷八“汉子”条：“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按北齐魏恺自散骑常侍迁青州长史，固辞。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就。’……”按，此条源于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陶宗仪所举第一例即为陆书原有，但新增一例。唐人用例如寒山《诗》之二五三：“碌碌群汉子，万事由天公。”由“汉”构成的表人的词如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六“举贤”中的“好汉”，《辍耕录》卷一“大汉”条中的“大汉”都是褒义，而陆游与陶宗仪都明言在他们的时代“汉子”有贬义，大概是词尾“子”的缘故。光绪《杭州府志》：“贱丈夫曰汉子，……按以上谚语今多仍之。”嘉庆二十二年《东台县志》：“长工谓之汉子。”东台邻吴方言，旧社会长工地位低下。此词现似已不用。

卷十八“书手”条：“世称乡胥为书手，处处皆然。……盖唐时已有此名。”按，此条源自宋龚颐正《续释常谈》“书手”条，首二句为陶氏所加。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支诺皋中》：“其案下书手蒋古者，忽心痛暴卒。”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四“俞鸣玉”条：“钱塘俞璩，……弘治初，投身入镇守府，为私房书手。”民国18年《金山县志》：“称乡胥为书手。”时代变迁，今此词无闻。

·还有些条目，如卷十二“乞求”条“世之曰乞求，盖谓正欲若是也。然唐时已有此言。”卷十七“改常”条：“今人谓易其所守者为改常。”卷十九“庞居士”条：“世斥贪利之人，必曰：‘汝便是庞居士矣。’”等，就笔者见闻，后世文献及今语似难以证为吴方言词或在吴方言区常用之词，故不具论。

以下诸条，陶宗仪未明言是吴方言词语，也无“俗曰”、“今人

谓”之类领起,但从元明载籍、清代地方志及现代吴方言推测,可能是吴方言词语或在吴方言区通用的词语。

卷十一“夜航船”条:“凡篙师于城埠市镇人烟凑集去处,招聚客旅装载夜行者,谓之夜航船,太平之时在处有之。”此条源于宋龚明之《中吴纪闻》卷四:“夜航船,惟浙西有之。……”《能改斋漫录》卷七“夜航船”条述略同。唐代已见记载,如皮日休、韦庄诗。元郭畀《客杭日记》:“九月十六日晴,晚趁吕城夜航,作钱唐之行。”明黄溥《闲中今古录摘抄》述海虞吴讷曰:“记得《韵府群玉》秀才,犹如趁夜航船听人说话者。”《二刻拍案惊奇》卷六:“趁着西兴夜航到得绍兴。”清袁枚《续子不语》卷六“夜航船二则”:“杭州夜航船,夜行百里,男女杂沓。”今人朱自清《航船中的文明》:“第一次乘夜航船,从绍兴府桥到西兴渡口。”阿英《夜航小行》:“夜航船是昼伏夜行的。”无锡人陈瘦竹老先生云:“小火轮之前有夜航船。”黄岩尤伯翔老先生云:“解放前黄岩至临海、海门有夜航船,夜里开的木船。”陆学海同志提供了一则有趣的语言事实:现由苏州(17:30始发)至杭州,吴江县城(晚七八点发)至平望(镇名)的机动火轮,当地人叫“夜航船”,也叫“夜航班”。

卷八“阿谁”条:“阿谁二字,见三国志庞统传。”按,此条抄自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九“俗语皆有所本”条,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四“谚语始”条亦抄录,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阿谁”条已早述及。“阿谁”本为前代通语词,如汉乐府诗《十五从军征》、《百喻经·妇诈称死喻》、《晋书·沈充传》、刘餗《隋唐嘉话》下、王梵志《借物索不得》诗中均有。大概宋元以后,“阿”只存于吴方言等南方方言中,所以吴、王、陶、郎等南方人都对“阿谁”这个俗语感兴趣。明黄尊素《说略》:“有掌科过孟尝处士处,题壁云:‘说甚么鸡鸣,说甚么狗盗,于今亦有虎狼秦,阿谁共走函关道。’”洪升(杭州人)《长

生殿·定情》：“借问从此宫中阿谁第一？”地方志中，嘉庆《松江府志》：“小名冠以阿。”光绪《青浦县志》有“阿爹”、“阿伯”等，范寅《越谚剩言》中有“阿大”、“阿三”、“阿五”、“阿六”等。但未见载“阿谁”一词。今松江、苏州有“阿大”、“阿二”、“阿猫”、“阿狗”，小名如“阿芳”等，但无“阿谁”，“阿”亦不能置于姓氏前。

卷十一“分疏”条：“人之自辨白其事之是否者，俗曰分疏。疏，平声。《汉书·袁盎传》‘不以亲为解’，颜师古注曰：‘解者，若今分疏矣。’《北齐书·祖珽传》：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领军，并与广宁王交结。珽亦见帝，令引入。自分疏。”按，此条实抄自《宾退录》卷三：“世俗谓自辩解曰‘分疏’。（引例同，略）则北朝暨唐已有是言也。”唐张鷟《游仙窟》：“娘子莫分疏。免入狗突里，知复欲何如。”敦煌变文《燕子赋》：“雀儿语燕子，何用苦分疏？”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二：“许公他日有会，乃谓顾曰：‘阁下何太谈谤？’顾乃分疏。因指同席数人为证。”据云今东阳尚有此词。

卷十八“宣发”条：“人之年壮而发斑白者，俗曰算发，以为心多思虑所致。盖发乃血之余，心主血，血为心役，不能上荫乎发也。然《本草》云：茺菁子压油涂头，能变蒜发，则亦可作蒜。《易·说卦》：‘巽，为寡发。’陆德明曰：‘寡，本作宣，黑白杂为宣发。’据此，则当用宣字为是。”按，此条实本宋张淏《云谷杂记》（张宗祥校录本）补编卷二“蒜发”条^②。洪迈《容斋随笔》卷六“宣发”条亦曾论及。《北齐书·慕容绍宗传》：“吾自年二十已还，恒有蒜发，昨来蒜发忽然自尽。”方以智《通雅》卷十八：“宣发，蒜发也。升庵曰：‘宣读第三声为蒜，今少年白发曰蒜发。徐文长则谓‘劳心计算则发易白，曰算发。’”章炳麟《新方言·释形体》：“淮西、淮南、吴、越谓黑中有一二茎白者为宣发。”光绪《镇海县志》引清初姜宸英《湛园札记》“人头发早白谓之蒜发，即宣发之讹也”。张淏，侨居婺州（今金华），姜宸

英，慈溪人，还有陶宗仪，他们都将“宣发”、“蒜发（算发）”列为专条，可见吴方言中有此词。民国《定海县志》、《象山县志》皆收此词。今东阳有，而松江、黄岩无。

卷十“不中用”条：“不中用，不可用也。”其前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九：“俗语皆有所本，如不中用出史记外戚世家、王尊传。”此自古及今当为通语中词语。近代用例如元盍西村小令《小桃红》：“古今荣辱转头空，都是相般弄，我道虚名不中用。”清初李玉（苏州人）《清忠谱》：“就把辱骂神象为题么？不中用。”吴方言区地方志常载此词：乾隆《吴门补乘》“言人无用曰不中用。”光绪《宝山县志》：“不中用，俗语不堪用。”咸丰《鄞县志》、民国《象山县志》及范寅《越谚剩言》皆收此词。今吴方言中普遍有之，但杭州、绍兴、云和说“无用”。松江主要说“没用”，也说“没用场”。苏州说“勿中用”。

卷八“不耐烦”条：“不耐烦三字，见宋书庾登之弟仲文传。”按，此条抄自《宾退录》卷七，行文更数字而已。《宋书·庾炳之传》：“炳之为人，强急而不耐烦。”刘希夷《秋日题汝阳潭壁》“幽人不耐烦，振杖闲步寂。”《古今小说》卷一：“主人家小厮，伏侍得不耐烦。”《二刻拍案惊奇》卷二二：“公子连押字也不耐烦了。”范寅《越谚剩言》收此词。嘉庆《松江府志》：“谓惮烦曰不耐烦。”光绪《杭州府志》：“谓心不悦意曰不耐烦。”等等。此乃吴方言的通用词，绍兴话说“勿耐烦”、松江话说“讨厌”（或加“煞”、“煞哉”）、“烦煞”（或加“哉”）。

卷六“发臄”条：“妇人头发有时为膏泽所黏，必沐乃解者，谓之臄。按《考工记·弓人》注云：‘臄，亦黏也。音职。’则发臄之臄，正当用此字。”此条抄自《老学庵笔记》卷十，惟书证与诠释相倒而已。毛奇龄《越语肯綮录》：“《周礼》注：今人头发有脂膏者谓之臄，音职。今越人亦有称发臄为发臄者，《广韵》作昵，又作臄，音同。”乾隆《象山县志》：“妇女发为膏泽所黏谓之臄。”道光、民国《象山县志》、

乾隆《震泽县志》、道光《苏州府志》、民国《吴江县志》并同。今人蒋礼鸿先生《义府续貂》：“今嘉兴谓黏为脰，如云黏脰脰，音为致。”

卷八“关节梯媒”条引《杜阳杂编》云，唐时元载宠姬薛瑶英与其父、母、兄及吏卓倩勾结，恃载权势，“以搆贿赂，号为关节”，天下求官者“指薛、卓为梯媒”，又引李肇《国史补》、牛軋《牛羊日历》，“以此推之，则谚所谓‘打关节，有梯媒’者，不为无祖矣。”按，陶以前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已有“关节”条。“梯媒”亦唐代通语，如李商隐《为东川崔从事谢辟及聘钱启》“某早辱梯媒”，杜荀鹤《投江上崔尚书》“仰天无处认梯媒”等。《辍耕录》特别记载了“打关节有梯媒”是元代俗谚。《辍耕录》卷二八“非程文”条：“柯理以梯媒而得中，对策何长？”元剧《谢天香》二“贺新郎”白：“怎么在我行打关节那？”《二刻拍案惊奇》卷四：“张廩生世事熟透，便寻个巡道梯已过龙之人与他暗地打个关节。”今杭州话叫“打关节”，云和话叫“赖（音）关节”。

卷二九“井珠”条：“人欲娶妻而未得，谓之寻河觅井；已娶而料理家事，谓之担雪填井；男婚女嫁，财礼奁具，种种不可缺，谓之投河奔井。凡纳婢仆，初来时，曰搯盘珠，言不拨自动。稍久，曰算盘珠，言拨之则动；既久，曰佛顶珠，言终日凝然，虽拨亦不动。此虽俗谚，实切事情。”按，“担雪填井”乃是俗语，如顾况《行路难》：“君不见担雪塞井徒用力。”“算盘珠”亦是常用之喻。明郎瑛（杭州人）《七修类稿》卷四十九“谚语至理”条：“未娶时，越河跳井。既娶，则担雪填井。娶久多生，不能养育，则投河奔井。此言虽戏，皆深致于理也。”无锡陈瘦竹老先生云，《辍耕录》河井一段未曾听说，而算盘珠一段则尝闻，唯“搯盘珠”为“走盘珠”。

卷十一“阿瘥瘥”条：“淮人寇江南日，于临阵之际，齐声大喊阿瘥瘥，以助军威。”引张翥《朝野僉载》郭胜静被打呼痛，口唱阿瘥

疼。按,考之文献:《古今小说》卷十三入话诗:“但闻白日升天去,不见青天走下来。有朝一日天破了,大家都叫阿疼疼。”“这四句诗,乃国朝唐解元所作。”吴文英《吴下方言考》卷四:“阿疼疼,痛楚声也。吴中凡孩稚作痛声曰阿疼疼。”看来此是吴方言词,今音 a? fuefue。然陶宗仪所云“淮人寇江南”,当指在淮南起事的张士诚率部南下取平江事,今苏北之泰州、扬州也有此词, a'io' ue,如写成汉字,似作“阿哟疼”,痛楚声或表惊讶,可见渊源有自。

以上对《辍耕录》的 40 多条所涉及的近 60 个吴方言词语,征引文献记载,依据近年调查作了疏证、阐述。我们还应从语言史的角度观察这些词语的变化发展。

有些在宋元时代是通语词,但当时吴方言中也常用,如“娘”、“老娘”、“奴才”、“汉子”、“不中用”等。有些本是通语词,后来进入了吴方言,而保存于其中,如“温墩”、“拗”、“麀糟”、“花娘”、“点心”、“利市”、“关节”等。有些词是吴方言与别的方言均有的,如“长年”是川峡与东南海隅皆有的,“咸杭子”是江西方言和吴方言皆有的(但至元时,吴方言区一般人已不知其词源)，“阿疼疼”为淮人和江南人共有。有的是道地老吴方言词,如“夜航船”(吴越水乡使然)、“火寸”、“焐儿”、“师娘”、“方头”、“蒜发”、“发肱”等。有的是吴方言词,后来进入了通语,如“丫头”、“梢当”。个别吴方言词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而“输出”至当时在江浙活动的苗军中,即“夫娘”。这是从吴方言与通语及其他方言(或语言)的关系而言。

如果研究其存在与消失,那么直至今日还在吴方言的某些点或很多点还保存和使用的词,有如“长年”、“丫头”、“温墩”、“拗”、“师娘”、“婆娘”、“麀糟”、“不快”、“太公”、“经纪”、“暖屋”、“暖房”、“蒜发”、“发肱”、“关节”等,有意思的是千百年来“夜航船”都是木船,多数地区此词消失,但在个别地区,夜里开的机动客轮承袭了

这个古老的名词。有的在行业语中消失,但在普通词汇中仍存,如“鎗”。有的让位于通语词,如“花娘”让位于“婊子”。有的词北移,如陶宗仪明确指出当时为西浙之词的“靽鞋”,后来换了另一说法“拖鞋”。陶宗仪明言“江南男覿曰师娘”,凌濛初之时则曰太保。有的词已经消失,如“方头”、“夫娘”、“阿谁”,“梯媒”、“大衣”;其中有的是由于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使然,如“焐儿”、“书手”、“传席”;有的将灭亡,如“老娘”,如今妇女都在医院生产,“袍”中年以下的人就没穿过,女子成年何须“上头”。然而说有易,说无难,笔者见闻有限,而吴方言范围如此之大,很可能上述有些词仍保存于某地。

根据《辍耕录》,结合古代典籍,可以发现有些词语由动词或动词性词组变为名词的过程,如“客作”、“经纪”、“点心”。

陶宗仪记载了宋初杭州的“火寸”在他的时代叫“焐儿”,可视为杭州方言由吴方言儿尾词(或儿化韵)向具有官话式儿尾词变化的一项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总之,陶宗仪这位吴方言区的卓越学者记录下的丰富的吴方言语音和词汇现象,是汉语史上的宝贵资料,值得大力研究,本文只是一次尝试。所述所论必有谬误,敬希方家指正。

后 记

向笔者提供方言资料的吴方言区人士主要有列先生:尤伯翔、王敬骝、孙家叙(以上黄岩),饶以和(云和人,长期在杭州工作),严伯广、严起翎(绍兴)、饶文倩(杭州)、汪维辉(宁波)、包忠文(东阳)、裴显生(天台)、陆学海(杭州人,长期在吴江工作),朱慧娟(苏州)、陈瘦竹、程曾厚(无锡),顾树兴、谈池平(松江),吴新雷(江阴)。除一人外,年龄都在50至76岁间;除少数人外,多数是有高

度文化者。饶以和、陆学海、王敬骝、饶文倩诸先生帮助尤多。某一名称有时甲知而乙不知,故文中往往特别指明被调查者。

王镔同志、祝鸿杰同志建议、鼓励笔者做词语的疏证工作,王镔同志多次惠寄大量资料。本文二稿曾得到杨耐思先生、宁继福同志赐阅。本文的写作始终得到周祖谟先生、唐作藩先生的鼓励,最后承王均先生审阅全稿,惠予教诲,拙文字逾二万,仍破格刊用。统致衷心的谢意。

1985年12月六稿

【附注】

- ①《明史·张士诚传》载士诚降元后,“邀王爵,不许”。自立为吴王后,“元征粮不复与”,参军俞思齐谏曰:“向为贼,可无贡;今为臣,不贡可乎!”
- ②见《南村诗集》卷三二《熟食日有怀》、卷三二《长安市》。
- ③周祖谟《射字法与音韵》,《问学集》下册,中华书局,1966年。
- ④见《吴语的边界和分区》,《方言》1984年第4期。
- ⑤引自赵荫棠《等韵源流》(商务印书馆,1957年)143—148页。《字学集要》中的助纳字按其所注的字母列入本文表中,如“饬涎”列入从母项下,而不列入邪母项下。
- ⑥另有“橙缠”,与之相同,后有专论。
- ⑦据《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 ⑧见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和《吴语的对比情况》(《国外语言学》1980年5期)一文。
- ⑨《元史·地理志》:江浙行省浙西道肃政廉访司辖平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诸路及松江府。《辍耕录》卷二六“浙西园苑”条、卷三十“银工”条,亦可证“西浙”指平江、松江一带。
- ⑩王世襄《髹饰录解说》第169—170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
- ⑪同上,第51—54页。
- ⑫同上,第35页。参见第53、55、161页。
- ⑬同上,第136—137页。

- ⑭见李荣《温州方言的变音》(《中国语文》1978年2期),郑张尚芳《温州方言儿化词的语音变化》(《方言》1980年4期、1981年1期),平田昌司《休宁音系简介》(《方言》1982年4期),徐通锵《宁波方言的‘鸭’[ɛ]类词和‘儿化’的残迹》(《中国语文》1985年3期)。
- ⑮⑯《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第57页、97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
- ⑰“焯”,中古音为去声队韵七内切,但是灰贿队韵字及泰韵合口字在唐后期及宋代已与支脂韵的合口字合流,韵母主元音变成次高元音。据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第41页和43页,杭州话“焯”、“寸”的韵母为 uei 、 uan 。上述两点可为推测南宋时期杭州音变的参考。
- ⑱同是松江人,顾树兴同志认为“丫头”有二义,而谈池平师傅认为只指丫鬟。
- ⑲⑳㉑见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第198页、206页、103页、205页、206页。
- ㉒《拍案惊奇》卷三一:“这花娘吃不得这一棍子”,被骂者并非娼妓,此乃骂詈语。
- ㉓陶珽《说郛》以“蒜发”等25条别标名东斋记事,署宋许观撰。

此文原发表子《中国语言学报》第三期(商务印书馆,1988)。我于1981.8.17致宁继福信,建议“从宋元人的笔记或其他典籍中多搜集些当时人关于语音分歧的直感的记载”(宁著《中原音韵表稿》第354页),后来我选择《辍耕录》作穷尽式的研究,写成二文,一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著作与元代语言》(待发表),一为此文。

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

——读《利玛窦中国札记》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生于意大利的马塞拉塔城,1571年加入天主教内忠于教皇的耶稣会,1582年来到澳门,翌年进入广东肇庆,此后历韶州、南昌、南京,1601年入北京,并深入宫廷,1610年卒于北京。利玛窦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教,但他把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记忆术等向中国学者传播。其功过,历史学家自有评说,但无疑的,他对中欧文化的交流有着重要贡献。

利玛窦是一位虔诚的宗教徒,也是一位博学的学者。他来到语言、文字迥异的中国,经过艰苦的努力,熟练地掌握了汉语、汉文,他把《四书》译为拉丁文,还加了注释。他用汉文写作,著述甚丰,如《天主实义》、《四元行论》、《西国记法》、《交友论》、《二十五言》、《畸入十篇》等等。他的有关中国语言文字的著作,是最令研究汉语史的学人感兴趣的,惜乎散佚者多。现在能见到的是,在明末程君房(名大约,字幼博)编的墨谱《程氏墨苑》中的四篇利玛窦写的罗马字注音文章,此即《西字奇迹》。1927年北京辅仁大学用王氏鸣晦庐藏本影印出版,取名《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1957年文字改革出版社重印,更名曰《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这四篇文章为《信而步海疑而即沉》、《二徒闻实即舍空虚》、《淫色秽气自速天火》、《述文赠幼博程子》,后三篇皆明言万历三十三年腊月朔题。罗

常培先生曾据以研究,1930年发表《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一文(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本3分),首先从利玛窦这四篇文章中387个不同音的字归纳出声母、韵母、声调的系统。接着把它与另一来华的耶稣会士比利时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的《西儒耳目资》(1626年刊行)进行比较,指出二者除去几处小的出入,大体并没有什么差异。

但笔者发现还有另一重要材料应该充分利用。利玛窦在晚年即1608年开始用意大利文记叙他在中国近30年的经历,临终时基本完成,他并无意于公开刊行。利玛窦死后不久金尼阁来华,他于1613年携带此手稿回罗马述职,途中译成拉丁文,并加了若干补充,1615年在德国出版。封面题字有“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书中初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和“著者同会比利时人尼古拉·金尼阁”等语。这就是著名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此书的著者主要是利玛窦,但金尼阁的若干增补,也有不小贡献。此后各种欧洲文字的译本陆续出现,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13年意大利文原稿于发现后第一次刊布。中国学者早就知道此书的存在,并且通过翻译的介绍而知道它的部分内容,但一直无完整的中译本,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何高济等译的中文本,现在我们有幸能读到全文。一位16世纪的西洋传教士看中国,必有偏颇,但是应该说,这本书比较忠实面客观地反映了明末中国社会的各个侧面。利玛窦说:“我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差不多30年,并曾游历过它最重要的一些省份。而且我们和这个国家的贵族、高官以及最杰出的学者们友好交往。我们会说这个国家本土的语言,亲身从事研究过他们的习俗和法律,并且最后而又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还专心致志日以继夜地攻读过他们的文献。”可见此书的真实性与那些道听途说

者不可同日而语。无怪乎 300 多年来其影响持续不衰。

我们最有兴趣的是看书是怎样记述汉语。他们来到中国的第一关就是语言关,“当时传教尝试的最大困难是不懂(中国)语言”。书中多次记叙利玛窦自己和其他教士如何努力学习汉语的事迹。作为异国人士,他们对汉语必然是很敏感的,他们在中国长期居住,刻苦钻研,对汉语应当是很了解的。《札记》共分五卷,第一卷是序篇,是对中国全面而概括的介绍,若干见解堪称鞭辟近里,其中有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概述。利玛窦指出,中国各省,口语也大不相同,即各有方言、乡音。此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Quon-hoa),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这种国语的产生可能是由于这一事实,即所有的行政长官都不是他们所管辖的那个省份的人,为了使他们不必需学会那个省份的方言,就使用了这种通用的语言来处理政府的事务。官话现在在受过教育的阶级当中很流行,并且在外省人和他们所要访问的那个省份的居民之间使用。懂得这种通用的语言,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他们工作所在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会是不说的,虽然有教养的人在他的本乡可能说方言以示亲热,或者在外省也因乡土观念而说乡音。这种官方的国语用得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该书第二卷还叙述了耶稣会士意大利人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奉命于 1579 年抵澳门,“他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就是学习中国语言,像人们所称呼的那样,学习这种语言的官话,即在全国通行的特殊语。”当时的澳门,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及从内陆到澳门做生意的人,“都不熟悉使用官话”,“本地的商人倒都懂官话但说得很差,因为他们习惯用他们的地方话交谈。”利玛窦于 1589 年初至韶州,拜访当地官员,自诩实际上比他们更懂得中国语言。1595 年他写道,他对汉语官话及汉文的熟练程度超过

了其母语,“至于意大利文,我再没有勇气使用它了,由于已不习惯”。《利玛窦中国札记》明确地记述了明代官话的存在,是高于方言的全国共同语,通行于各地,尤在官员和知识分子中很流行,其普及程度连妇孺也懂,外国人学汉语就是学的这种官话,当然在边远省份,方言势力比较顽固的地区如广东,官话影响相对地小些。这些关于早期官话的记述十分宝贵。“官话”一词在元代尚未出现,明代谢榛(1495—1575)《四溟诗话》卷三:“及登甲科,学说官话,便作腔子。”何良俊(1506—1573)《四友斋丛说·史十一》:“雅宜不喜作乡语,每发口必官话。”张位《问奇集》:“江南多患齿音不清,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这些是“官话”一词的较早用例,但是语焉不详。相形之下,利玛窦的叙述就显得清楚、明确多了。这大概是中国学人身在此中,习焉而不觉其可贵;而外国来客,最为敏感的就是语言,故详加观察,屡屡记述。

利玛窦是这样描写这个官话的声调系统的:共有五种声调,“非常难于掌握,区别很小而不易领会”。欧洲语言的一个音节,在汉语由于声调的不同,就至少具有五个不同的意义,“并且彼此由于发音时的声调不同而可能相去有如南极和北极”,每个字的确切意义是由声调决定的。利玛窦说:“我要冒昧地说,没有一种语言是像中国话那样难于被外国人所学到的。”第四卷谈到利玛窦等传教士1598年首次去北京活动未成,南返途中编成了《平常问答词意》等几套汉语字词表,因为汉语“共有五声”,他们这次创造了五种记号来标志五种声调。我们可以在现存的利玛窦写的那四篇罗马字注音文章中看到,阴平、阳平、上、去、入五声的调号分别为一、八、\、/、V,位置在元音之上。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袭用之,其《译引首谱·列音韵谱问答》云:“音韵之学,旅人之土产;平仄之法,旅人之道听。音韵敢吐,平仄愿有请焉,何也?平仄清浊甚次,敝友利西

泰首至贵国,每以为苦。惟郭仰凤精于乐法,颇能觉之,因而发我之蒙耳。”按,利西泰即利玛窦,郭仰凤即郭居静(Lazane Cattaneo)。罗常培先生1930年文中引用了这一段,但是《利玛窦中国札记》对此事叙述则更为详悉:“郭居静神父对这个工作做了很大贡献,他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家,善于分辨各种细微的声韵变化,能很快辨明声调的不同。善于聆听音乐对于学习语言是个很大的帮助。这种以音韵书写的方法,是由我们两个最早的耶稣会传教士所创作的,现在仍被步他们后尘的人们所使用。”郭居静的音乐才能是利玛窦素所敬佩的,《札记》第四卷第12章记载了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神父在北京宫廷教授演奏古翼琴的事,“庞迪我神父还是很久以前在利玛窦神父的建议下向很有修养的音乐家郭居静神父学的古琴。”由于《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明确记录,我们要说,这种借助音乐原理暗示汉语调型的记调法是在16世纪末由来华的西方音乐家郭居静发明的。

《札记》这两段关于郭居静发明汉语官话声调记调法的文字,根据文意,可知是金尼阁的手笔。金尼阁后来在其著作《西儒耳目资》中完全继承了这种方法,并对明代官话的五声有所申述:“中华所用之音极少,而字则极多,……音少必难免同音之乱,故中华先圣,出巧法以救之,每总音乘五声,则音虽少而能多矣。”“平声有二:曰清,曰浊。”“余曾见有一书,分称阴阳者,则与清浊之义相合也。”“清平不高不低,如钟声清远,浊平则如革鼓冬冬之音,旅人所知如是,恐于五方未免有一二不相合耳。”“正音如是,或有不合,土音而已。”“仄声有三:曰上,曰去,曰入。五者有上下之别:清平无低无昂,在四声之中,其上其下每有二,最高曰去,次高曰入,最低曰浊,次低曰上。”我们可以将这些文字说明与暗示调型的记调法结合研究,揣测明代官话,至少是利玛窦、郭居静、金尼阁时代的汉语

官话的五个声调的调值。清平(即阴平)肯定是个中平调——33。去声是高升调——35,上声是低降调——31。浊平(即阳平)是曲折调,可能是131或121,因为起点低,所以听感上就比上声还低。而入声可能是535或424的曲折调(问题在于入声若是带喉塞音尾或较短促,是很难形成曲折调的,或者它就是一个不促的独立调类)。还有,曲折调的起点和终点可能是齐的,也可能不那么齐。

令我们注目的是入声问题。元明时代汉语共同语中有没有入声,一直是聚讼纷纭的问题,很多学者主张入声已于此时消亡,这首先出现在若干关于《中原音韵》的论著中,其实,周德清“入派三声”的做法是否意味着入声消失,有不同的解释。《蒙古字韵》、《古今韵会举要》都有入声。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成书于1366年)卷四云:“今中州之韵,入声似平声,又可作去声。”卷十七云:“乐府中押‘逐、赋、菊’字韵者,盖中州之音轻,与尤字韵相近故也。”其《书史会要》(刊于1376年)卷七云:“入声轻呼,则同平声矣。”16世纪前期的朝鲜学者崔世珍的《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凡例》等著作也反映了当时的汉语有入声。笔者著有《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等著作与元代汉语》一文论及这个问题。如今《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的四篇罗马字注音文章和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更有力地证明了明代的汉族共同语即官话是有入声的,明末来华的西洋传教士的著作对我们了解16世纪的汉语有重大作用。

那末,《西儒耳目资》所反映的音系应该是官话而不是方言。有的专家根据此书曾得绛县韩云、涇阳王征之助,而认为它反映的是山西方音或西北方音。可是金尼阁在该书自序中说:“然亦述而不作,敝会利西泰、郭仰凤、庞顺阳(按,即庞迪我)实始之,愚窃比于我老朋而已。”韩云序亦云:“四表金先生,利先生之后进,哲入蓼矣,尚有典刑。”《西儒耳目资》的音系跟从利玛窦四篇罗马字拼音

文章所归纳出的音系大体上并无差异,而据利玛窦、金尼阁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所学习、研究的正是明代的官话。利玛窦等几个最初来华的传教士已经制定了用西洋字母拼写汉语语音的原则方案,且有实践活动,其依据当然是当时的官话,不会是方言,尤其不可能是山西方言。利玛窦没有到过山西,他所结交的上层人士大多是南方人。再说,韩云、王征及捐资刻印《西儒耳目资》的大官僚张问达父子虽为方言区人,但如《札记》所云,在官员和文士中,各省的方言是不说的,通行的是官话,因此韩、王、张等人必然懂官话,而且有较深研究。《西儒耳目资》一书是金尼阁为西方传教士学习汉语、汉字,在其前辈体系的基础上编写的,同时受到对传统等韵深致不满的韩、王、张诸人的激赏,认为对“中士”亦有大用,也“可以昭同文之化,可以采万国之风,可以破多方拗涩附会之误”,因而其中以问答形式写的大量诠释,其对象与其说是西土教士,毋宁说是中国学人。由于地理、历史的原因,山西方言一直有很大的封闭性,在历代汉语中并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看来金尼阁、韩云、王征不可能以山西音为依据,他们动辄“华言”、“我华之言”、“中华”、“中原”,以“正音”与“土音”对言,并自居“正音”,于引用“土音”处必特别注明。他们怎么能以山西土音作为“正音”呢?正音者,官话也。因此应该给《西儒耳目资》以应有的位置:其音系是明代官话的反映。

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什么?它与北京话有何关系,或者与中原方言有何关系?我们的看法是,未必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与利玛窦同时的顺天布衣徐孝的《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订于1603年)中没有入声的地位。至于《西儒耳目资》中多次言及“中原”,但细察之后,就会发现“中华”、“中原”二词经常换用,并无差别。如该书《译引首谱·小序》云:“图有二:首图万国音韵元泉,末图中华音

韵宗派。”《中原音韵活图说》则云：“此中原音韵活图，继万国音韵活图而设也。”等等。此书的“中原音韵”乃中华音韵之意。《利玛窦中国札记》没有直接提到明代官话以什么地方的音为标准音的问答，但他所记的另一件事发人深省。1600年利玛窦再次由南京去北京，新来的庞迪我神父是他的助手，他们乘坐由一个姓刘(?)的太监率领的马船船队沿运河北上，到了山东省西北的临清，太监因故先行，“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作为礼物留给了神父们，他说他这样送礼是因为这个男孩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南京话”。如果在明代，南京话是有别于官话的一种方言，那庞迪我就没有必要，至少不值得花力气在一开始学中国话的时候就去学纯粹的南京话，因为《札记》讲过，懂得通用的语言即官话，“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他们工作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罗明坚神父到澳门，第一件事是学中国话，但学的是官话，而不是澳门一带的土话或广东话。而且庞迪我此时是去北京，力图在北京打开局面，从事传教活动。事实上他此后一直住在北京，为什么要学纯粹的南京话呢？书中往后又记下了一笔：“作为利玛窦神父在北京伴侣的庞迪我神父学会了说中国话。”

众所周知，明代初年，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及成祖朱棣早期都建都于南京，从洪武元年算起长达54年。明郑晓《今言》（嘉靖四十五年刊）卷二：“盖长陵崩后，仍称北京为行在，则南都为京师。……正统六年，定都北京，去行在。”徐达攻取大都，朱棣坐镇北平及后来迁都北京都曾带了大批南京人及其他江淮方言区的人北上，南京话在明代占据一个颇为重要的地位，或许即为官话的基础方言，这个假设尚需从语言学、历史学等方面进行论证，《利玛窦中国札记》所述的太监赠送南京男孩教神父学南京话一事，可以作为思考这一问答的重要线索之一。

《札记》还零星地记述了汉语的一些特点。第一卷和第四卷都指出汉语的单音节性，“我从未遇到过双音或多音字，虽然有些字可能包含两个甚至三个元音，其中有些是双元音。”利玛窦指出欧洲语言里的一些辅音在汉语里却没有。第五卷记述一个年轻的北京教徒学习用拉丁文背诵教义问题，“他们在这方面的困难在于缺乏某些相当的字母”。缺乏什么呢？他们在肇庆传教时，“为了使权威的观念和上帝之名配合起来，传教士们……总是使用天主这个称呼，意思是上天之主。他们难以找到一种更恰当的表达方式，因为在中国语言中没有辅音 D，在他们看来，这个特殊名称中有一种庄严和神圣的意味。”这是指的拉丁文 Deus（上帝）的 D，汉语无此浊辅音。又，元代，蒙古人称大都为 Campalu，辅音 P 常与 B 互换，蒙古人开始称之为 Cambalu，“但是中国人很少用辅音 B，仍把这个名字读成 Campalu”。按，汉文即“汗八里”。《札记》又说，“中国人在他们的语言中没有流音‘R’，而且从不使用中间没有元音的两个辅音。”从上引的《札记》各段，就能理解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的下列安排了：该书列 29 个字母，其中“不鸣”者四，即“他国用中华不用”的辅音 b、d、r、z，《列音韵谱问答》云：“敝土更加其四，其号为 b、d、r、z 之状，夫四者不但中华不鸣，亦不能鸣，何也？人口不习，岂能强而出之？”利玛窦、金尼阁二人的观点和做法实出一辙。

《札记》还提到“南京(NanKin)一词，葡萄牙人最初在福建省漳州的居民中得知此名，但叫做 LanKin，“因为该省的人总把 N 读成 L”。按，今闽南不少方言仍然如此。书中还提到，广东的省城叫广州，“但葡萄牙人弄混了省的名字，也叫它广东”。按，英语承其误，至今仍以 Canton 指广州。

明代文言和口语的严重脱节也自然成了这些欧洲人的话题。《札记》中说：“在风格和结构上，他们的书面语言与日常生活中所

用的语言差别很大,没有一本书是用口语写成的。一个作家用接近口语的体裁写书,将被认为是把他自己和他的书置于普通老百姓的水平。”下面的一段描绘堪称惟妙惟肖:“人们不可能靠听写中文来笔录一部书,把一本书念给听众听,他们也无法听懂书的内容,除非人人眼前都有这样一本书。发音相同的各种不同书写符号不可能用耳朵听准,但是可以用眼睛把符号的形状以及它们的意义分辨清楚。事实上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几个人在一起谈话,即使说得很清楚、很简洁,彼此也不能全部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意思。有时候不得不把所说的话重复一次或几次,或甚至得把它写出来才行。如果手边没有纸笔,他们就沾水把符号写在什么东西上,或者用手指在空中划,或甚至写在对方的手上。这样的情况更经常地发生在有文化的上流阶级谈话的时候,因为他们说的话更纯正、更文绉绉并且更接近于文言。”这里揭示了文言适于目治而不宜耳治的特点,明代知识分子口语中文言成分如此之重,以致妨碍交际,并非如今人所想象的,文言只限于书面语,《札记》所记述的明代这一社会语言学现象很有价值。利玛窦认为,自古以来中国人“就一直把绝大的注意力放在书面语的发展上,而不太关心口语。就是现在,他们的辩才也只见之于他们的写作而不在于口语。……结果有时候甚至是住在同一城市而且离得很近的朋友,也是书信往返,面不见面谈话”。

《札记》也涉及到语法问题:“两个人谈话时,他们从来不用语法上的第二人称,……在谈到自己时从不用第一人称的代名词,除非是主人对仆人,或上级对下级讲话。”他指出,汉语中表尊敬和谦虚方式之多,“很明显的是如果不想显得没有教养或无知,如果想懂得别人所说的或所写的是是什么,一个人就必须深通各种不同的表达思想的公式”。

《札记》记叙了利玛窦与徐光启在北京合译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一事，“这里也可以指出，中文当中并不缺乏成语和词汇来恰当地表达我们所有的科学术语”。在序篇里讲到中文“不仅是用几个短语而是用几个字就清楚明白地讲出各种想法，而那在我们就必须罗嗦半天还没有讲清楚。”这可能主要是指文言而言。

利玛窦又叙述了用汉字写的书面语不仅广及全国，而且播及东亚。“任何以中文写成的书籍肯定可以进入全国的 15 省份……而且，日本人、朝鲜人、交趾支那的居民、琉球人以及其他国家的入，都能像中国人一样地阅读中文，也能看懂这些书。虽然这些种族的口头语言有如我们可能想象的那样，是大不相同的。”当时的越南使者定期入朝中国，路过广东肇庆时总要乘机访问利玛窦等人的天主教堂，并被赠予用中文写的教义问答，“他们和中国人一样地阅读它，尽管他们说的语言有天渊之别”。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其《列边正谱·小序》也说：“中华一统，车书会同，其字从意。一统之外，邻近诸国，余还闻有几国字皆从意，每号象之绘之，后加其音耳。”“中华从意之字，邻国幸而用之，虽风气之音，大不相通，但使中文如本地之文，即无不通之者。”

另外，在序篇及其后还数次述及汉字的繁难及表意特点，兹不赘论。

总之，由利玛窦撰写、金尼阁补充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了利玛窦在中国近 30 年的经历，相当充分地反映了明代末年的中国。这部名著对于研究明代中外交通史，乃至明史都很有史料价值。书中涉及汉语达数十处，特别是纪述了明代汉语共同语即官话的性质、使用范围以及口语和书面语的使用情况等等，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对我们研究明代汉语及明季汉语音韵学的外来影响都有很为重要的价值。

* 本文初稿曾得李思敬、杨耐思二先生赐阅,谨致谢忱。

此文原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何高济等的中译本《利玛窦中国札记》是据英文本译的,而其祖本则是金尼阁的拉丁文本。书中述及在山东临清,姓刘的太监送给庞迪我一个在南京买的男孩,教庞迪我纯粹的南京话,拙文已经论及。杨福绵先生见到拙文后,表示同意我的观点,并惠予支持,其《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所纪录的明代官话》一文指出,《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利玛窦意大利文本是:“太监刘步惜很高兴地把在南京买的一个书童送给神父们当做礼物,因为这个男童会讲地道的中国话(che parlava molto bene [la] lingua cina),可以教正要开始学中国话的庞迪我神父。”杨先生接着说:“金尼阁把利玛窦原文‘地道的中国话’改成了‘纯粹的南京话’,可见当时的南京话就是地道的中国话,换言之,就是当时官话的基础方言,是明末标准官话的代表,否则庞迪我就没有必要去学纯粹的南京话,而应该等到到北京后,学纯粹的北京话了。”杨文引证利氏论述甚多,见解精辟,高明之著。又拙文把利氏的五种调号说成是“暗示调型的记调法”,进而揣测调值。杨先生指出,这五个符号是借自拉丁文和法文,1990年夏我为杨先生整理上述文章时,读到了批评我臆说的一段,感愧不已。此次结集时未按成规删去这则谬见,否则读者见到杨文(将在北京《中国语言学报》第5期上发表)时会感到无的放矢。我不知以为知,当引以为戒。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王顺洪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云,江户时代(1603~1867)的中国语被称作“唐话”,学习者主要是唐通事(1604年起设置的,负责对来日唐船的翻译和贸易事务的官员)。该书页270摘录了唐通事子弟练习唐话的教科书《小孩子》中的一段:“打起唐话来,凭你对什么人讲,也通得了,苏州、宁波、杭州、扬州、绍兴、云南、浙江、湖州这等的外江人,是不消说,对那福州人、漳州人,讲也是相通的了。他们都晓得外江说话,况且我教导你的是官话了,官话是通天下,中华十三省,都通的。”六角教授指出:“所说的‘福建人和漳州人也通’的唐话,是指南京口,即南京语。”按,“中华十三省”即明代的十三布政使司。明初大批南京一带的人随沐英向云南移民,至今云南很多地区的人的家谱记载,先人来自南京应天府高石坎柳树湾,《小孩子》将云南列入“通得了”的外江范围内,是符合明代南京话的实际情况的。该书页273引录了唐通事卢笃三郎的

自传：“笃三郎（高朗），弘化四丁未……生于长崎港……，卢家因当唐通事，跟郑干辅……诸先生学支那话（支那南京音）。”该书页 276 记载了著名的唐话学者冈岛冠山（1674—1728）撰写的《唐译便览》卷一之首的话：“每字注官音。”六角先生随后指出：“这里所谓的官音是指官话的南京音。”明治四年（1871）日本外务省设立汉语学所，教的仍是“唐话时代的南京语”，明治九年（1876）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科（其前身为汉语学所），将“南京语教育转换成了北京语教育，唐通事以来的南京语教育就此告终”。这一史实也有力地证明了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承王松木先生提供这一学术信息，谨此致谢。）

“布文”辨识本末及其他

赵元任先生《语言问题》第七讲“方言和标准语”里有一段话：

不过方言这个名词在广义上讲起来么，也当根本不同的语言讲，比方清末在北京有广方言馆，事实上就是教英国语言、德国语言、俄国语言、法国语言、日本语言，各处很不同的语言，根本不一定有关系的、历史上不一定同源的一些语言。

为此，我就去找《广方言馆全案》读，我看的不是江南制造局原刻本，而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中的铅字新排本，1989年出版。

拙文《“方言”和〈方言〉》略叙了广方言馆办设的始末，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奏设上海同文馆，后改称广方言馆。《广方言馆全案》是当时的部分原始案牒的汇编，故价值颇高。赵元任先生列举了当时教学的语种，我顺着他的思路，所以拙文中也讲到上海广方言馆的情况：

学习的外国语文主要是英文，其次是法文、俄文、布文、德文。(光绪五年的“江海关道刘禀复南洋通商大臣沈”的文书中有“至俄文、布文，似应一并令其肄习”，“沪上广方言馆，向有学习英文、法文、布文生徒”，“至俄文、布文本应兼习”诸语，其中“布文”不知何指。)

日文一科未见提及。我说的五文是从《广方言馆全案》一书中勾稽

出来的,英、法、俄、布四文见上引光绪五年文书,“德文”见于光绪十五年(1889)“江海关道龚移制造总局”文书,内云:“如有翻译俄文、德文精熟者,亦可咨送一二名。”

上个世纪,西方列强的舰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后,在这所培养洋务人才的外语学校里,教学的语种除英语外,还有法、俄、德语,自是情理中事,怎么又冒出个“布文”来?在《广方言馆全案》中出现了三次,当非手民误植,百思不得其解。我想起了《书林清话》所载的一则史实:清高宗万机之暇观赏宋代书画,屡见建安“勤有堂”字样,想知道原委,于是在乾隆四十年正月丙寅谕军机大臣:“询之闽人之官于朝者,罕知其详,若在本处查考,尚非难事,着传谕鍾音,于建宁府所属,访查余氏子孙……逐一查明,遇便复奏。”他身居九五,自会得到满意的解答,我是老九,只得在文中加注,盼通人赐教。可至今未得高明海导,疑滞蓄于胸,总思得理而后安心。说来好笑,我也曾怀疑“布文”或许与比利时有关,但是转念一想,在19世纪后半叶蚕食鲸吞中国的列强中,比利时还排不上号,而且比利时用的主要是法语和佛兰芒语。我查了刘正琰、高名凯等《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岑麒祥《汉语外来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0),黄长著《各国语言手册》(重庆出版社,1990),刘涌泉、赵世开《英汉语言学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辞海》(1989年版)和《汉语大词典》,均不得其解。后来也查过旧《辞源》、旧《辞海》,问题依然。

一日理不得,一日心难安,最近又查《中文大辞典》(台北中国文化研究所,1968),没有“布文”条,却有“布国”、“布路斯”两条(后又查书,知袭自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我恍然大悟:“布文”者,德文也!郁积两载,一夕涣然冰释,浮一大白可也。且慢,还留有问

题,何以《广方言馆全案》所录载的文书中又有“德文”呢?

我长期不得其解,总结教训,犯的错误有三条:

第一、《广方言馆全案》收文书 50 多通,上起同治二年(1863),下迄光绪二十年(1894),仅 31 年,通常用“清末”二字即可概括,实际上“清末”的外延大于它。这 31 年时线虽短,其内却有时点之异,中西两方中最大的变化是,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乘普法战争胜利之威于 1871 年建立了德意志帝国。这段历史我在小学时就学过了,“文革”中在农场须读马恩著作,故更为熟悉。但是我思考“布文”问题时,总是立足于中方,中国历史太悠久,这“清末”中的 31 年,可谓“弹指一挥间”。压根儿就没想到普鲁士与德意志的问题。

有了德意志,所以广方言馆的光绪十五年(1889)的文书中有了“德文”。但是光绪五年(1879)“江海关道刘禀复南洋通商大臣沈”文书中还叫“布文”,称布文教习为“布师”,可是该文书中已出现“德国”字样,原文如下:

沪上广方言馆,向有学习英文、法文、布文生徒,以所请外国翻书儒士三人,兼充教习。嗣因布师金楷理离局,生徒无多,早经撤馆。……去夏教习法文傅兰雅请假回国,……现在傅兰雅经署理德国李星使咨留三月,翻译西书,……

再看《清史稿》卷一五七“邦交志”五“德意志”:

德意志者,日耳曼列国总部名也,……同盟三十六国,而中唯布路斯最强。……(同治)十年春,李福斯递国书,言德意志各国共戴布国君主为德意志国大皇帝。

我错将时线压成时点,以至勾稽出来的材料“布文”、“德文”并列,而没有想到它们的先后关系。

第二、王念孙《广雅疏证序》云:“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

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此之不悟,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鲜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岐矣。”这段名言,耳熟能详,若遇先秦典籍,我也许会警惕,而于同光文书,视作近代。我没有能从“布文”想到“普文”(在汉语文献中不知有否出现此词)。再举最近一例,1993年5月19日在北师大宿舍区内的淮扬餐厅里,精致的菜单上有“鲜磨豆腐”,我惊讶:饭馆里还磨豆腐?问了服务员,才知是“鲜蘑”。有文化的人往往拘执于形体,或许文化越高的人其蔽越深。王念孙说:“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其实,也应该“就今音以求今义”,“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第三、德语 Preussen,中国人先译为“布路斯”,大概因为德语[p]是送气的,在重读音节中尤然,后译作“普鲁士”(清谢清高《海录》之“埔鲁写”、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之“普鲁社”当系据英语 Prussia)。如果广方言馆案牘中出现的是“普文”,我想我能联想到普鲁士,而三次碰到的都是“布文”,于是屯兵于坚城之下几近两载。与德语不同,汉语/p/、/p'/对立,送气与否,区分音位,自古已然。宋元切韵学著作对此都是严加区别的:《韵镜》和沈括《梦溪笔谈》为“清”和“次清”,《卢宗迈切韵法》、《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为“全清”及“次清”,《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则为“纯清”与“次清”。我求解“布文”时,曾想到“比利时”,怎么也想不到“普鲁士”,我跳不出“全清”的藩篱,思想的触角涉及不到“次清”的领域,这大大影响了我的“认知”过程。

这都是愚鲁所致,特解剖如上,献丑了。

本末道罢,复附赘文:

一、我们需要一部完备的汉语外来语大词典、更大的汉语历史

大词典。上海的《汉语大词典》即将出齐,这是空前的,但是也不应讳言,未惬人意。客观原因之一是汉语历史悠久,文献充栋汗牛,而研究太少。

二、汉语词汇的研究在乾嘉之世登上了一个高峰,但是直到本世纪上半叶,基本上限于先秦两汉(尤其是先秦)。50年代起,唐宋元俗语词的考释蔚为红学,近年又有移师魏晋南北朝之势。这十几年由于台港词语及粤方言词的大量涌进,新词语新词义受到语言学界的青睐,出版了不少论著。但是自上一世纪中国走出封闭起,西方语言和日语对汉语的影响,特别是对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形成所起的促进作用不为不大,而这段时间汉语词汇的研究显得很薄弱,如果研究得多,也就被词典吸收得多。

现在对汉语史的研究确实较以前深入多了,各个时期皆有学人在奋力攻关,但是有些论著,冠以“近代”或“魏晋南北朝”,所引材料上下数百年,地域遍全国,而书中却没有或较少言及时空的差异,则有压时线成时点,聚平面为一点之嫌,仍然有欠于精深。

三、我从《广方言馆全案》中辑录出有关语言文字的词语若干条,列于下,为研究同光之世的语言、历史、文化的学人提供些素材。括弧内为该词语首次出现的文书的时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折》(页115—117)未署时间,置于同治六年(1887)和八年(1889)两文书间,只得标以“1887—1889”。兹分四类:

甲 语言文字(1863) 言语文字(1863) 语言(1863)

乙 中外文字(1867) 中西文字(1871) 汉洋文字
(1887—1889)

丙 中国语言文字(1870) 中国语言(1870) 中国文字
(1867) 清汉文字(1863) 清语(1863) 汉语
(1863) 汉文(1887—1889) 华文(1870)

丁 外国语言文字(1863) 西国语言文字(1881) 西人
语言文字(1870) 西语西文(1863) 西文西语
(1863) 外国语言(1867) 外国言语(1867) 西语
(1870) 西文(1863) 洋语(1863) 洋文(1867)
洋字(1863) 番语(1863) 夷语(1863) 英文
(1879) 法国语言文字(1879) 法文(1879) 法语
(1879) 俄文(1879) 布文(1879) 德文(1889)

“番语”、“夷语”皆仅一见于同治二年的公文中,可见清政府官员的倨傲之情,此后则习用“西语”、“外国语言”等。“英文”、“俄文”至20世纪50年代起方逐渐让位于“英语”、“俄语”,但至今仍有人使用。

四、章太炎(1869—1936)的《论语言文字之学》(《国粹学报》丙午年即1906年第24、25期)在论述传统的文字、训诂、音韵之学后,说:“合此三种乃成语言文字之学。此固非儿童占毕所能尽者,然犹名为小学,则以袭用古称,便于指示,其实当名语言文字之学,方为确切。”这为汉语言学史家所称道。章氏拈出“语言文字”四字必有所本,《广方言馆全案》的1863年及其后的文书中已屡次道及“语言文字”,或冠以“外国”、“西国”、“西人”、“中国”。

五、100多年前的上海广方言馆的历史应该是我国外语教育史上值得重视的一节。语种的地位,英语最高,法语其次,俄语、德语是兼习的科目。现在法语是小语种了,二次大战后法语的地位大为降低,以前则不同,请看光绪五年(1879)“江海关道刘禀复南洋通商大臣沈”的公文:“光绪五年正月十五日祇奉钧谕并抄总理衙门公函,以上海广方言馆学生,应令学习法文、法语。各国遣使办理公事,法文较为适用,现在同文馆学习法文者无多,将来必不敷用。上海广方言馆学生,向虽专习英文,刻下自应择其资质聪颖者,赶

令学习法国语言文字,以期有济于用。”以后对法文生徒一直比较重视。总的来说,法文次于英文,光绪二十年(1894)广方言馆经费开支账内,英文设正教习兼翻译一名,副教习兼翻译一名,前者“每月薪修一百三十元,伙食银三两六钱,油烛洋一元,跟丁钱五千文”,而法文教习兼翻译只一名,“每月薪修一百元,从前延聘洋人,现请华人,薪水较轻”。可见洋人待遇高,自“古”即然。

1993年6月

补志:“语言文字”四字的更早用例:元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自序(撰于延祐二年):“今上之读经,虽知主朱子说,不知读之固有法也。读之无法,故犹不免以语言文字求之,而为程试资也。”“文字语言”四字的更早用例是宋陈善《扞虱新话》上集(跋于绍兴己巳)卷三“三舍文弊”条:“崇观三舍,一用王氏之学,及其弊也,文字语言,习尚浮虚,千人一律。”

本文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文通讯》第29期(1994年3月)。

跋

浮生过半，成绩微微。如果说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话，那就是也曾看了些书，也曾写了些论文。现遵吕叔湘、李行健、曹先擢、查道元诸先生之命编成这本自选集。

这些论文从题目所涉的时间说，上起战国，下迄清末，勉强像个汉语史论文集的样子。

我写过关于宋词韵的系列论文，这本集子只收一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其余概不入选，因为我想从头重新做起，完成一本专著。《泰州方音史及通泰方言史研究》字逾十万，无法选进，只收了由其中部分内容浓缩而成的一篇短文。

人们常引用“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的话，似乎文章就有可能成了“不朽之盛事”。还是看看段玉裁的《潜研堂文集序》：“古之以别集自见者多矣，而多不传；传矣，而不能久；传且久矣，而或不著；其传而久，久而著者，数十家而已。其故何哉？盖学有纯驳浅深，而文又有工拙之不等也。”何等正确！记得两年多前，我曾花了几个月的工夫逐页翻阅宋人文集，好些本来已不传，靠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来，总算勉强传下来了，但是委实“著”不起来。驳浅如我，这些文章“传”、“久”、“著”，是不敢奢望的。我总不能忘记朱德熙先生的话：“50年代以来培养的学生，其中虽然也不乏杰出者，但总的看来，失之于陋。”“陋”是铸定了的，几十年来，客观条件之差，毋庸再言了。但既然戴了顶“误身”的“儒冠”，就只得尽主

观努力了。我的文章,当然算不上“呕心沥血”之作,但称“殚精竭虑”四字不为过。我秉性愚鲁迟钝,有时为一条例证,费几天时间,一篇文章总要四五稿,甚则六七稿,经年累月,方得成文。我只希望其中有些能成为学术之道混凝土层下的一粒细沙,于愿足矣。

这些文章,在构思、写作、删改的过程中,得到众多师友的鼓励、批评、指教,每篇文章都有他们的心血在、思想在、语言在。每当翻阅这些论文时,感激之情由衷而生,众多赐教、赐助的师友,是我要泥首以谢的。

每篇文章交稿时,我总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往往加上一句,“祈请方家指正”。这次结集,和盘托出,囿于自己的识、才、学,“当局者迷”,必然有错误,甚至硬伤。胡三省云:“人苦不自觉,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下载之后,鄙陋如我,谬误更不知凡几。恳求诸位师友教正,这是我叩首以请的。

衷心感谢吕先生为拙集题签,李行健学长赐教良多。当今“唯钱是图”,而河南教育出版社却愿出版这冰箱中的赔钱货,令人感动。我一再请求修改《〈卢宗迈切韵法〉述评》一文,承查道元先生一再宽假,以致影响他的工作,这是我负疚不已的。邓兴锋、顾黔二君助我整理,亦致谢忱。

鲁国尧于金陵愚鲁庐

1994年3月17日

作者简介

鲁国尧,江苏省泰县人,1937年11月14日生。1955年江苏省扬州中学毕业,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门化毕业,1964年北京大学汉语史专业研究生毕业。1965年分配至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1990年9月至1991年4月应日本学术振兴会之邀赴日从事汉语语音史的研究,任东京大学外国人研究员,1992年2月至8月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访问学者,1993年2月被聘为复旦大学兼任教授。现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语言学科规划组成员。

1986年获首届王力语言学奖金三等奖,1989年获第三届王力语言学奖金三等奖。

鲁国尧从60年代初期起即研究宋词用韵,30年来著系列论文多篇。为了能透彻地理解宋词用韵所反映的国语、方言的实质,他在80年代又拓至邻近领域,研究了部分宋金元诗韵、元曲韵和宋元笔记中的语音史资料。其《元遗山诗词曲韵考》打破了近体诗用韵牢守官韵的成说,订正了钱大昕、王力关于“借韵”、“出韵”的观点;他的关于白朴词韵、曲韵的论文证明白氏无论词曲均依实际语音押韵。他指出元白用韵反映了金元时代北方汉语的韵部系统,而这早于周德清《中原音韵》百年之久。鲁国尧还指导国内青年学人研究了温庭筠、韦庄、王禹偁、杨亿、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陈

与义、曾几、楼钥、刘过、姚燹、王恽等人的诗词用韵及洪兴祖《楚辞补注》的反切与直音资料。在此坚实的基础上,他写了长篇论文《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这是他近30年对宋金元词韵作了穷尽式研究后的初步总结,继承了罗常培先生的遗志,填补了一项空白。

近年来鲁国尧进而研究宋代的切韵学,1990年11月他在东京发现了南宋初年的《卢宗迈切韵法》,使之返归故土。其功类于杨守敬,但《韵镜》长期大显于东瀛,故易为杨氏注意,而《卢宗迈切韵法》自1900年入藏日本国家图书馆以来,一直被忽视,发现后就面临辨伪证真、评论价值的问题。其《〈卢宗迈切韵法〉述评》援据赅博、考证详审、创获卓卓,被认为将宋代音韵学史与宋代语音史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北京大学出版社将出版单行本。

鲁国尧在《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一文中,提出了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当时的南京话的假说,得到了国内外很多专家的支持。这跟北京话自元迄今一直是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的观点相对立。

方言史的研究一直是汉语学的薄弱部门。《泰州方音史及通泰方言史研究》是他写的第一篇论文,十余万字,不仅详列了泰州方音向普通话集中靠拢的12项音变,总结了声韵调成分的增减与变化,而且从居民变迁、历史文献的勾稽、实际调查、与近邻亲属方言的历史比较,寻溯泰州方音直至清初的历史,归纳了音变的四种模式。该文指出江淮之间本为吴语区,永嘉之乱导致了汉语北方话的南移,江淮官话发源于此,文中提出了通泰、客、赣方言同源论的假说。《〈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是其方言史的又一力作。他对《辍耕录》所记载的吴方言的语音和词汇资料作了穷尽的辑录,论证了元代松江音系,对《辍耕录》中的近60条吴方言词语,不仅援

引文献加以疏证,而且与近现代方言联系,从语言史的角度考察这些吴方言词语的变化和发展。宋代闽语是他近期的研究课题之一。

在词汇史领域他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除《〈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外,还著有《“方言”和〈方言〉》、《“布文”辨识本末及其他》二文。其《“隶书”辨》也含有对上古若干词语的考证。他在青年时代研究过古汉语语法,“文革”后发表了《〈孟子〉“以羊易之”、“易之以羊”两种结构类型的对比研究》。他对历史学、文献学也有涉猎,写过《长安论韵考——一切韵序史实考之一》、《辑校本〈山中白云词〉之讹误》、《从曲律、曲韵查核诸家对白朴曲点校的失误》。他还是《辞海》1979年版、1989年版和《现代汉语虚词例释》的主要编写人。他不自封自囿,注意借鉴国内外学术新成果,与侍建国合译了《中原音韵音位系统》。

鲁国尧潜心向学,数十年如一日。综观其学术历程,他着力于专题研究,愿下苦功,扎硬寨,打硬仗,作穷尽式的研究。他每进行一项课题,总以狮子搏兔之力作超常的投入。譬如为写《“隶书”辨》,除了大量的文字学论著外,他还读了绝大部分的现存的两汉人著作和部分考古资料。为撰《〈卢宗迈切韵法〉述评》,他发宏愿,埋头翻阅了三百九十几种宋人文集计六千余卷,又接着看了宋元明类书几十部,自宋以来的书目百种,宋人笔记百种,史书十余部。他不轻著述,精益求精,故文以质胜,颇具深度,多所发明。从选题到撰述都可见他好学深思、务实求是的精神。

他深感,虽然做了些工作,但才疏识陋,为学甚隘。他说,他要好好读书,好好写作。他将继续前进,一步一个脚印。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鲁国尧自选集

作者 =

页数 = 3 1 6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